

GEKAUFTE ZEIT

购买时间

DIE VERTAGTE KRISE

DES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德]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 ■ 著

DEMOKRATISCHEN

常 暄 ■ 译

KAPITALISMUS

译 莱
从 茵

本书分析了2008年以来
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
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转化

Wolfgang Streeck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 著

常恒 译

购买时间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GEKAUFTE ZEIT
DIE VERZÖGERTS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德）施特雷克
（Streck, W.）著；常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
（莱茵译丛）

ISBN 978-7-5097-7603-2

I. ①购… II. ①施… ②常… III. ①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研究 IV. ①F83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4099号

·莱茵译丛·

购买时间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著 者 / [德]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

译 者 / 常 暄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张 骋 冯立君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188千字

版 次 /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603-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4-0693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序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一书即将付梓，作为译者照例有必要提笔简单写几句。译者居于两种语言文字之间进行文本的转换工作，对于原本来说，他是接受者，而对于翻译文本来说，他又是生产者。这样的一种双重身份让我既可以从接受者的角度来写一点可能并不算太成功的读书笔记，又可以从生产者的角度来对自己的劳动做一些总结和说明。

关于书名

“购买时间”这个标题不得不说还是有一定歧义的。因为按照汉语的习惯，人们可能会首先把它理解成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短语，即何时购买，且按这种理解方式的话，购买的宾语也不是时间；而作为本书书名的“购买时间”则是

一个动宾短语，就是花钱买时间的意思。

我于2013年年底接到《购买时间》一书的翻译任务，刚拿到书时，德语书名就吸引了我——“Gekaufte Zeit”，它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买来的时间”，让人产生的联想是，书内描述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时间，而这些时间是通过购买的手段获取的，因此，最初与出版社暂定的书名就是“买来的时间”。另外，本书的副标题是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字面直译是“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拖延了的危机”。买来的时间和拖延的危机，两者从结构上还算工整。

后来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作者自己解释 *Gekaufte Zeit* 来源于英语 *Buying time*（购买时间）这个惯用语，意指通过种种手段（不一定要用到金钱）来拖延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的发生。从本书的内容上看，作者施特雷克想要分析论述的重点也不是时间，而是向读者展示西方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使用了哪些方法去拖延合法性危机，以期阻止其发生。纵观历史，从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时代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分别使用了通货膨胀、国家债务和私人信贷市场扩张的方法，使用“金钱”这种神秘的机制不断试图消除社会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上述三种措施，每个措施大约奏效了约十年，但这种应对措施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假象增长，因此它只能拖延危机。到了2008年，合法性危机终于以资本主义世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面目表现了出来。为了能让书名更好地体现书的内容，最终将书名定为《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关于本书的线索

关于本书的结构，我不想重复作者在引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的东西。只是诚如作者自己所说，正文的三个章节是他三次关于阿多诺的讲座内容的扩展，由于是三个讲座，因而内容略有重复。作者的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扎实，驾驭各种资料和信息的能力极强，书中也常常会插入性地讨论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作为读者，我在面对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的高水平学术著作时，还是想理清头绪，把握线索。因此，我始终在思考这样几个最基本的问题：作者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研究了什么东西？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首先，作者立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危机理论，从其特有的社会生活和致力于资本利用和财富增加的经济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出发，把当前的以银行危机、财政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三重表现的新型危机放到一个历史发展的顺序中，用动态的视角审视它。然后，作者感兴趣的“是过程而不是状态，或至少是与过程相关联的状态”。要连续地对待以各种不同形态爆发的危机，并把它们视作整个社会发展的契机，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战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权逐步消解的过程。最后，从这样一个历时的角度出发，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相似性和交替影响要大于一些社会学共时横向研究中得出的，对于“资本主义类型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各种民主制度的不同。

作者分析研究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富裕民主

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而在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大背景下，这种政策的制定始终面临着一对矛盾、两种期待。一对矛盾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矛盾。两种期待是国内民众和资本之于国家的两种不同期待。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在战后的黄金时期西方经济高速增长，这对矛盾关系一度得到了调和。但是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由大多数民众选举出来的政府要满足众多选民的利益诉求，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诉求。民主制度总是希望更多以干预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以期让大众从经济发展中更多获益，实现社会公正。相反，资本在寻求利润的最大化中，需要的是市场公正，民主制度越少干预经济行为越好。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在负债国家中，民众和资本拥有者成了负债国家中的国家人民（Staatsvolk）和市场人民（Marktvolk），前者要求国家提供生存照料，而后者要求国家能够有能力清偿债务。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两种期待中左支右绌，蛋糕实际上只有这么大，但为了让它够分，不得不采取措施让它显得更大一些。作者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政策不过是用放大镜让蛋糕看起来更大，是在购买时间。通货膨胀、国家负债和个人负债三种方法，每使用一个，都让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一个比之前更加困难的局面。国家也随着三次购买时间的举措从财税国家向负债国家以及整顿国家转型。当下的危机中，三种购买时间的策略都已经用尽，有人试图用国有化银行来化解危机，但这只能是又一次用假象财富来解决问题，而且这种方法的有效期极短，副作

用极大。

作者自己也认为，有时候只能指出失火了，却未必能给出救火的方案。在我看来，他至少给出了一个否定形式的行动建议，即不要再购买时间！此外，人们应该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比以往更尊重差异和主权。第三章及尾声中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作为整顿国家的欧洲以及欧元，是对作为统一货币的欧元区的冷峻思考，给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过快过热的狂喜浇上了一盆冷水。当失败者永远是失败者时，他就不再有兴趣按照既有的游戏规则继续参与了。无论是各民主国家中对选举态度漠然的中低收入人群，还是威胁退出欧元的希腊都是很好的例子。

关于翻译

本书的主要翻译工作是我于2014年在德国弗赖堡大学交流期间完成。书的语言虽算不上艰涩，但概念和术语还是很多。作为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门外汉，在处理这些概念时，我从我的同事那里得到了非常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在对原文的理解上，我在翻译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德国朋友的帮助。作者施特雷克教授得知我是中文译本的译者后，给我发来了他认可的英语译本供我参考。这个英译本给我的翻译带来不少帮助。没有上述的帮助和支持，我的翻译很难顺利完成。因此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由于译者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少错漏，我个人对这些错误负全部责任，也恳请广大读者能够批评指正，以期在再版中将这些错漏之处一并改正。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最后，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提供翻译资助的歌德学院表示感谢；同时也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细心的审校工作表示感谢。

常 暄

2015年6月于南大和园

目 录

引论 危机理论——过去和现在	1
第一章 从合法性危机到财政危机	16
一种新型的危机	22
危机理论的两个意外	28
另一种合法性危机和战后和平的终结	40
漫长的转折：从战后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47
购买时间	53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改革：从财税国家到负债国家	74
民主失效而导致金融危机？	75
新自由主义革命中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	78
外篇：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	86
饿死野兽！	93
税收国家的危机	101

从财税国家到负债国家	104
负债国家和分配	109
负债国家的政策	112
作为国际金融外交的负债政策	127
第三章 整顿国家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在欧洲	135
一体化和自由化	136
作为自由化机器的欧盟	143
体制转型：从凯恩斯到哈耶克	151
作为欧洲多层次统治的整顿国家	154
作为国家转型的财政整顿	159
增长：回到未来	171
外篇：地区增长方案	183
关于欧洲整顿国家的策略能力	198
国际整顿国家中的抵抗	211
尾 声	221
下一个是什么？	221
现在怎么样？	222
资本主义或民主制度	231
作为轻率试验的欧元	234
欧元国家中的民主？	237
赞誉贬值	243
欧洲布雷顿森林	248
赢得时间	252
参考文献	254

引论 危机理论——过去和现在

这本书是我在 2012 年做过的关于阿多诺的讲座的扩展版，几乎正好是我在法兰克福完成社会学学位四十周年之际完成。^①

① 我要感谢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霍内特（Axel Honneth）教授以及苏尔坎普出版社邀请我，并给了我这样一个整理思路并将之充分阐述出来的机会。研究所的 Sidonia Blättler 女士在我于法兰克福逗留期间做报告时亲自到场，并做了精心和值得信赖的组织工作。Eva Gilmer 女士对手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仔细的审读。在我的讲座前期的准备和后期的完善工作中，还对材料和数据进行了整合，在这些工作中，科隆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研究所的学生和助手们在各个方面给我提供了帮助，其中有 Annina Assmann、Lea Elsässer、Lukas Haffert、Daniel Mertens 和 Philip Mehrrens。Lea Elsässer 特别为本书中支持我的论点的众多图表做出了贡献。另外，如果没有我的同事 Jens Beckert、Renate Mayntz、Fritz Scharpf、Martin Höpner、Ariane Leendertz、Armin Schäfer 等的帮助，我本人能够对这个问题产生的想法可能连我在本书中提及的一半都不到。当然，如果我对某个问题的理解尚不到位，这只能是我个人的原因。

我并不能说，我曾是阿多诺的学生。我当时参加过他的一些讲座和讨论课，但是听懂的东西不多；那时的情况如此，我也只好如此。直到后来，我才在非常偶然的时机中清楚地认识到，那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损失！于是，阿多诺给我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象便是他从事研究工作时那种深深的严肃性——这与今天，社会学的专业化已经有了几十年历史，很多人以那种内在的漠然从事学术工作形成了可以想象的鲜明对比。

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人会认为我把崇拜阿多诺的作品当作一项天职。我甚至也放弃了逐一去寻找我能说的东西和阿多诺遗留下来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因为这看起来既不自然，也非常狂妄自大。如果一定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也是非常宽泛的意义上的。这其中包括，我从直觉上拒绝相信，危机总是能以好的方式结尾——这是一种我认为在阿多诺那里同样可以找到的直觉。那种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那里具有代表性的，我想将其称为功能主义安全感的东西在阿多诺那里是完全看不到的；在他眼里，所谓一切东西总会在某个时刻自发地回归到好的平衡关系的判断是根本没有任何保障的。“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解决的方法”，对于这样一种荷尔德林式的基本信任感，阿多诺实在无法苟同。无论如何，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在我看来，社会秩序在通常情况下是脆弱而不稳定的，任何时候都完全有可能出现令人不快的意外状况。另外，我也反对要求一个对存在的问题做出描述的人，必须在分析的同时一并给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来^①——所以我在本书中也不会向这样的诉求屈服，尽管我在本书的最后仍然试图基于危机的某个方面提出一个尽管不是非常现实的建议，告诉人们该如何去做。人们面临的问题完全有可能是无法解决的，或者至少在这里以及现阶段没有解决的可能性。如果有人充满责备语气地问我，那“好的东西”在哪里的时候，这便又是个绝佳的机会重新回归到阿多诺，他的回答定然是：“什么？竟然会完全没有任何好的东西？”只是他本人也许会找到比我更加优美的语言表达。 8

我这本书将以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到 70 年代早期，也就是阿多诺那个年代，当然也是我在法兰克福求学时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危机理论来关注当代民主制度下资本主义的金融和财政危机（Finanz- und Fiskalkrise）。我所引述的诸理论是试图理解那个年代战后政治经济中开始出现的作为整个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断面的变革。他们往往还或多或少折中地化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从这些理论中生发出来的

① 关于经济学家是如何要求同行们，以及把因为缺少问题解决方案作为不同意其诊断的理由的实际现状，可以参考 2012 年夏，德国报纸上所谓的关于欧债危机的“经济学家之争”。一位在“致全体亲爱的同胞们”的“对欧元持怀疑态度”的公开信上签字的经济学家在几天之后，作为对公众可能爆发的愤怒的反应，又在另外一个态度相反的声明中签字支持。对此，他在一家英文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解释其做法：“我相信，经济学家应该有义务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像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消防员，你的责任是灭火，如果你只在那里大喊‘着火了！’肯定是不够的。”2012 年 7 月 15 日，*The Guardian Online*，网络链接：<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2/jul/15/europe-economists-letters-national-autonomy>，最后获取日期：2012 年 11 月 26 日。然而这个世界上有的火是没有办法或者至少暂时是没有办法扑灭的。

对现象的阐释是非常不统一的，它们有的仅仅是粗略的模型，并且随着事件进程的发展，也在经历着变化和修正。当我们去回顾这些理论时也会发现，在这个大的理论家族中总有人固执地坚持一些不重要的区分，这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没有必要，有些甚至无法理解。因此，本书中也就不再会去探讨，究竟当初谁说得更正确一些。

法兰克福年代的理论尝试说明，社会科学的认知无可避免地和它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同时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才会在研究当下事件的时候重新回归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此外，也因为今天人们再一次知道并能够说出一个几十年来被遗忘或被认为不重要的事实——富裕民主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因此，理所当然地也只能借助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才能解释。回过来看时，我们就能认识到当初人们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事情还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抑或是因为人们因为政治因素的左右而不愿意认识到而已。尽管存在着一切理论上的努力，人们却还是忽视了重要的东西和新发生的现象，这可以提醒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总是面临着开放性的未来，历史也无法预言——这种状况现代社会学仍然没有能够完全加以厘清。^① 另外，尽管历经种种变迁，在当下仍然能够再次找到在过去就已经发现但被遗忘的东西。当你把社会构成当作一

① 当然这就是在于它如果总是把自己理解为通则式研究的科学（nomothetische Wissenschaft），并以这样的方式对外呈现自己。人们因而不能就这一点指责法兰克福社会学。

个发展过程来理解，它能够自始至终地将变化的结构维系在一起，并且人们在回顾它的时候能够理解其即使是难以预测的内在逻辑；这时你会发现，如果说用静止的方法观察世界有多不可靠的话，那么社会构成究其几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却保持着近乎一致的面貌。

我对于当下资本主义金融和财政危机的分析致力于连续性地对待它们，并把它们视作整个社会发展的契机。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开始，在我看来，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并且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将之描述为战后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权逐步消解的进程。^① 如前所述，我这本书中对于资本主义这一发展历程的理解缘起于当时借助既有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来试图阐释这一初步形成雏形的现象的一种理论探索。这些理论当中还包含后来由阿多诺率领的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某些研究，尽管阿多诺本人可能并未直接参与其中。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危机理论的关键特征在于其启发式地假设社会生活和由资本利用及增殖的必然律令控制的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则性的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在战后形成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则以多样化、历史持续发展的方式，通过国家的政策表现出来。社会机制，首先特别是那些政治经济类型的，因而看起来总是饱受

10

① 一个历史进程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任意性，因为历史总是相互联系的，并且任何历史事件也都有其相应的历史背景。尽管如此，还是存在着明确的标志和形式化的契机。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外一个新时期的发端，渐渐已经成为共识，因此我对此也完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

争议，且总是在各方面格格不入的行动导向之间做出妥协的权宜之计；社会体制因而也就是自相矛盾、从根本上不稳定的临时选择，最多不过是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平衡而已。最后，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社会经济也就不是仅作为技术的或者是自然的法则决定的，由拥有不同利益和资源的参与方之间的受公权力保障的互动行为构成的行为体系。

通过采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理论，并试图将其放置在此后 40 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去加以更新，我将当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嵌入一个发展顺序当中（Streeck 2010），并用动态的视角来审视它。以这样的方式从事宏观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一条正确的路子，这是我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者多年从事各个社会领域的大量研究得出的结论。^①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我感兴趣的不是状态，而是过程，或者是和过程相关联的状态。而那些把结构和事件当作静止的特征和可能性空间中不受约束的独立事件的理论则必然导向歧途。一切社会之物都处在特定的时代中，并且在时代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与自身有着更多相似之处。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只有当我们知道它昨天是什么样子，并且处在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之上时，才能真正理解。一切现存的事物都处在某个发展路径的半途之中。如何体现这些东西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书的三个主要章节中都有着大量的展示发展进程的图表以及精心雕琢的叙述性

^① 参见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关于德国政治经济学自由化的研究（Streeck 2009b）。关于资本主义作为发展阶段的分析，见 Streeck（2011c）。

文字。

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这一点很重要，不仅如此，除了事件在时代中的发生时间外，还有地点。空间作为因邻近而构建起来的社会语境，对于社会来说起到的作用完全不亚于时间。起作用的不仅有共时的时间，^① 还有历时的，也就是历史时间。社会科学的认识只有在人们将其配上相应的时间与空间的索引，才是真正的认识。本书中将谈及的危机是西方世界富裕民主国家语境下的资本主义危机，这一语境在大萧条的体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重建，20世纪70年代战后秩序的崩溃，“石油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事件中渐渐形成。对于其他社会来说——无论当下的还是未来的——这一危机都是有意义和影响的，但这种意义和影响究竟如何，还要由历史具体的和实践的行动来决定，并且通过实证的研究来加以厘清。我们关于危机所知道的一般情况——无论是政治危机还是经济危机——都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但是至少与之同样重要的是这次危机的特殊之处，以及那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它构成了这一危机的特殊属性，并且我们要从它时间和空间的语境中慢慢将其分析阐释出来。

12

显而易见，将时间维度纳入对当下金融和财政危机的观察中在多个方面都具有启发意义。首先，在历史语境下，各项社会学方面的横向研究观察到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在各民族国家社会中的区别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在诸多“资本主

^① 就如同在“路径依赖性”概念中（Pierson 2000；2004）。

义类型”（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研究（Hall 和 Soskice, 2001）中，这些区别被看成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本质特征。^① 如果人们把危机视作被拉长了的发展顺序中的一个中间阶段的话，不难看出，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似性和交替影响要远远大于它们在体制和经济上的差异。无论其地域上的具体情况如何，即使有如瑞典和美国那样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家，其内在的机制却是同一的。超越时间去观察，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最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的领导地位则表现得最为明显。一切引领民主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事件都是在那里发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和通货膨胀，抗税和减税带来的预算赤字，政府行为增长的债务融资，20 世纪 90 年代的整顿风潮，作为政府职能私有化政策一部分的金融市场解除管制，此外当然还包括 2008 年的金融和财政危机。

同时，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因果关系和内在机制也只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实现，如果是涉及社会制度或者整个社会的适应和变革，也只是在较长时间上。我们时常会低估了社会问题的原因和其产生的影响之间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如果人们过早地询问，一个关于变革或者某种社会形态终结的理论究竟是否正确，就会存在着我们在理论彰显其有效性之前就急于做出否定性判断的风险。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在当时的实证观察之上的关于全球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国家经济体间消除疆界不会对社会国家造成负面影响。今天我们却知道，事情

^① 关于对“资本主义模式理论”的批评，见 Streeck（2009b；2011b）。

的发展只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认为一个像欧洲福利国家那样成熟且近于迟滞的社会形态会在数年的经济国际化之后就消失掉或者演变成一种完全与以往不同的东西，这个前提就是错误的。体制的变革通常甚至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一种渐变式的变革出现的（Streeck 和 Thelen, 2005）。这些微小的渐变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可能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早已经成为主导事物发展的核心。^①

除了社会和体制变革的长期性以及渐变性的本质以外——而且多长时间才算长？——社会发展还总会不断遇到各种相互作用的原因，因而它的发展进程变缓，或是发展方向改变，或会出现新的调整，或是发展进程停滞。^② 社会观察其自身中起作用的趋势，并对它们做出反应。在此期间会

① 参见关于劳动关系的“德国模式”转型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跨企业的工资生成体系的第一次破裂或许还可以被解释成以保持体系本身为目的和结果对变化了的情况灵活的适应。然而当其逐渐解体的过程一步步推进的时候，把这一过程阐释为系统的“双元化”的解释便开始一点点确立其地位，与此同时，旧的制度尽管失去了其普遍性的特点，却还仍然是同样的东西（Palier 和 Thelen, 2010）。当系统的边缘越来越多地以相同的发展方向侵蚀其核心的时候，无论这个过程多么缓慢，分解成多少步骤，这一阐释都越发不可避免地在某个时间点上必然要被扬弃，并且这一过程应当被描写成从其一开始就呈现出的样子：一个迄今由政治而不是由市场力量引导的在社会领域的自由化过程（Hassel 1999；Streeck 2009b）。

② “反作用的原因”（*entgegenwirkende Ursache*）概念在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滑的理论中占据中心地位 [Marx 1966 (1894), 242 页及其后]。这个“规律”因此就不是决定论的，因为它预见到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可以被相反的发展阻止的可能性。这一发展则可被解释成一个原因的影响——正如一种“潜在的下降”的影响——然而这一发展趋势因为相反的作用，从实证上却无法被观察到。就连在波兰尼那里，当他提到社会对于市场扩张及其向“虚拟商品”如土地、劳动和资本延伸的反作用时，反作用的原因概念也居于中心地位 [Polanyi 1957 (1944), 第 11 章]。

展示出无比丰富的发明创造，它的范围大大超出社会学者们的想象力，甚至也包括那些正确认识到了内在的但表面上尚存争议的发展趋势的学者们。20世纪7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的危机让那些即使对晚期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毁灭或必然自我毁灭理论缺乏兴趣的人也不得不重视。他们也感到了批判理论或多或少预言了的紧张，并对此做出反应。用今天来回顾过去，这种反应是中长期——然而也逾四十年——成功地借助于金钱来购买时间（Kaufen von Zeit mit Hilfe von Geld）。“购买时间”是对英语表达 buying time 的字面翻译，它意味着尽量拖延当前存在的事件，以期阻止事情的发生。这个过程并非一定要使用金钱，但在书中讨论的案例中则用到了金钱，而且还是数量巨大的：通过使用金钱——这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最神秘的机制——来消除社会冲突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首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国家债务，接着是私人信贷市场的扩张，最终是今天由中央
15 银行购买国债和银行债务。就像我将在本书中阐述的那样，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延迟和加剧，通过购买时间的举措和被我们称为“金融化”（Finanzialisierung）的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过程保持着密切的关联（Krippner 2011）。

如果选择了一个范围足够大的时间框架，那么就可以把当下危机的发展看成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对危机的辩证过程。^①如果回顾过去，并且放置到一个相对更长的发展次序中来看

^① 关于辩证转型概念在当代机制理论中的复兴，参见 Greif（2006）以及 Greif 和 Laitin（2004）。

的话，短期内被认为是危机终结——当然同时也可以看作是驳斥了当前版本的危机理论——其实不过是深层次的引发一轮又一轮危机的冲突和整合缺失在表现形式上的变迁。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我们认为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一般根本不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就又转变成了新的问题，或曰：成了以新面目出现的老问题。每次战胜危机，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它又成为一次新的危机的前奏。这一过程历经复杂而又往往无法预料的转折，以至于人们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忘记了这样的基本事实：只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脚步——市场不断“攻城略地”（Lutz 1984；Luxemburg 1913）——与社会生活世界的逻辑相冲突，一切稳定措施都只不过是临时的。

我在法兰克福做学生时并不算太美好的记忆还包括，当时的讲座和讨论课——至少对于我个人的口味来说——过多地探讨了各种“理论”，而非借助这些理论研究的对象。那种人们可以在如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当中找到的世俗现实性（Mills 1956），是我当年作为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弟子渴望而无法得到的。及至今天，没有历史和地方特色，不给异域风情或是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荒唐事留一些位置的社会学对我来说都是很无聊的。尽管我已经因此准备在理论上轻装上阵，但显而易见的是，我的主题——富裕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必然要求我在研究中联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传统。宏观社会学危机和政治学民主理论，如果不联系经济，单纯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的行为去研究，很明显是不合适的。这就如同任何政治和社会中关于经济的概念不可以割

裂当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来谈一样。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没有人能够不通过把政治和政治体制放置到同市场和经济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结构和冲突的密切关系中来理解它们。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属于前者？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我也不想花力气去研究。历史发展的结果还在于，我们现在已经无法非常确切地在阐明事件的过程时说，非马克思主义在哪里终结，而马克思主义在哪里开始。无论如何，现代社会学，特别当它研究整个社会及其发展的时候，是不可能不引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即使它是以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面目出现的。^①我总是坚信，如果不使用某些上溯至马克思的核心概念，人们是无法理解，或者说只是很有限地理解现代社会当前的发展的——并且，随着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即将诞生的世界社会（Weltgesellschaft）中越来越清楚地扮演着驱动力量的角色，上述情况就变得愈发明显。

我有意识地将我关于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思考设计

① 这理所当然，同时也确实是在一定的程度上符合像马克斯·韦伯这样的人，终其一生他都——也许是出于好的心意——始终未公开谈及马克思或者引用其论述。相应的，与其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相比，在德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被以更为粗暴的方式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带清除出去，或者学界尽量设法与其划清界限。像“资本主义”或者“阶级”这样的概念在其他国家更能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日常话语中。人们只要读一读当时美国“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流行的主要著作——比如Rostow [1990 (1960)] 或 Kerr et al. (1960)——就可以知道在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强国，人们在学术和政治话语中重新引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无论是正确的理解还是错误的解读，都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得较为宽广。展示在您面前的如同用粗笔绘在巨幅画布上的画卷。语境和顺序居于中心，而事件则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粗略的相似性排挤细致的差异；事实和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了比它们本身更多的关注；综合优先于分析；各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也进一步地被忽略。论点也呈现出非常多元的和大的跨度：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罢工潮到欧元的引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通货膨胀的停止到 20 世纪末收入不公的快速增长；从欧元共产主义（Eurokommunismus）时代的包容政策到地中海国家当下的财政危机，以及其他很多东西。也许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一一被更专业化的进一步研究所证实；这是我要冒的风险，同时也是每个对多个动态进程 18 同时进行表观观察研究的风险。但是，我当然也有信心，绝大部分的论点最终能够得到证实。

本书的结构，依其三个主要章节来看，是和三次讲座相对应的。因此，内容上就会有一些重叠的地方，此外也会出现一些令人惊讶的顺序安排，这在一本完全体系化的书中也许是不会出现的。不过可能一本过于体系化的书却恰恰会削弱可读性。所有我引用作证据或者插图的事实和数据都或多或少为大众所知，或至少出现在专业的期刊中；我所做的贡献，如果能谈得上贡献的话，就在于我将它们纳入了一个更大的历史理论语境中去对待。三场讲座，原来每个需要大约一个小时的报告时间，我后来又对它们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使其更加明确和具体。为了不影响阅读的通顺，我使用了脚注的方式，通常是为了引用《纽约时报》上显然是毫无顾忌地进行研究的报道又或是传递一些令人惊悚的事实情况，

这些会让我们对那些慢慢已经成为正常现象的事实哭笑不得。有时候我也会使用脚注去表达更为大胆的、进一步的假设，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文字而无法进入正文中。

《购买时间》如前所述，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的开始简短地介绍了金融、财政和增长危机的关系，以及它如何给人们制定政策不断提出新的谜题，如何让迄今所有的危机管理收效甚微。接着，我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不断明晰了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skrise）的理论，并试图理解，为什么从种种情况来看，该理论并不能为社会的发展做好准备，并且社会的发展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也驳斥了这一直觉。当然，被拉长了的从战后社会资本主义向21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型首先就属于这些社会发展的重要事实。进一步的我还想描摹出20世纪70年代预言的危机确实爆发了，并且随着时间不断表现出新的形式，直到2008年以今天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19

第二章专门讨论了国家财政的危机及其成因和后果。这一章节从对日益走红的“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开始，其核心理论认为，国家负债的增长主要归咎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过度的民主，此外这一理论还论证了，不断增长的国债应该被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变形或是1945年以后产生的民主资本主义的“回归”（Agnoli 1967）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这种发展，依我的观点看，使那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处于理论中心位置的 [Schumpeter 1953 (1918)] “税收国家的危机”当下化了。接着，我把负债国家当作真实的制度形态来加以研究，这种形态最迟在20世纪80年代就

取代了传统的税收国家形式。此外，我还关注负债国家和社会生活机会的分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负债国家和阶级结构的关系，在负债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冲突以及国家公民和“市场”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本章结尾处，我讨论了处于理论核心地位的关于负债国家的国际维度以及政府国际金融外交角色。

第三章中，我讨论了一种慢慢取代负债国家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并且我把它叫作“整顿国家”（Konsolidierungsstaat）。它在欧洲的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与长时间以来作为欧洲国民经济自由化机器起作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可分割。我的分析在于描述了作为欧洲多层次政体的整顿国家，并指出，财政整顿的过程是欧洲国家体系的一项基础的，实际上也是根本性的改造。本章最后，我还思考了关于反对派政党针对这一改造的可能性和边界问题。 20

最后，在结尾部分，我将我所有的中心论点再次综述，同时结合 2012 年夏季和秋季的公共讨论，以欧洲货币联盟和欧元未来为例，试图对有可能减缓资本主义扩张过程——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全球化”——并且保留对“市场”进行民主监督这一选项的危机做出了可能的回答。

第一章 从合法性危机到财政危机

种种迹象表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法兰克福学派流行的新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被认为是错误的。也许因为像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种宏大的社会形态的变革和消解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至少对于那些缺乏耐心的理论家来说是太长了一些，以至于他们在有生之年急于想知道他们的理论是否正确。并且社会的变迁实际上还会经历理论上不一定会有有的令人惊异的歧途，因此这些只能在事后，或者事发的当下再做出解释。无论如何，我的观点是，对于21世纪初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人们只有把经济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危机看作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约1975年前后——开始的发展过程暂时的高潮才能真正理解

它，危机理论也是那个时代最早的理论尝试。

今天再回顾过去，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转折时代已经没有争议了：^①战后重建此时结束了，作为战后资本主义政治国际秩序（Ruggie 1982）的国际货币体系也逐渐开始破裂，经济行为中的阻碍和停滞的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节点也卷土重来。从马克思主义中以各种方式应运而生的那些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理论对于当时政治和经济的情况比其他社会学理论直觉上能够更好地进入。然而，那些试图把从1968年的罢工风潮（Crouch 和 Pizzorno, 1978）到所谓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剧变纳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更为宏大的历史语境中去的理论尝试也很快几乎被人们完全遗忘，而那些和作为批判理论的危机理论一直紧密相连的实践上的意图也不过如此了。发生了太多令人惊讶的事情。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Habermas 1973；1975；Offe 1972b；1975）企图重新确定那一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紧张和碎裂。然而事情的发展方向，包括后来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使得这一理论失去了解释力。该理论的诸多问题中的一点在我看来应该在于，它从根本上接受了战后“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描述：即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政府和大企业联合管理，其构成和适应是为了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并尽可能地抵制体系性

^① 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众多当代历史研究中请参考：Doering - Manteuffel, Raphael (2008) 以及 Raithel et al. (2009)。关于西方世界可参考 Judt (2005) 以及 Glyn (2006)。作为现代历史上的标准化石 (Leitfossil)，参见向三边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民主的“可统治性”的报告 (Crozier et al. 1975)。

的危机趋势。对他们来说，值得怀疑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在政策上引导的可能性，而是其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合法性。因此，在我看来，这一理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低估了资本作为政策行动者和有战略能力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并高估了国家政治的行动和计划能力，于是用国家和民主理论来代替经济理论，从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遗产中的核心部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大损失。

24 1968年前后的危机理论几乎没有对以下三个发展做出准备：首先是资本主义迅速地，以令人惊讶的成果，回转到了“自我调控的市场”，以取消管制、私有化以及市场扩张等各种可能的方式来重新焕发资本积累的活力。所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亲身经历过这些的人，都会迅速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产生理解上的困难。^①其次，对于合法性或是动因危机的预测也同样如此。20世纪70年代已经可以看到广泛扩展的社会对于受市场调节或者市场为导向的新生活方式的认可。比如，特别是女性对于“异化的”薪酬工作热情的渴望，以及超过所有期望的消费社会的发展（Streeck 2012a）。最后，伴随着战后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变迁的经济危机，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负债对于合法性危机理论来说

①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概念逐步地被重新调整定义，同时它最终的言外之意被剥离出来。对于Claus Offe来说，回顾着来看，这甚至是个“概念上的错误”（Offe 2006a），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越发显得没有任何其他替代道路可选，并且问题的核心在于调节和管制的方式和方法，而不在于如何克服制度本身。

还只是很次要的地位。^① 这与受涂尔干 (Durkheim) 启发, 作为戈德索普 (Goldthorpe) 和赫希 (Hirsch) (Goldthorpe 1978; Hirsch 和 Goldthorpe, 1978) 关于分配政策的社会混乱状态的表达的对通货膨胀的解释不同, 也与如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范畴内预言了所谓的“国家财政危机”, 以及由此导致的由工会组织起来的 25 国家人员和废弃的过剩人口的代理人组成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盟的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 Connor) 那样的作者的理论完全不同 (O' Connor 1972; 1973)。

下面我想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做历史的描述。它可以在我视作反对战后混合经济 (mixed economy) 的资本的反叛, 短暂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扩张的劳动力和消费品市场广泛的普及性以及从当时到现在的一系列危机现象——这一危机到今天以银行、国家财政和经济增长的三重危机形式达到了迄今的高潮——之间建立起联系。同时, 20 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解除束缚” (Glyn 2006) 在我看来是资本的占有者和支配者——所谓的食利阶层——反抗 1945 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必须接受的多样化限制, 以便在体制竞争的条件下为获得政策可接受性的成果。这一成果具有可能性, 同时出乎所有预料, 作为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体系再现活力也完全可以实现。对此, 我的解释就是用金钱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购买时间的国家政策, 它

① 极有可能的原因是, 这一理论就在德国诞生和发展, 而在这里人们又比其他国家更少地感受到了危机。人们可以回想一下政府官方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关于德国模式的论调。

通过使货币总量膨胀，不断增长的国家负债以及最终所谓大众忠诚（Massenloyalität），即慷慨地向每个家庭发放信贷，来保障作为消费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稳定，这在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每个这样的策略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所熟知的方式归于无效，因为它在慢慢消弭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对正当回归期待的尊重与满足的运转基础。于是还是会阶段性地反复出现合法性问题，然而首先不是在大众中，而是在资本运行中，它往往会以经济的再生产危机和积累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些危机又会在民主授权的民众中催生出针对制度合法性的危险。如我即将说明的，这些问题的克服只可以分别通过政治经济的自由化以及经济政策的免疫化来抗衡来自下部的民主的压力，以期重新获得对市场的信心。

用回顾的视角来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史看起来就是很古老、很基本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发展的结果——是二战以后两者之间的包办婚姻逐步破产的进程。当民主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在资本面前成为积累问题后，作为解决的条件，便要求越来越多地把资本主义经济从民主的干涉中解放出来。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来说，当经济对作为大众民主的民主制度产生免疫，稳定其大众基础的地方就从政治转移到了作为产生贪欲和恐惧^①的资本主义基调的机制的市场中来。我想把这一过

① 贪婪和恐惧，按照由金融理论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自我描述，是股票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中一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行为动因（Shefrin 2002）。

程描述为战后资本主义建立阶段的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变形成为新哈耶克经济体制的过程。

我的结论则是，现在与 20 世纪 70 年代不同，我们现在也许确实生活在一个自战后以来的政治经济形态的晚期阶段——在当时尽管形式不同的危机理论中，已经预见，甚至是热切期待着。我很肯定，我们今天确实处在民主制度的晚期阶段，如我们所知，民主制度正在走向一条被阉割为再分配的大众民主，或是被缩减为法治国家和公众娱乐的组合形成的道路上。像我想展示的那样，所谓借助民主的去经济化的资本主义去民主化进程，自 2008 年的危机以来，也特别就在欧洲地区发展迅猛。 27

我们的时代是否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晚期，这一问题不得不处于搁置状态。在新自由主义变形的民主政治下的体制性的无理要求和市场的公平性之间完全是不相容的。然而，在一切的说服教育的努力之下，部分民众仍然存留有对社会正义的模糊期望。当这种期望在一个已经回归到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状态的民主体制下得不到表达时，便可成为各种混乱的抗议活动的推动力。这种可能性在早先的危机理论中一再被提及。这种类型的抗议活动是否危及自我呈现出的资本主义三分之二社会（Zweidrittelgesellschaft），甚至其全球“极富经济”（Plutonomie）^①的问题也必须搁置一边：多样化

^① 花旗银行（Citibank）的研究部门创造出这个概念，为了打消其精选出的客户对于资产管理的恐惧，他们将来的富裕，就如同在凯恩斯主义的世界中，是与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福祉息息相关的（Citigroup Research 2005；2006）。

的，首先在美国被发明出来且充分尝试了的管理所谓被抛弃了的社会下层的技术看起来完全可以向别的地方移植，也包括欧洲。处于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在可能的服用兴奋剂式的花钱救市带来的风险和副作用之后，并且这一方法在未来必将被摒弃的情况下，还有没有替代的增长良方，以保持富裕国家中资本积累的运行。对此，就如同我在本书的尾声中所做的那样，人们只能加入推测。

一种新型的危机

今天，西方富裕民主社会的资本主义正处在三重危机之中，它会持续多年，且暂时并无终止的希望：这包括了银行危机、国家财政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没有人能够对这一毫无先例的情形做出预判，既不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也同样不可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德国，人们反而因为很偶然的，从外部视角看来完全带有奇异效果的特殊条件^①几乎没有感受到危机的影响，并且因此还倾向于告诫人们不要过于沉浸于“危机的歇斯底里”中去。在几乎其他所有的富裕民主国家中，包括美国，2012 年的危机已经深刻地影

① 这些特殊条件在于，德国一直以来并未听信更懂经济的同伴们的建议，而很好地捍卫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并且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时，也只是缓慢地走在通往人们一度大肆吹捧的以美国或英国为蓝本的“服务业社会”的道路上。因此，2008 年后，它还可以出口产品，特别是其他供应商无法以同等质量替代的高档汽车和机器。同时，德国国民经济也得益于中国的高增长和深陷危机的美国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平衡。另外，整个欧元区的汇率是固定的，并且这个汇率低于只有一种德国货币的情形。欧洲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压低了欧元的汇率，并且这种情况还将持续。

响了几代人的生活和生活规划，同时人们也感受到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银行危机来源于，在金融化的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中，过多的银行提供了过多的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贷款，而它们中的大部分突然之间变成了坏账。因为没有一家银行可以肯定，正在和自己进行交易的银行会不会第二天就轰然倒闭，所以众银行便不再会相互间提供贷款。^①同时，它们还必须担心客户们基于任何一种原因感觉到钱放在那里并不安全，而开始要求兑现，好把投资收回，并放置到另外一个他们认为更加安全的地方。因为监督机构要求，银行应该提高自有资本和应收款项之间的比例以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所有银行就必须更加克制自己发放贷款的行为。能够起作用的措施包括接受坏账、无限制地保障投资安全以及国家收购银行，最好是将所有的银行一起收购。但是为了“拯救银行”需要的金钱却是一个天文数字，国家已经负债累累。更不要说也许这 30 样做会比干脆让一家家银行发生连锁反应都倒闭掉的花费只多不少。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也只能大致估算。

① 关于银行危机的范围到底有多大，由于事物的本质决定了人们无法给出统计的数据。什么样的贷款才算是坏账，银行自己有时候都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但是当银行确切知道后，它首先要做的是想尽办法去捂住这个消息（除非银行可以把已经毫无价值的债券置换到由国家经营的一家所谓的“坏账银行”中去）。同理，国家银行体系的相互构架的坏账范围也只能由政府或者国际组织经评估来推测。公布出来的由政府或国际组织进行的所谓“压力测试”的结果也都并不真正可信，因为把问题公之于众很可能会导致问题立刻发展成危机。因此，压力测试从一开始就已经预设了要给出让人们安心的结果。参见最近欧洲对于西班牙银行的情况做出的不引人注目的结果报告。

第二，所谓财政危机是数十年来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和相应增长的国家债务的结果，这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图 1.1）^①，同时 2008 年以后，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资本重组以及接盘毫无价值的债券来拯救金融业，通过财政刺激来拯救实体经济，都需要政府大量贷款，这也造成了财政危机。由此产生的国家无支付能力的风险上升在一系列因为有着新老债务而财政负担巨大的国家中显现出来。为了重新赢得对“货币市场”的信心，国家号召自身和公众采取严厉的节约措施，在欧洲实行相互监督，甚至完全禁止出现新的债务。这一措施显然无法解决银行危机，甚至对于实体经济的衰退也无能为力。节衣缩食是否能减少债务的负担还存在争议，因为这样一来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反而对其产生抵制。对于减少国家债务来说，经济的增长和保持平衡的收支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31 第三，是实体经济的危机，它表现为高失业率和停滞的经济产出（表 1.1）。^② 实体经济危机部分是因为企业和消

① 图 1.1 展示了经济合作组织全体成员国以及从中挑选的七个国家 40 年的国家债务增长情况。这七国分别代表了一定的国家团体：美国和英国代表了高度金融化的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瑞典作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和法国代表了欧洲大陆国家，意大利代表了地中海国家，日本则代表了亚洲的发达工业国家。令人惊讶的是国家间微小的差异，特别是当人们把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地产泡沫崩溃之后急剧增长的新增负债排除在外不予考虑的情况下。

② 详尽地讨论金融和财政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后果就需要写一本专门的专著，这也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表 1.1 展示了 2007 年，也即危机爆发前一年，之后的五年内几个选出的代表性国家，除德国和瑞典之外，经济发展滞胀以及社会生产总值下降的情况。特别严重的则是在欧洲的几个深陷危机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那里不仅经济发展衰退，就业机会也大大缩减，失业率提高。这一情况在英国乃至美国也好不了多少。

费者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因为银行已经债台高筑，不仅怕担新的风险，也无款可贷；部分是因为国家要缩减开支，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强行提高税率。实体经济的停滞加剧了财政危机，反过来，又因为它而导致支付不能，即银行业的危机。

显然，三种危机是密切相关的：银行危机通过倾向和国家财政危机相关，银行危机通过贷款和实体经济危机相关；国家财政危机通过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实体经济危机相关。三者不断相互加剧，三种危机在范围、权重和相互交织的方式上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同时，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有着相互的影响：银行破产倒闭，有可能会把其他国家的银行一起拖下水；由于国家支付不能而导致的国家贷款利率提升也有可能摧毁其他国家的国家财政；一国的经济景气和经济崩溃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在欧洲，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在欧洲货币联盟的作用下，这种关联性和交互作用有着非常特殊的形态和强度。

32

当前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危机在 2012 年夏天时就已经持续了四年之久了。它不断地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改变着其外在形态，然后不断地把新的国家、危机以及复合危机推向人们关注的焦点。没有人知道，下面将会发生什么；每个月都会出现新的话题，有时甚至是每周都会出现新话题，只不过是突然有一天，所有的话题都重新回归。政策行动的空间中则处处埋藏着难以一眼窥尽数量的各种无法预计的副作用。再也没有比这一领域更适合用问题复杂性来形容了。政治做出的任何解决某个问题的行动，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就会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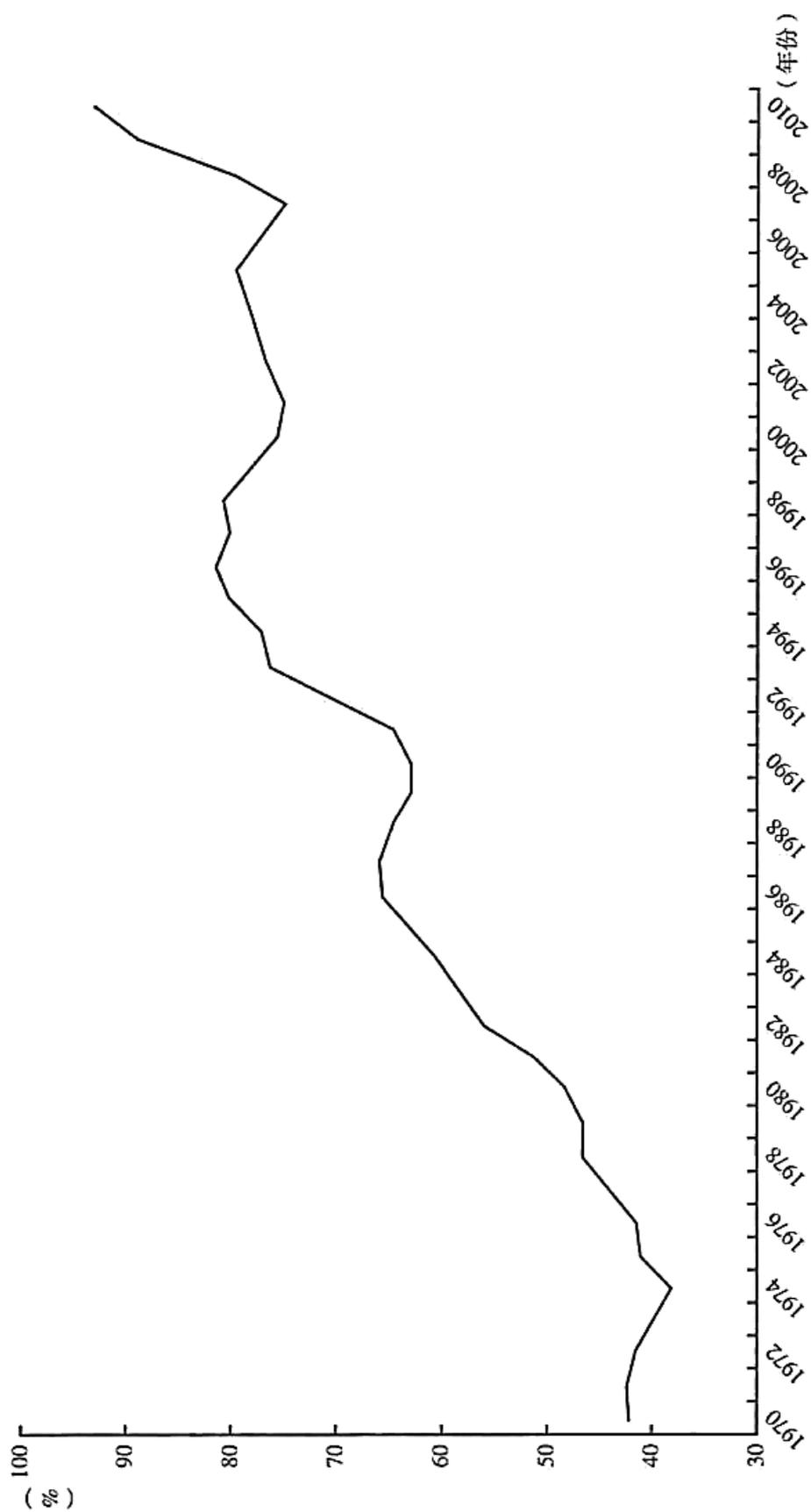


图 1.1a 国家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OECD 平均数), 1970 ~ 2010 年

表中的未加权平均值包含了以下国家：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英国、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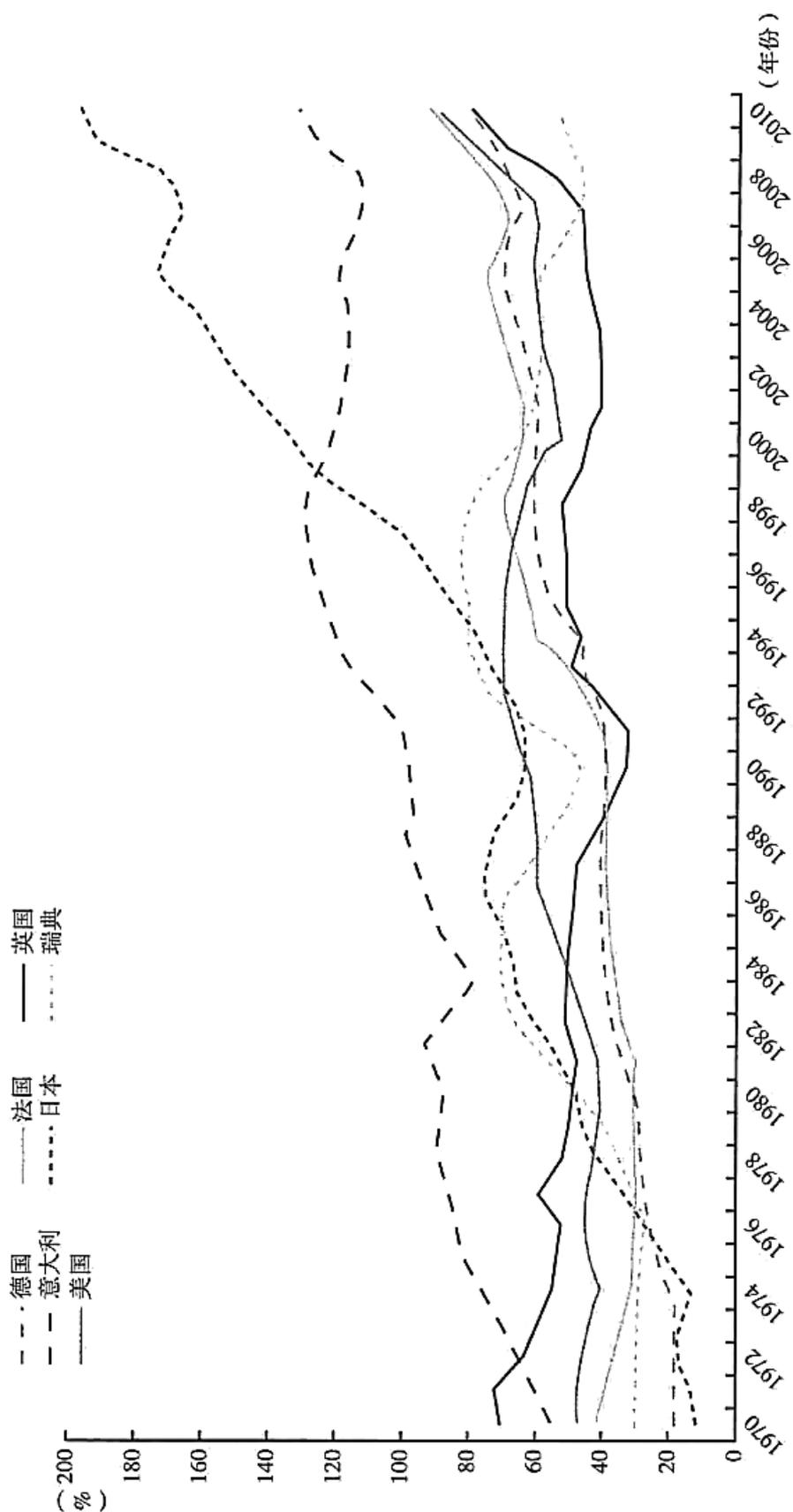


图 1.1b 国家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七国), 1970 ~ 2010 年

资料来源: OECD 经济展望: 统计和预测, 当前数据。

发一个新问题；解决一个危机的方法则会加剧另外一个危机；人们斩杀了九头蛇的任意一个头，又会长出两个新的头来。太多问题需要同时处理；短期的解决方案阻碍着长期方案的实施；长期的解决方案根本得不到施展的空间，因为短期方案要求获得更高的优先级；到处都出现漏洞，而人们堵住漏洞的方法就是在另外的地方撕扯出新的洞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全体政府完全无计可施，并想象他们基于所谓的久经考验的局面控制能力而表现出的乐观主义的处之泰然的表面之下有着多少苍白的惶恐不安。

危机理论的两个意外

34 在 1968 年前后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①还没有出现涉及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内容。这不奇怪，因为人们无法在当时那个时候预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但是，其中也完全没有提到经济发展趋势循环、增长危机和增长极限、消费不足和过度生产。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试图和经济主义决定论保持不同，因为一些人，特别肯定是正统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者会把这种决定论解读成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更重要的也许是当时人们必须称之为时代精神的东西：在当时取得了广泛影响力，甚至令人惊讶的影响到了左派阵营的主导观念，即资本主义经济成

① 我在后面会大致综述，但我会主要把其相同点而不是其中一些还存在的差异摆出来。后者在与后来实际的发展情况相比中显得苍白无力，因此这里我就只点出这一个差异。

第一章 从合法性危机到财政危机

表 1.1 2008 年经济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七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德 国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3.9	107.4	108.3	102.8	106.4	109.7
	就业率	65.5	67.2	69.0	70.1	70.3	71.1	72.5
	失业率	11.2	10.3	8.7	7.5	7.7	7.1	5.9
法 国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2.7	105.0	104.7	102.0	103.4	105.2
	就业率	63.7	63.6	64.3	64.9	64.0	63.8	63.8
	失业率	8.9	8.8	8.0	7.4	9.1	9.4	9.3
意大利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2.3	103.9	102.6	97.0	98.7	99.2
	就业率	57.6	58.4	58.7	58.8	57.5	56.9	57.0
	失业率	7.7	6.8	6.1	6.7	7.8	8.4	8.4
日 本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1.7	103.9	102.8	97.1	101.4	100.7
	就业率	69.4	70.1	70.9	71.1	70.5	70.6	71.2
	失业率	4.4	4.1	3.8	4.0	5.1	5.1	4.6
瑞 典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4.6	108.1	107.3	102.0	107.9	112.2
	就业率	72.3	73.1	74.2	74.3	72.2	72.7	74.1
	失业率	7.5	7.1	6.2	6.2	8.3	8.4	7.5
英 国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2.6	106.2	105.0	100.4	102.5	103.2
	就业率	71.8	71.6	71.5	71.5	69.9	69.5	69.5
	失业率	4.8	5.4	5.3	5.6	7.6	7.8	8.0
美 国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2.7	104.6	104.3	100.6	103.7	105.5
	就业率	71.5	72.0	71.8	70.9	67.6	66.7	66.6
	失业率	5.1	4.6	4.6	5.8	9.3	9.6	9.0
希 腊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5.5	108.7	108.5	105.0	101.3	94.3
	就业率	60.1	61.0	61.4	61.9	61.2	59.6	55.6
	失业率	9.9	8.9	8.3	7.7	9.5	12.5	16.0
西班牙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4.1	107.7	108.7	104.6	104.5	105.3
	就业率	64.3	65.7	66.6	65.3	60.6	59.4	58.5
	失业率	9.2	8.5	8.3	11.3	18.0	20.1	20.3
葡萄牙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1.4	103.8	103.8	100.8	102.2	100.6
	就业率	64.5	67.9	67.8	68.2	66.3	65.6	64.2
	失业率	7.7	7.7	8.0	7.6	9.5	10.8	11.7
爱尔兰	国内生产总值	100.0	105.3	110.8	107.5	100.0	99.5	100.2
	就业率	67.5	68.5	69.2	68.1	62.5	60.4	59.6
	失业率	4.8	4.7	4.7	5.8	12.2	13.9	14.6

资料来源：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主表来自于 OECD - ISSN 2075 - 2342 - © OECD 2012；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了一个通过技术管理可操控的富裕机器，在借助于凯恩斯主义的工具箱和国家以及大企业之间有序的相互作用下可以平稳并无危机地保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因此看起来得到了保障，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经济危机得到了克服，并且从正统理论上预言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也似乎离我们远去了。

毫无疑问，这反映了二十多年高速不间断的经济增长的经验——谈及德国的情况，则是1966年那场，事后来看根本不应该被看成经济危机的危机以及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组成的执政大联盟通过现代化的，抗周期循环的经济政策（antizyklische Wirtschaftspolitik）来克服危机的体验。通过上述政策，联邦德国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眼里克服了其自身秩序自由主义的自我误解，并开启了成为不同于一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其“混合”国民经济中遍布公共企业（öffentliche Unternehmen）、规划机构、行业委员会、地区发展委员会、收入政策协商等组织，就像安德鲁·尚菲尔德（Andrew Shonfield）在其1965年的《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这本书在德国经由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介绍，风靡一时——中细致描述的那样。同样的一种经济控制的乐观主义情绪，出现在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任
36 职期间，他们的顾问团队中有着大量凯恩斯主义学派以及相应更乐于对经济实施干预的经济学家。有趣的是，控制乐观主义（Steuerungsoptimismus）这个用来描述这一现象的词语却出现在它所描述的这一现象完全消失之后。计划绝对不是诅咒，甚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融汇在当时都是政治经济学辩论

中的一个合法性的论题：资本主义市场需要更多计划，而共产主义计划需要更多市场，于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可以在中间的某个地方相遇（Kerr et al. 1960）。当代理论中，经济作为机制代替了资本作为阶段的位置。“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如 Habermas 1969）占据了原本属于权力和利益的保留空间。认为经济学根本上说已经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的观点，在社会学家中已经如同在经济学家中一样广泛传播了。阿米泰·埃奇奥尼（Amitai Etzioni）1968年的《积极社会》（*The Active Society*）一书无疑是众多例证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其最雄心勃勃的尝试就是只要确定条件，现代民主社会就可以在这样的状况下自由选择其发展方向，并在实践中实现这一选择。在他666页的著作中仅仅提到一次经济学，也只是为了确认，“西方国家”今天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通过广泛的应用凯恩斯或其他工具来控制社会进程以防止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萧条，并实现经济的增长（Etzioni 1968, 10）。^①

至于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提出把现代资本主义转而阐释为技术决策的经济管理体系——也就是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Staatskapitalismus*）——的是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在其流亡前后是社会研究所作为经济学方面专家的成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日益经由国家来计划，“以至于留给市场法则和其他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Pollock 1981 (1941), 87]。

37

^① 20世纪80年代，埃奇奥尼也转向了一种经济和经济行为的社会科学理论（Etzioni 1988），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甚至直到一战结束，法西斯和战时经济结束，波洛克 1970 年逝世前，他都从未感到有必要修正他的观点。由于出现了大企业以及通过国家计划来调控的工具，在波洛克看来，放任状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高级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从政策调控的原则上讲不可能再出现危机的经济体制阶段。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和罗斯福新政这三大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政治的优先级都取代了经济的优先级，并克服了原始的、非组织的、无序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危机。赫尔默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在一本波洛克的文集的序言中写道，从阿多诺或霍克海默（Horkheimer）的角度来看，“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详细描写。在这样的秩序中，人们可以说在非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政治相对于经济具有优先权，而由此国家权力掌控了经济过程”。并且：“波洛克关于纯政治而不再间接的由经济实现的统治……给霍克海默以及阿多诺提供了政治经济学上的合法性，从而不再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看得至关重要。”（Pollock 1975, 18,

38 19。）^①

① 然而这与阿多诺将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引入社会理论的事实也完全不矛盾，他把它定为 1968 年法兰克福社会学家日的主题，并且以大会主题“晚期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1979 (1968)] 为标题做了导论式报告。阿多诺用“晚期资本主义”来区别他称作“自由资本主义”的东西，并且完全在波洛克的意义上去理解成历史上更原先的，通过国家干预和组织构建起来的资本主义形式。晚期资本主义对于阿多诺来说总体上和别人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相一致。有组织的（晚期）资本主义会突然爆发危机式的崩溃或者以新自由主义的未来的形式回到自由化的过去，这在阿多诺看来都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危机理论和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一样，几乎完全没有预料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它们却仍然是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只是对于这一理论来说，资本主义的断口不再处在经济，而是处在政治和社会之中：不是在经济的一边，而是在民主的一边；不是资本的一边，而是劳动的一边；不是在体制的融合，而是在社会的融合（Lockwood 1964）。问题并非在于增殖生产——人们认为，它的“矛盾”已经可以掌握——而是它的合法性；问题不在于转换为社会经济的资本是否能够为社会提供供给，而在于，资本能够提供的东西是否能够取悦它的接收者，好让他们继续一同跟随。因此，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危机理论视角观察下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不是生产（不足或过度）的危机，而是一个合法性危机。

事后并且从更远的视角来看，当时人们的直觉让人们回忆起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 1943）。如果物质生存有所保障，那么非物质的需要，比如自我实现、解放、认可、归属感等类似的东西就会表达出来，并需要得到满足。^① 当时人们推测，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向人 39

① 同样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的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性的理论（Bell 1976a）看似也与之有着某种临近关系。贝尔的理论出发点也是，资本主义制度随着其不断进步的资本主义发展能够带来一系列的与其社会组织不一致的动机和需要——只是贝尔作为保守派人士，因此他把他观察到的那些新出现的，与资本主义可能不相容的文化导向看成是更趋于颓废享乐主义，而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危机理论中却是进步和解放的——并作为促进人类发展的——成分。除去这点的话，两者其实都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越来越多的不可治理性（Unregierbarkeit）。一方面因为，人总是不断地成长超越（转下页注）

们提出的压制性纪律要求和异化薪酬工作的强迫特征在富裕得到保障的新历史条件下不可能长期得以实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实现了稀缺性的终结，资本占有者也越来越少地重现其统治力——这首先是通过在工作岗位上制造不必要的等级制度或是通过经济上作废了的绩效考核原则来确定不同的薪酬。^① 参与决策和民主，在工作中解放或从工作中解放出来，这作为可能性等待着被发现和被实现（Gorz 1967；1974）。人的市场化以及用竞争代替团结在当时是过时了的生活方面，并且愈发被人们认为不合时宜。对生活各领域中的民主化和超越现有政治机构边界的政治参与的要求最终会发展成拒绝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从内部打破那些已经变得多余了的基于私人财产之上的工作和生活的组织。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个时代的经验研究首先集中在大学生和工人的政治觉悟以及工会和它的潜力，它不仅仅是工资机器。市场、资本和资本所有者相对则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理论中，民主和交际理论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或至少说是对后者进行了补充。

（接上页注①）自我；另一方面就是人变得越来越自大，所以不得不学着如何了解可能性的边界。发展对民主国家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过度要求，它要么可以通过改革制度来防止（如 Crozier 等，1975，在三边委员会的委托下），或者在一条在民主的强迫下向资本主义制度中植入新的，与其体制相异的成分的道路上，成为一个克服它的政治经济体制。关于不可治理性和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见 Schäfer（2009）。

① 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在他 1967 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他这样说：“根本上无意义的是与绩效相适应的社会秩序概念……鉴于工业劳动的高级形式已经使得竞争表现出来的，个体工作能力范畴不再至关重要的事实。”（Offe 1970，166；原文加粗）这本书还隐含地把支持学生薪水和保障性基本收入的论点提到了更前的篇幅中。

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拒绝战后资本主义全体追随者，并使其终结的不是大众，而是以资本组织、资本组织者和所有者形式出现的资本。涉及资本主义薪酬劳动和消费社会在大部分的民众——用赫尔穆特·科尔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国家里外面的那些普通的民众”——眼里的合法性问题时，它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一场危机理论根本没有预料到的繁荣。1968年学生运动抗议“消费恐怖”还余音绕梁，消费主义和商业化的阶段就已经悄然开始，它突破了人们以往对世界的认识，但令人惊讶的是，此前还抱怨和抗议资本主义中生活过度市场化的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却又积极地参与到了其中（Streeck 2012a）。消费品市场，如汽车、服装、化妆品、食品和娱乐电子产品以及服务市场，如身体保养、旅游和娱乐，都以前所未有的活跃方式爆炸式增长，并成为资本主义增长的发动机。由飞速发展并普及的微电子技术而实现的越来越快的生产和装备的革新缩短了更多的消费品的生命循环，并实现了满足特殊消费者群体愿望的深刻的产品差异化。^①与此同时，货币经济占领了越来越多的以往不必花钱的社会生活领域，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增殖开辟了新的空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体育运动，它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一个能创造数十亿美元产值的产业。

41

包括工资劳动——或者按1968年的话语，应该叫作依

① 当现实把批判理论的苦行僧式的观念抛到身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社会学不再言及所谓的“虚假的需要”或是所谓的“虚假的意识”——这些是一些此前不久还很流行的概念。

赖于工资收入——也获得了合法性危机理论所无法预见到的名誉恢复。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各个国家，妇女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在不久以前还被打上了工资奴役的标签，并且认为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的女性参与工资劳动又被重新看成从“不付钱的家庭劳役”中解放出来。^① 女性进入职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尽管一般来说，女性获得的薪酬会低一些。实际上，涌入职场的女性在各个方面都成为资方的同盟军，并致力于对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按照这样的方式，为本来的“局外人”提供机会，因为她们要求比男性的“局内人”更低的价格。越来越高的女性就业率也和同时发生的家庭结构变迁相联系：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相应的，生活在不安全家庭环境的儿童比例上升，这导致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Streeck 2009a）。

接下来的时期里，工作对于女性来说成为社会融合和赢得尊重的最重要手段。作为“家庭主妇”的生存方式在今天就仿佛是一种耻辱。在口语中，“劳动”（Arbeit）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了付薪酬的，能够在市场中体现自身价值的雇佣劳动，最好就应该是全职的。女性如果能够把孩子和事业（Kinder und Karriere）统一起来，那么就能赢得更多的社会声望，即使这里说的“事业”仅仅是一份全职的超市收银员。比合法性危机理论者们还要悲观得多的阿多诺也同样会在最近几十年的消费狂潮（Konsumrausch）中认识到那种由文化产

① 除了女性以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外籍人口也起到了相类似的作用。

业轻松地就可以制造并长久保持的“异化中的舒适感”（Wohlgefühl in der Entfremdung）。新新教（Neoprotestantismus）教徒对他们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努力，对生活 and 日程精确到分钟的计划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筋疲力尽感到非常自豪（Schor 1992）。同时，人力资源的自我商品化——这个时代的人已经把教育回报计算内化在了人生规划中——这些都给工资劳动危机和绩效原则画上了句号，其作用和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发现的所谓“新资本主义精神”一样（Boltanski 和 Chiapello, 2005）。这种精神在劳动场所中新开辟了创造性和自治的空间，作为更深入地融入企业的手段以及作为以抽取利润为目的的自我实现的工具。^①

当劳动者以及消费者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群体忠诚看起来很稳固的时候，这显然并不是在资本的一方。法兰克福学派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理论的问题是从未承认资本具有目的性和策略能力，因为资本只被看成是机器而不是行动者，只是生产的要素而不是阶级。^② 所以他们当时的估算均未考虑这一因素。不用提及马克思，即使对于熊彼特来说，“资本”就是一个永不安静的炉灶，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不断

43

① 人们再次信任绩效原则作为社会地位和消费机遇分配机制可以从中产阶级家庭越来越多地投资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当中窥见一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在幼儿园里面已经开始教授中文课程。

② 这样做的优势就是，可以避开一些困难的阶级理论问题，如关于管理者和所有人之间的地位问题，小资本和大资本之间的区别问题，企业作为关系的组织与企业主作为个人的角色，大量新兴中产阶级的社会定位，政治家和公务员的阶级属性等问题。关于众多阶级理论的社会学问题，参见 Wright（1985）。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理论中的资本如果不会行动或者没有行动能力，那必然是一个极度贫乏的理论。

被提出的干扰事件——持续的“有创造性的破坏”的出发点 [Schumpeter 2006 (1912)], 直到不可避免的官僚社会主义使其安静下来。就连韦伯也是这样看待问题, 并这样预言的, 也许合法性危机理论中资本是无生命的这一观点最初就可以部分追溯到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 20 世纪 60 年代末之后的几十年中发生的事情就无法解决: 实际情况是, 资本愈发表现出自己不是游戏的道具, 而是游戏的参与者; 不是被掠食者, 而是掠食者。并且战后“社会市场经济”的体制牢笼看起来越来越狭小, 资本看起来有必要把自己从中解放出来。

44 40 年前, 异于也优于其他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危机理论, 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内部的脆弱性。但是对它的原因和正面临着的历史变迁的方向和动力机制却认识错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排除了有可能不是劳动, 而是资本终结了在被称为“繁荣三十年” (trente glorieuses)^① 中发展起来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的可能性。实际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 包括其间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 是一个资本不断从社会管制中突破出来的历史。这种管制是 1945 年以来强加的, 也是资本本身所不愿意的。其开始是 1968 年前后的工人抗议运动, 以及成熟工业社会的资方不得不面临着新一代的产业工人, 他们已经对战后重建阶段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

① 这是法语中对二战后将近三十年经济增长的表达。在英语世界, 人们会使用“黄金时代” (Golden Age), 而在德国, 人们喜欢用“经济奇迹” (Wirtschaftswunder) 这个词。

步还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建立的年代在政治上的许诺习以为常了。这种需求却是资本主义不能也不愿意长期维持下去的。

在之后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精英及其同盟者们不断寻找着从当初为了和平的原因而不得不担起，在此后的重构阶段中尚能大致满足的社会责任中逃离的出路。以克服市场饱和的威胁的新的产品策略，劳动力供给日益过剩作为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以及市场和生产体制的国际化为企业开辟了新的机遇，好让他们从规定的工资和社保政策的体制束缚中摆脱出来。这种束缚 1968 年以来就一直迫使企业长期进行利润压缩。^① 随后，便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自由化进程——未有任何理论预言的在最广泛的阵线上发生的自由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强势回归，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史上亦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国家无法满足社会的期望，要从中摆脱出来，要对资本主义制度放松管制，进行自由化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也感到自身政治组织允许的应对危机的自由度过小，对此批判理论毫无准备。^② 同时作为控制技术、国家摆脱束缚和资本解放的自由化进程，只要是人们对于 1968 年动荡还记忆犹新就只能逐步地向前推进。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多样的政治

① 这在 1965 - 1980 年低谷时达到了戏剧化的程度，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又出现了零星的改善，尽管从根本上单纯是由于资方挪用了生产力的提升 (Brenner 2006)。

② 还有理论认为同样毫无准备的是保障工作和绩效动机的消费虚假满足在历史中扩张和拉伸的令人惊讶的可能性——这是通过不断快速发展的商品世界来分散人们对集体政治的进步和个体经济需求满足的需要的注意力。

和经济运行的障碍，直到它在当前的世界金融体系以及国家财政的危机中达到高潮。

另一种合法性危机和战后和平的终结

从危机理论兴盛后过去的四十年来看，我想提出一种关于合法性危机的延伸概念，它不仅包含国家和公民两个行动者，而是有国家、资本以及“工薪阶层”三个行动者。^① 政治经济制度必须在期待面前自我证明其合法性，而这种期待现在不仅存在于民众一边，还存在于不再以机器，而是以一个参与者身份出现的资本一边，更明确地说：就是那些食利的资本所有者和资本的管理者们。实际上，正因为体制是资本主义的，所以它的期待和它的稳定就应该比依赖于资本而生存的民众的期待更为重要：只有先满足了资本的期待，才能相应满足民众的期待，反之则不一定成立。与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不同的是，合法性危机可以出于资本对于民主制度的不满或者是对制度加诸它的义务的不满而产生，并且这意味着：并不存在很多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看到的正在降临的所谓进步的、“超越体制的”社会需要的进化。

一个以资本方面为出发点的合法性危机理论把企业和企业主看成利益或者利润的最大化工具，而不是富裕机器或者是国家经济以及景气政策顺从的执行者。“资本”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中是一个固执而又自利的，兴趣盎然而又富有策略

① 在作为政治信任危机的经济危机，以及作为资本拥有者和经营者不满的交际的投资回归方面，我的理解和米哈尔·卡莱斯基的政治经济动态理论保持很密切的一致（作为例子见 Kalecki 1943）。

的，具有沟通能力的，但仅仅是有限的可预估的集体行动者，它会产生不满，也会将这种不满表达出来。哪些人或者哪些事物属于资本，可以在阶级理论中按经典政治经济学模型根据收入的类型来加以区分。资本利益来自依赖自身收取投入资本的利润的收入地位；资本收入是其所有者或者管理者从资本中获得的剩余收入（Residualeinkommen），他们试图从被他们处理的资本——既可以是这些资本的拥有者，也可能是受到托付而管理——中获取最大化数额的回报。在这个意义上的“食利阶层”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工薪阶 47 层”，他们拥有的不是资本，而是劳动力。他们可以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以固定的价格把劳动力作为一种可变资本交付给资本的拥有者。只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不依赖于把它投入应用可能产生的利润——当然也有可能无法产生利润。剩余资本收入和合同规定的劳动收入之间的差别——利润和工资的差别——在劳动力市场理论中用心理学的方法用不同的“风险倾向”来加以解释：不甘于冒风险的人倾向于成为劳动者，获取少量，但相对也更稳定的工资收入；反之，更愿意冒风险的人则成了企业家，获取不稳定的，但是却有着更大潜力的资本收入。获取剩余收入的人会试图在一定的资本投入基础上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而相应的，获取工资收入的人，则会在一定的固定工资收入基础上尽可能将劳动付出控制在最少的限度。^① 分配的冲突此时就表现在，

^① 如经济学家提出的工人消极怠工的理论所说，为什么劳方在资方眼中总是会涉嫌逃避劳动，因此必须有效地对劳动过程进行监督（Williamson et al. 1975）。

食利阶层更高的剩余收入要求在相等条件下降低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反之亦然。^①

48 对于一个把资本看成行动者，而非机器公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经济的运行”，虽然说增长和充分就业看起来是个纯技术问题，实际上还是受政治制约的。这里就有了一个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为传播，并且也为波洛克以及法兰克福社会理论所接受的技术治理的危机概念之间的区别。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占有者的投资积极性，而投资积极性又取决于利润需求、收益期待以及资本占有者对于社会关系在资本运营方式安全方面的评估。不发生经济危机就说明资本满意，反之，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不满意的表现。资本占有者和资本管理者要求什么样的投资回报并不是一次就定下来的，而是随着地点和时间的状况而不断变化的。投资者如果没有替代选择时就会变得更加谦逊克制，然而当他们觉得目前的获利并不够高时，又会变得更加挑剔。特别是当他们认为社会环境是敌意的，并且向他们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时，就会失去信任，从而通过保持流动性（或曰流动偏好）或者资本逃离来克制资本的投资，以等待外部条件的改善。

① 当然，肯定会存在着不同种类混合的灰色地带，今天这种情况尤甚。比如，在这一地带中有着多样性的“结果依赖”的获取报酬方式，有给在工业生产部门手工劳动者的计件工资；小储户会同时获得工资收入和利息收入；以及所谓的“人力资本”收益就既可以看成是劳动收入，也可以看成是资本收入。问题的关键是要详细分析并区分，是不设上限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资本积累，还是传统上保障生存发展的既定或按一定标准增长的收入水平。两种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并列作为不同的行动导向，它们分别由有着互相冲突，有时互相渗透的需要和要求的不同社会集团和社会机构所代表（Streeck 2011c）。

资本主义中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一方的信任危机，因此不是技术故障，而是一种其自身方式的合法性危机。低经济增长和失业现象是资本拥有者“投资罢工”^①的结果，通过他们的投资行为可以克服危机，但只要他们缺乏信任，就不会投资拉动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是私人财产，至于其拥有者是否使用这种财产，原则上是他们个人的意愿决定的。他们并没有必须要投资的义务，^②至于他们什么时候才觉得有必要投资做些什么，也不是经济学家们用数学能够计算出来的。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只能丢给心理学去解决了。通过经济政策来消除危机就在于，在资本拥有者的利润期待和对社会的需要以及工薪阶层对于工资收入和就业期待之间协商出一种平衡，好让资本觉得它足够公正，并愿意活跃于生产活动之中。如果这种协商不成功，并导致资本感到了作为干扰经济运行的不安和愿望无法满足，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额外的、派生而来的合法性危机，即工薪阶层的危机，对他们来说，制度在技术上的运行，特别是保障增长和充分就业，是他们和平生活的前提。因此，工薪阶层此时并没有什么新的需求，他们的担忧只是一些原有的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

49

资本主义，换言之就是以一种社会契约为前提，这项契

① 这是一个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批判资本主义中常见的概念。政策上当时试图通过“投资审查”来杜绝“投资罢工”的可能。

② 资本主义制度中，所有国家经济政策的难处是为人所共知的。“人们可以把马牵到井边，但喝不喝还得看它们自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社会民主派经济政策者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在谈及自己 1967 年后恢复经济景气的努力时如是说。

50 约将资本和劳动之间，利润阶层和工薪阶层之间相互间正当的期待作为一种经济立宪的形式确立下来。与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希望我们相信的不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个受制于时代的，有着构建需要和合法性需要的社会秩序：从空间和历史上具体以不断变化了的形式表现出来，原则上永远可以重新协调约定，并最终总是面临着崩溃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英语文献中称为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政治经济的战后协议（postwar settlement）开始瓦解：这是一个自战后的状况中产生出的关于新的资本主义形态经营基础的社会谅解。1945年以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都处于守势，当时在正在形成的西方世界的各个国家中都必须面对一个由于战争和体制竞争而不断壮大了的工人阶级，而努力获得社会执照^①的延长或更新。这就只能通过巨大的妥协和让步才能实现，就如凯恩斯主义理论预言和实现的：中期是通过国家制定经济景气政策，通过计划保障增长、充分就业和社会平衡以及不断加强面临市场不可预测性时的保护；长期则是资本主义将在一个长期低利息和低利润空间的世界中运行。战时经济结束后，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工作中以政治定义的社会目标为优先，才能在稳定的，既防止法西斯式的倒退，又能与斯大林式的政治尝试相抗衡的自由民主政治中建立起一个有着复苏活力的利润经济。也只有这样才使得重新确立财产权和管理权威具有政策上的可实

^① 在这里，人们甚至可以使用重新颁发资本主义的利润狩猎证书这样的表达。

现性。一个规范市场、制定计划以及再次分配的干预经济的国家负责来协调和监督是否恪守了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讨论中称为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套话”（Friedensformel）的东西。这样的国家必须保障新资本主义的经营基础，否则其合法性就会受到损伤。 51

战后政治经济的这种和平局面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变得不那么稳定。对这一发展通行的描述和解释总结下来指向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下半叶时的经济增长减弱，这有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永远像战后年代那样一直保持那么强大的提供能力和提供意愿。西方国家的政府无一例外地在用尽良方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社会和平以及政治稳定，并且试验各种新的国家计划和调控经济的技术手段，然而此时的工人阶层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执着地坚持保有战后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之初时对他们许下的种种诺言。如果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改善的话，为什么要继续跟着资本主义制度玩下去，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参与资本生成利润的活动呢？至于资本一方，他们肯定非常担心所谓的“期待增长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以至于长远上看，他们无法维持下去。除非能够以利润不断减少或者在选举压力下的国家经济政策来使私营经济转型成为完全管制、精心计划的准国有经济基础设施为代价。

总的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情况就已经接近了卡莱斯基在 1943 年发表的一篇远见卓识的文章中描写的那种凯恩斯主义模型面临资本的反抗而归于失败的状态（Kalecki

52 1943)。卡莱斯基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既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可以保障资方的企业无波动的、持续的增长，那么他们同时代的资本拥有者们还有什么好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呢？卡莱斯基给出的回答是，因为长期的充分就业会给资本带来风险，因为这样一来劳动者们就会渐渐淡忘因为失业而带来的贫困和窘迫，从而变得过于自负。这样劳动场所和政治中的纪律就会崩溃。所以，按卡莱斯基的观点，资本本质上乐见长期的结构性失业，它可以作为对劳动者的一种警告。一旦他们提出过分要求，就有可能面临失业。而这一切的根本前提是，国家放弃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手段来保障充分就业。

世界范围内 1968 年和 1969 年的罢工潮在资方以及一些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眼里就是经济长期无危机增长和充分就业得到保障的结果，以至于工人阶层被长期的富裕生活和福利国家制度给惯坏了。^① 工人阶层反过来却认为，只是在坚持他们理解为固有公民权利的工资定期上涨和社会保障不断改善。从这时起，资本和劳动两方面的期待就渐行渐远，以至于战后民主资本主义政体必然陷入危机之中。20 世纪 70 年代上半叶出现越来越多的罢工潮，工人和工会

① 不能逐一对此证明，我却坚信，今天的霸权主义的普遍理解是可以从对 1968 年和 1969 年罢工运动话语的总结回顾中找到根源的。按照那些话语，“我们”——普通的男男女女——太过自负，需要表现得更谦逊一些。大众的狂妄自负，人们当时都这样言说，在经济学标准理论看来还应该为此后几十年间的国家负债持续增长负责——这当然是个极好的解释，特别适合用来掩盖此后发生的经济发展果实越来越不平均分配的现实情况。

坚持他们的要求，而资本方面也觉得让步的空间已经被挤压殆尽。作为对策，资本开始准备从原有的战后社会契约中挣脱出来。它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重建其行动和构建能力，并从民主政治的计划和利用中解脱出来。与劳动者和工会不同，对于资本来说，它除了可以继续参与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中继续参与下去以外，还有着替代策略：它慢慢放弃对制度的信任，并渐渐将制度赖以运行的投资抽取出来。

漫长的转折：从战后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大约在咆哮的 70 年代（roaring seventies）——因为人们对富裕和自由过度的期待而这样称呼这一时代，同时这种期待也贯穿了当时的政策和公共生活的氛围——资本的拥有者和管理者们开始了漫长的试图使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根本转型的斗争——恰恰是他们，而不是如合法性危机理论所期望和预言的那样，由广大群众，即工薪阶层来发起这场斗争。鉴于 1968 年获得的印象以及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惊吓，这种气候一方面表现在政治意欲测试经济的“可负担性极限”^①，另外还以一些专著的主题的形式，如瓦尔特·科皮的《民主的阶级斗争》（*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1983）或艾斯平-安德森的《反市场的政治学》（*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1985），为人们知晓，资本所有者和可以左 54

① 左派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约亨·施特芬（Jochen Steffen）于 1971 年社会民主党大会讨论关于税收政策时提出，这给他带来的后果是引起了公共的愤慨，长期来看则是标志了其政治生涯的终结。

右经济的人们开始致力于从一个尽管受到战争时期的影响，还是帮助他们在 1945 年以后重新回归到工业社会的发号施令地位的政治体制中逃脱出来。

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工厂和协会都皈依到一个共同的新目标中来：资本主义自由化和向内以及向外的市场扩张。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事件以及 1972 年出现的原材料危机前所未有地让人们怀疑，经济是否还能够长期的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尽到在旧的政治体制中迫于政治压力而必须负担起的义务。持续的高增长已经不再是民主资本主义和平套话的保障。放弃利润，以保证充分就业，或者以高成本生产产品以保证高工资和低工资差距条件下的稳定就业，就是要求企业以及依靠利润生存的食利阶层做出牺牲，而这种牺牲看起来越来越令他们无法接受。国家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或多或少地伸手进行社会民主的干预，^① 令他们无法再度信任。解决的方案只有一种，就是重新逃避到市场中去：把资本主义经济从战后重建年代的官僚主义政策以及阶级调和主义的监督中解放出来，通过自由市场和放松管制，^② 而不是连带着社会责任的风险通过国家政策来重新确定合理的利润空间。

回顾过去，自由主义的策略——排挤国家干预政策，

① 20 世纪 70 年代正是公共选择理论登上经济学历史舞台的时代，国家公共权力部门在他们看来也是自利的利益最大化者，只是和资本不同的是，它们还拥有更多的特权，来使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求更多好处（Buchanan 和 Tullock，1962）。作为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布坎南将公共选择描述成“没有浪漫主义的政策”（Buchanan 2003）。

② 关于美国进行放松管制运动参见 Canedo（2008）。

回归市场作为基础调节机制的作用——在当时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良好效果，这绝不仅仅令批判理论感到意外。^①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西方国家社会中的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契约的核心要素渐渐被破除或遭到质疑：政治上保障充分就业，全部领域通过自由的工会来制定工资，工人在劳动场所和企业拥有参与决定权，核心工业领域的国家监管，广泛的公有制经济保障更稳定的就业作为私营经济的榜样，普遍的、对抗竞争而建立的保护作用的社会公民权，通过收入以及税收政策控制在小范围内的分配不均，国家制定经济景气政策和工业政策以防止增长性危机的爆发。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是在1979年，即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的年代，开始或多或少地以更富侵略性的方式来排挤工会的势力。几乎就在同时，全世界范围内也开始了逐步的，但影响力毫不逊色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这项以被认为是早就应该进行的机构“灵活化”和“激发劳动力潜能”改革的结果就是对战后资本主义岁月的福利国家的根本性修正。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用向国境线以外扩张市场，或曰“全球化”来给这种转变寻找合法性的理由。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取消解聘保护权，将劳动力

56

^① 韦伯、熊彼特和凯恩斯都从不同的视角和以不同的评价预言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将在20世纪下半叶时平缓地或者不太平缓地走向终结。在这里也值得提一提波兰尼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声称，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且一去不复返了。“在各个国家中，我们正经历着一种新的发展，经济体制不再制定法律来要求社会依其运行。社会之于体制的优先地位也得以确立。”[Polanyi 1957 (1944), 第252页]

市场分成核心和边缘领域赋予不同的保护权，允许和支持低薪资的就业机会，承认高结构性失业率，对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改革，裁减公职人员以及在可能的领域取消工会对薪资的决定权。^① 这一发展最终，无论其国家间的差别和特色，都形成了一个逐渐适应市场的，“消瘦”的更“合适”的现代化了的福利国家，它对于劳动者的友好以及运行成本的降低通过降低由社会公民权保障的社会生活最低水平来实现。^②

1970 年以来，放松管制的不仅是劳动力市场，还包括更多其他的物资、服务和资本市场。政府希望达到从政治义务中解放出来的目的，附带也希望看到经济增长，而市场的扩张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压力对于资本拥有者来说，却更多地作为薪资及劳动条件恶化或至少是更加差异化的合法性借口。^③ 同时，资本市场也成了企业监管的市场，它把提升股东利益当作好的企业管理与经营的最高准则（Höpner 2003）。很多地方，甚至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作为对国家为民众提供的存在保障的补充甚至是替代，个人保障被推向了私立教育和保险市场，同时为他们提供了通过贷款来支付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经济的不平衡日益加剧

① 此领域文献卷帙浩繁，作为选择阅读，参见 Katz 和 Darbishire（2000）。

②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情况，见 Scharpf 和 Schmidt（2000a；b）以及《牛津福利国家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中编者导言（Castles et al. 2010），以及其他两篇文章（Kautto 2010，Palier 2010）。

③ 对于很多其他的，另见 Emmenegger et al.（2012），Goldthorpe 1984 以及 Palier 和 Thelen（2010）。

(图 1.2)。^① 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保持着大概一致的步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经济”的拥有者和指挥家的压力下日益将 20 世纪中期负担起来的保证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社会安全和社会凝聚力的义务甩开，并把公民的福利事业以史无前例的程度推向了市场。

向新自由主义的漫长转折在西方富裕社会只遭到了非常弱的阻力，又重新回归常态的高结构性失业率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以及飞速发展中的市场营销手段给社会生活越来越多领域的商业化带来了忠诚度，并稳定保障了民众就业以及劳动的积极性（Streeck 2012a）。同时还有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描述的在不断发展的知识社会中就业和劳动组织的新形式作为 1968 年自我实现项目的补充（Boltanski 和 Chiapello, 2005）。新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其拥护者——在女性当中早已经是如此，对她们来说，就业同时就意味着个性的自由。那么对于新生代来说，已经习惯于认为劳动关系中的灵活性就是他们个性化的、去传统的社会生活的灵活性的一种反映。他们不必去担心五十

① 图 1.2 展示了 7 个案例国家（具体参见本章第 24 页注释①）中一般用来表达收入分配的不平均性的基尼系数的发展变化。基尼系数测量了实际分布情况和理想平均分布之间的偏差。另外一个用来提示分配不平均的标准是工资比，即工资收入相对于资本收入占国民经济收入的比例是多少。1960~2005 年这段时间，对 16 个 OECD 国家工资比的描述和基尼系数的发展一样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并令人印象深刻。“当战后时代社会民主建设占得上风时，资本的协调权受到威胁，工资比就提高了。而 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风向突变，资本方面协调权回归。……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尝试，它使得资本家阶级的收入份额又重新提升到了战前的水平（Kristal 2010，第 758 页及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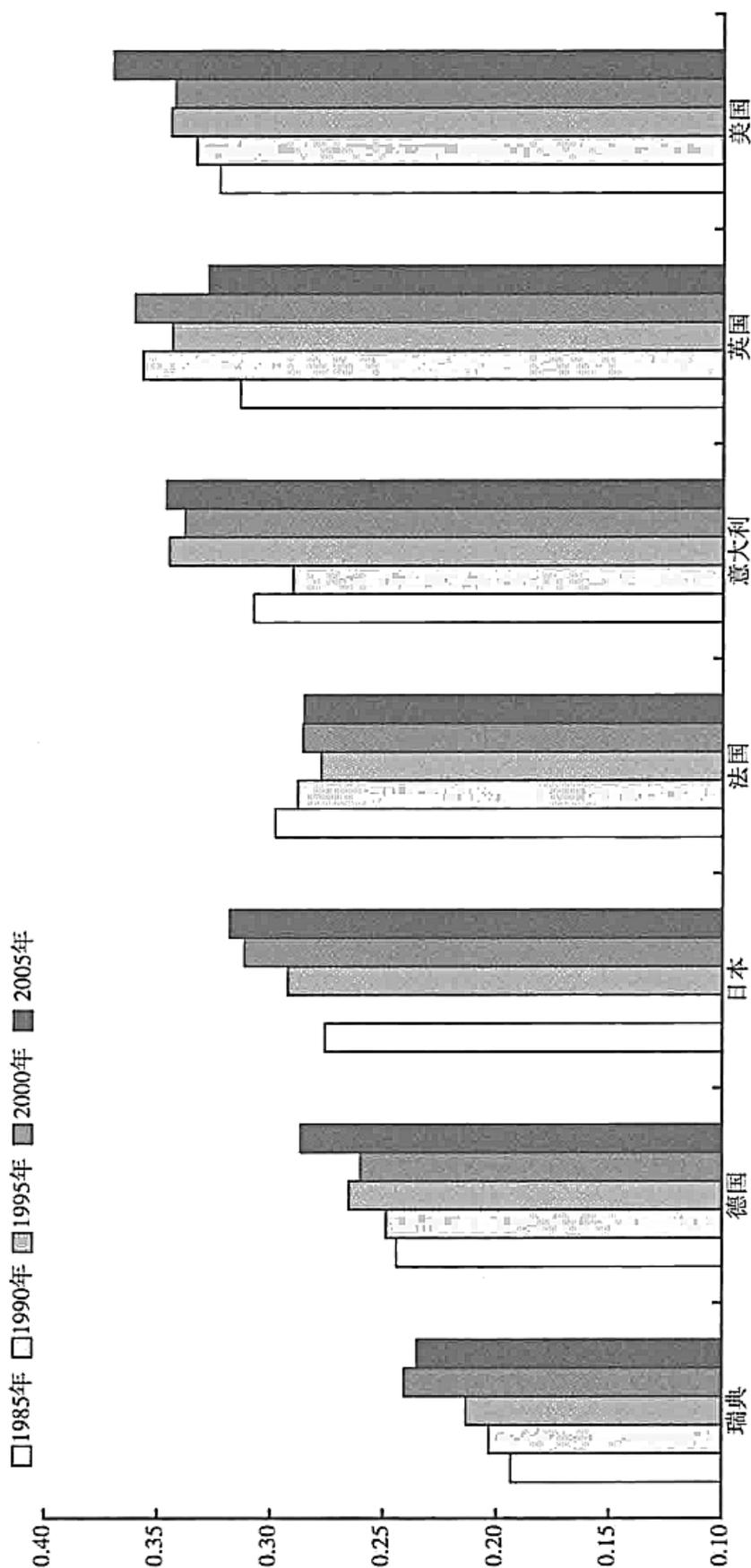


图 1.2 七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状况：基尼系数，1985 ~ 2005 年

资料来源：OECD 家庭收入分配和贫困情况数据库；OECD 2008 年资料库；2008 年经济、环境和社会数据；OECD 2010 年资料库；国家指标，OECD 资料库数据。

年如一日地在一个企业工作直到光荣退休才获赠一枚金表的噩梦成真。资本拥有者和国家长期以来多方面的努力，以试图用各种辞令来使自主选择的和被动的流动性，自由职业者和无稳定工作以及主动辞职和被裁员之间的差别变得不那么明显，绝对不是毫无成果的。新的一代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世界是一个精英政治的解释，并且认同职场是一个体育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着山地自行车赛或是马拉松。无论如何，相比于20世纪40年代来说，人们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对于市场的不确定性的宽容度显著提高了。40年代的时候，波兰尼还以人们天然向往社会关系的稳定以及在其中寻求安全的需要出发，用社会的反作用力理论去反对自由主义的主张。

购买时间

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襄助也是不可能的。漫长的20世纪60年代结束时，资本主义的和平套话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由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持续高经济增长，并以此实现就业保障、工资上涨、不断改善的劳动条件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权利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越来越不可能实现。最迟到20世纪70年代初，生产性的资本投资面临着所谓为了保障充分就业而采取的激进的薪资确定方式和不断扩张的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威胁而退缩。上述这些政策在人们普遍的信念中却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契约的坚强柱石。因此，一个合法性危机就降临了，即使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也必然是议会民主制度的。人们在此后的岁月中很好

地应对了这一危机，然而只是并不是像批判的危机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而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一种以超过当前生产发展和增殖边界的货币政策来满足工资的上升，其结果则是出现了世界范围的高通货膨胀，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段变得尤为明显。^①

1968 年的罢工潮之后，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保持了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消费社会中的社会和平与稳定，它的出现代替了不够快速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保障了充分就业。^② 这样看来，它相当于是对已经开始难以为继的新资本主义和

① 试图借助于所谓的无通胀的“收入政策”来应对的尝试结果各不相同。在一些国家，人们尝试着让工会和资方以阶级调和的方式共同纳入国家稳定政策中来——对于前者，首先是采用了非金钱的方式，如给予劳方更多的组织权和更好的养老金期望作为补偿，而对于后者则是通过协商来降薪，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便收到了最好的效果。收入政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个比较政治学和体制经济学中很时髦的话题（导读参见：Flanagan 和 Ulman, 1971；以及 Flanagan 等, 1971）。如一篇当时的文献所述，国家的通胀率随国民经济的体制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不仅是工资确定的机制，也包括央行在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德国的货币政策在当时是通胀最小的，因为当时有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工资确定体系和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央行，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就已经有了后来美国和英国货币经济政策的形式和功能（Scharpf 1991）。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情况，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才可以在 1976 年时以“宁要 5% 的通胀，不要 5% 的失业！”的口号参与选战。作为对货币价值高稳定性的补偿，德国的国家负债就发生的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早，对此我后面还会多次论及。德国的联邦银行拥有独立性，它一方面能够阻止政府插手货币总量，另一方面又迫使其在国家政策以及市场经济中采取财政政策的手段来保障就业以及防止合法性损失。后来德国央行就成了其他欧洲国家央行的榜样，这里面不仅包括了密特朗时代的法国央行，还包括后来的欧洲央行。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的国家间的体制差异导致了大量的关于“阶级调和论”的研究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变体论”的研究（Streeck 2006）。

② 关于其结果，见 Streeck (2011a)。

平套话的一种临时性修补。而通胀政策的核心在于，拿额外的资源来缓解资方和劳方在劳动成果分配上的矛盾冲突，只是这些资源是我们没有或者说尚未能真实用于支配的货币的形式。通货膨胀只是让待分配的蛋糕看起来发生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增大，这在短期可能不会造成什么差别；通胀无论给资方还是劳方都带来了一种错觉——用凯恩斯的话来说：一种使新的消费主义成为可能的财富增长的“货币错觉”。然后通胀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无法持续，并且在货币贬值到财富所有者开始不敢投资或者干脆通过换持其他货币来规避风险的时候就必然走到其尽头。^①

62

那些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把还并不能支配的资源引入其国民经济中来暂时缓和分配冲突的国家玩的是一种现代的不能兑换的纸币（fiat money）的魔术，国家可以通过其强制力来确定货币量的大小。最迟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滞胀——这是指通货膨胀加速，但经济仍然出现衰退——现象开始后，说明靠玩名义增长来代替实际增长的把戏已经行不通了。美国及其央行美联储领导实施了非常强力的措施，其中包括提高央行的基本利率，某些时段甚至高于20%，

① 20世纪70年代时，人们还普遍认为，通货膨胀的负担只会波及资产所有者，但总体却对于工人阶级有利，因为只要通货膨胀没有伤及企业的投资热情，它就给工人带来了在分配中的优势地位。但是，一旦通胀带来的对未来价格和相对价格的不稳定性对于投资者来说过大，他们的投资积极性必然受挫 [Hayek 1967 (1950)]。这样一来，解决一个合法性问题的方案就成了另外一个再生产难题的原因——那么这意味着社会融合问题导致了另外一个体制融合危机（在Lockwood 1964的意义上）的产生，它又会变成一个新的社会融合危机，最终只是旧的合法性问题翻新了花样。

通过这些措施，在极短的时间内给通货膨胀画上句号（图 1.3）。然而由于这些政策以及由于通货紧缩给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尖锐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图 1.4），在前战后资本主义以及一直存在的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又卷土重来，这使得很多国家不得不再次使用借用货币的方式来部分地消除这种矛盾。于是，当前达到高潮的全球金融和财政危机从那时开始了，或者说，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世界经济货币稳定政策是一个高风险的强力措施，它只能由像里根或者撒切尔夫人那样的人实
63 施政策才能够推行下去。无论如何，他们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重建健全货币，不得不承受大众的高失业率和面对工会方面的抵抗。^① 实际上，国民经济的通货紧缩，再加上由此产生的高结构性失业率以及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者权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反而使得工会组织全球性倒退（图 1.5），罢工作为解决工作冲突和分配冲突的武器已经越来越不好用了。相应的，罢工频度也在此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低，世界各地都接近于零，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图 1.6）。^②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诺言、资本主义全体当事人的期待和地位日益变得更加重要的市场愿意让渡出来的东西之间的鸿

① 戏剧性的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出现在了里根于 1981 年挫败了民航管制员工会罢工以及 1984 年撒切尔夫人对矿工工会斗争的胜利。

② 图 1.6 中，我将意大利删去了。20 世纪 70 年代时，意大利的罢工率仍然居高不下，这会影
响整体发展的表达。20 世纪 80 年代后，意大利的工人罢工现象也大大减少。

沟不仅还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然而又是政治的方式来加以弥合。这就是国家负债时代的开始。

和通货膨胀一样，政府的国家负债也是一种可以使用还未能实际支配的财政资源来缓解当前社会矛盾的手段——只是这里使用的是还需要民众挣出来，再经由国家税收收上来的钱。这里运用的又是货币体系，只是并不是由国家来印刷纸币，而是国家通过借贷的方式将未来的税收收入预支使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不断增长，首先是因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然后是因为在此前的减薪政策谈判中作为交换的而许下的条件必须兑现了。尽管“改革”就是为了缩减人们对政府提供保障的要求而引进的，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所有基于社会国家的承诺和不成文规定一下子就能够作废。此外，由于治理通货膨胀，现有国债的贬值也停止了，这导致实际的债务负担相对于社会生产来说增加了。因为从政治上讲，增加税收和缩减社会保障具有几乎相同的风险，于是各国政府都通过负债来自救。以美国为例，克里普那指出，早在里根政府期间国家债务就已经随着金融市场自由化的第一次浪潮开始了。它需要从国外吸引国家所需要的资本，同时也准许银行更快、更频繁地这样做，以满足政府对货币资本不断增长的需要（Krippner 2011）。

但是这一政策也仅能暂时，而不是持久地维持资本主义的和平。20世纪90年代，政府开始担忧负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他们的债主们也开始怀疑这些国家的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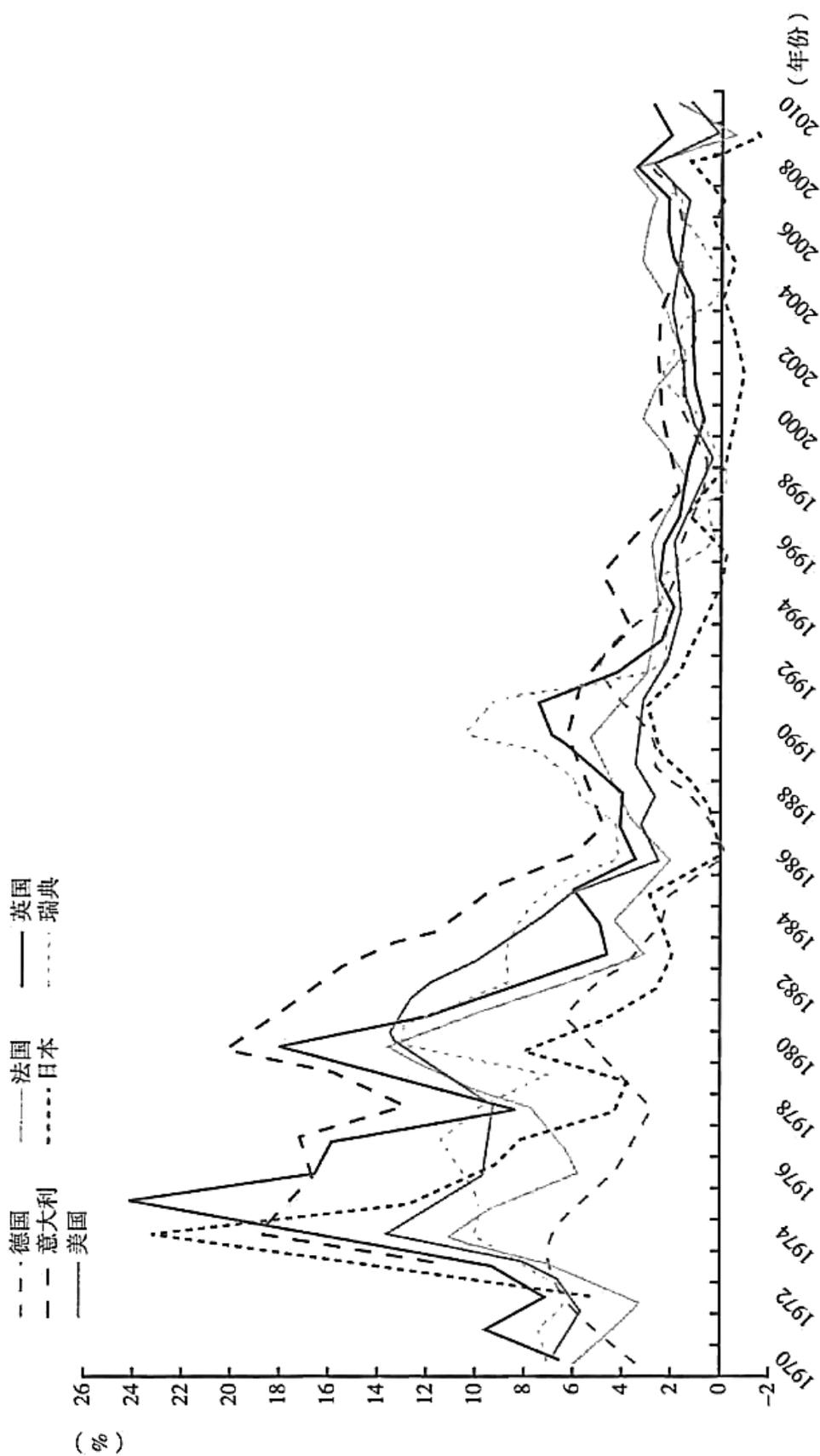


图 1.3 七国通货膨胀率，1970 ~ 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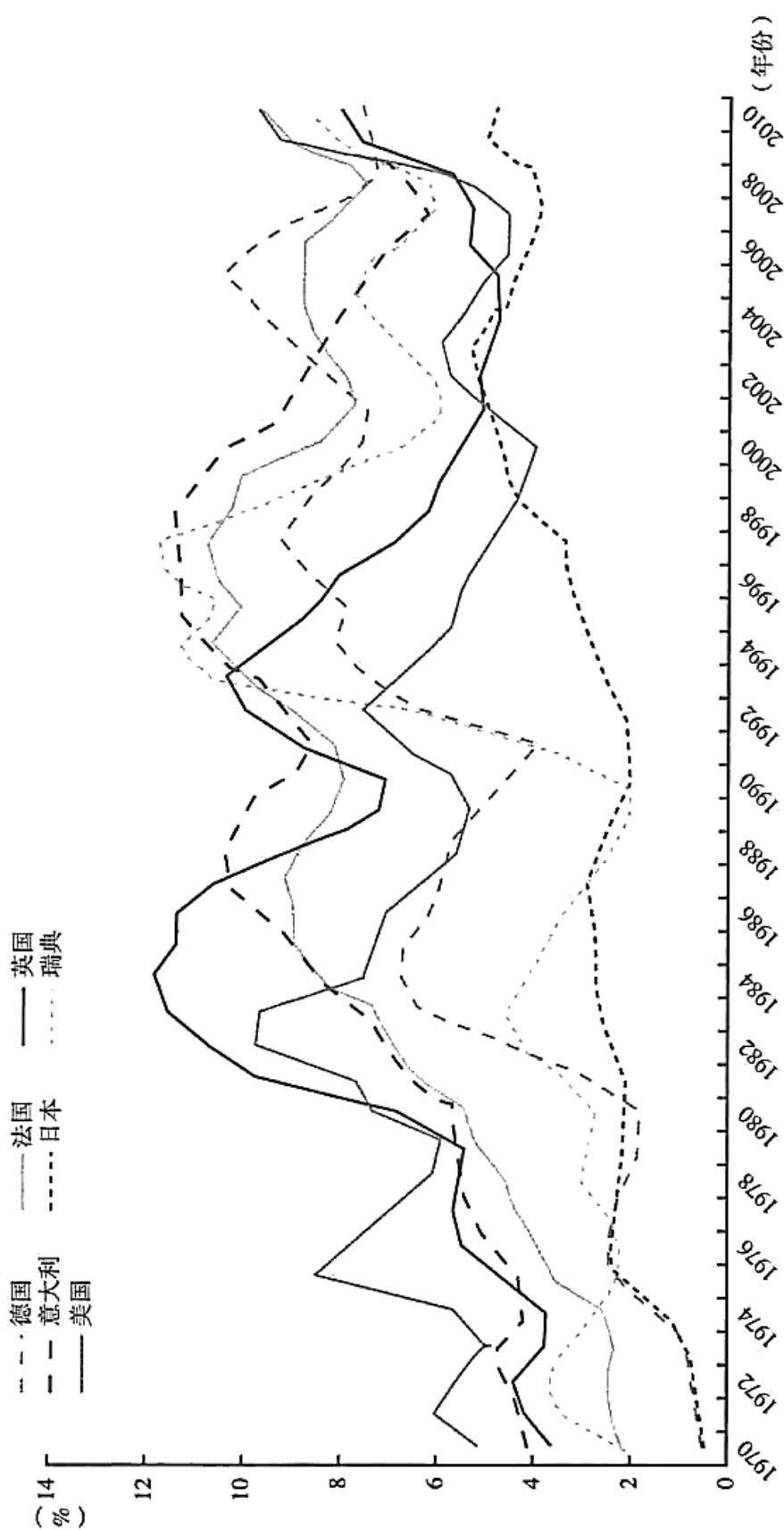


图 1.4 七国失业率, 1970 ~ 2010 年

资料来源: OECD 经济展望: 统计和预测, 当前数据。

清偿能力。这次又是美国率先开始在克林顿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缩减各项社会开支来平衡公共财政。^① 绝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在被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同等对待的要求下，也跟随美国一起参与进来。^{②③} 但是就在资本主义从其战后的躯壳中解脱出来 20 年后，它就需要在其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寻求额外的，抹平冲突的资源来保障其合法性——只是这次是用尽可能完美的方法使政治上的必须和新自由主义的愿望价值统一起来。特别是在美国、英国，也包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诸国^④，整顿国家公共财政都会有造成影响经济景气的需求短缺以及私人财产方面有损合法性的收入减少。对此的应对之策乃是又一次注入预支的支付能力，这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改革的第二次浪潮，它带动并加快了个人负债的高速增长。科林·克劳奇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命名为“被私有化了的凯恩斯主义”（Crouch 2009）。

被私有化了的凯恩斯主义用个人负债代替了国家负债来

-
- ① 克林顿在 1991 年竞选中以解决前任里根和老布什政府遗留的双赤字——贸易和联邦财政中的两项赤字——问题为口号，并赢得了大选。
- ② 图 1.1 让我们认识到，我称之为第一次财政整顿阶段的过程其实是不无成果的。其中只有德国是一个例外，因为当时两德统一，政府有很多需要支出的财政预算，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科尔许诺不另外加税的基础上。
- ③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的广泛的，由政府提倡并资助的机制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它们的主题围绕着，人们如何以民主机构的“改革”来阻止或甚至消除富裕民主国家出现的负债趋势（Molander 2000；Poterba und von Hagen 1999；Strauch und von Hagen 2000）。
- ④ 关于瑞典的情况，可参考 Mehrrens（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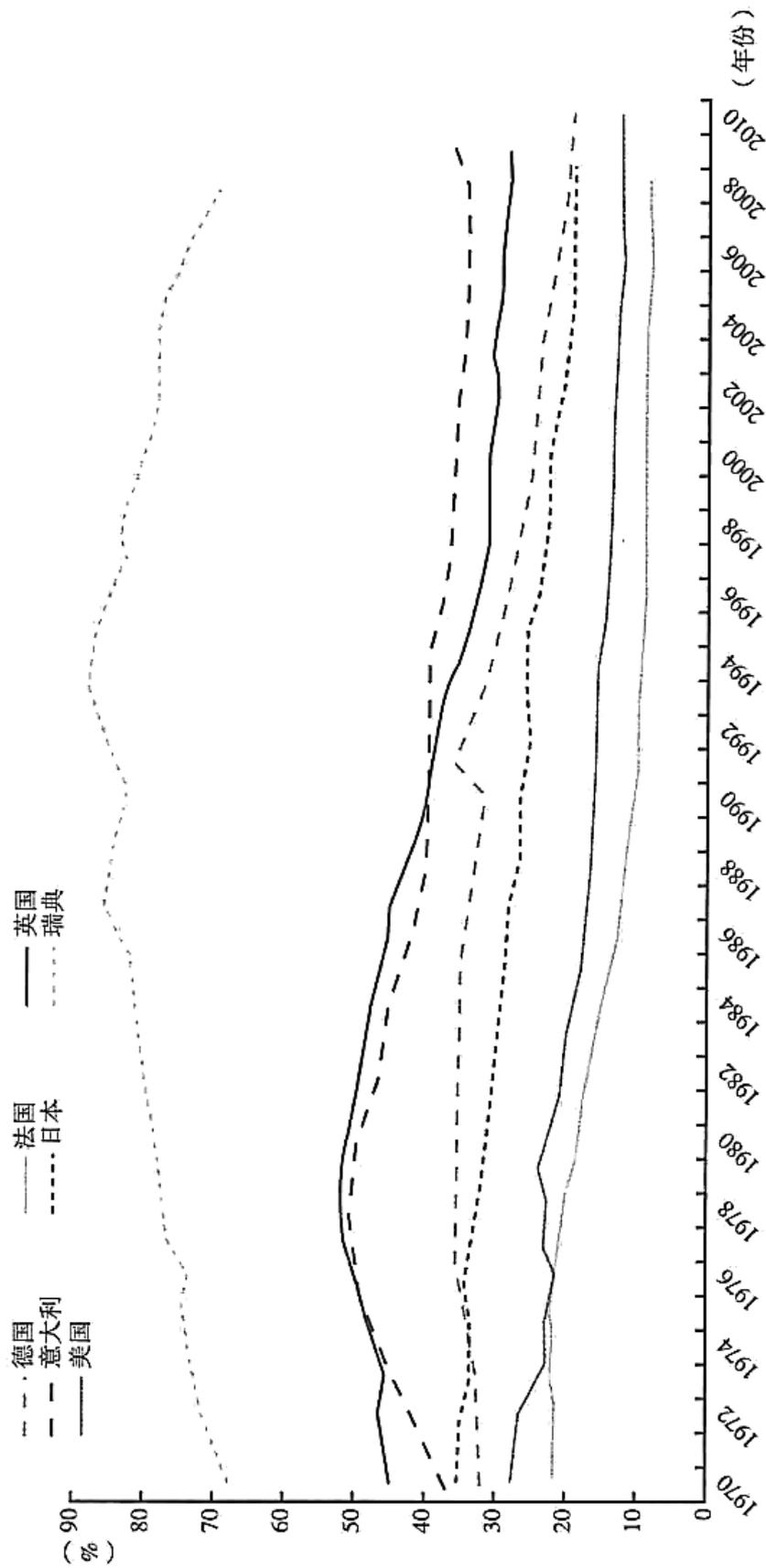


图 1.5 七国工会组织, 1970 ~ 2010 年

资料来源: 阿姆斯特丹劳动高级研究所: ICTWSS 数据库, 2011 年 5 月 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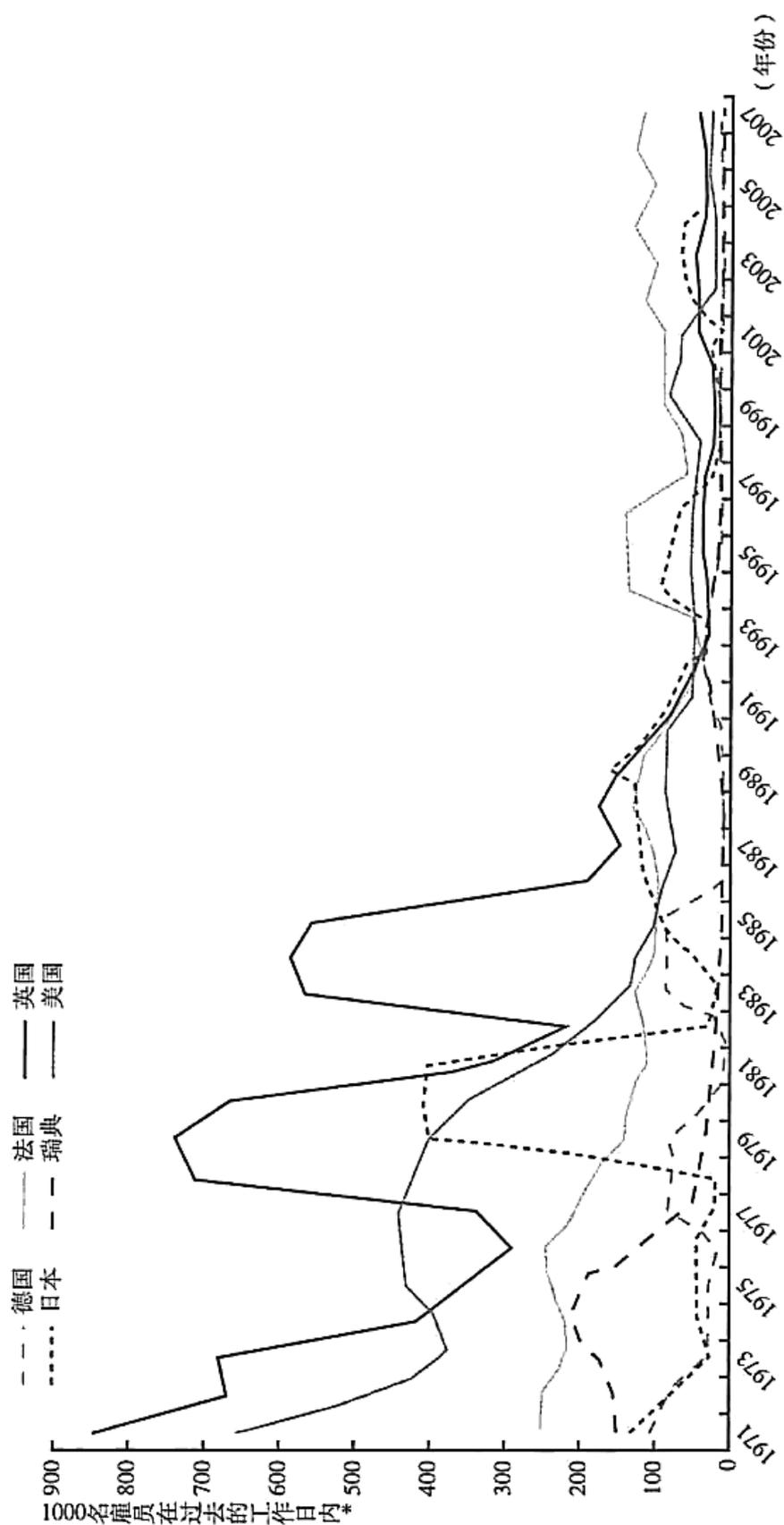


图 1.6 六国罢工情况, 1971 ~ 2007 年

* 移动平均指标 (3 年)

资料来源：ILO 劳工统计，美国劳工统计局。

作为扩大政治经济中可分配的资源储备的调节机制。^① 这一举措是第三种，同时也是迄今最后一种用预支的购买力来填补晚期战后资本主义诺言缺口的方法。在这个政策下，国家仅限于使用相应的调节政策，来使个人及家庭财政方面能够以自担责任和风险的方式来获取贷款，从而平衡个人由于工作或是国家社会保障方面造成的收入缺失。这里通常情况下被归为不同类型的，或者根本就被认为是完全相反的游戏规则的资本主义国家间仍然存在着平行性。不仅在美国、英国，而且在瑞典（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在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债务急剧上升，以至于期待中的整顿政策带来的或多或少的国债减少的局面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出现，此外反而是此前相对还一直保持稳定的总体负债水平急剧上升，只是它不是由国家债务的增长而更多地是由个人债务的增长而带动（图1.7）。^② 68

用个人债务代替国家负债的解决方案在政策理论层面找到了新的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来论证。资本市场按照这一理论是可以自我调节的，不需要国家的管制，因为各参与者究其本身是拥有着各方面信息的，于是也能够规避系统不平衡

① 与此同时，上述国家也从放松管制的金融业向着“结构转型”而成的“服务业社会”的过程中受益良多。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和英国，华尔街和伦敦市成为最重要的国家经济分支和财税来源。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美国45%的企业赢利来自金融业，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则只有不到20%（Krippner 2011, 33）。关于有利于金融业的再分配的量有多大以及从中可以抽取出多少资源，参见 Tomaskovic - Devey 和 Lin (2011)。

② 图1.7展示了四个补偿效应特别明显的四个国家。值得一提的是，瑞典（与其他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同）居然也在列。

69 现象的出现。^① 因此，个人生存保障也就看起来完全可以通过贷款来实现，而这时，国家也就终于似乎可以完全向战后不得不负担起来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很可疑的，既保障经济增长又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彻底告别，从而把这些都重新推向市场以及在其中理性行为的参与者身上去了。到了这时，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也就到达了其逻辑的终点。

众所周知，上述的前景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当下的三重危机正是债务金字塔崩溃的结果。而债务金字塔则是由一个增长的资本主义为前提的资本化的诺言组成的，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这些许诺确保了他们的合作或至少是容忍的态度，然而问题在于，人们所期待的这种经济增长早就已经不存在了。自由化改革也陷入了一个很危险的转折点。在2008年的危机中，面临崩溃的国际银行体系迫使本来准备从经济干预中抽身而出的政府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游戏中去，尽管此前采取了那么多的私有化措施和放松控制政策。同时，所有以巨大的政治风险换来的财政整顿的成果有可能一下子付诸东流。2008年以来，各国政府或多或少地面对着金融危机后收拾烂摊子并重新建立起一种秩序的任务而无计可施：很显然，这样的一个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私有化方法来完成的。同时，在政府和央行拯救私立银行系统的

① 对此，首先应该参阅作为效率市场假说创始人的尤金·法玛（Eugene Fama）以及MM定理（Modigliani - Miller - Theorem）的共同提出者米勒（Merton H. Miller）、马科维奇（Harry Markowitz）、梅顿（Robert Merton）、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布莱克（Fischer Black）等。他们都曾经或正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其中很多人也都在瑞典国家银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名单上。

措施中，越来越难以区分国家的和个人的钱之间的界限：最迟到国家来接手坏账时就能非常明确地看出，两者之间是如何无缝对接起来的。今天，人们已经几乎不可能再看出，哪里是国家，哪里是市场，到底是国家将银行国有化了，还是 70 银行把国家私有化了。^①

我总结一下：购买时间共有三种形式以及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最为典型的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领头羊美国（图 1.8）。20 世纪 70 年代，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经过巨大的波动，在 1980 年时达到了 14%。这时出现了第一个转折点：通货膨胀被抑制，但是国家负债取代了通货膨胀，直到 1993 年，国家债务都在不断快速增长。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对国家财务进行整顿，短短几年中就使其以超过 10% 的速度回落；但是，国家负债减少的同时，私人负债却加速增长。直到金融业崩溃的较短时间，才开始有最初的抵制私人负债措施，这是由于个人无清偿能力，伴随而来的则是在通胀率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国家债务再度增长。

在德国，由于机构的不同以及特殊历史事件，危机爆发的阶段性时序就略有不同，但仍然是按照相似的内部逻辑在发展（图 1.9）。如前面所提及，德国只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有过非常短暂的高通胀现象；原则上讲，到了 1974 年布兰特总理下台时，在达成一个两位数的工资协议之后，德国的

① 至少在 2012 年夏讨论拯救西班牙银行的一揽子计划时，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货币的双重本质——作为私人财产和公共机制——当然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Ingham 2004）；这种双重本质是资本主义谜题的基础（Graeber 2011），也是对食利阶层来说其最终的不可理解性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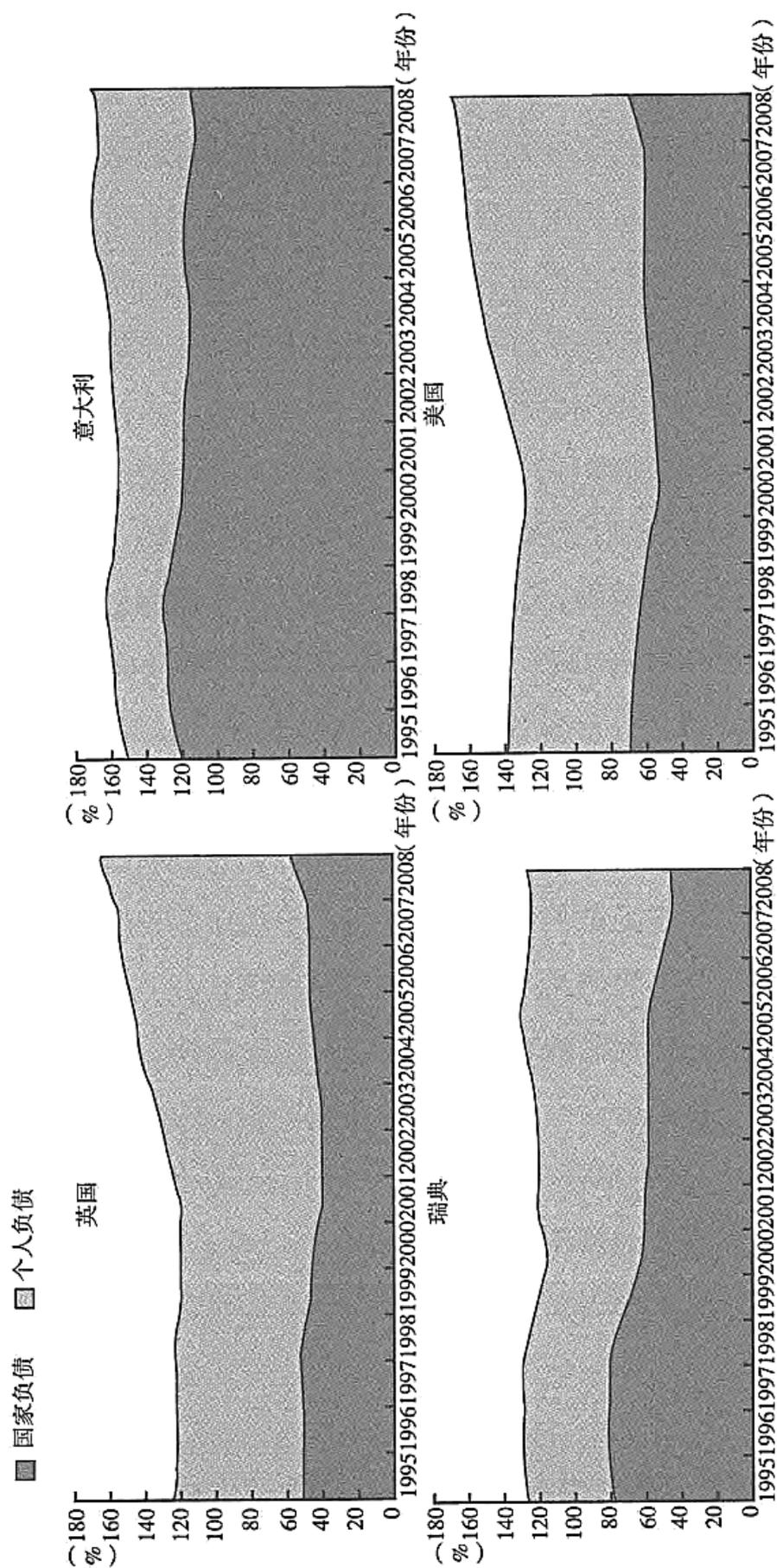


图 1.7 四国国家以及个人负债情况，1995 ~ 2008 年

资料来源：OECD 国民经济核算统计；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通货膨胀就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国家负债的快速增长，其结果就是，1980年，国会大选时，人们已经在讨论国债额不能超越社会总生产的30%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两德统一之后，国家债务持续增长，并开始出现私人债务。后者到了21世纪初时有所减少，由于德国当时的国债逆世界潮流而动，并未停止上涨；总的来说，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之间呈现互补的关系。2005年，执政大联盟开始实施其卓有成效的整顿政策时，私债也未上升，相反仍然持续有所下降。^① 金融危机在德国如在美国一样造成了新一轮的国家债务增加。

72

在瑞典，通货膨胀、国家负债和私人负债之间在四十多年间的发展也如同连通器一样（图1.10）。其间爆发过两次严重的财政危机。1980年以后通货膨胀的降低带来了国家负债的增长，并在80年代中期的一次财政危机中达到峰值。后来的保守政府在以超过20%的速度快速抑制国家债务的时候，通货膨胀又卷土重来，或者说抵制国债就是通过通胀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转折点，通胀降低的同时，国家债务又开始快速增加。1994年出现了第二次严重的财政危机后，瑞典政府开始了长期的低通胀下的可持续性财务整顿。瑞典以此成为整顿国际的榜样案例（财政部，2001；Guichard et al. 2007；Henriksson 2007；Molander 2000；2001）。当然，同时私人财务方面的债务也开始出现长期和持续的增长。

^① 关于德国财政负债情况的特殊性，见博士论文（Daniel Mertens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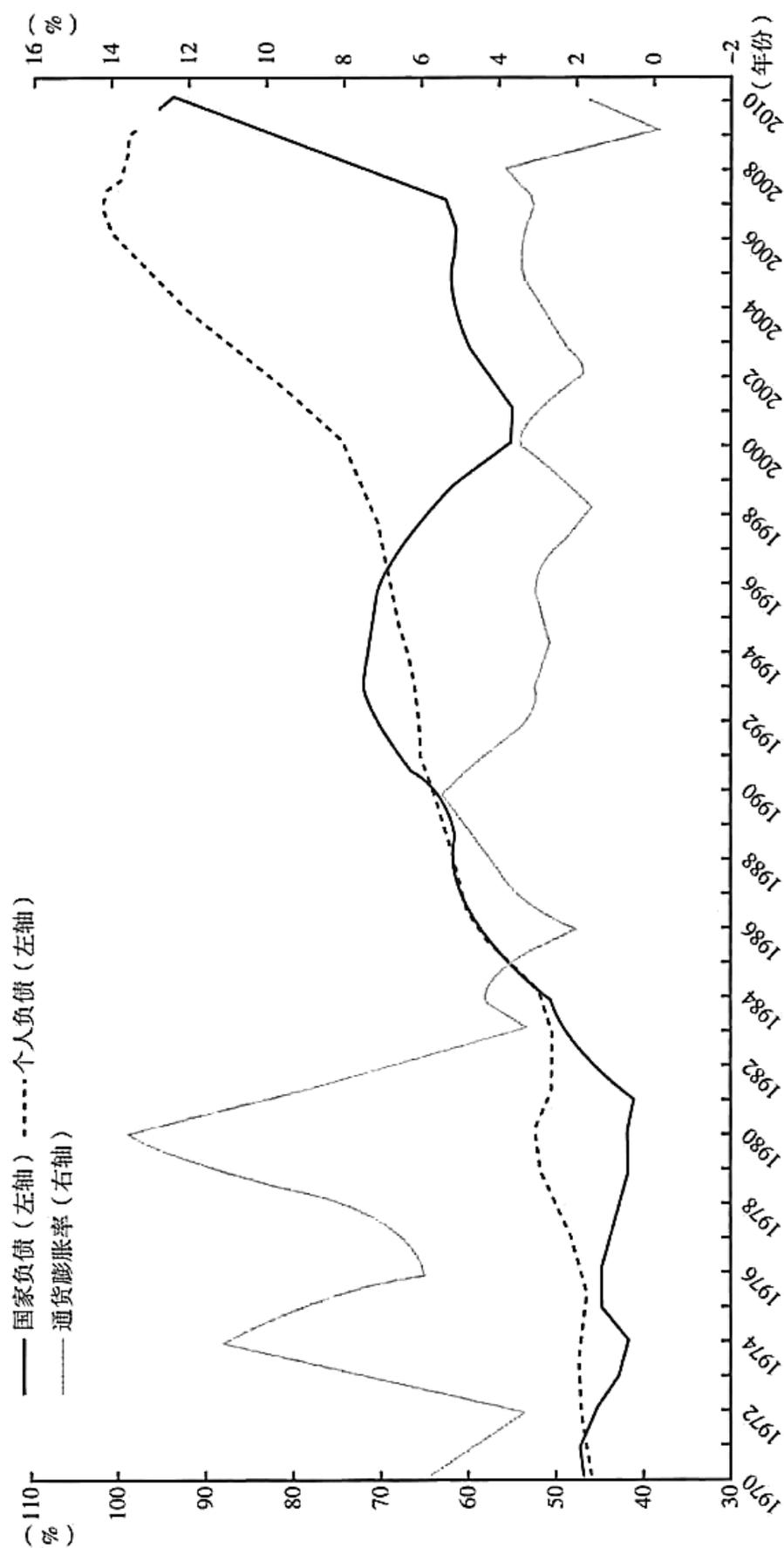


图 1.8 美国危机爆发的进程

资料来源：OECD 国民经济核算统计；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前后使用的三种产生增长和财富幻象的货币手段——通货膨胀、国家负债和私人负债——都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行得通。然后这种策略就必须被舍弃，因为相比于给积累过程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它会带来更大的伤害。^① 在此期间，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一直在继续着，并决定了下一次尝试修改资本主义和平套话的先决条件。每一次，当这种尝试难以为继的时候，它所造成的损失就非常可观，然后为了消除这些损失所要采取的措施就会面临更多困难。在今天看来，解决目前还在一直持续着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就是要从根本上通过对欧洲核心现代福利制度国家完全的改弦更张来重新定义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只是我完全不知道，这样一种深刻的变革是否能够在为解决一次危机而预留的时间内实现。 74

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人们只需要回忆一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所谓的黄金三十年后的发展道路，就能明白个大概了。每一次过渡到一个构建新的合法性的模式时，都伴随着工薪阶层的失败，这才能够使自由化的进程不断被推动下去：通货膨胀的结束以工会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丧失罢工 76

① 通货膨胀，国家或者私人负债都并不必须导致危机的发生。透支未来生产力提高的效果而使名义工资上涨有可能鞭策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债务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的投资带来资金，最终又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而得以清偿。私人债务是提前预支了未来的财富，但它也可以通过工作偿还。在所有的三种情况中，事情最终的发展方向都取决于用于投资的资本的所有者的反应：通货膨胀有可能会飞速发展而情况急速恶化，由于害怕财产的损失，就会造成资本外流的结果。国家债务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会使人对清偿能力产生怀疑，私人债务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每个阶段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投资者对于行动者“理性”的“信赖”——也就是说，信任理性的能力，同时也去感同身受地体会“信赖”的心理学和利润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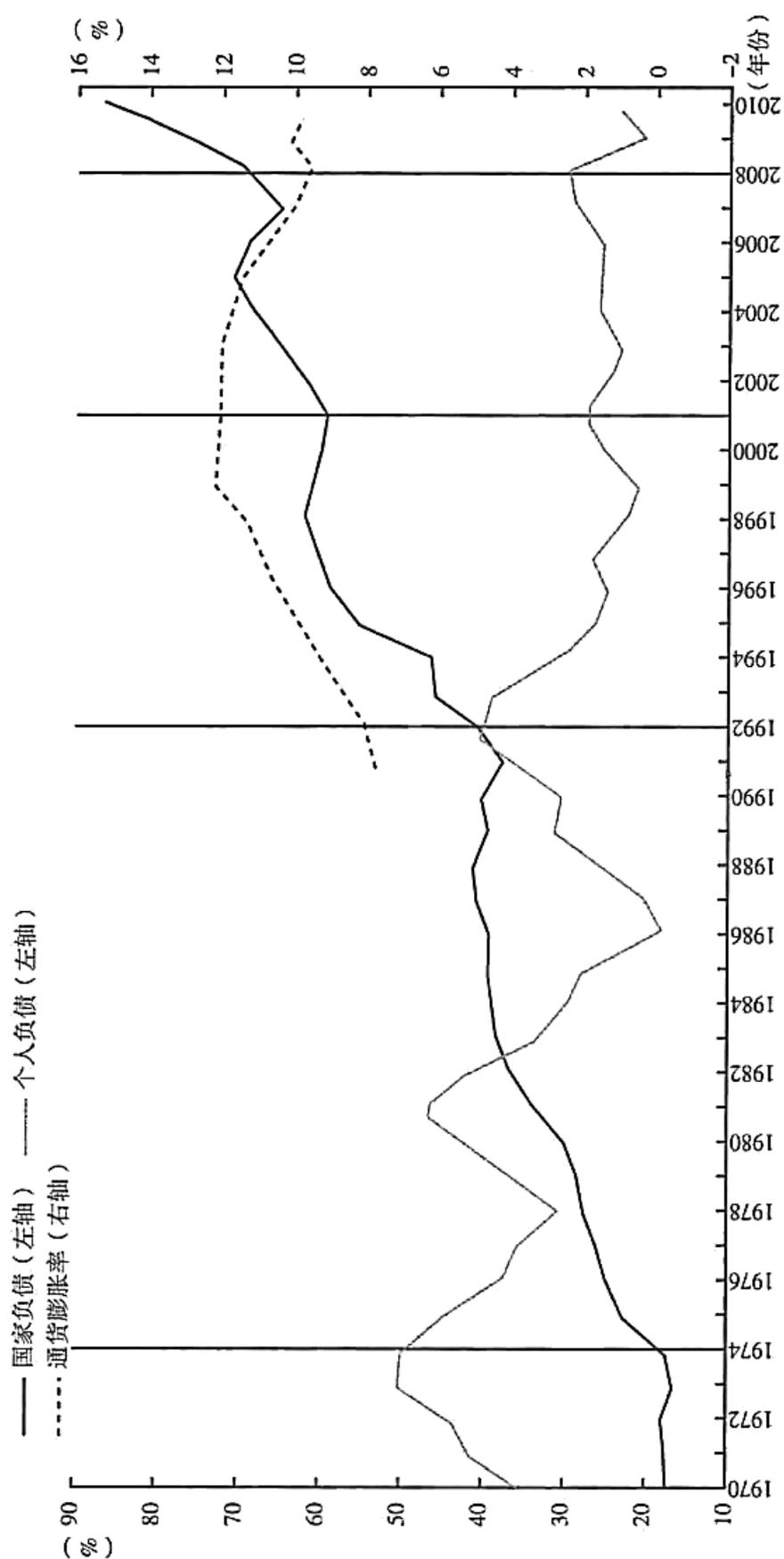


图 1.9 德国危机爆发的进程

资料来源：OECD 国民经济核算统计；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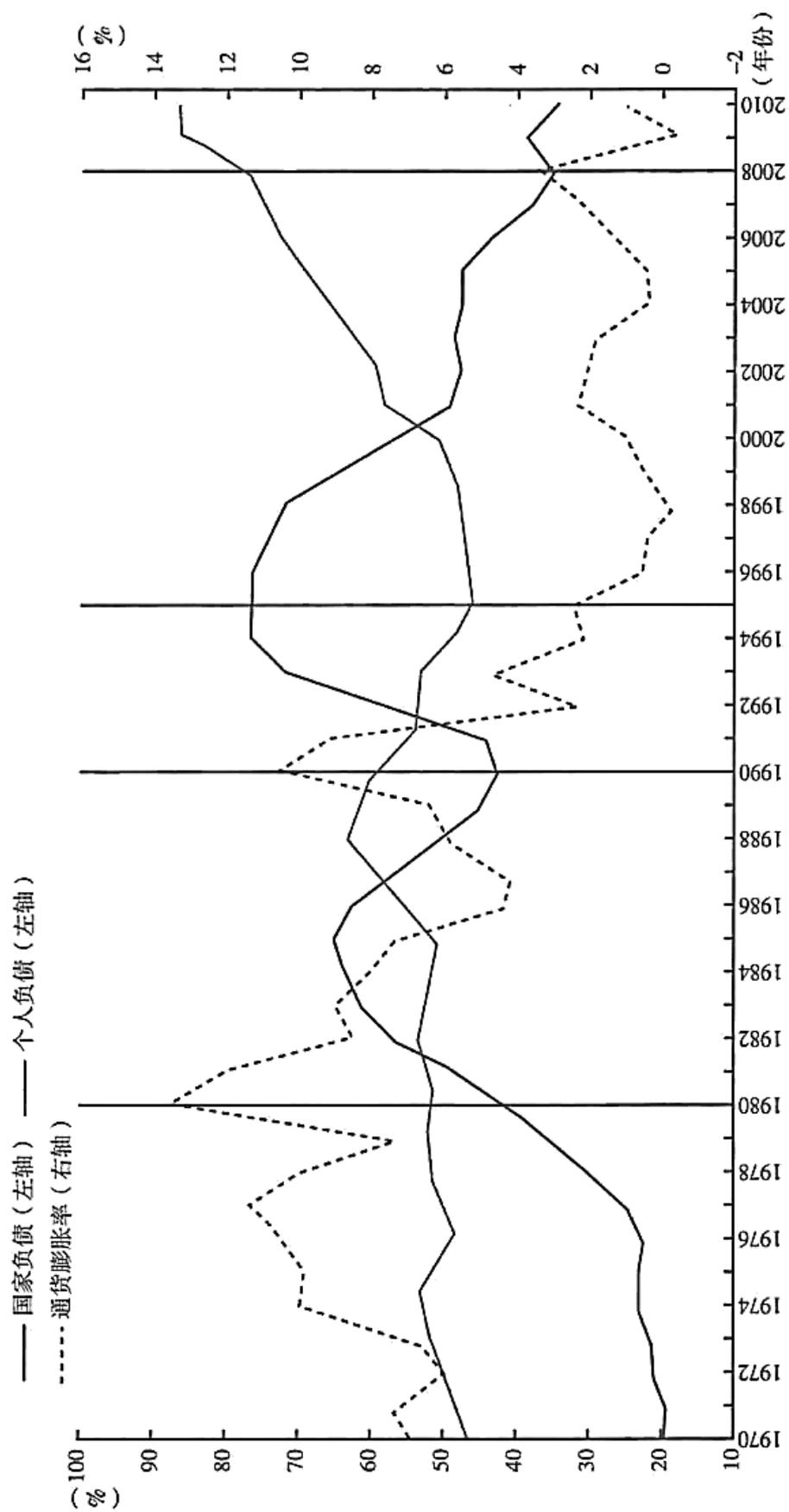


图 1.10 瑞典危机爆发的进程

资料来源：瑞典国家债务管理局，瑞典统计局。

能力，以及持续的长期结构性失业为代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顿国家财政划开了对社会公民权利的深深切口，公共服务业的私有化以及生存保障商业化的多元形态，私立保险公司在社会保障方面负担起原来属于政党和政府的任务；所以“赊欠资本主义”（Pumpkapitalismus）（Dahrendorf 2009）的终结又导致了虽然无法完全精确预估存款和投资金额损失量有多大，但仍然会以失业、就业供给不足和进一步缩减国家负担的义务为代价进一步整顿公共财政。同时，政治经济的分配冲突将会越来越远离“马路上的”男男女女们的“经验世界”以及政策干预的可能性：从每年的工资斗争到议会及政府的换届选举，再到私人的贷款和保险市场，最终到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十分遥远的所谓国际金融外交，其事实和内容对于所有那些并不直接参与其中的人们来说，像一部深奥的天书一样。

如我下面要说明的那样，在近四十年所走过的道路的延长线上，人们还将寻求找到彻底放开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市场的尝试，不是通过那个多方面作为保障而依赖的国家，而是通过作为大众民主的民主制度，因为它本身也属于民主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在今天，通过制造增长的幻象来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方法看来已经用尽；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通过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玩的货币魔法最终看起来实在过于危险，人们也不敢再试着用它来购买时间。如果不能再现一次经济增长的奇迹，那么未来的资本主义就只能放弃建立在通过赊欠的方法实现的消费主义之上的和平套话。今天危机管理的乌托邦思想还停留在以政治手段去推动实际已经高度去政治化

了的政治经济的完善，它的发生要固定在重新组织的民族国家中，受到国际的，杜绝民主参与的政府及金融外交的监督；它还需要一群必须是在霸权的转变观念教育中学习多年的民众，他们能够认同自由市场得出的分配方案是公平的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其他替代选择的。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改革：从财税 国家到负债国家

政治的标准经济理论——这里千万不可以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混淆——解释了由民主制度的失败而产生的国家财政危机。它或多或少是合法性危机理论关于保守的过度要求或不可治理性变体的形式化版本。其主要的叙述在于过度使用的“公共池塘”：被使用到极致的公共资源（Alesina 和 Perotti, 1999; Poterba 和 von Hagen, 1999）。这一概念即使并非完全令人信服，但也历史久远。19 世纪时，人们提出它，并以此来捍卫对中世纪的公共财产的迅速私有化过程。这一过程在马克思那里被描写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Marx 1966 (1867), 第 24 章]，公共池塘理论则给这一进程提供了效益方面的理论合法性（North 和 Thomas, 1973）。

民主失效而导致金融危机？

简短地说，关于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ödie der Allmende）（Hardin 1968）的漫长故事和为数众多的不同版本最终都指出，如果一个资源，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私产，而可以供全体成员自由使用的话，就会出于相同的原因而很快枯竭。一块公地会被理性行动的个体过度放牧、过度捕捞、过度掠夺，他们难以克制从公共资源储备中过量获取，而非补偿或反馈的冲动。公共财政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公共池塘一样，而民主制度则是公民可以任意剥削公共池塘的许可证。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家通过选举来获取职位，而又因为每个选民也是在经典经济学理论意义上“理性”——利己主义——地行事，那么政治家必然会屈服于多数人的压力，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不顾及可支配资源的有限性。他们宁可在争取更多选票的竞争中去美化一种愿景，即：公共的资源储备是取之不尽的。一旦选举获胜，政治家又会在再次当选的利诱下支出比国家实际收入更多的金钱。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出现慢性的财政赤字，渐渐使得国家债台高筑。 79

从标准经济学角度来看，国家财政危机是未经厘清的产权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关系不明的后果。这也被计入了民主失败的账单，更明确地说：民主决定权被执行到了它本来所不能决定的领域。解决财政危机就因此需要保护公共财政不被由民主方式生成的诉求滥用，并最终缩小通过税收而设置的社会公地的范围。众所周知，这一理论是关于强大公

权力的基本信条。然而我要否认这一说法，并且我会揭示出一个更接近事实真相的关于当下财政危机的因果关系。当然，我的这一理论最终也会走向另外一个版本的“公共池塘”理论和民主失败论调，只是在我这里，两者之间的位置发生了调换。

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财政是否遭受了过度的民主威胁？如果我们回顾当前国家财政危机的历史，那么二战以来国家负债的激增发生在2008年以后（图2.1），这就显然与民主授权的选民需求膨胀之间并无关联。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膨胀的欲望在作祟的话，那么这也是来自那些经营不善的大银行，它们成功地把自己扮演成“太大而不能失败”的样子，并与体制息息相关，因此是值得营救的。当然，它们在国家机器中为数众多的代言人也功不可没，如W. 布什的财政部长，前高盛集团总裁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en）。^① 他们充分利用了政府以及民众对整个实体经济崩溃的恐慌，并且为国家天文数字般的干预救市开辟了道路。而救市的目的也并非是用作为无主物的公共池塘来满足选民公众自我财富提升的无理要求，而是防止出现集体贫困。经济增长方面导致的损失让很多国家的负债率在刺激经济增长方案和银行救市方案的基础上雪上加霜。2008年以后加剧的国家财政危机不应该被归咎于过度的民主，而是应该归咎于金融危机的观点，还有其他的定量研究可以佐证。

^① 关于“经济体制的需要膨胀”见Beckert（2009）。关于高盛集团银行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一篇不错的调查文章是“The Great American Bubble Machine”（Taibbi 2009）。另参见Streeck（2012b）。

这些研究表明，2008年的危机后，一个国家金融业的总量和其新产生国家债务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Schularick 2012）。

如同我们所见到的那样，20世纪后三十年中，金融业的巨大增长和富裕民主国家的财政危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美国，对金融业放松管制并使其膨胀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里根政府要解决经济增长衰退以及因为减税而带来的财政困难问题（Krippner 2011）。打破货币业的枷锁就是为了一方面可以从国外进口资本，用以平衡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支付差额的赤字，并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平可以通过信贷的方式加以保障。^①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帮助国家实现解决自身赤字的问题。后者又部分地与20世纪80年代通过美国央行高利率政策实现的通货膨胀结束相关，这一政策给国家负债贬值画上句号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和就业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保障体制的更多要求。此外，人们期待从对金融行业的放松管制当中转型成为“服务和知识社会”的结构转型的领导角色，并伴随着整个经济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的税收收入。 81

金融化又继续经由克林顿政府和其惊人成功的措施不断促进，以达到整顿国家财政的目的（Stiglitz 2003）。美国联邦财政在20世纪末确实在短时间内出现了盈余，也是由于国家强力地干预了社会支出才得以实现的。在金融市场中加大力度推进的放松管制政策通过负债，特别是私人信贷可能

^① 这一努力其实从尼克松时代就已经开始，比如当时美国政府就吸引诸如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把石油交易中剩余的资金投到美国来（Spiro 1999）。

性的提升成功地堵住了由于国家整顿政策撕开的缺口。工资收入以及技术转让收入的减少和停滞，同时“自我负责”的个人保障成本上升，都有可能损伤民众对于经济自由化的接受——这一民主资本主义经济史的转折点，又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得以延续：9·11事件后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为了扩大个人财产而向穷人发放次级贷款——而这一房贷则极有可能无法收回。

新自由主义革命中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

基于这样的背景，很难像公共池塘理论所倡导的那样，把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以来，西方民主国家增长的债务归咎到政党和国家面临的民主压力之上。实际上，债务的增长、减少和再增长与新自由主义是否能够战胜战后资本主义紧密关联，而新自由主义又伴随着政治上对大众民主制度削权。20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的严重预算赤字是工会方面好战的薪资制裁措施和出现高失业率后的结果。后者则又使得改革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变得合情合理。这些在迟到了的市场调节机制“自由化”名义下的改革措施最终走向了对战后资本主义年代的社会契约的根本修正。我在第一章里已经对这里提及的发展予以了概括式的叙述。

新自由主义革命成功最为显著的表达在于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收入和财产分布不均的上升。如果说，国家负债是大众民主授权的结果，那么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何财富和财富机会的分配自下而上地出现了激进的转变。就以收入的分配来说，近些年，在如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这些传统上收入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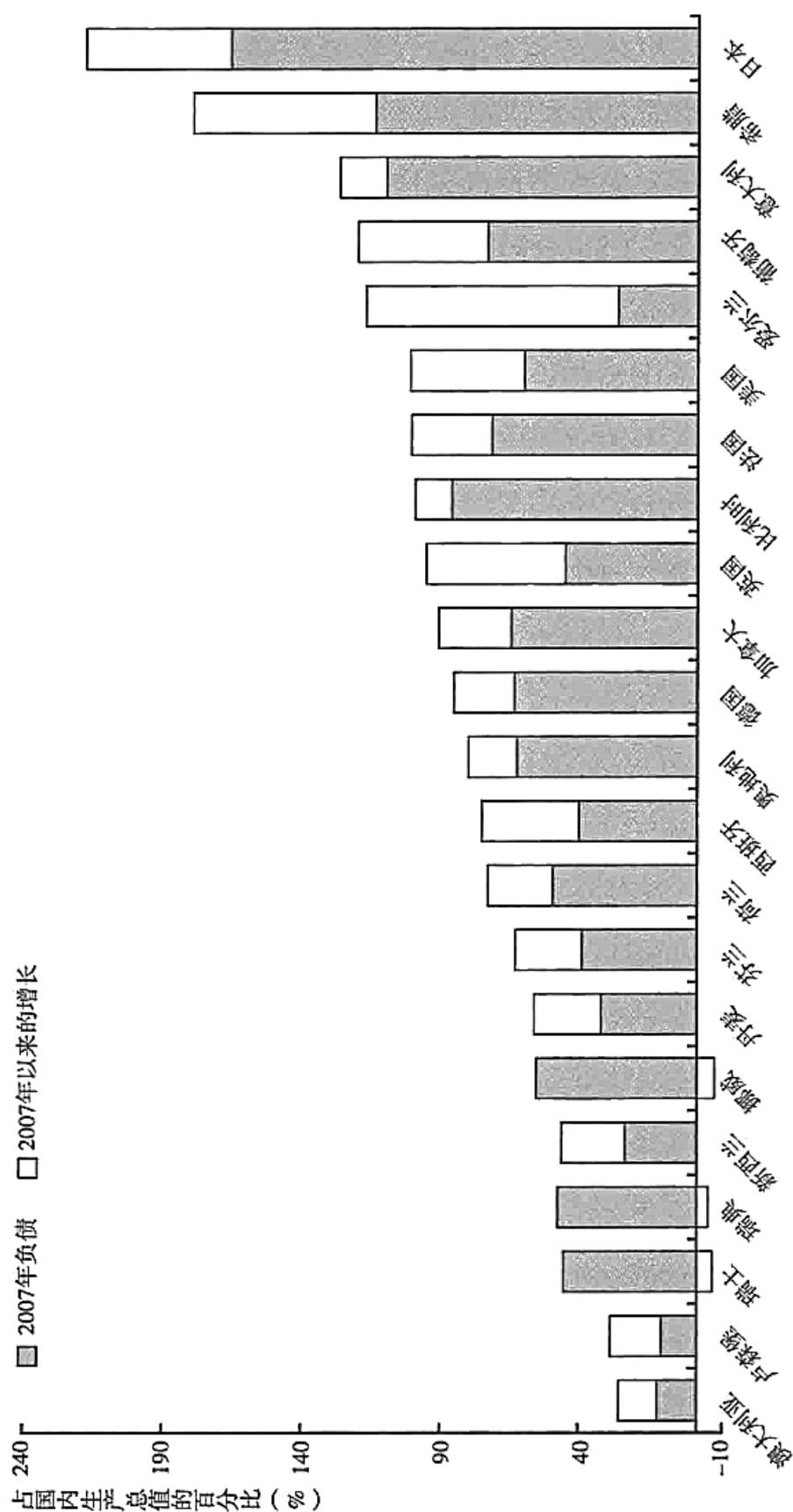


图 2.1 金融危机中国家负债的增长，2008 ~ 2012 年

资料来源：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配就比较悬殊的国家，收入分配更为不均；而相比之下，比较平均的瑞典和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现象（见前文，图 1.2）。^① 对于德国的发展情况，我曾经试图这样解释：它是与跨企业薪资制定系统的逐渐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会权力丧失密切联系的（Streeck 2009b，第 41 页及其后）。布鲁斯·威斯腾（Bruce Western）和杰克·罗森菲尔德（Jake Rosenfeld）以美国为例，更精确地从量化角度，证实了工会谈判权力和收入分配不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Western 和 Rosenfeld，2011）。

托马斯·寇肯（Thomas Kochan），美国最著名的劳动力市场研究者之一，指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薪资发展代表了美国社会契约的瓦解。他认为，在此之前，生产力、居民收入和平均小时工资是以同步水平在增长的（1945 = 100，1975 = 200）。这之后，生产力则持续以直线上升，2010 年时达到 400，而平均的小时工资只有 200，也就是说维持在了 1975 年到 1980 年时的水平停滞不前。虽然家庭收入上涨至 250 左右，但这种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女性更多地参与工作养家，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时间的延长而导致了总收入 85 的增加（Kochan 2012a；b）。这些数据表明，美国工人的家庭收入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没有从生产力水平提升中分得任何的好处，尽管工人工作中投入更多，劳动强度更

① 与之不同的是法国的情况，1985 年至 1995 年，基尼系数还小幅降低，此后又在一个低水平数字上停滞不前。但是由市场压力而导致的改革却也是势在必行，法国的现状也必然会“正常化”，无论其总统和政府来自于哪个政党或派系。

大，对工人工作中灵活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工作条件也较以往持续地恶化了。

而大资本的所有者及其管理者的剩余收入（Residualeinkommen）情况就完全不同了。2012年3月26日，斯蒂芬·拉特纳（Steven Rattner）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2010年取得的新增社会生产中不少于93%的份额——2880亿美元——进入了最上层1%的纳税人腰包中。而37%的增长则属于0.1%的最上层阶级，他们的收入也因此增长了22%。作为多次不断的减税的结果，对于最上层的1%的人来说，在前二十年间每次经济增长的阶段都更多地获益：“在克林顿时代，45%的收入增长流向了最上层的1%的群体，而在布什时代，这个比例是65%，到今天则已经上升到了93%。”^①按照《纽约时报》6月12日的报道，2010年，房地产市场崩盘后的美国平均家庭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衰退到了1990年的水平。

无论我们采用哪些数据来描写美国新自由主义革命进程中出现的独一无二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都只能指出同一事实。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拉里·米歇尔（Larry Mishel）指出，美国1983年到2009年间财富增长的81.7%落入5%的美国人手中，而属于下层的60%的财富则只获得了7.5%的财富增长。从企业经理人的收入方面来看，根据《纽约时报》2012年4月7日的报道，即使是在危机年2011年，全

86

^① 更前一些，但同样令人惊讶的数据可以参考 Hacker 和 Pierson（2010；2011）

美百名获得最高薪资的经理人的“补偿”达到了1440万美元，是同期美国平均收入的320倍之多。20世纪70年代的相关数据不太容易获得，但毫无疑问，企业中的顶尖收入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呈爆炸式增长，这种情况也绝不仅限于美国。^①

新自由主义改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排挤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平行地从民众对民主选举的参与度持续降低，有的时候还是急速降低中看出。它波及的首先是民众中本应该特别对国家以及由国家实现的经济上自上而下的再分配特别感兴趣的那部分群体（Schäfer 2010；Schäfer 和 Streeck，2013）。在西方民主国家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参选率是上升的，而这之后到今天，参选率平均下降了至少12%（图2.2）。这一趋势在各地都很明显，并且暂时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回升。越过一半的国家，其2000年以后的选举都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参选率。越是最近举行的选举，越有可能是战后以来参选率最低的选举。同时，地方选举和地区性选举的参选率往往较之国家级的选举还要更低一些，其参选率降幅较以往更加明显，至少在德国是这样（图2.3）。其中参与率最低的则是欧洲议会的选举。

和20世纪60年代修正主义民主理论 [Lipset 1963 (1960)] 所说的不同，参选率降低并非是由于民众对于一

^① 参见数据（Streeck，1997）。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丁·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的案例已经很好地说明了德国已经走在了追赶美国的道路上。他2011年时可以为自已批准1830万欧元的薪金。

切都表示满意，因而主动放弃了对事情发展的干预。正如阿尔明·赛弗（Armin Schäfer）的研究表明，选民当中，正是低收入阶层以及社会底层的选民参选率最低，而这一社会群体的参选率下滑最为明显（Schäfer 2010；2011）。因此，各地都可以观察到参选率和当地失业率以及社会救济比例之间呈强负相关关系。在德国大城市中，各街区间各项选举的参选率分布离散性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都呈上升趋势，并且参选率在社会经济相对薄弱的居住区（高外来人口率，高失业率，低收入等）已经低到很多政党已经更多在考虑是否还有必要在这里张贴竞选宣传海报。^① 这一举动同时又导致社会底层更加游离于选举制度之外，而政党的竞选平台则更多地移向了社会的中间阶层。

一切情况都表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下滑的参选率反映出的不是满意，而是听天由命的态度：特别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转型中的失败者，他们无法从政府换届，执政党变更中看到任何有利于自己的希望。全球化带来的 TINA 政策（TINA，即 There Is No Alternative，意为“别无选择”）已经早就深入社会的各个层次：选举，至少在那些依靠政治差异的人眼里，已经毫无区别意义。而越来越少地把希望寄托在选举上的人，是那些有能力从市场中获得希望的人，他们越来越不用担心市场受到政治的干预。社会底层在政治上的自我放弃态度保护了资本主义不受民主制度的干预，并且巩固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成果。

88

^① 关于这一相关性的一篇新闻报道，参见 Schlieben（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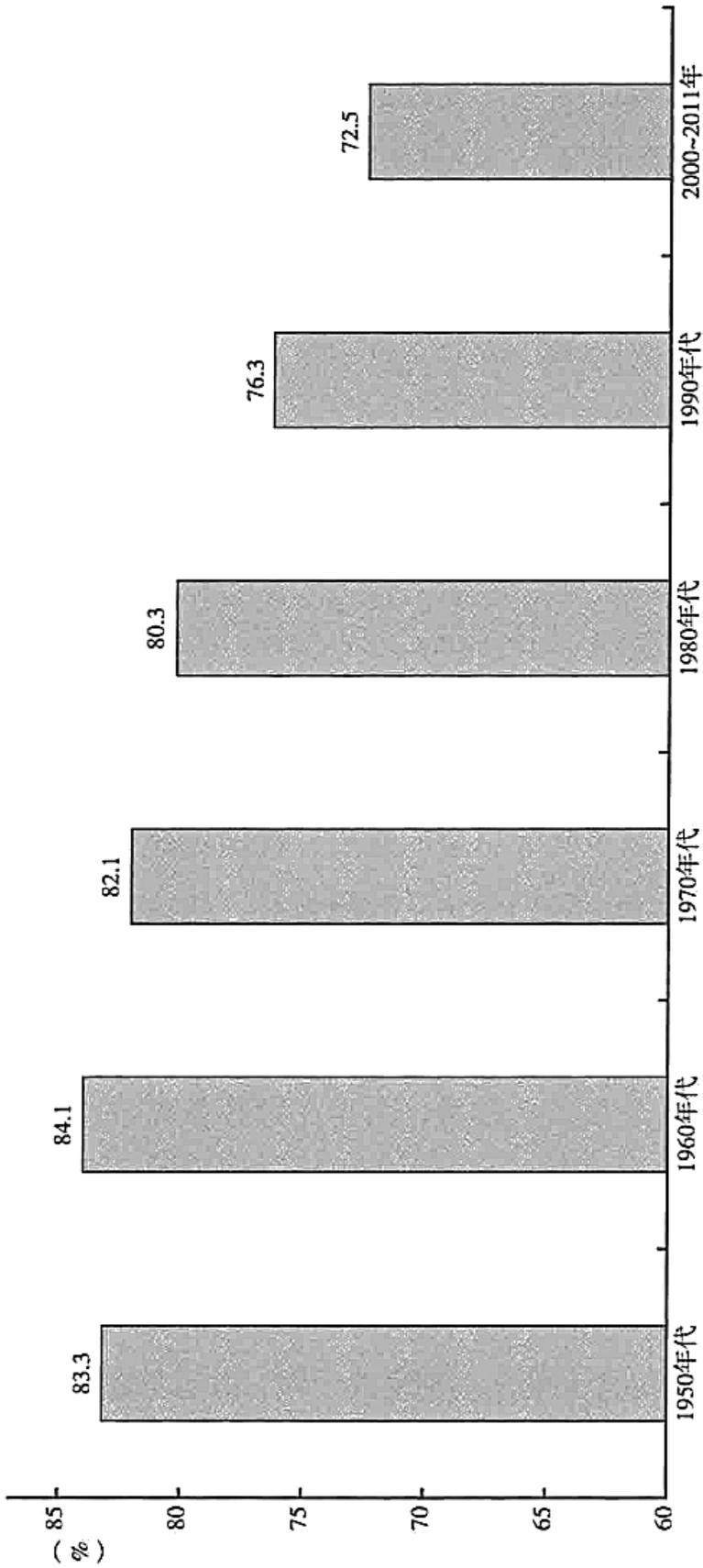


图 2.2 国家议会选举的参选率，1950 年代至 2000 年代

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资料来源：民主和选举援助国际研究所 (IDEA)，投票率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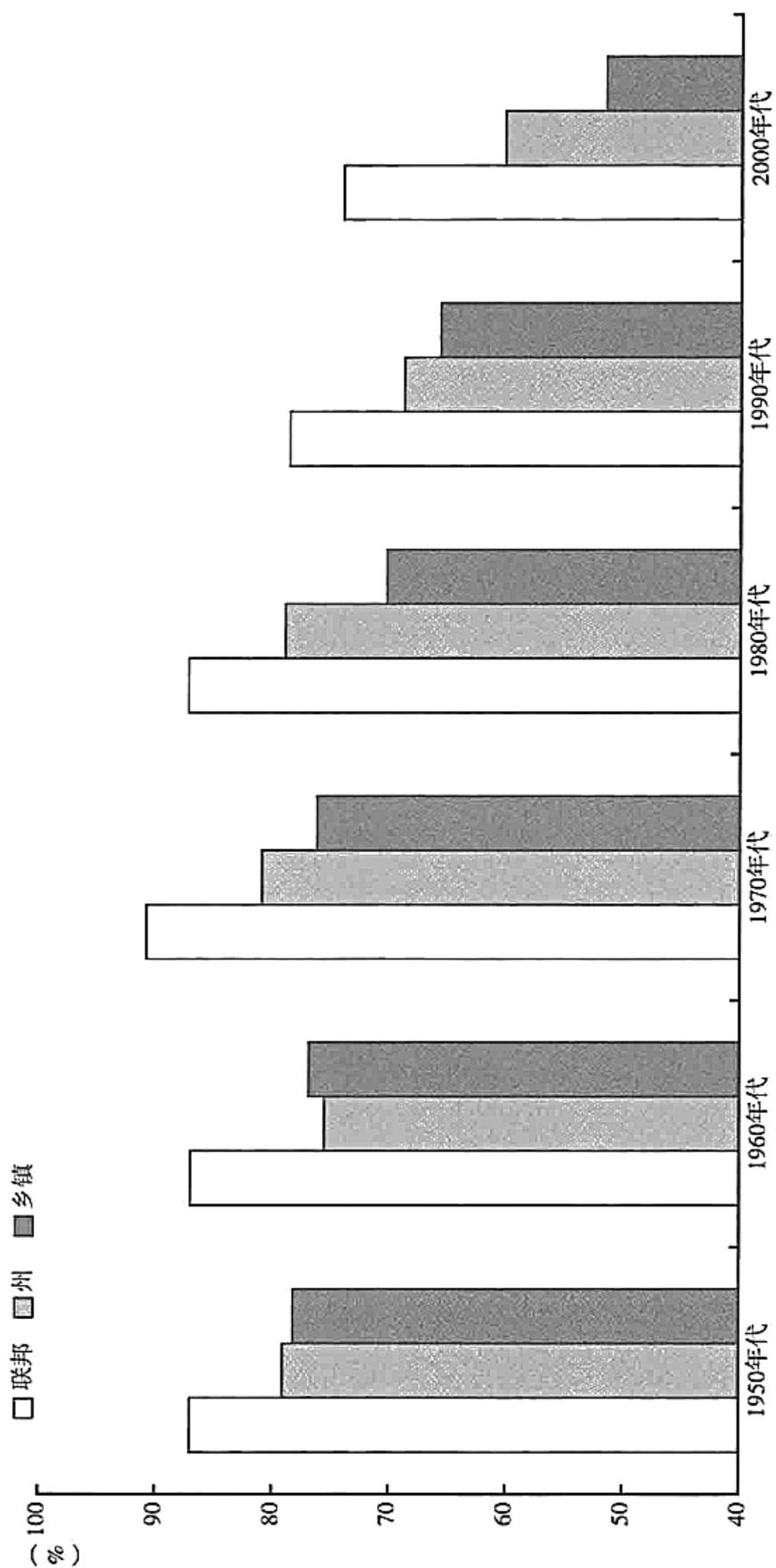


图 2.3 德国参选率，1950 年代到 2000 年代

资料来源：Armin Schäfer, Demokratie im Zeitalter wirtschaftlicher Liberalisierung, [www. mpifg. de/projects/demokratie/Daten/Wahlraten](http://www.mpifg.de/projects/demokratie/Daten/Wahlraten)。

外篇：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

在这里，我想就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市场和民主政治以及新自由主义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补充性地谈一些一般性的想法。一般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需要一个强势的国家，它要能够通过自身的干预把社会特别是工会方面的要求转移到市场的自由游戏中去。上述观点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在其1988年的专著《自由经济和强势国家》（*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中以撒切尔政府为例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出来。相对的，新自由主义和一个民主国家则是不相容的，因为民主国家是这样一种政权，它以公民的名义借助于公共权力对市场进行的经济物资的分配实施干预——也就是说，这种政权从公共池塘理论角度来看，国家财政将无以为继。

最终，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不过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一个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在冷战时代，民主制度离不开资本主义，或曰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反之，资本主义也离不开民主制度^①，是公共政治话语的共识。在战争持续期间，人们还远远未如此看问题：资产阶级作为天然的少数派总是担心被民主选举出来的多数人政权——那不过是一个工人政府——剥夺财产；另一方面，激进左派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由资本、军队和贵族联盟导演的反民主政变，在他们

① 上述与“现代化”理论有着很紧密联系的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见1963（1960）]。但阿连德之后的智利或邓小平以来的中国成为上述理论的反面例子。

看来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法西斯政权明确地证明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无法相容。在实践中，与资产阶级右派专政的解决方案相平行，必然地产生了委员会或者说苏维埃民主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或所谓的“人民民主”，只是其具体名称随着理论和政治的景气状况不尽相同罢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同民主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事实就显得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且还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为了依赖于薪资生活的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出于由民主机制产生的集体目标，直接并且不断地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

战后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政治经济中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机制化了的分配机制，我想把它们称为市场公正（*Marktgerechtigkeit*）和社会公正（*soziale Gerechtigkeit*）。我所理解的市场公正指的是生产的产品按市场来评估每个参与者的个体效益的原则进行分配，并通过相对的价格表达出来。按照市场给付薪资的标准就是边际生产率，即竞争条件下最后取得的单位效益的市场价值（*Böhm - Bawerk 1968*）。相反，社会公正则要视文化标准而定，它不是建立于契约权利，而是建立于地位权利之上。社会公正遵循群体对于公平、合理以及交互性的理解，认可个体对于生活质量最低标准的诉求，并且它不依赖于个体的经济效益和工作能力而存在。社会公正还认可关于健康、社会保障、参与社群生活、劳动保护、组织工会等基本公民权和人权。

91

无论是市场公正还是社会公正都是矛盾的。关于必须要

达到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才能使竞争是公平的，并且它的结果是公正的问题，爱米尔·涂尔干 [Durkheim 1977 (1893)] 早就已经论述过了。在实践中，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总是以市场是足够“完美”为出发点，以至于由此产生的结果也是公正并且是有效率的。比较困难的则是社会公正，因为它的内容是由“社会构建”的，因此也就会随着文化和政治语境而不同，更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变迁。市场公正的东西由市场来决定，并且通过价格表达出来；而社会公正则是在政治过程中由权力和动员相权衡，并且在形式化的或非正式的机构中得以表达。一个社会如何通过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眼镜来审视自我，或者说如何用上述理论来说服自我的程度决定了，它会在极端情况下直接接受市场公正作为社会公正，从而使得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复存在。^① 这种解决问题方式的一个变体就像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 所倡导的那样，自始就宣称社会公正这个概念百无一用^②，并且设法设置政治和经济的机构，使得从一开始就

① 在个体层面，大学中传授的经济学理论在其几乎所有的信徒当中都有着令人惊讶的效率。“经济”按其本身的要求来看，和学校中的“经济学课程”一样都遵循着相同的目标：可验证的，可以用成绩单来说明问题的道义上的转化教育，其表现形式就是应用实证的、“无价值倾向”的理论。另见《法兰克福汇报》2012年8月9日上一篇关于美国中央银行行长本·伯南克 (Ben Bernanke) 在一批教师面前做的题为《市场好极了》的报告的报道。

② “我们在社会公开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不过是那么一种近乎宗教的迷信思想。只要它还能让它的那些追随者们感到快乐，我们就应当怀着尊重与之和平共处，然而当它成为强迫他人的一种借口时，我们就必须要与之抗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公正的信仰在当下也许是自由的文明社会中绝大多数其他价值最严重的威胁” (Hayek 1981, 98)。

避免社会公正的诉求影响了市场公正，从而走向歧途的可能性。

尽管是那样，从市场公正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公正的想法会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政权的多数派形成的道路上不断赋予自身权利，从而借助于政权力量拥有不断地干扰市场行为的可能性，这存在着一个持续的危险。社会公正是实体的，而不是形式的。因此，它在具有形式理性的市场角度来看是非理性的，不可预估的，从而也是专断独行的——这是一个在马克斯·韦伯处就已经能够寻觅踪迹的思想。^① 如果是应社会公平要求而做出的政治决断就会使市场过程变得凌乱不堪，让它的结果变得不干不净，制造错误的刺激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破坏效率原则，总的来说是“与经济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民主的阶级斗争”（Korpi 1983）又是对一个建立于资方和劳方不平等契约之上的体制不可或缺的修补。因为这样的体制会因为所谓的马太效应而催生出累积的优势：“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Matthäus

93

^① “相反，实体理性（materialen Rationalität）这个概念是多义的。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仅仅关照纯形式（相对）明确可以确定的，目的理性的用尽量适合的技术手段加以计算的事实是不能满足需要的，它还提出了伦理的、政治的、用益的、享乐的、等级的、平等的又抑或是其他种种要求，并依此来对形式上理性，即所谓可以计算的经济行为的结果价值理性地（wertrational），或曰实体目的理性地（material zweckrational）进行测量。这些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理性的价值标准可以有无限多元，即使在它们当中也不能清楚的界定哪些是社会主义的，哪些是共产主义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如此的：伦理的和平等的价值标准理所当然的是上述这些多元因素的一部分”（Weber 1956, 60）。

25, 29)。对于资本主义的实践来说，用世俗政治的公平观来修正市场虽然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做法却一直必须延续下去，只要在市场天生的失败者有可能拒绝继续参与到市场中来。没有市场中的失败者，也就没有了胜利者，没有长久的失败者，当然也不会有长久的胜利者。^①

此外，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资本也会在社会过多地干预市场，并超出其承受范围的时候，用危机来还以颜色。当那些管理着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的人感觉到了威胁，觉得最终无法按照市场公正的原则取得相应报酬的时候，危机就产生了，在这个节点上，他们的“信任”低于投资所需要的最小值。资本拥有者可以将资本转移至国外或者在货币经济中以某种形式观望，通过上述方法他们让资本永久地或暂时地从一个不值得信赖的政治环境的经济运转中抽离出来，
94 其结果就是工人失业，经济增长缓慢。今天，资本市场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这种情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市场公正其实也遵循着一些规范性的标准，当然是那些

① 用社会公正的政策手段来修正市场公正，以达到社会凝聚力的做法有着非常有趣的先行者。中世纪英国法学理论中就区分了审判（justice）和衡平（equity）。审判由普通法（common law）法院做出，即使这些裁决从形式上毫无令人指摘之处，仍然可能与实体公正的观点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就可以求助于设在国王王宫的衡平法院（court of equity），它可以对普通法院的判决结果做出修改或废除。这种干涉在普通法的维护者看来是有着系统性错误的，直到几个世纪以后衡平法逐渐植入到了普通法之内（Illmer 2009）。相对于自由市场的契约统治来说，今天的社会国家起到的就是一个衡平法院的作用，或者说在战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起到调和作用。

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的标准，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属社会公正，尽管它借助于标准经济学理论宣扬为一种自然的而不是社会的规律性。资本在“心理”上对政治秩序的信任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最重要技术前提，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只给所谓的用民主授权的社会公正弥补市场公正留下了非常狭小的空间。同时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不对等：资本对于回报的要求从经验上来讲是整个体系运转的基本函数，而相应的“劳动”对于回报的要求不过是一些干扰项罢了。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以及其后的熊彼特和其他一些学者都担心市场的形式公正会因为“官僚主义”或是其政治推手，比如社会主义者或者社会民主人士的推动不断地被实体的、物质的公正融合。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最终会毁灭，相应的资产阶级个体自由也就不复存在（Offe 2006b）。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则是在可预见的将来避免了上述情况的出现。今天，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已经达到了越来越接近永久放开市场公正原则，或者说至少长期稳定地将这一原则从历史上社会公正的束缚中放开的程度。当然，这也是形势所迫，通过输入假想的资源，在分配冲突中既保证市场公正，又虚拟社会公正的实现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渺茫了。 95

市场要对民主制度的修正行为免疫有两条出路，一是通过对公民进行新自由主义的观念转化教育，二是取消民主制度，就像20世纪70年代智利所采取的方法一样。第一种形式已经在标准经济学理论的教条框架下不断地努力地尝试，

而第二条路目前行不通。因此，消解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长久的建立市场之于政治的优先地位就需要政治经济的机构通过逐步推进的“改革”措施来完成（Streeck 和 Thelen, 2005）：如过渡到规则约束的经济政策，独立的中央银行和不受选举结果影响的国家财政政策；通过把经济政策的制定权转移到相应的调节机构或是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及通过具有一定宪法性质的减少国家负债法案，对此，国家即使不是永久性地，至少也应几十年如一日地严格遵守。这样一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改革成了能够持续地赢得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信任的国家。国家通过机构化了的、确定下来的政治纲领，使人信服的保证，再也不插手“经济”事务——即使施加干预行为，也是以保障资本投资可以获得适当的收益的形式来实现和捍卫市场公正。作为前提，民主制度，即我们今天的战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制度，必须中立化；也必须实施和完善哈耶克式的自由化，也就是说，防止资本主义受到大众民主干涉的自由化。

96 市场公正的倡导者们试图在修辞上和政治概念上占上风，因此，他们把社会公正污名化为“政治上”分离主义的，因而也是不干净的甚至是腐败的。相反，市场公正因为它看起来是非人格化的，又在价格理论上可以计算，它的运行不需要政治，也就是说按照一般性原则，所以它在这种非政治的意义上是“干净”的。这类区分还是等同早就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日常口语之中：比如我们说，这是一项政治的决定，就已经足够说明，这一决定给某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

带来了好处。^① 资本主义公共关系专家不倦地表达着这样的观点：市场是按照一般性规则来分配的，而政治则是凭权力和关系。市场在衡量效益以及决定分配时忽略每个参与者自始的不平等的事实源于这样的分配不是通过决定做出来的，因此它也更容易被人们忽略，不同的是，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却经过了正反的激烈讨论以及需要人们积极地去加以实施。同时，政府的政策措施可以归于某个决策者或决策机构，因此人们也可以据此来追究责任；相反，市场的决定看起来没有掺入任何人为的因素——特别当我们把市场作为一种先决的自然状况来理解的时候——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这就如同我们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它的后面隐藏着一些也许只有专家们才能理解的深邃奥义。

饿死野兽！

如果公共债务的增长并没有和大众民主动员的增长相关，正相反，却正好与新自由主义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参与的减退相关的话，那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国家的财政危机在我看来不过是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为人们所预测到的现代国家运行问题的充分体现。这一运行问题在于，国家从由私有财产所有者组成的社会当中抽取的经费渐渐地越来越不能够完全满足它所要负担的任务的需要。从这个角度上讲，国家负债产生的原因不是过高的支出，而是过

^① 对于公共选择观的追随者来说，这几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是一条公理。

低的收入。它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按照私有财产所有个体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和社会一方面设置了可征税收的界限，另一方面同时不断对国家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

实际上也可以观察到，富裕民主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负债是与税收收入增长的停滞同时开始，而在国家支出放缓之后。如果说两者一直以来都是亦步亦趋地在增长的话，那么最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起先在国家支出上升的情况下，税收总水平总体上是保持不变的（图 2.4），那么在如瑞典、法国、德国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迅猛势头甚至还有所下降（图 2.5）。^① 即使在这里，发展趋势在大体上还是具有相同形式的，并且其原因也是相类似的。增长阶段的终结也结束了让纳税人不断陷入更高的收入税税率的所谓的“冷累进”（*kalte Progression*）。这一效应从国家财政的角度来看部分由 20 世纪 70 年代的通货膨胀抵消了；很快，由此产生的真实收入的损失，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抗拒纳税（Block 2009；Citrin 1979；2009；Steuerle 1992）以及对税收进行改革的要求，比如将税率指数化。那么在成功实现了货币价值稳定之后则导致了，国家要想提高收入只能通过可见

① 日本近几年来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显示出一种增长趋势。在英国，工党政府领导下税收负担也有非常小幅的增长，在英国人们主要的努力方向是使发展方向发生扭转。对于欧洲货币联盟来说，从 2000 年到危机爆发，可以证实这些国家在对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开放态度和在资本以及工资收入方面税收减少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后者则是劳动市场下端工资收入降低的结果。由于稳定方案的赤字极限，这就导致了国家支出的减少（Rademacher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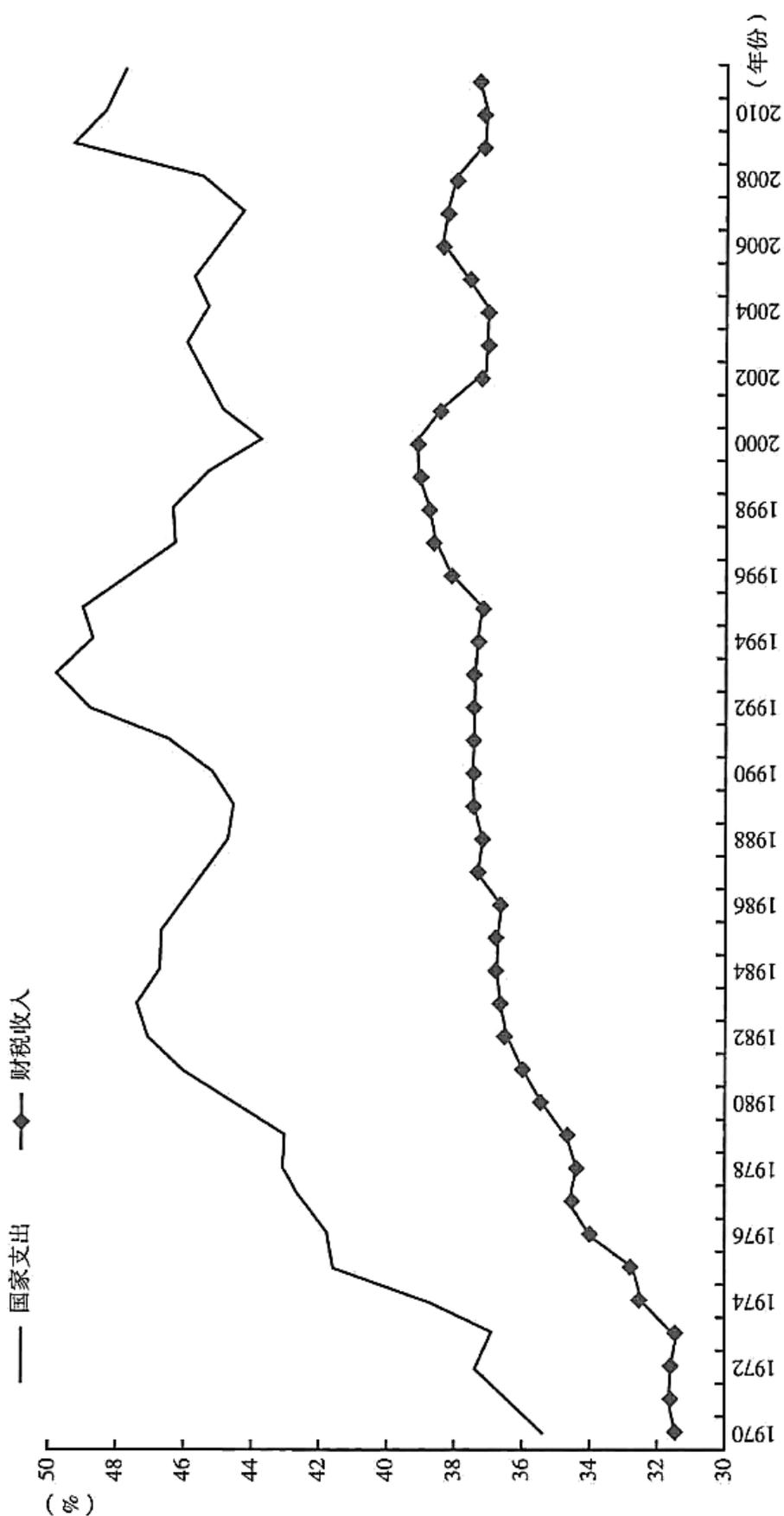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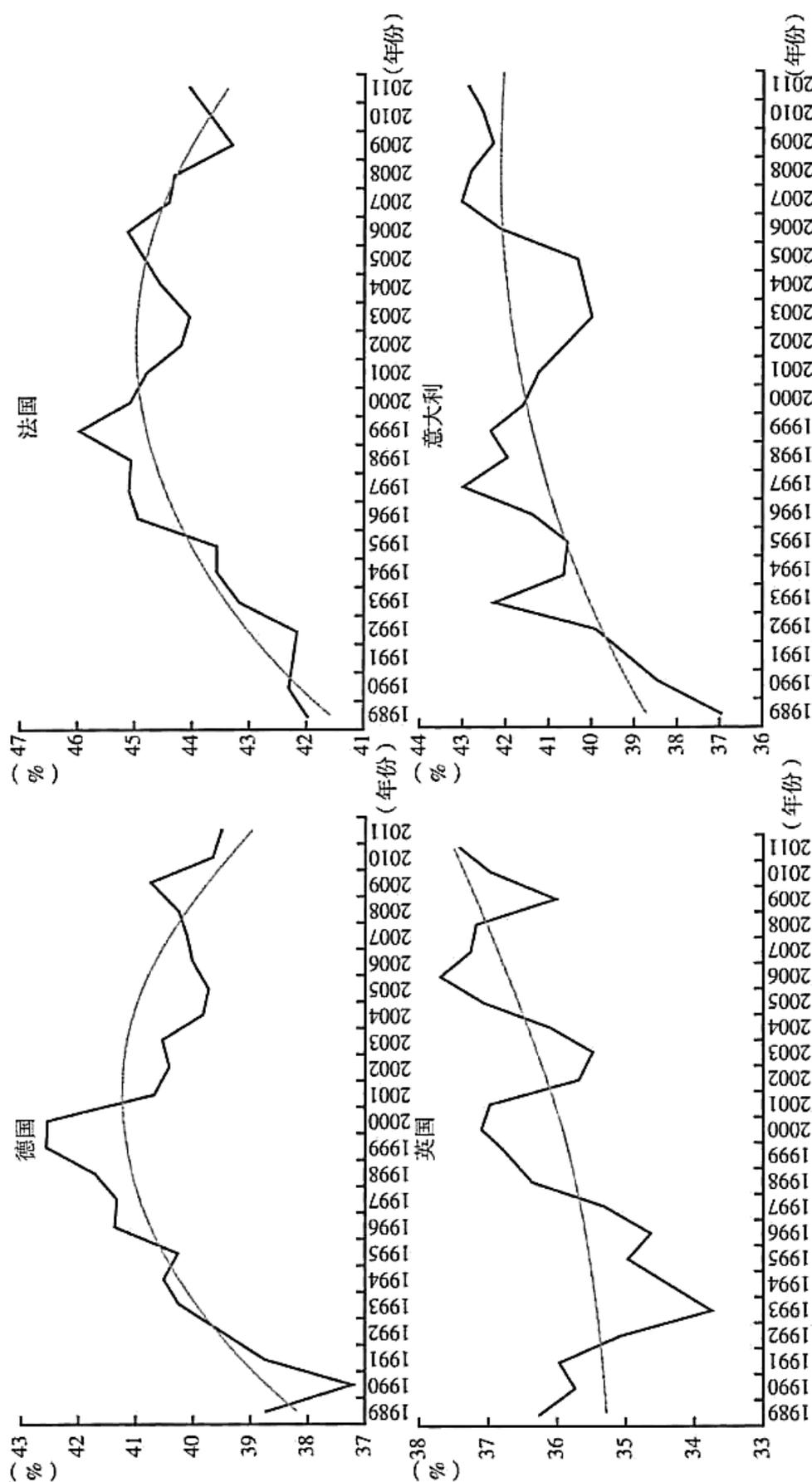


图 2.4 1970 年以来七国国家支出和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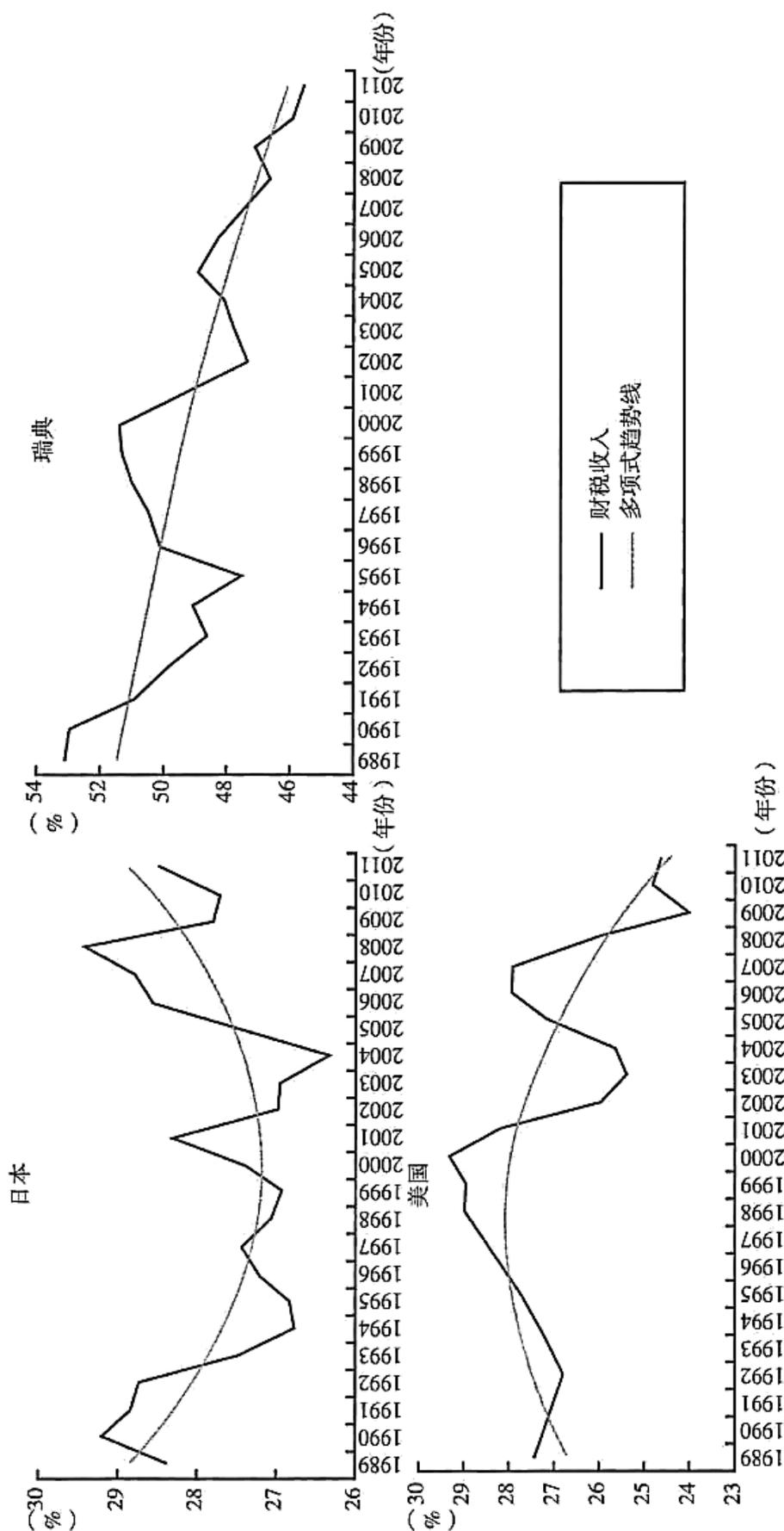


图 2.5 七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89~2011 年

资料来源：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的，而不能通过政策上的，也即是较为隐形的税收增长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又增添了新的因素。高速增长的经济国际化为大型企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之门，让他们得以把赋税义务转移到相对更加宽松的国家。尽管在那些生产部门转移已经停止的地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们仍然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税务竞争，并促使其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将企业税的最高税率降下来（Ganghof 2004；Ganghof 和 Genschel, 2008；Genschel 和 Schwarz, 2013）。尽管这同时会带来通过取消免税而导致所谓的收税基础扩大，这会使得总体的税收结果大体相当，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已经无论如何不能再考虑增加税收了。此外，还有新自由主义学说强调的要更好地刺激绩效以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它要求在收入分配的低端通过降低工资和提供社保，而在收入的高端则增加收入并减少税收。在这个方面资本主义多样化的游戏模式之间的区别也只是很有限的：在德国表现为由施罗德任总理的红绿联盟政府实现的劳动市场上的劳动最低保障哈茨方案（Hartz IV）和税制改革的组合（Ganghof 2004，特别见第 98 ~ 117 页），在美国则表现为克林顿政府削减了所谓的“我们所知道的福利”（welfare as we know it）以及布什政府 2001 年以后实施的臭名昭著的减税政策（tax cuts）。^①

①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头 10 年不断新出现的减税政策为形成美国当前包括不断增长的国家负债的所谓“赢者通吃”经济所做的贡献，见 Hacker 和 Pierson（2011），此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做了详细描述。

形成国家财政危机的原因至少在公共财政的收入方面所占的比重完全不比支出方面小，这一点我们可以以美国为例很好地说明。对于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有组织的，迄今在加利福尼亚仍然成效卓著的反税收斗争活动的谋略家来说，公众流行的低税收要求服务于另外一个目标，令国家无法继续其同样也很受欢迎的社会保障方案。即使在今天的美国政坛仍然影响力巨大的反税收活动家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的宣传下（Kuttner 1980；Martin 2008；Tarschys 1983），这一无比成功的运动的口号家喻户晓：“饿死野兽”（starving the beast）！而 21 世纪初扛起这一政策大旗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在接手前任留给他的一个相对充盈的国库后，急忙开始实施对超级富豪急剧减税的措施，使得国家财政重新回到创纪录的巨额赤字；同时他还两次发动战争，再一次扩大了国家支出方面的漏洞。^① 这一状况充分说明，这不是在谋求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而是致力于发展一个按新自由主义方案缩减了的国家。

103

同样，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当国家的收入增长开始停滞的时候，其支出首先是继续上升，上升势头直到上世纪末第一次新自由主义的整顿风潮开始才结束。这一现象并不必

① 德国的情况也完全相似。如果没有施罗德政府的税收改革，2008 年之前的政府财政收支不可能达到平衡。默克尔领导下的执政大联盟（2005～2009 年）政府新任命的财长在 2006 年 1 月在法兰克福工商业协会做的一次报告中这样表扬前任红绿联盟政府的改革：这是一次改革，它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实现了广泛的税收改革（Steinbrück 2006）。2005 年初，德国人收入税的税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平，而德国国民经济的税务负担也远远低于历年的平均水平。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已经成为今天（2012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总理竞选人。

然能归结为民主授权的选民大众进行群体自助服务。更多迹象则表明，其原因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产生的不断上升的对于修复类以及投资类公共服务的要求的表达——这一方面是对于由资本的积累而造成的损害的修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实现持续的增长创造必要的前提。^① 所谓修复性可以是指那些随着结构性失业的回归而产生的社会保障以及失业者帮扶方面的增长开支，^② 同样还包括增长了了的公共卫生支出以及 20 世纪后三十年中开始出现的用于环境修复和改善的支出。投资性支出则是指那些同样不断增长的国家用于扩大和保持基础设施，对人力资源进行培训以及科技方面研发的各项投入，这些都是个人成功地进行资本积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从广义上来讲，公共开支还应包括以下方面：和平利用核能，因为对于私人电力企业来说，建核反应堆发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为儿童提供更多的入托儿所和入幼儿园的位置，这也能够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解放大量女

① 还有众多类似的对于公共支出的分类。比如 O'Connor (1973) 就区分了社会资本支出 (social capital expenditures)，又细分为社会投资 (social investment) 和社会消费 (social consumption) 以及社会生产花费 (social expenses of production) 和国家支出的两种功能，维持合法性和积累。

② 它的必要性，也即所有致力于社会公正的措施都在政治话语中争论不休，且需要经过大量的磋商。根本上说，一个社会可以得出新自由主义派的结论，任何对于不工作的人的支持都是对工作的人的一种不公平，于是乎，按这种思路就可以为公共开支节省大量资金。诚然，也有另外一种权衡的思路认为，社会保障政策是“值得”的，因为，同时也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工作能力和依赖工资的人的“善良意志”。然后它就不再是修复性的，或者去商品化的以及消费性的，而是具有了投资的性质。社会和文化的状况，特别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可以论证社会保障政策的合法性。

性劳动者；维护保养航空母舰，应用无人驾驶飞机及其相应技术来保障供油通道；还包括后来证明是极度危险的对私人金融信贷放松管制，使得贷款额极度膨胀作为最后一项产生经济增长（假象）的手段。^①

105

税收国家的危机

列举完这些事实后，想不回忆起财政理论中的一个经典理论都难。这一经典理论随着公共选择代替了公共财政而为人们遗忘，同时也因为不够严格而从经济学理论的记忆中删除了出去。在这里，我指的是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关于不断增长的国家事务和增长的国家份额定律，它形成于19世纪末（完整的版本参考Wagner 1911），并且于20世纪50年代时对于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Musgrave 1958）。作为讲坛社会主义者^②、国家社

① 当依赖工资的劳动者能够保持其愿意继续维持这种依赖工资生活的方式，并按照与之相适应的期待来做出行为的时候，这种社会保障政策就具有了投资的性质。当劳动者只按资方的允许以及要求来做事情的时候，资本主义是无法运转的：实际人们遵循着无条件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分配中的简朴知足思想有悖于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模型，所以只能用一个劳动经济理论当中公认的陈述来调和，即所有工资者都是要“规避风险的人”。]在保障固定工资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减少报酬作为相应的补偿，资方和劳方的关系就会崩溃。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减薪是通过国家、资方和工会三方面达成的协定才实现的（Schmitter 和 Lehbruch 1979），而作为对减薪的回报，国家则许诺保证退休工资的上涨，这会在未来若干年要求从公共财政中支出以兑现。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公共支出增长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国家承担了资方应该支付给工人的劳动报酬。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无论工会还是工人都无论如何都非常坚持这一诉求。

② Kathedersozialist, 19世纪宏观经济学派名。——译者注

会主义者、柏林大学校长、俾斯麦经济社会政策的智囊以及1910年起普鲁士上院（das Preußische Herrenhaus）成员的瓦格纳，期望在一个现代化增长的经济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不断增长，不仅为了保障一般性的文明水平，同时也为了负担那些我们今天称之为扩张的市场以及一个私有经济生产方式的外部效应（Externalitäten）的成本。^① 尽管在瓦格纳那里是完全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性以及日益登上政治议程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方式的革命性突破等理论，但是，它和马克思学说中关于私人组织生产关系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增长的社会化的相似性绝对不是偶然的。

这一思想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断发展的财政社会学（Finanzsoziologie）显得更为重要。德国社会学协会早期的马克斯·韦伯的重要反对者之一，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鲁道夫·葛德雪（Rudolf Goldscheid）认识到，国家从封建社会的疆域国家（Domänenstaat）发展成了现代化的税收国家（Steuerstaat）——这种国家通过税收的方式获得由私有财产所有者组成的社会中的资源——是资本主义进步的一种伴随现象 [Fritz 和 Mikl - Horke 2007; Goldscheid 1926; 1976 (1917)]。同时，他也指出，税收国家获取为它的公民，或

① “此外，根据经验还可以从不断发展的‘诸文化国民’（Culturvölker）的历史中，也即从时间的对比就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国民经济的对比……中，推导出某种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某种‘所谓’的法则：这就是在诸文化国民不断发展的同时‘公共’以及国家的行为不断扩张的法则。”（Wagner 1892，第 883 页及其后；另见第 892 - 908 页。）

更准确地说为一个由私人占有所主导的文明社会提供被要求的服务而需要的资源的能力或早或晚地无法再满足实际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过是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的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财政学上的重新表述。一旦达到了这一点，在葛德雪看来，税收国家将面临自身的极限，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中，作为“被剥夺财产的”税收国家已经不再拥有能够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的资源。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必须实施所谓的国家的“重新资本主义化”（Rekapitalisierung），以便让依靠纯税收收入的国家收入财政转换成为国家通过自身的企业性行为获得收入的方式。国家在公共利益中行使其功能，如弗里茨和米克-霍克（Fritz 和 Mikl-Horke, 2007, 166）总结的葛德雪的核心观点所述，可以“不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因为

税收通过国家这个渠道时，总是会给最强大的资本占有者带来好处。他们的权力将会越来越大，而作为社会需要的守护者的国家的权力则得到了削弱。强者有可能躲避赋税义务，而人民大众则必须承担全部的赋税义务。即使是递进的个人收入税收也只是表明，国家不过是在遮遮掩掩地保持着财富分配不公和过度集中现象。

107

葛德雪关于财政政策的悲观主义观点并不孤立。“税收国家的危机”的可能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就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最为著名，影响力也最大的是约瑟夫·

熊彼特在奥地利社会学协会做的一场影响力深远的报告 [Schumpeter 1953 (1918)]。熊彼特的结论是，税收国家的历史机制还没有达到其极限，甚至奥地利和德国仍然可以在不进行普遍的社会主义化的情况下清偿战争赔款。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他也不排除，甚至还期待税收国家以及其相关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得以幸存。^① 尽管这一思想在后来的时间里，特别是 1945 年以后，进入了经济学教条史的地下墓穴里，但它作为一种社会国家的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驯化了的资本主义制度看起来开启了经济史的新纪元。此后，仍然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新的表述形式再现出来。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拥趸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Connor, 1973) 的财政危机学说中，或者在他之后的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1976b, 220~282) 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未来的悲观主义看法。

从财税国家到负债国家

如果人们把被奥康纳和贝尔重新预言的现代国家的财政危机定位在收入，而非支出方面——人们把这种危机定义成为一种葛德雪和熊彼特意义上的税收国家的危机——那么最

① “渐渐地，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社会同情的范围的扩大，私营企业的行为愈发失去其社会意义。他的原因在于，同时也表现在了 19 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方向之中，它的也许是最后一次歧途正是在世界大战中登峰造极。社会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尽管战争发生了，突破了私营行为和税收国家的界限：这也是肯定的” [Schumpeter 1953 (1918), 57f.]。

近几十年来的两种此前在其重要性上没有被任何人所预言的发展趋势一下子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第一个是税收国家变形成为一个债务国家——一个通过负债而不是通过税收来得到其一大部分同时也是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支出的国家，其结果就是导致堆积如山的债务，而国家又要花掉它收入的越来越大的一块，用以清偿这些债务。这个对于现代国家财政问题的可能回答在早期的讨论中一直只起着如此之小的作用——比如在奥康纳那里也只是在很不重要的地方有所提及^①——的原因有可能在于，国家不断地用债务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首先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功能足够健全的金融产业以及通过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实现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进程。另外，金融市场也必须融入国际中去，才能够满足富裕工业国家特别是像美国的巨额贷款要求。这一发展，如前面所述，最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的。

债务国家的形成既可以理解为税务国家危机中的延缓期，亦可以理解为一种新产生的有着自身规律的政治形成物。下面，我将会从后者的角度来使用这一定义。必须首先强调的是，债务国家的产生也是由一个相反作用的原因加剧

^① “不断增长的国家负债一般来说并不会导致财政危机的加剧，但也不会让其缓和。国家和地方的债务部分是自行消失的……美国联邦的债务部分的也是自行产生的，在实际的经济能力难以跟上经济能力的可能性时，就会以增长贷款量，各方面的需求、生产、就业和收入的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税收收入（O'Connor 1973, 178f.）。”这些是奥康纳在1973年时写下的，彼时凯恩斯主义仍然有市场，而且美国的国家债务也还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当时占社会生产的42.6%，相比之下2010年时的比例达到了89.6%）。

的。这一原因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改革及其所做出的通过将公共的，在瓦格纳意义上的，在 20 世纪进程中不断增长的国家任务私有化的方式进行的国家财政整顿。这是另外一个历史发展趋势，这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于当时的危机理论来说，还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它的核心在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功能重新由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来全部或者部分地负担起来——从养老保险，到医疗保险、教育直到对于保障就业状况的责任。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一点人们可以最方便地通过给予各个家庭更多新的自由空间以自行举债来实现。国家从个人生活保障中越来越多的部分中淡出部分因为富裕社会增长了财富和消费水平而实现，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合理性。在战后时代的公民社会权被私有化和市场化取代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它被克劳奇（Crouch 2004）称为“后民主”（Postdemokratie），其政治参与被重新定义为娱乐，并且同政治的，特别是政治经济的决策脱钩。^① 当前在国家以及国际层面上实施的，通过减少国家支出方式进行的，持久的国家财政整顿，其核心不过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最初的十年间新自由主义各项充分发展的创意改革措施的延续。

在我谈及同时代债务国家的政治解剖之前，我想把我迄今为止的论点综述一下。我的观点是：我觉得国家负债的公

① 在本书很后面的地方我还将这种脱钩现象描写为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向哈耶克式的一种过渡。

共池塘理论解释以及民主失效论都是有价值的，我不是去放弃它们，而是翻转它们。关于公共池塘理论，我想说的是，国家的金融危机并不是因为被过度民主误导的大众从公共资源中索取过多；更多的原因反而在于那些从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利最多的人太少的向公共资金中给付，而且还付得越来越少。如果说存在着所谓的“需求膨胀”，并由此导致了国家财政的结构性赤字的话，那么它也是发生在了社会的上层，他们在最近几十年间的收入和财富极速上升，减税给他们带来的利好也在推波助澜；而社会下层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降低。这是一个，如前文已经论述的那样，通过通货膨胀、国家负债以及信贷资本主义产生的货币幻象掩盖，并且暂时提供了合法性的发展过程。

由此，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真正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转型年代的“民主失败”到底是什么。民主国家及其政治的失败在于，它们没有认识到战后时代针对社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并耽误了对其有所作为的时机；它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 111 的虚假繁荣中放弃了去整顿恶性增长的金融业；它们竟然心甘情愿地相信了用“软”的治理来代替“硬”的政府既对于民主有利，又能顺利解决社会问题的种种说法（对此 Offe 2008 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述）；它们放弃了去规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获益者，让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赢利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① 它们不仅放任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不公不断

^① 在德国，关于更高的顶尖收入阶层的收入税，更高的遗产税以及不同的财产税的讨论直到 2012 年夏才开始，在法国总统大选后，受到国内左翼党的压力。参见 Bach (2012)。但现实的针对富人的增税政策却一直遥遥无期。

增长，甚至还以资本主义进步的名义，通过种种“兼容刺激的”税收和社会的改革来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公。此外，民主政治也没有能成功地阻止让富人受益的减税政策实施，从而失去了那些本可以从中获益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恰恰相反，它还由于选民阶层不断上移的趋势，而使得增税政策越来越遥遥无期。最终民主政治以这种方式参与到了负债国家的形成过程之中。

112 单个国家组织下的民主政治是否能够，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日益国际化的经济中成功地控制住这样的发展趋势。对此，我不予置评。非常明显的是，在工业和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性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它们的“保留收益”^①也在上升，就如同国家对于潜在投资者的“信任”的依赖不断上升一样。最晚到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国家政府，无论是保守的，还是社会民义的，都不约而同地皈依了自由化的政策，它强调社会要广泛地适应由资本提出的新的生产条件的要求，从而走上一个长期繁荣的道路。但它却忽视了资本主义非常局限的、几乎只在严格和有效管制下才有的民主兼容性。因此结构性的、意识形态上的民主失败以这样的方式集中体现出来。其结果在2008年以来尤为明显。

① 我在这里使用保留收益（Reservationsgewinn）这个概念借用了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中“保留工资”（Reservationslohn）的概念，它指的是，低于保留工资水平时，工人就不再愿意接受一份工作。保留收益则是指企业家决定进行投资行为时的最低利润率。

负债国家和分配

在向负债国家过渡中的另外一种民主失败则在于，它在分配政策方面的后果在公共讨论中几乎完全不被关注。在日常的政治实践中，保守党和资产阶级政党都被认为不如社会民主党那样适应负债政策。然而对比的统计结果却并不一定能证明这一观点（Wagschal 1996；2007）；然后却因为种种原因，鲜有人知道这一情况。在政治辩论的话语中，负债作为一个批评的话题，传统上确实更多地被人们用来针对右翼的保守党派，而非左派。因为对于那些拥有财富的、由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着的资产者阶层来说，关键之处往往并不在于如何不负债，而是如何能够可信地用好这些从富裕民众中得来的负债，并能够偿还——这是在当下“市场”的债务危机中人们特别突出强调的一重思虑。

国家债务和财富分配的政策关联，直到人们在新自由主义转向中理解了，国家通过负债来寻求生计其实是在对有产阶层征收过低税收的后果时才清楚地呈现出来。当税收体系越少地把更富有的人的财产和遗产纳入公共体系中来，^① 那

113

① 此处也不乏耸人听闻的例子。比如希腊的宪法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可以保障船主，如奥那希斯（Onassis）和尼亚科斯（Niarchos）这样的家族能够享有免除税务的优惠。这项规定是在1967年希腊军事政变后，军政府（Junta）上台后写入宪法的。1972年希腊船主们选举了独裁者帕帕多普洛斯（Papadopoulos）为终身船主会主席，作为对他的感谢。关于今天占有全世界船队15%比例的希腊船主们的情况，请参见《纽约时报》2012年5月24日的文章《不安全感触动希腊大亨》（“Insecurity Touches the Tycoons of Greece”）。希腊的情况就是，如果试图结束船主们的免税权利，最终只可能导致他们把财产和业务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富裕的希腊家族究竟占有多少资产，很难具体确定，“因为这些钱绝大部分都出现在海外，隐藏在瑞士银行的户头中，或者投资（转下页注）”

么财富的分布就会越来越不平均，并且以社会高收入阶层有着更多的储蓄率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样一来，国家的税收政策下允许出现私人过剩资本，这些人就必然面临着为这些资本寻找投资可能性的问题——这时食利者们又纷纷强势地回归到了经济中，尽管凯恩斯认为食利者们早就应该安乐死了 [Keynes 1967 (1936), 第 24 章]。在他们
114 寻找投资机会时，因为富人的成功抗税而不得不依赖负债的国家与他们一拍即合：一方面，国家的贫困就是他们的财富，另一方面，国家还给他们带来了理想的投资机遇。

在我看来，唯一指明这其中关联的经济学家是卡尔·克里斯蒂安·冯·魏茨泽克 (Carl Christian von Weizsäcker)。尽管，当然也许正是因为他非常肯定的态度。与其他几乎所有的德国经济学家都不同的是，魏茨泽克提倡提高国家负债，至少可以在那些收支状况良好的州可以这样做。^① 对此，他给出的解释则是：随着社会人口的不断老龄化，社会上存在着不断增长的“养老需求”，这就使得像德国这样的富裕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资本过剩”。要想让老龄化的民众不陷入“投资困境”，国家就必须愿意吸纳他们

(接上页注①) 在了伦敦或者摩那哥的房地产业中。”也正是因为它们广泛地参股了希腊的银行，所以“寡头”们当然也有理由要求继续待在货币联盟中。希腊超级富豪们不交税，但其中一些却仿效美国的榜样来投资一些慈善事业。还有一些人则额外的“征招更多的保镖来壮大自己的安保队伍”。类似的文章还有《希腊超级富豪保持着奢侈的生活对外保持低调》，见 2012 年 6 月 13 日《卫报》。这时，一个善良的好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样的文章在德国却从来不会见诸报端？

① 此处可参阅他在 2010 年 6 月 5 日《法兰克福汇报》上题为《国家负债的雅努斯之面》(“Das Janusgesicht der Staatsschulden”) 的文章。

节省的钱作为贷款，特别因为一方面它可以防止养老为目的的投资陷入风险过大的项目，另一方面由于随着实体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需求的改变，投资可能性也会相对不足。但是魏茨泽克并没有阐述投资困境的替代解决方式，比如可以通过对剩余的资金征收更高的税收（“充公”Konfiskation），使之进入正常的国家收入之中，或者用集体分摊方式实现的养老体系来代替个性化的通过个人投资实现的养老模式，这两种方式都可能会带来更公平的结果。^①然而魏茨泽克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他所倡导的解决方案并非出于技术，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因为“隐性的和显性的私有财产出于养老以及遗产的原因（……）都是一种‘结构参数’（Strukturparameter），没有对社会结构（……）极强大的干预，它们是不会有变化的”（Weizsäcker 2010）。

115

魏氏的分析很清楚地表明，只要国家对负债的清偿能力是值得信赖的，那么国家通过举债的方式来部分地筹集履行国家事务的资金就完全符合资本持有者们的利益。对于同市场和财政部门的分配斗争中的胜利者们来说，要想让他们的胜利更加充分，就要让他们从国家和社会中争得的资本再次

① 更多税收以避免国家负债会让庸俗的整顿逻辑变得不再适用，当“我们”不可以再以牺牲“我们的孩子”为代价而生活的时候——实际上问题症结在于，那些“挣得更多的人”恰恰是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在生活，他们不断让自己免除社会公共成本的义务。此外，如果在服务行业中设置了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话，这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无疑又会导致其储蓄率下降，并同时造成他们的“投资困境”——更多税收，在凯恩斯看来，同时还能起到促进消费和经济境长的作用。

安全并且能够获利地投资。所以他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国家，它不仅允许他们手上的资金是其合法财产，同时不是以税收的方式征收，而是以贷款的形式把这笔钱借走，并为他们保管好这笔钱，再付给他们利息，当然还要好事做到底，让这笔钱在他们的家族中传承下去，安全地移交到下一代的手中——遗产税这个东西早就成了最无关痛痒的税收之一。^①这样一来，负债国家就成了社会阶层关系固化的工具，并持久地为加剧其固有的社会不公做出贡献。同时，国家及其行为也会屈服于以“市场”的形式出现的债权人的监督。这种监督有可能与公民通过民主政治对国家的监督重叠起来，甚至像在负债国家向整顿国家的过渡进程中所表现的那样渐渐地取消后者的地位。

负债国家的政策

当下的财政危机，以及从财税国家向负债国家的过渡进程带来了一个既往的民主理论不曾讨论过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国家之间关系的新阶段。2008年的危机使得富裕民主国家的债务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时，他们的债权人并不再像以往那样理所当然地相信国家未来愿意或者有能力清偿债务。为此，债务人们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寻求自己债权的安全性，并比以往更多地干预到了国家政策中来。这样一来，在债务国家中除了原有的公民群体以外，出现了第二个阶级，它亦有着对国家的种种诉求以及授权的权力。而在民

^① 关于遗产税可以参阅 Jens Beckert 的文章（特别是 Beckert 2004）。

主的财税国家以及既往的民主理论中，只有公民群体才是现代化国家唯一的目标群体。

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国家的债权人成了现代化国家的第二“选民团体”（constituency）^①。这就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以“股东价值理论”（Pappaport 1986）为先兆的，持股的所有人激进地进入到资本主义大企业内部一样。就像当时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必须面对“控制企业的市场”一样，今天债务国家的政府也受到“金融市场”的关系所迫，必须服务于一个额外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的诉求也随着在流动性的市场中日益增长的实现能力而不断增强。就如同公司治理转型中的资本市场一样，对于民主国家转型的信贷市场来说必须也存在着通过使用其新赢得的市场权，特别是那种可以出售其所持有的份额的可能性来排挤各自面对的行政权力中相竞争的诉求施加的影响力——在前者中就是企业员工施加给董事会的影响，而在后者中则是全体公民施加给他们民主选举出的政府的影响——从而为自身获取利益。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涉及了分配冲突：在企业中则是剩余赢利不再分配给员工或是积累起来为了稳定企业的管理，而分配给持企业份额的所有人；对于一个债务国家来说，就在于维系人们所谓的国家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价值”

117

① 英语单词 constituency 唯一合适的德语翻译就是“Wahlkreis”（选区，选民团体）。但是这也仅能覆盖此词一部分的语义内涵。牛津字典上对它的定义是：“a body of customers, supporters, etc.”以黑格尔的话语，我们也许可以把一个国家的“constituency”定义为它的“道义上的根源”（moralische Wurzel）；这样看来，债务国家就有两个道义上的根源。

(bondholder value) 的东西。就像股东价值上升要求企业董事会要么必须压制其全体员工，或者更好的方法则是让企业股价大升一样，坚定国家债权人的信任则要求政府必须说服全体公民或者迫使他们对于公共财政的利益诉求做出有利于“金融市场”的让步。

下面，我想提出一个理论方案，把当下的债务国家看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的代理者和代言人；以及两股完全处于对立状态的势力之间的体系。两者之间遵循着越来越难以协调的逻辑，而国家的政策却仍然要尽量使之平衡：一方是民众（国家人民，Staatsvolk），另外一方则是“市场”（市场人民，Marktvolk）（见表 2.1）。^① 国家人民是由民族国家组织起来，由其全体公民组成，并且这种公民身份让每个人与国家建立一种关联，公民之于国家有着不能让渡的公民权。公民权包括，他们可以作为选民参加定期举行的选举，表达自己的意志。平时，他们可以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方式参与到“公众意见”的形成当中，以左右他们的合法代言人的决策。他们可以这样做的代价则是，要对国家负有忠诚（Loyalität）义务，包括向国家纳税，同时如果使用税收原则上也应该是相关的国家机关自由决定的事情。公民对国家忠诚，反过来国家需要负担起照料公民生存的责任，特别是

① 这一模型让我们想起对作为社会体系的利益团体的描述，它要在有着两种不同的行为逻辑的环境中间求得生存：一方面是其构成成员基础，遵循着一种“成员逻辑”，另一方面则是政策的机构体系，遵循着“影响逻辑”。无论是这里，还是对于债务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组织必须依靠动员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提供的资源而生存，同时，两个环境又对它提出完全互相矛盾的行为要求（Schmitter 和 Streeck 1999）。

保障民主构成的社会公民权利。

由它的公民统治，并且由他们来供养的民主的财税国家一旦其生存来源不完全由其公民供给，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债务人的信任时，就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债务国家。和财税国家的国家人民不同，债务国家的市场人民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对于其相应的民族国家来说，市场人民的成员只是通过合同的形式与其发生关联，他们是投资人而非公民。他们之于国家的权利不是公法，而是私法性质的：不是基于宪法产生的民权，而是基于民法产生的权利。并非复杂而政治上可扩张的公民权利，他们对于国家享有的是特定的，可以在民事法庭上追诉的，并且通过履行合同得以满足的请求权。当某届政府令他们不满的时候，他们并不能通过选举的方式让它下台，但是却可以把手中持有的债券出售，或者不再参与到购买新的债券的活动中去。由此形成的利润率反映了投资者们估计的风险，他们是否不取回或者不完全取回投资就成了市场人民的“公共意见”——这种意见，因为它以一种可以量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比国家人民的意见更加精确和直观地表达了出来。所以负债国家期望它的国家人民作为公民义务的忠诚的地方，则正是需要它考虑到如何能够获取市场人民“信任”之处。它需要可信地去使用负债，并让人相信它未来有能力偿还。

119

当人们试图来理解民主的债务国家的运行机制时，首先必然会非常惊讶地发现，似乎并没有人知道谁才是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市场”。就连关于国家为了获取贷款而应当给付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也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文

献，至少在社会学领域很少，而且在日报或者周报上也几乎没有。^①人们知道的只是，国家一年当中多次出售债券，其中绝大部分用于筹集资金来清偿先前的债务；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交易。经济学理论看起来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债务的市场是一个完美的市场，完全不想去质疑它；因此关于其需求方的结构的数据也因此几乎不可寻。这一问题相比之下会变得格外引人注目，比如任何其他经济部门当中，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层面上，都有着关于市场份额或者集中程度的统计数据，并且这些数据都非常容易获取。人们只知道几个大的在国家债务市场方面运作着的基金，如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和 PIMCO。^②但是，这里是否也像其他的一些市场那样会存在着所谓的一小部分大企业对市场 and 价格的统治，人们却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只是，各国财长们很愿意

① 比如尽管基本的数据在短期内并无变化，但国家信贷的风险酬金呈现出高波动性，这令人惊讶，也需要有更好的解释。同样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一些负债率很高的国家，如比利时、日本和美国相对可以以比较好的条件获取到贷款，而一些国家，如西班牙，自身的负债率并不高，却只能以很高的利率获取贷款。

② PIMCO 是一个缩写，全称为 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这家企业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专业从事国家债务方面投资基金的管理组织。单单 PIMCO 的总回报基金就达到 2630 亿美元。PIMCO 的主席兼开创者，威廉·H·格罗斯（William H. Gross）2011 年的收入高达 2 亿美元，他的 CEO，及其指定的接班人埃利安（Mohamed A. El-Erian）必然对 1 亿美元的收入表示满意。2007 年到 2011 年的 5 个危机年中，总回报取得的利润率大约为 9.5% [《债券市场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导人》（“The Bond Market Discovers a New Leading Man”，《纽约时报》，2012 年 7 月 29 日）]。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改革：从财税国家到负债国家

表 2.1 民主的负债国家和它的两种人民

国家人民	市场人民
国家的	国际的
公民	投资者
公民权	债权
选民	债权人
选举(按届的)	拍卖(持续的)
公众观点	贷款利率
忠诚	“信任”
生存照料	清偿债务

在 PIMCO 预约见面时间，向它的董事会主席讨要关于本国财政政策的意见。^① 一个用以禁止市场主导者之间的协

① 《明镜》周刊的网络版 2011 年 8 月 2 日登载了一则采访 PIMCO 董事会主席埃利安的访谈。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明镜》：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世界各地经常接触政府部门。你会如何提出建议，例如，对西班牙财政部长？

埃利安：我想，是我们在伦敦的同事们会见了他和他的代表团，这是应西班牙当局的要求。

《明镜》：现在已经有多少财政部长希望约见你呢？

埃利安：有的已经这样做了，还有世界各地的一些中央银行行长们。典型的问题是这样问的：“如何使得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我国进行长期投资。”答案总是一样的：要有良好的和可持续增长的前景。

《明镜》：你的同事们然后告诉西班牙财政部长：“抱歉，你的债券对我们来说，风险太大了。”

埃利安：我们对待风险非常谨慎，如对于希腊和爱尔兰。西班牙则需要更多积极的讨论，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应对储蓄银行（cajas）的问题。

见：<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business/spiegel-interview-with-pimco-ceo-el-erian-germany-finds-itself-in-a-very-delicate-situation-a-744297.html>，最后获取时间：2012 年 11 月 26 日。

122 议以及公开发出计划好的购买或不购买决策的信号的卡特尔法在国际层面并不存在。与水泥或者内衣生产商们的价格议定不同的是，当世界领军的基金组织在一次电话会议达成一致，不参与法国国债的拍卖活动，并不构成商业犯罪行为。^①

民主的债务国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两个股东阶级之间长袖善舞，让两者都至少能够基本满意，而不完全失去其忠诚和信任。这样一来，国家就必须注意，不能让自己和其中任何一方靠得太近，因为这会导致它和另外一方的关系出现危机。民主的债务国家只有在其国家人民愿意和它一起合作的情况下才能令其债权人满意；如果在民众眼中，国家成了债主们伸长了的胳膊，就存在着他们拒绝服从国家统治的风险。同时，这样的一个国家，也只有当它的债主们愿意以可接受的条件向它不断提供贷款的时候，才能在自己的国民，特别是那些尽管已经高度国际化形式下的纳税国民面前保有其合法性。而债主们提供贷款的意愿在当国家过多地动用资源，迎合其公民的期许时就会消
123 失，因为国家有可能无法很好地偿还债务。债务国家首先会更多地迎合哪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相对权力。国

① 而且关于国家债务的信用评级机构（Ratingagentur）的角度也并不明确。和证券化市场不一样的是，对于国家债务的评级没有人或者至少不是由支出的国家来付款。这笔钱是不是由购买国债的人出的，也不确定。一段时期，欧洲政府以及参与其中的国际组织热切地，甚至是带着恐慌地期盼着三大评级机构（Standard and Poor's, Fitch 和 Moody's）的评级结果，市场对它们的反应也如同像接受命令一般言听计从。然而在最近一段时间却不再如此。评级机构是不是让自己的行为和债务人方保持一致，如果是，又是如果做的，在目前来说，还是未知数。

家及其政府时刻在衡量，多大程度上有可能会失去债权人的信任或是失去国民的忠诚，以及分别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决定了民主债务国家政策的两个争取监督国家政策的诉求团体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新型的、还在不断发展之中的并且几乎还没有被研究的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作为第二人民——作为同国家人民相竞争的市场人民——的金融资本出现后，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不再以间接的方式——是否向国民经济中投资，而是以直接的方式——是否向国家提供贷款——对政策施加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批判民主理论研究了战后时代的民主国家中，虽然那些实际占有生产资料 and 投资的公民有着事实上的特殊地位，却仍然或多或少地成功保障了其民主的合法性的方法。自由化进程中快速的，伴随着强烈的阶级政治倾斜的民主组织和参与的衰退，以及政策行为的自由度，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危机进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限制，这可能意味着上述的保障在财税国家向债务国家的过渡中变得不再那么容易实现。

我想就债务国家政策以及债务国家中有效的利益对决形势谈几点观察，尽管这种观察由于当下非常欠缺的现状研究只能局限于一些报纸报道的印象综述。

124

1. 富裕民主国家长期增长的负债已经在相当长时间以前开始出现其主权事实上受到限制的苗头。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要屈从于金融市场的秩序。2000年4月，时任德意

志银行行长的罗尔夫·布罗伊尔（Rolf Breuer）在《时代》（*Die Zeit*）周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21世纪的政治表达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到金融市场”，“如果人们想这样的，金融市场其实已经作为某种意义上的位于大众传媒之后的‘第五种权力’，承担了非常重要的监督作用。”对此，人们不必过于担忧：“如果21世纪的政治真的在这种意义上处于金融市场的纤绳之上的话，这也许也不是那么糟。”最终，

政治……对对于自身渐渐感到越来越不舒服的行为限制……做出了贡献。政府和议会更多地使用了国家负债这一手段。这意味着——如同其他所有的债务人一样——对债权人负有解释说明的义务。国家的负债越多，国家就越多地面临着金融市场的裁决。如果说政府和议会认为在今天必须要更多地考虑到国际金融市场的要求和偏向，那么这只能说是既往犯下的错误导致的。^①

只在几年之后，同样的情况，人们就可以用更加不加粉饰的口气说出来。2007年9月，时任美国央行主席的格林斯潘在一次采访中回答苏黎世报纸 *Tages - Anzeiger*（2007年9月19日）提问他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会支持哪位候选人时，

① 布罗伊尔，《第五种权力》（*Die fünfte Gewalt*），见：http://www.zeit.de/2000/18/200018.5._gewalt_.xml，最后获取时间：2012年11月26日。

这样说道：

125

我们很幸运地看到，美国的政治决定鉴于全球化的形势而绝大部分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了。除了国家安全话题是例外，谁是下一届的总统其实根本就不重要。世界是由市场的力量来统治的。^①

“市场力量”对于民族国家的主权的限制与对公民的民主决策自由的限制以及相应的对国家获取资金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市场人民的授权是相辅相成的。在国家层面的民主是以民族国家的主权为前提的；然而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市场的债务国家能够行使的主权却越来越少。全球集中整合的金融市场相对于民族国家组织的社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力的组织优势第一次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是在1992年9月，金融大鳄索罗斯竟能够调动如此大量的货币，以至于他成功地用这笔钱来针对英格兰银行进行投机炒作，并能够使当时的欧洲货币系统一度接近崩溃。在这次操作中，他也获得了十亿美元的巨额收益。

2. 债务国家的债权人人们在同国家的公民之间发生冲突时的主要目标显然在于，当危机发生时，能够在同国家公民要求提供生存照料的诉求冲突中稳定地保障其债务诉求。最理想的实现这一诉求的方式就是通过甚至被写入宪法的一些机制手段，如“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它就

^① 转引自 Thielemann (2011)。

限制了选民以及未来的政府之于公共金融的部分主权。制定这样的一些机制手段是由于国家债务受到了高风险酬金（*Risikoaufschlag*）的威胁而被迫做出，同时也会因为低风险酬金而受到鼓舞。原则上这里归根结底是一个破产法的核心问题，只是投射到了一个国家金融政策的层面，即：
126 在破产程序中，哪类诉求之于另外的诉求有着优先权？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当然希望涉及各个方面的“修剪”并不从他们那边，而是在退休人员和医疗保险者那里进行——也就是说，国家要行使自己主权的时候，只针对自己的国家人民，而并不针对自己的市场人民。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近年来的讨论，就不难发现，这一原则确实已经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对于“市场的恐慌”——债权人的恐慌——国家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加以避免，^① 已经成了整个政治光谱中所有团体的一个共同地带，就好像由此可能带来的让全体退休人员陷入恐慌是出于公众利益不得已而为之一样。

① 为了表现这个问题，这里应该引用一段经济伦理学家乌尔利希·蒂勒曼（Ulrich Thielemann）文章中的话。2011年9月，德国经济部长菲利普·罗斯勒（Philipp Rösler）在《世界报》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不应该存在“思想禁止”，并且人们必须去检验“有秩序的国家破产的可能性”。接下来的事情，蒂勒曼写道：“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依布勒（Wolfgang Schäuble）立刻做出反应。他非常‘反对在公众话语中讨论国家的破产’，因为这会导致‘金融市场无法控制的反应’。‘市场’，按朔依布勒几天的说法，‘对于欧洲的行动能力是完全没有怀疑态度的’……反对党也利用这次的机会，来标记人们所谓的‘经济能力’。罗斯勒的言论，在绿党党团主席尤尔根·特里庭（Jürgen Trittin）看来是‘非常业余的’，并且显示了，‘经济部长的位子上坐着的是个实习生’。‘证券交易所会有反应。’”（Thielemann 2011, 820）

3. 在争取“市场的信任”的努力中，债务国家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可信，并且能够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履行它在民法和合同法意义上的义务。在危机到来之时，建立这种信任最好的方式就是实施针对自己国民的节约措施，最好还要让反对党也参与进来，并且建立一些永久性的限制开支的机制和手段。而只要选民还有机会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个服务于资本市场的政府下台，那么市场人民就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完全高枕无忧。并且如果存在着某个拥有潜在的取得政权能力，且对资本市场并不持太多好感的反对党，也会让国家的信任受损，从而在这一方面花费金钱。所以说最理想的债务国家是一个在大联盟领导下，至少在金融和财政政策方面以种种措施将偏离这一要求的做法从共同的国家宪法中慢慢清除出去。目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越来越接近这种状态了。

127

4. 对于“市场”来说的一个困难的问题是：当国家缩减用在国家人民身上的开支，并且这种措施过度使用的时候，就有可能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增长可以减少国家的负债比例，同时也能够减轻国家还债的压力；^①反之，经济增长的停滞或者甚至是经济发展的倒退则会增加国家无法偿还债务的概率。要求把财政紧缩和经济增长同时协调在一

① 据说只是在一定的已经到达的负债水平之下。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专业意见则认为存在着一个门槛效应，如果超过这一门槛，国家负债就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这个限度约为社会生产的80%（Reinhart和Rogoff 2010）。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就像所有的经济理论计算出来的“规律”一样，这也必须小心谨慎的对待——那么今天很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早就已经失去了增长能力了。

起，这个任务犹如让人们把圆画成方；没有人知道，这该如何去实现。^①同时，这也构成了各派经济学理论关于解决国家财政危机正确道路的争论不休的基础。一些派别认为应该通过供给方来解决，即要通过减税以及以复兴私营经济为目标来减少国家的行为。而另外一些派别则要求以刺激和加强公共以及私人的需求为前提，为实体经济寻求更多新的投资。

128 5. 另外的一些并发症则源于这样的事实：在市场人民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人同时也是国家人民中的一员。他们也是普通的公民，所以除了作为国家债务人的诉求以外，他们也对国家有着同样的，甚至可能是更高的对生存照料方面的需要。这一类人的数量在过去几年中随着以如补充养老金、中产阶级储蓄提升等形式表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部分私有化进程越来越多。对于这些人来说，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国家面对“市场”无力给付，不得不缩减他们投资的金钱，还是国家为了避免上述的支付不能，不得不缩减社保开支，对他们的伤害更大。在政策上，他们就一方面既支付紧缩政策以保障他们的资本；同时又抗拒紧缩政策，以保障社会国家的维系。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这一类人可以被视作一种处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压力中的中间群体。

6. 同样知之甚少的还有国家人民和市场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到两者之间处在变化中的

^① 关于这个，还有一些想法在尾声当中。

“贸易条件”的协调。投资人的权力首先源于高度发达的国际一体化以及高效的全球市场的存在；他们的信任感一旦缺失，这两者让他们有可能快速地从一项投资中抽身而去，转而进行另外一项投资活动。此外，当国家的国民或者政府不再想迎合他们的愿望时，信用评级机构也会帮助他们联系在一起，作为市场人民共同给国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财富的所有者们为了保障其投资组合，也不得不依赖于至少将一部分资产投入国债中。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一些规范性的措施来迫使“市场”投资国家债务，比如国家可以提高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法定风险准备金水平。^①再者，国家还可以从根本上来按自己的衡量来单方面对债务进行“改组”，因为它作为“主权的”债务人，迄今为止并不受任何破产条例的规约。^②同时，它还能够迫使债主们做出债务减记，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中止一切债务偿还。实际上，这对于债权人方面来说也是持续不断的一场噩梦。^③因为放弃清偿债务

129

-
- ① 与低利率、资本交易监管以及提高通胀率相联系，这都可以成为缩减国家债务的策略。专业术语叫作“金融压制”（finanzielle Repression）（Reinhart 和 Sbrancia 2011）。
- ② 不断地有人建议为国家建立一个破产条例。债权人希望通过这样的条例来制约作为债务人的国家在支付不能时的行动自由。然而他们也不确定是否真的能把国家带向这个方向。相反，破产条例却很有可能导致国家的破产正常化，从而使国家破产越来越频繁。
- ③ 不断地寻找方法来保护自己，不受这种可能性的影响。2012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了，债权人参与到希腊的金融整顿中来，而2011年希腊的整顿被认为是不够充分的。一家对冲基金甚至正在检验在欧洲人权法院发起就希腊损害所有权诉讼的可能性。引用一位投资人的话：“欧洲忘记的事情是，它们应该尊重合同。”见“对冲基金可能起诉希腊，如果它试图强制造成损失”，《纽约时报》2012年1月19日。

对于一个国家将来的债务信用来说有着极大的伤害，因此，国家不到完全没有其他出路的时候，也不会使用这种手段。原则上说，为了应付国民要求国家履行生存照料的诉求，国家单方面的免除自身债务的方法是一个很危险的武器。但是，只要这个武器还存在，并且一定程度上有理由相信受到这个武器的威胁，国家的债权人就有必要在实现其利益过程中有所保留。^①

7. “市场”还可以调动起“国家联合体”以及它们的机构用以对抗债务国家并保障其自身诉求。此时，“市场”会倚仗其相对于国家机构的组织优势，尽管后者已经被嵌入了全球的市场中，但在体系组织上却仍然只局限于国家的层面。在国际化和高度交融的金融市场上，一个债务国家的破产崩盘将给其他国家带来一系列的在其形式和度量上都无法预估的外部效应。比如说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有可能因此而遭受极大的损失，以至于它们必须由“它们自己”国家的政府投入巨大的财政力量来拯救。^② 同时，养

① 大约当国家信贷的风险酬金上升时。总的来说存在着一致性，当利息超过大约7%的水平时，国家就无法偿还债务。然而国家在为债务筹集资金时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操作，所以利息的上升总是会滞后那么一段时间，直到上升了的高利息覆盖到债务的大部分时，才会令支付不能的可能性变得非常急切。从根本上讲，这种状况是债主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能为他们下金蛋的鸡是不应该被杀掉的。除非他们能够很清楚地计算好，早点让这只鸡死掉，可以快速地让另外一只鸡替换上来。这当然也会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② 当然，人们也并不真正清楚，各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具体是怎样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如前面提到的，国际组织做出的所谓“压力测试”（Stresstest）也完全没有说服力，一方面因为它只是根据金融监视机构所掌握并公布的数据来进行计算的，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测试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结果必然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引起恐慌。

老保险已经私有化的那部分也有可能崩溃，或者“市场”对于国债的信任因此受到影响。这时利率就会上升，对于其他不断需要新的贷款来清偿旧的债务的国家来说又将是巨大的负担。因此，一个面临危险的国家就会遭受到来自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压力，必须要履行它对于债权人的义务，这就有可能要以牺牲它对于国民的义务为代价。同时，其他的国家也会陷入压力，并以“国际团结”的名义来帮助遇到危险的国家，并通过贷款以及划拨款项的方式来防止它无法支付。不过，国家也可以结成联盟对抗“市场”，比如它们可以共同拒绝接受紧缩政策的要求。这里又存在着集体行动中的经典问题，即每个参与到其中的国家的利益以及出发点各不相同。比如像英国这样的一个比其他任何国家对于健康的金融业的依赖性都要大的国家，就不可能加入任何一个迫使“金融市场”做出债务减记的统一行动中去，除非它能够从其他国家那里取得好处以平衡这种损失。

131

作为国际金融外交的负债政策

现代化的债务国家的政治有很大一部分开始成为国际政治——以国家间金融外交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欧洲表现得尤为明显，因而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愈发脱离了民主制度的制约。国家人民和市场人民之间的分配冲突，究其本质不过是依靠劳动工资生活以及依赖利润的阶层之间冲突的派生版本，然而它却投射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以致其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终让人们无法认出

其本来面目。而这个新的层面却正给了后民主时代的表演以极好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欧洲民族国家的公众们多年以来已经看够了那些充满着惊天逆转的令人屏息凝神的谜一样的游戏，其光怪陆离的程度，与小爱丽丝游历的仙境相比也不遑多让。

132 然而，在债务政策方面的东西却要严肃得多。以财政监督以及整治国家政府为手段的国际“治理”的委托从长期来看，尽管不是一劳永逸的，但通过没收国家人民的政治生产资料的方式，在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冲突中做出对前者有利的决策。如果说2012年通过的借助于“财政一揽子方案”的关于欧洲国家体系新秩序的计划实现了其目的的话，各个民族国家及其政府在金融市场以及国际组织的压力下，从国际法和宪法的角度必须遵守市场公正的准则，从而进一步被剥夺了在社会公正名义下进行调整的可能性。^① 在这一点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化以其市场对政治干预的免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财政危机和债务政策的国际化把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政治和经济的行动者隐藏到了一个有着统一的，相互又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利益的国家群体组成的结构的幕后。国家就像参加一场比赛的足球队一样，争取取得积分榜上更好的排名。只是这种竞争比的是诸如经济能力、竞争力、腐败的

① 有关这里更多的见第三章，与讨论关于欧盟作为一个国际的整顿国家相关的章节。

程度以及政治代表能力等的东西。^① 同时，它们也被设计成为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载体，大约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要求团结互助。其结果却是债务政策被有着煽动性潜能的民族主义的概念以令人惊讶的通俗方式重新表述出来，以及对国际政治话语迅速的民族化和民族主义伦理化，同时，在全球金融市场、国际组织以及遵守由它们制定的行为规则面前，对国家主权诉求是否尊重也有赖于国家是否做出好的行为。 133

在国际债务政治的语境中，一元构建的国家作为有着共同责任的整体伦理行动者存在。内部的阶级和统治关系则被忽略。这就使得在话语中对不同国家做出了区别对待，有些是那些秩序井然的国家，而有些是那些没有把自己的家庭作业完成好的国家，因此它们也就没有理由抱怨受到干预。“情况糟糕的”国家要想享受那些“情况良好的”国家的团结，就必须按照他们的方式去进行改革或者至少尽可能照着去做。反过来，情况不容乐观的国家期待着那些运气不错，因而过得更好的邻居们出于道义上的责任能够对它们施以团结的援手；如果邻居们不愿意帮助，或者并没有施以期望中那么多的帮助，则可能被认为是骄傲自大且铁石心肠。与之相应的有关纳粹德国的刻板印象也卷土重来，比如在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的《欧洲

^① 在社会学研究中，比较政治学问题习惯于去带着一种潜在的明争暗斗的心态：哪个国家或者国家中的哪个社会群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在环境政策方面，在卫生健康、民众满意度以及政治参与度方面是“更优越”的。

不需要欧元》（*Europa braucht den Euro nicht*）（2012）一书中，以及意大利和希腊的一些报纸媒体上，把德国总理描述成为希特勒思想上的继承者。^①

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国际的债务政策是一种国家政府间的合作，以保护金融投资者不受损失，其目的在于将国家贷款的风险酬金总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并防止每个国家需要为自己的国家银行补贴损失，或者必须注入资金救市，以防止它们崩盘。国家同时也保护了那些把自己盈余的金钱投资到国债或者其他的金融产品中的，地位更优越的公民的利益。“市场”以及政府都使用一切手段来防止面临危险的债务国家动用自己的主权拒绝履行债务。国际债务国家的共同体的第一要务就是，动用所有成员的力量，包括那些弱势成员，去尽可能完整地履行曾经欠下的

① 见2012年8月7日，《法兰克福汇报》上的文章《意大利的反德国情绪高涨》（“Antideutsche Stimmung kocht in Italien hoch”）：“在意大利国内的欧元讨论中，关于德国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最近一次的事件升级是上个星期五，在 *Giornale* 报的头版标题就是《第四帝国》。该报纸属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兄弟保罗（Paolo）以及由西尔维奥管理的上市公司蒙达多利出版社共同所有。其主编阿里桑德罗·撒鲁斯蒂（Alessandro Sallusti）写道，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几百万人，但德国人仍然觉得不够。‘现在他们又回来了，虽然不是带着大炮，但是带着欧元。德国人觉得他们要发号施令，而我们要无条件地屈从于那个叫作默克尔的新皇帝的命令。’撒鲁斯蒂在贝卢斯科尼的报纸首页上这样写道，非常糟糕的却是，意大利完全不做出反应，就像盟国在1938年时纵容希特勒那样……最后，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在同《明镜》的谈话中警告了意大利的反德意志的怨恨情绪，并认为各个国家的议会作用有限。后面一个观点在德国受到较多批评。在这一背景下，右翼通俗报纸 *Libero* 在周一的网刊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德国的抨击：《纳粹德国想给我们上了一堂民主课》。”

债务。

国家人民和市场人民之间的冲突还包括，那些金融市场相对还比较信任的国家的公民们被自己的政府，其他国家的公民，国际组织以及金融投资者们^①要求，对那些陷入支付困境的国家表示出“团结”。事情的真相就是，不是国家，而是债权人需要拯救自己的投资，并以此来稳定全球国债市场，那么援助国的人均收入还低于被援助的国家就显得无足轻重了。^② 出于同样的原因，援助往往也根本不可能到达

① 大投机家索罗斯在公众中有着很大影响力。根据 2012 年 1 月 26 日的《法兰克福汇报》，索罗斯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欧元区损害欧盟的政治团结的危险性……德国在这里负担着主要责任……为了规避这种风险，索罗斯建议欧洲人建立严格的金融纪律以及结构性的改革……这里可以使用的一个手段是欧元债券。”索氏喜欢通过由他资助的经济以及社会学家以科学政策顾问的形式传播他关于欧洲统一的号召。见 2012 年 7 月 23 日的号召“打破死锁：一条走出危机的途径”，由索罗斯 2009 年建立的新经济学思想研究所传播（<http://ineteconomics.org/council-euro-zone-crisis/statement>，最后获取时间：2012 年 11 月 26 日）。

② 人们理所当然地希望，斯洛伐克也能够参与到对爱尔兰的援助行动中来，虽然它的人均收入远远比对方要低（后者在危机之前甚至还要高于德国的平均水平）。而关于德国之于希腊的团结，则归因于德国比希腊富有，从而在伦理上具有义务。公众话语中完全没有涉及的内容则是，在希腊有大量的人生活水平高于德国的平均水平，而在德国，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水平不如希腊的中产阶级。而德国人为了营救希腊财政所付出的代价是缩减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用于营救属于希腊上层社会的银行不受损失以及补贴那些较少负担税赋义务的大资产者。2005 年希腊获取了约相当于 GDP 4% 的收入税，相比之下，西欧欧盟 15 国则达到 10% 左右的水平。所有税收总额占社会生产的 29.7%，而欧盟 15 国则达到 39.7%（三分之一强）（Grözinger 2012）。2001 年，希腊加入货币联盟，同时也开始了以低息贷款大幅举债，希腊将利润税收的最高比率从 40% 降到了 20%（Markantonatu 2012）。

136 相关的国家，而是直接就到了国外的债权人的手上。^①

那些被其他国家“拯救”的国家仍然必须，或者正是因此必须缩减其国民的生活水准，一方面从长远上谋求金融市场的信赖，同时也是为了安抚援助国民众的情绪。因为同样的，他们也出于为了共同体内的团结提供资金，而不得不接受缩减自己的公共开支和社会保障。^② 于是乎，对于双方，无论是提供援助还是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需要向金融市场缴纳的“贡物”对于不同富裕程度，或者说对于应该有着不同富裕程度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双向的勒索。

最终以国际上从外向内，从上向下发出的紧缩政策的指令为终点的国际团结是让一个渐渐失去支付能力的债务国家的公民为其以往政府承担责任。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政府是由公民们以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民主制度的作用是，
137 在民众和政府之间，在作为主人的选民和作为经办人的政府

① “它在欧洲货币联盟中的成员地位安危未定，希腊仍然继续接受来自所谓的贷款三驾马车的数十亿欧元的紧急援助并监督其救助。但是，这些钱中几乎没有一个子儿到希腊政府的手上，并花在公共服务上面。相反，这些钱立刻又回到了三驾马车的口袋里。欧洲救助希腊的用于购买时间的1300亿欧元却主要用来清偿了希腊的国债——而此时希腊的经济却仍在打拼……表面上看，情况非常荒谬。欧洲当局有效地把钱借给希腊，于是希腊能够把借来的钱给还上。”见《大部分对雅典的援助回到欧洲》（“Most Aid to Athens Circles Back to Europe”），载：《纽约时报》，2012年5月30日。

② 在债务国家间国际金融外交的整体民族主义世界图像中，当希腊工人在外国营救市场方案中被缩减了养老保险时，他们实际在为“他们的”银行付钱。为了营救希腊银行，应该首先找银行的区分所有权人，或者是那些最近在银行业务中狠狠地捞了一笔的人的想法在一个已经早就被新自由主义重新唤起民族主义整体论的几近霸权的话语体系中难以发声。这当然也反映出了看起来仍然享有主权的国家在新自由主义转向后相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软弱无能。

之间建立一种同一性关系。这种关系足够要求全体公民自己掏腰包去偿还当初以他们集体的名义欠下的贷款——无论当初他们具体把票投给了谁，也无论这些借来的钱有没有实际到他们的口袋里。同时，作为国家的公民，还很难主张所谓的建立在欧洲人权公约之上的抵押限制，如若作为一个经济公民可能还更容易一些。

在新民族主义的公共话语体系中，国家的过度负债被认为是由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牺牲了另外一些国家国民的利益而过上更为优越的生活（于是乎必须对他们施以“作为惩罚的团结”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债务国家通过举债的方式来代替特别是无法向最富裕的一批人收取又或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不愿意或者不能征收的税收。这使得国际社会对债务国家的援助成为一种不仅是与债权人之间的团结，同时也是一种与较少特别是随着新自由主义转型以来更少地被征税的社会上层之间的团结；团结的结果是补贴了更加倾斜的收入分布，并且也正是因为团结政策让那些被援助的国家的国民不需要组织起来进行政策上的修正抑或是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冲突和风险。在今天“挣得更多的人”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轻松地逃避税赋义务，并逼迫自己的祖国不得不借债度日，这也是近几十年来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后果。像美国、法国、英国以及德国都是由于一些其他国家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使得资本从这些软税收国家（Weichsteuerstaaten）流出，从而从很大程度上得到好处，特别是那些富人以奢侈地产不断增长的价格的形式获益良多。此前，这些国家的政府在“金融市场”的一片叫好声

中或是迫于“国际共同体”的压力给予了资本以通行自由，而今天，它们的全体国民集体收到了账单。

当下国家间金融和财政外交政策已经高度嵌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在这样一个颠倒了的世界里，国家主权向超国家（supranational）机构让渡，国际援助方案以及跨越国界的调节措施不仅对于金融投资者们来说是保障投资和征集债务的方法，也是以保护“市场”不受以出于社会公正的市场调节为名义的政策干预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去民主化手段。国家主权——国家民主的根本前提——作为以别国为代价负债的机会被渐渐取消了合法性，并且在并不鲜见的案例中，在那些被要求共同分担债务的国家人民的叫好声中被取消掉了；这样做却只对那些没有民主听觉的超国家组织机构有益处——上述现象不只局限于过度负债的债务国家当中，同时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当人们高呼诸如国际团结，利用超国家一体化形式和平防止民族主义的价值口号时。

第三章 整顿国家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在欧洲

金融和财政危机的进程中，取代了财税国家的债务国家也处在一个慢慢向整顿国家变化的过程之中，并且处在完成向欧洲国家体系以及它的凯恩斯主义构建阶段的政治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告别的阶段。正在形成之中的整顿国家是一个国际的多层级的统治，并且这绝非出于偶然。国际化一方面和去国家化之间，另一方面和自由化之间有着关联，这最迟在关于“全球化”的政治后果的讨论开始，存在于公众的意识当中。但这种关联没有人能够像哈耶克那么早，像他的文章《州际联邦的经济条件》（“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Interstate Federalism”）中阐述得那么清楚，文章于1939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年

发表在了《新联邦季刊》（*New Commonwealth Quarterly*）上 [Hayek 1980 (1939)]。

一体化和自由化

141 哈耶克的文章按其产生的状况，是从探讨稳定的国际和平秩序的可能性的条件开始的。在哈耶克看来，这在长远上只能通过一个国家间的联邦才能得以实现，这个联邦必须要强大到足以能够对内调节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对外保障集体的安全。因此，它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处于中央政府手中的国防和外交。但是人们也并不能保持原样；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国家间有着共同的外交和国防，却没有共同的经济秩序的先例” [Hayek 1980 (1939), 256]^①。如果在这样的联邦中允许国家间有着不同的经济秩序和政策存在，那么这就会导致各个国家形成“利益团结”，其结果则是，联邦内部公民之间的经济冲突线沿着成员国的边境延伸 [Hayek 1980 (1939), 257]。最终总是相同的团体之间起冲突，而不是在变换其组成部分的团体之间。对于整体的统一来说，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其间发生冲突的团体并不总是那些，并且不同的利益团体在其政治版图上相互覆盖，从而完全不可能长期的和某个特定地区的居民完全一致 [Hayek 1980 (1939), 258]。

① 这里，以及后面的引文都是由我自己翻译的，施特雷克。

如果说维系一个联邦共同体必然要求一个统一的经济统治体，以保障团结并不仅局限于国家的小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经济统治究竟是以什么形态出现？以下的两步构成了哈耶克论文中的核心论点。首先哈氏指出，共同的经济秩序下，没有内部关税且人员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却有着一个“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的联盟 [Hayek 1980 (1939), 258] ——它必须对于每个成员国的经济政策的波及范围以及影响深度产生限制。接着他又指出，在单个国家层面必须杜绝政治对于市场的干预，并且这种干预也不能上升到联邦的层面上，或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寻求某种程度的替代——也就是说“今天一般来说在民族国家层面上保有的某种经济上的职权既不能在联邦也不能在单个国家中行使”。这意味着：“总的来说，如果联邦在实践层面可行的话，政府会越来越少 [Hayek 1980 (1939), 266]。” 142

关于上面提到的第一点，哈耶克进一步指出，在“人员、物品和资本” [Hayek 1980 (1939), 260] 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单个国家大约出于促进本国产品的目的对于市场的干预则会对于联邦作为一个整体产生过大的影响，以致后者完全不能容忍。同时，每个成员国实施一套自己的货币政策也不可能：

确实看起来也令人怀疑，在联盟内部有了统一的货币体系后是否还能继续存在着独立的国家央行。极有可能的情况则是，这一功能将由一种联储性质的系统整合起来。

此外，竞争也导致了没有国家能够对自己的经济施以过大的调节管制手段：

甚至是单个国家在法律上对童工加以限制或是对工作时间做出规定都显得比较困难 [Hayek 1980 (1939), 260]。

再者，联盟内部的自由迁徙和流动也给国家向国民征税提高了难度：过高的直接税收会把人员和资本赶到别的国家去，而边境检查的取消也让直接的针对货品的征税带来了难度。如同国家一样，它们的经济协会和工会也都受到类似的限制：

如果一旦把边界开放，保障了流动的自由，所有这类的国家组织，无论是工会，卡特尔还是职业联合会，都会失去其垄断地位和作为国家组织来监督服务和产品供给的能力。

143 关于第二点，但是为什么不能在联邦层面替代性地把那些为了维系联邦存在而不得不在单个国家层面取消掉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呢？原因在于，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联邦当中，利益的多样性更大了，但是用以消弭利益冲突的共同的认同性情感则更弱于单一民族国家。比如对单一工业部门征收保护性关税则会导致作为整体的经济社会中出现另外一批牺牲者，最后的结果是，代价反而更大。在同一国家的民众中，这也许还是可行的，但是在联邦中，情况则完全不是那么一

回事：

法国农民能够心甘情愿地为他们需要的肥料付更高的价格，用以支援英国的化学工业吗？瑞典的工人愿意多花钱买橙子，来帮助加利福尼亚的农户渡过难关吗？或者英国银行区的职员们买高价的鞋子和自行车，用来表达对比利时工人或者美国工人的团结友爱？又或者是南非矿工们愿意多花点钱买沙丁鱼，好来帮助挪威的渔民 [Hayek 1980 (1939), 第 262 页及其后]？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的经济干预政策：

甚至法律对工作时间的限制或者是对于失业的强制保险又或是保障某种便利做出规定都有可能在贫穷和富裕的地区被人们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并且这些规定往往损害了贫困地区中一些人的利益并被他们坚决抵制，而他们在富裕地区又会支持这种政策并且可以从中获益 [Hayek 1980 (1939), 263]。

由较小的规模带来的结构上的均质性以及共同的民族传统及认同性使得国家以一定的深度干预到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成为可能，然而随着范围更大的联邦——也因此变得更加具有异质性的政治单位——的形成，这种干预就不再那么容易被接受。联邦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自由化：

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英国人或者法国人有可能把对自己的生命、自由以及财产权利的保障——简言之，就是一个自由化国家的功能——托付给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组织。但是，如果要他们心甘情愿地把管理他们经济生活的权力也交托给联邦的政府——比如来决定应该生产什么，或者应该消费什么——既不可能，他们也绝不希望这样。同时，在联邦中，民族国家也没有保留类似的职责。这样一来就能够推导出，联邦意味着，两级政府都没有权力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去计划经济生活 [Hayek 1980 (1939), 第 263 页及其后]。

哈耶克的论断从展示国际和平秩序的经济前提开始，终止于论证为什么一个由国家组成的联邦，如果它想要能够维系自身的存在，就必然地在经济政策上采取自由化措施。^①民族国家，如果它们想要和平，就必须加入联邦；但反过来，联邦又会要求它们不仅要自由化自身的经济秩序，还要从联邦建立伊始就创造一个自由化的经济制度。同民族主义一道，还必须要克服社会主义，以及那两者之间对于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存在着威胁的联系 [Hayek 1980 (1939), 271]。这种方式上唯一可能实现的民主制度的种类是一个严格自由化的，尊重市场自由的制度，因为只有这样的民主制度才能够保障联邦内部和外部的和平：

① 以及为什么反过来“放弃国家的主权和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法律秩序是对于自由化方案必要的补充以及逻辑上的完善” [Hayek 1980 (1939), 269]。

如果说情况表明，如果国际政府的任务本质上只局限在一个非常自由化的方案之上，民主制度在国际层面才可以成为可能的话，那么这只不过验证了人们在国家层面已经获得的经验。在国家层面上，情况已经越来越显而易见，民主制度只能在我们不对它提出过高要求，并且绝大多数人并不去滥用它干涉个体自由的时候才能够起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国际的民主政府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只在于限制它的权力和影响范围，那么这个代价真的并不大 [Hayek 1980 (1939), 271]。 145

哈耶克 1939 年的文章看起来就如同是一份构建今天的欧盟的计划书，并且它不仅仅是在有关和平问题的话语中。尽管战后的一体化政治首先对于欧洲统一进程的设计是建设一个跨国的混合经济 (mixed economy) (Shonfield 和 Shonfield, 1984)，并且在那个时代，从哈耶克的角度来看，关于不可避免地形成超国家的一体化了的政治经济的自由主义观点在很多人看来还显得非常荒唐。^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使其从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规则的幻想中脱离出来，并且当这种一体化的进程进展得越深入，且越触及

① 除了围绕在前西德经济部部长路德维希·埃尔哈德 (Ludwig Erhard) 周围的一批秩序自由主义者 (Ordoliberalen)，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EWG) 已经早早地看到了按他们的口味把一个竞争的经济政策通过布鲁塞尔这条道路转移引入德国的机会。见 Gerber (1988; 1994)。如果他们自己没有读过哈耶克 1939 年时关于联邦的那篇文章，这当然是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哈耶克 1962 年到 1967 年在弗赖堡大学任教——那么他们就能完全理解由哈氏分析的整个情境了。

欧洲政治经济的中心时，它就越符合哈耶克在 1939 年时的直觉：它关涉在联邦中政治机构的经济中立化的必要性以及配置性决策要让位于自由市场；禁止各成员国破坏市场自由的干涉措施，甚至包括取消各个国家的货币；以及在哈耶克看来阻碍联邦层面的超越创造市场和解放市场的一体化进程的政治障碍。

实际上，二战后的欧洲首先出于保障和平的需要而产生的国家间联邦基于它本身固有的，早就由哈耶克描述出来的政治和经济逻辑从长期来看是值得信赖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能为加入其中的成员国家提供强劲动力，推动其国民经济的自由主义变革以及对各自不同的牺牲市场公正保障社会公正的民主制度的方案加以修改。尽管欧洲一体化当初的设计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事实发展的状况却仿佛哈耶克的文章仔细计算了的发展的轨迹，而后来欧洲统一的机构发展完全按这一既定的轨道亦步亦趋。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更加明显地表现在了当下正在进行的我称之为整顿国家的机制调整的过程中。今天，当人们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分配冲突转移到了国际金融外交层面以来，致力于把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从政治的调节中解放出来的“市场”强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构筑在哈耶克早在 1939 年就已经预言了的机构动力中。欧盟变形成为一个欧洲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工具并不是刚刚从 2008 年开始的；它究其本质和结果是一个连续的变化进程的必然，这一变化进程不过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自由化进程的道路上欧洲地区具体的演化形式和表达

方式罢了。这一进程——当下表现为两个快速平行发展的 147
以实现机构化的市场公正之于社会公正的霸权为目的的经
济的去民主化和民主的去经济化过程——可以被称为欧洲
资本主义的哈耶克化，为的就是纪念这位长久以来被人们
遗忘，但是在被重新发现后对后世起到极大作用的思想先
行者。^①

作为自由化机器的欧盟

很早以前欧盟就被证明具有“民主赤字”，同时兼具 148
“社会维度”的缺失（欧盟委员会等，1988）。关于第一点，
这虽然也被归咎为欧洲议会在能力设置上的先天不足，并反
映了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尚不存在政治上的欧洲国家人

① 当哈耶克自己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反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的战争中的全球意识形态者时，就已经产生出了非常细致的关于民主制度的观点：他首先深知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制度应该如何来建设，此外，它也已经不再是“今天正在操作着的那种形式”，不是“购买选票或者平衡以及奖励不正当的特殊利益团体的过程”，也绝对不是“那种每隔几年就把立法权拿出来交给那些许诺给人们最大特别利益的群体的拍卖体系……”（Hayek 1980）民主制度也只有在国家的行为，特别是那些具有经济特征的国家行为严格地按照普遍性的规则来办，并充分保障其不可能任意胡为时，这种民主制度才是和自由，特别是经济的自由共通的。首先，人们就必须阻止民主制度来不断尝试干涉自由市场的结果。这一点应该由相应的宪法法规加以保障（Hayek 1971）。哈耶克对此还做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立法权应该交给一个“立法大会”，它的成员每15年改选一次。每个公民一生只有一次选举权，且是在他45岁的那一年，这样一来，每个年龄段的人平均都能占据立法大会中1/15的席位。党派和利益代表人（工会负责人！）则不能拥有被动选举权；同时也要用高退休金来增强他们的独立性。今天人们尝试着用来使资本主义市场不受民主政治制度干涉的方法当然是另外的一些东西，尽管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的领导层产生机制中的选举成分比哈耶克建议的形式更加缺乏。

民。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各个国家的行政权力通过形成了国际的多层面统治后变得更加强大了。各成员国政府通过设置在布鲁塞尔的议席来武装自己，并与国内的反对力量做斗争，特别是那些诸如劳工等有组织的利益团体，从而让他们的诉求落空（Moravcsik 1997）。这样一来，各个国家内民主力量的博弈就可以被绕开，诸如在私有化国企这类重大问题上。

另外，在“社会维度”的问题上，相应的国家机制贬值了，但是又没有相应的国际替代机制建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还处在1968年工人躁动不安的印象之中，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宣告的目标是总体上借鉴当时的西德模式建设一个超国家的社会国家。随着各成员国中社会民主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束并且由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政府对布鲁塞尔的共同体机关还残存的，但实际上早就已经废止了的社会民主残余纲领的攻击，一体化进程已经开始停滞。同时也因为，渐渐习惯于自由化的有组织的资方也向共同体发出失去兴趣的威胁。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领导的两届委员会的任务就在于扭转这个趋势。这后来通过内部市场大纲得以实现，大纲让企业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形式为“四种自由”的市场扩张。而对于劳工阶层来说，也许诺了他们在社会政治上会被嵌入欧洲内部市场中去，并且随着前者的实现，后者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但其实后者并没有真正实现，一方面由于资方的抵制，另一方面则是英国政府的拒绝（Streeck 1995）——无论布鲁塞尔方面资助的，渐渐已经快要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亚学科的所谓“欧洲研

究”如何反对一切实证观察研究的结果鼓吹的所谓的“社会维度”。

当时形成的是一个由于跨越边境的市场和市场自由的作用，在民族国家中法律秩序、政治力量关系以及民主的意愿形成日益交错或中止的，迄今稳定的“消极”的，而无“积极”一体化的模型（Scharpf 1996）。通过超国家自由化的一体化或者通过国际一体化实现的自由化的主要行动主体是欧洲法庭，它的决议无论对于每个国家还是公民都变得越来越不可推翻，特别是当东欧国家加入，成员国的异质性更强之后，更难以形成关于社会保护措施方面的多数意见（Höpner 和 Schäfer, 2010）。20 世纪 90 年代时，起首要作用的还是欧盟委员会，它借助竞争法的手段成功地在更多的公有资产领域推动了私有化进程，^① 在之后的十年中，则是欧洲法庭在不同的裁决中以不受阻碍的服务和资本流动为名质疑了工人阶层的罢工和参与决定权。总的来说，欧盟以这样的方式成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自由化机器，在它的帮助下，政府能够应对国民的反抗，实现各种形式的适应市场的改革，甚至很多时候完全没有受到来自欧洲机构的压力。

① 第一批认识到可以通过欧洲竞争法来起到转型作用从而干涉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可能性的人是路德维希·埃尔哈德身边的智囊们。他们想以此来扭转在争夺德国卡特尔法中的败局。当时建立起来的这种机构设置在大约 50 年之后确实已经能够在欧盟委员蒙蒂的领导之下，以竞争法的种种机制来摧毁德国的公立银行体系，而后者对于私立银行来说早就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了（Seikel 2012）。此外，委员会建立在资本的自由流动原则基础上发起的，针对下萨克森州政府以及大众集团员工强硬态度的攻击还在进行之中（Werner 2012）。

迄今，欧洲货币联盟达到了，把资本主义经济从民主的对市场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机制的欧洲联邦（europäische Föderation）多年发展的高潮。对此，回忆一下决定建立欧洲货币联盟恰逢西方富裕的民主国家首次开始试图整顿其公共金融的时候，就很有益处。国家层面财政预算的纪律从一开始就是一揽子方案的一部分：对所有成员国来说的要求是，每年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整体的负债水平不能超过60%。同时，货币联盟大约是出于防止或消弭内部分配冲突的目的，还从一开始就杜绝了那些相对国民经济竞争能力较弱的国家以贬值的方式从政治上去重新调节共同市场中被称为“公平竞争环境”（level playing field）的竞争秩序的可能性。以这样的方式，更具生产能力，并更依赖出口的国家就有着对市场公正的诉求，并要求自己的利益不受到为了国家特殊的，社会公正的目的而利用民族国家的主权带来的损失。而在共同的货币联盟中，那些在经济上尚不能和其他成员国等量齐观的国家则会因为为了要适应而不得不对所谓的“内部贬值”抱以开放的态度，即工资下降、缩减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换言之：要实现自身内政方面的全面完善，适应与共同货币相联系自由化纲领。

151 这些目标中没有哪一条是在一开始就实现了的。为了实现和完成与规则绑定的财政预算政策，由货币联盟提出的规则既不够明确，也缺乏相应的制裁机制；每个成员国仍然有着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屈从于本国公民提出的与市场公正相悖的要求。法国就设想通过建立“经济政府”来更

加灵活地应用规则体系，并且从整个欧洲的层面上为无条件的政治干预创造新的空间，然而却一直因为其德国盟友的利益和内政原因未能成形。由于德国和法国在这个问题上都固执己见，互不相让，所以规则多次被打破，也无任何有效的追责机制。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尚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硬货币条件（Streeck 1994），它们似乎没有能力或是不愿意对自己的社会以及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做出适应市场需要的“现代化”改革措施。为了经济上不出现崩盘，它们在欧洲实施欧元改革后，由于国际金融业对欧元区施以的便利，纷纷大量地利用了便宜的贷款来源，^① 再一次，也许也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购买了时间——直到财政和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下，关于欧洲稳定条约的争论处在一个自 1990 年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发展轨道上，并且延长了这一轨道；它可以被看成一种加强了的新设置和改革的政治经济机制，使之确实能够完善欧洲资本主义自由化进程并长久保障其实施的尝试。尽管财政协定（Finanzpakt）是由于危机发生才直接导致其启动的，然而它实际上在更早前的时候就已经诞生，并且早就是欧洲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一项战略上的基础设施。这从另外一个事实中还可以得到印证：尽管财政条件作为对于三重金融和财政危机的政策解决手段被推向了市场，但正是因为它是作为一种长效机制，因此当前效果并不理想。

152

^① 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会详述。

在这里将对在危机发生后，欧洲理事会（Der Europäische Rat）以闪电般的速度讨论并通过的为数众多的新规则、新机制和新手段一一阐述，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所谓的欧洲马斯特里赫特稳定和增长协定的六法案（“Sixpack”）生效（2011年12月13日）和2012年3月2日签署欧洲财政协定之间3个月时间都不到。其他的不断超越上述协定的为欧洲机关制定的补充性规则修订（Höpner和Rödl, 2012），也在2012年夏天处在制订之中了。长久以来的趋势却始终是：

1. 必须服从成员国家的财政政策的规定变得越来越具体和细致。遵守这些规定被看作是享受欧洲“国家共同体”的救市措施的回报，并且特别出于“市场”方面的威胁，要求成员国必须愿意遵守这些规定，将公共的和私人的信贷风险共同体化。

2. 单个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屈从于更加尖锐的责任，必须进一步改革其经济、社会和法律秩序。比如它们都必须以德国为榜样，把“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n）写进自己的宪法。并且它们也需要找到方法来让自己国家的工资形成机制，适应由欧盟定义的宏观经济稳定目标，却往往因为出于这样的目的而让自身陷入一个“不断在改革中”干涉自己国家的机制，有时甚至还要针对国内民众的反抗，并且既不考虑工资形成的自制原则，也不考虑欧洲的能力秩序（Kompetenzordnung）。

3.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新规定机制放弃干涉每个成员国的自治。于是就缺少了关于最低征税标准的确定，用以防

止内部市场和货币联盟之中出现税收竞争。^① 这延续了欧洲货币联盟的传统，比如它的一致性标准和接受标准中没有任何关于可以容忍的最高失业率以及社会不公程度的表述。

4. 欧洲的机构组织，无论是已经成立的还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要成立的，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权利，监督和鉴定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和金融政策，甚至越来越多地可以在成员国，包括其议会做出决策之前。欧洲层面上首先起作用的是欧盟委员会，而欧洲理事会作为各个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成员国的代表却只以拥有一些否决权的形式退居二线。

5. 在欧洲层面，如果成员国没有遵守向它们提出的规定，将得到越来越高的惩罚措施。而做出这些措施所需要的程序越来越多地以司法的形态出现，并且自动生成，而无条件的政策性决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154

6. 国家和欧洲的那些用以规约成员国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规则体系往往都在制定时被赋予了一种永久性的特质，以致再次形成新的政治上的多数意见时，原则上仍然不能对其进行修改。

① 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对希腊的“救市”行动附加条件时几乎从来没有考虑救市行动与取消这个国家的船主不纳税规定，又或是防止富裕家族的财富向国外转移之间必须要有什么必然联系。就像 Grözinger (2012) 所说的那样，比如“希腊”……或可向美国学习以调整“它的国籍法和税法”，对其本国公民采取全球范围征税的制度，或者对于富人移民海外征收高额的“移民税”。除此之外，希腊还可以采用所谓的“双重征税协定，它可以专门针对那些富人在海外隐匿的也许是巨额的财产和收入”。然后没有人要求希腊做出上述任何哪怕一项措施，甚至作为反对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也完全没有提出类似的要求，作为希腊对于默克尔政府危机政策中给付的巨额援助的回报。

7. 最后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要求制定这样的规则，让布鲁塞尔的中央机构，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能够在个别成员国不遵守某项规定的时候能够为这些国家在替代选项上有所作为，或者在它们的立场上做出适应市场需要的决策。

这样的旅程最终要到何处去？这一问题在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延思·魏特曼（Jens Weidmann）于2012年6月14日在曼海姆的一次演讲中得到了清晰的回答。魏特曼直到前不久还一直是联邦总理默克尔最重要的经济智囊团成员。在这次演说中的显要位置他还提到：

当在某个国家出现了不能遵守财政预算规定时，国家的主权就会在那样的程度上让渡给欧洲，以便保证目标能够实现……可以想象的比如有能够增加税收和按比例缩减开支的权力，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提出上述要求。……在这样的框架下，整顿的道路就从欧洲层面施加了保障，尽管这些措施在各个相关国家的议会中可能并没有取得多数意见的支持。^①

2012年夏末，作为迄今为止在拯救共同货币的协商框架内达成的最重要协议的财政协定，仍然没有被所有的国家
155 确认。在很多成员国中，引发了对于欧盟希望通过国际范围有约束力的责任，让国家用节约的方法长期平衡其国家财政

① 这一讲话可以在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网页上查到，网址：[http://www.bundesbank.de/Redaktion/DE/Reden/2012_06_14_weidmann_rolle_geldpolitik.html](http://www.bundesbank.de/Redaktion/DE/Reden/2012/2012_06_14_weidmann_rolle_geldpolitik.html)，最后获取时间为2012年11月26日。

从而重新赢得“市场的信任”的政策抗议。无论是希腊还是意大利，作为“技术型领导”的政府首脑有能力打破本国民众对于要求他们做出的节约方案的抵抗。希腊甚至一度出现了左翼党派通过竞选上台的可能性，并以国家破产和退出欧元区的方式来威胁其他国家——后者就如同把某个成员国排除在货币联盟之外一样，都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随着奥朗德取代了萨科齐，欧洲范围内，特别是在负债国家中普遍出现了一个关于促进“经济增长”方案的讨论。然而这种方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却是未知的。鉴于在这样的语境中提出的建议的模糊性和财政上的无关紧要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人们纷纷宣告新的增长政策中，期待召唤出一个“解救之神”（Deus ex Machina），它的出现能够让所有的参与方都同样满意，从要求能够从贷款中稳定获益的债权人，到希腊和西班牙的中产阶级直至包括那些债务国家中对生活水平担忧的民众。可以想象的还有，新的增长方案，如果它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转化成了向南方的成员国输送的失败的资金补贴的形式的话，那么必须付出的代价则是，尽管这些国家仍然牢固地处于低生产水平的经济地位上，却不得不长期以失败者的姿态来迎合进一步开拓市场的胜利者们的需求。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就是一种实现哈耶克式的市场统治的补偿，补偿给那些对此一无所有的人。

156

体制转型：从凯恩斯到哈耶克

要想充分发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进行中的从凯恩斯主

义向哈耶克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的历史意义，人们不妨回忆一下新自由主义转型之初的状态。今天，那些曾经拥有独立央行的主权国家在开放了边境后，不得不有义务按照效益理论原则的规约制定经济政策，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经济体制下，国家拥有非常发达的行政手段体系，可以无条件地对国家的国民经济实施干预，特别是对劳动生产成果以及生活机遇的分配实施政策性干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际上“嵌入了自由主义”（Ruggie 1982）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还保有自己的货币，它们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使之发生贬值，从而寻求对由于内政原因，特别是对过于强大的工会以及共产主义政党做出让步，而不可避免地对在“外部竞争力”上遭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那个时代的国家可以向国内对于社会公正的需要做出让步，对市场需要进行扭曲，并不会受到外部经济的制裁。资本外流可以通过资本往来的监督加以制止，或者至少设置一些障碍；这就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投资者在争取最低利润率的谈判中的权力，在投资者看来，这应该是社会给予他们投资行为的一种回报。

157 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时代的重要机制是那些以阶级调和的方式机构化了的劳动和资本的利益团体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协商体系（Schmitter 和 Lehmbruch, 1979）。在这个基础之上，国家政治尝试着通过一个由三方充分协商了的收入以及可能情况下的价格政策来保障充分就业和对于广大劳工阶层能够接受的收入和财产分配体系。工资减少则是通过“政治交换”得来的，这种交换就是一个有能力的财税

国家在对于宏观经济和工会的合作的对抗措施中，借助于积极的社会政策来对此做出贡献，让那些依靠工资生活的人们有所保障，不至于在市场的 uncertainty——用危机理论的话语翻译一下，可以称之为：资本拥有者的情绪变化——面前无所适从，同时也可以稳定社会的有效需求。凯恩斯主义的国家为此需要强大的，广泛组织起来的工会，并且国家会给予它们多样的组织上的帮助。同样需要的还有充分发展的资方团体和经济协会，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和企业之间在面临国家和工会的压力时也会联起手来，对外代表自己并更加具有行动力的原因。这样一来，企业也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控制中对于民主政治在给自己设置限制时有参与建构的话语权。^①

新自由主义革命让这些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它的目标在于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做尽可能的裁减。从功能上，把国家缩减到更便于实现和发展市场，并从机制上让国家不再具有能够干预市场的自我调节并实现市场公正的能力。完全实现这一目标则只能是当进入欧洲的政治经济的国际化和国家体系，转型成为一个有着限制单个国家的民主，以及存在着多国组织起来的金融市场和监管机构的多层次统治的进程的时候——这种配置长期以来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理想的工具，它被用来调和面对自上而下的国家监督下由于扩张和私人合同自由而产生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目前为止，这一发展的最后阶段就是当下从国家层面的债务国家向国际层面

158

^① 对于新企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行方式的综述，见 Streeck (2006a)。

的整顿国家的过渡。伴随着这一进程，哈耶克式的关于自由化的，对政治压力免疫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正处在走向它完全实现的道路上。^①

作为欧洲多层次统治的整顿国家

公共财政的整顿和限制国家债务的政策需要让现代化国家的新的第二选民，即金融市场，带来更多信心，国家在它们的诉求和国民的诉求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会或者能够优先考虑它们的利益。一个拥有健康结构的国家财政预算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必须拥有足够储备，同时也有着机制上的灵活性。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一点，却并没有确定；虽然市场向国家要求很多确定性，但是却并不同等地给予国家一定的确定性。整顿的政治“驯兽”包括，国家把整顿国家财政全部纳入自己的工作之中，并期望有一天以此能够得到低利息的奖励，用贷款来平衡已经有的债务负担或者新的特定项目的贷款；然而国家的这种诉求无法用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这在一个“自由市场”当中也是不存在的。^②

① 从德国秩序政治角度来看，作为具体的乌托邦，参见 Matthes 和 Busch (2012)。

② 费尽心力评判并终于得以实现的为了在市场中重建信用的措施是否真的可以在市场中赢得信用，国家往往要到后来才知道——或者说，市场要到后来才会让决策者们知晓。人们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能从对于证券市场的影响或者说国债的风险溢酬看出。只是太多太多的事实表明，这些措施在初期短暂地取得效果之后，无论分析人士和基金管理者如何释放所有的“信号”，市场对于金钱和美言的饥饿需求又会随时卷土重来。

市场人民中的食利者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家人民中的退休者和公务员。一个对于市场来说具有可信度的整顿政策必须要限制其数量，同时也要缩减其诉求。首先，整顿政策就必须先介入那些被人们称为 60 年代和 70 年代政策遗产的东西，也即历史上，在财税国家失败之后超越了其承受限度的对社会权利的诉求（Rose 1990；Rose 和 Davies, 1994）。对于公共部门的缩减也意味着对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且一般来说总带有反公平的分配效应。缩减社会支出首先还必然会以更低的养老保险以及延长退休年限为结果；如果说前者可以通过养老保险的私立额外保险来平衡的话，它实际上如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一样，以利好的方式扩大了资本主义运营的企业活动领域。

这种“改革”都是政策上很困难的操作，也因为像之前提到的那样，需要缩减的国家公共开支部分来自那个时代许诺延迟发给工人的工资；当时，工人及其工会组织在社会民主的政府的要求下，出于整个经济稳定的考虑应允了减少工资。撕毁这种没有成文的隐性条约长期以来被认为对于一个经民主方式选举的，并且可以被选下台的政府来说风险过大；包括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也经历了从他们的前任那里接手过来的作为“不可移动的对象”存在的社会国家方案（Pierson 1994；1996；1998）。当 160

下的整顿政治家中广泛的对于施罗德的赞赏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当时力排众议，最终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总理职位，也要坚持实施“改革政策”，并部分地实现了它们。

尽管有这些例子，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并不能足够相信民主国家的内部政治可以成为结构性整顿的保障。因为在欧洲仍然不可能以经济理性的名义在一夜之间取消民族国家剩余的民主制度，特别是每个国家的政府仍然可能会被民主选举下台，一个可以选择的手段就是将民族国家纳入一个不民主的超国家的统治——一个无民主的国际的超国家——中来，并且让自己受到它的规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就渐渐被改装成一个这样的国际组织。今天，成员国家一体化进入一个可以对抗选举压力的封闭的超国家机构体系中，并且维系在一个共同的货币体系中，为的是取消作为国家市场社会中政治专断的最后一座堡垒的国家政治的主权。同时，特别是取消了在欧洲货币联盟框架内的贬值使得投资者特别是金融投资者不必再担心，当国家无法跟上国际竞争的步伐时采取突然的汇率适应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所以说，统一的货币也有助于实现市场公正。^①

161 国际整顿国家中的多层面政治通过把参与到其中的民族国家纳入超国家的，限制其各自主权的协议和规则体系中的方法来调解和协调各国的内政。一个经过了尝试的方法就是政府首脑之间的定期峰会，在峰会上通过来回磋商达成某种一致意见，并公开地向世人宣告，参与各方都有责任遵守，并且在各自的国家中即使遇到阻力也要促使其实现。那些在这项事务中失败的政府，在国际上就会失去他人的尊重。正是因为各国内部的阻力能在国内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① 关于贬值的问题，在尾声中有详细的论述。

并且就峰会形成的共识的新的磋商往往也容易变得毫无前途，所以说，机制化了的高峰会谈能够加强国家层面行政权的力量，从而对抗其议会和内部政治中的利益团体——这种效应在欧盟形成的早期就已经屡见效果了。在“市场”压力下召开的危机峰会则加强了这种效应，因为每个能够威胁到共同决策实施和执行前途的抵抗都被认为能够引发危险的“反应”；至少无论在政府还是在金融市场眼里，它都是一个不祥之兆。

然而，国家议会和反对党在峰会决议的压力面前也并非全无反抗，听天由命。近几年，各成员国中纷纷做出的使国家议会——这里要与所谓的欧洲议会区别开来——更多地参与到欧洲的共同决策中来的努力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国际层面也并非完全没有成果。特别是在危机发生以来，当议会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对于政府间形成的广泛的决议和法律草案仅仅在极短时间内就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并通过的时候，在一些国家，包括德国，都引发了抵触。特别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一直在努力地否定着布鲁塞尔的技术统治和市场及欧洲联邦国的信徒们共同宣传的理论：国家的民主机制在面对国际高峰外交做出的决策时除了全盘接受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此外，政府也能够在国家谈判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如果它能够在伙伴国家们面前证明自己有能力让某些决议在自己的国家内不被通过。^① 2012年8月，意大利总理蒙蒂对德国总理做出的警告——向议会表达，由欧洲政府层面做出的决

162

^① 关于多层面外交的复杂逻辑的形式分析，参见 Putnam (1993)。

议应该被尊重是各国政府的义务^①——表现了，间或出现的各国议会和司法对于欧洲政治权力吸收各国内政的抵抗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② 这种抵抗长远上是否能够奏效，又或是它能否阻止或者延缓通过国际整顿国家的进程，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21 世纪伊始的欧洲整顿国家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而是一个国际的产物——一个规约各个加入进来的民族国家的超越国家的统治，它没有民主责任机制的政府，却拥有有约束力的规则：以治理（Governance）代替政府（Government），用市场来驯化民主，而并不是用民主来改良市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历史上新型的结构机制，它可以保障在先前拥有主权的国家做到完全适应市场：这等于给单个国家的政治强制套上了一件适应市场的外套，这种权限从形式上看起来很像国际法中另外的新型的直索可能（Durchgriffsmöglichkeit），只是它不是一个保护的责任（duty to protect），而是一个支付的责任（duty to pay）。全部这些即将实现的东西的目的都在于经济的去政治化以及同时发生的政治去民主化。

① “每个政府都有义务去教育它们的议会。如果我当时非常机械地照着议会预先的规定来行事的话，那么我就根本不可能同意最近欧盟布鲁塞尔峰会的决议。”（《明镜》2012年8月6日对蒙蒂的采访，第46页）

② 作为布鲁塞尔前委员，蒙蒂一方面深谙通过国际外交来强化行政权力之道，同时，一国内部政治中抵抗力量的存在也有可能能够改善其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政府可以在某种边界之内做出选择，从哪个方向上去最优化地利用它们在国际多层次体系中的中间地位。因为在意大利，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往往会绕过议会，由总统的政令来统治国家，所以说，在蒙蒂看来，指出议会中存在反对声音而对抗布鲁塞尔的某些危机计划的行为更多不过是玩一些政治把戏罢了。

作为国家转型的财政整顿

作为对于财政危机的回应所采取的整顿欧洲国家财政的措施走向了一个由财政投资者和欧盟共同协调的欧洲国家体系转型的道路——欧洲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三十年经济自由化成果明确地写入新宪法之中。其目标就是，用双重机制化的手段来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约束在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市场公正之上：一方面是以写入宪法之中的“债务刹车”形式的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国际条约或者欧洲范围的责任实现的外来约束。人们希望实现的愿景是，国家被限制到一个能够保障顺畅地实现市场关系的水平，并且社会实现自我满足，它对于国家的要求就只有对财产权和自由权利的保障，那么相应的，它能给予国家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了。

当下欧洲所面临的前途就是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社会契约独特的内向性爆炸（Implosion）在向着遵守财政纪律约束的国际整顿国家的过渡。这就使得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起一道“长城”——用金融界的术语来说：防火墙——显得尤为重要了，有了它，市场如虎添翼，可以更好地阻止国家无条件的行政干预，从而实现自己对于公正的理解。这种规则所要求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对于经济上不平等有着极高宽容度的社会。那些已经脱钩了的过剩的民众必须明白，政治不过是中产阶级的游戏罢了，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对于世界的阐释和自我认同并不在于政治手段，而是来自利润丰厚的全球文化产业的造梦工厂。为了维持造梦的效应，甚至也要合理化其他行业的明星，特别是货币金融业的，所创造

164

出的惊天的价值，并拿这个来装点门面。同样，资本主义经济不断从民主制度发起的干预中摆脱出来，还需要大量有着清教徒思想的，信奉“效率公平”和竞争生存的中产阶级群众基础。中产阶级作为人力资源的拥有者，有着极高的在自身进取和子女教育方面投资的意愿，并且他们的消费标准如此之高，以至于公共物资在这个标准面前总是显得捉襟见肘（Streeck 2012a）。

如前所述，国际协商确定的整顿富裕民主国家财政的尝试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从这些尝试中不难推导出一些猜测：当下已经明确写入国家和欧洲法律中的未来整顿措施将会怎样，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第一波在很多国家中进行的财政整顿不同的是，那次的整顿还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而进行，它让几乎所有民众都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的贷款平衡停滞的甚至是减少的收入，以及国家对于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缩减。这样的补偿性方案在今天的金融危机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并且随着对于金融业的新规出台，这条道路已经几乎完全被堵死了。因此，当下面临着的向国际整顿国家的过渡不仅是处在了“市场”和国际组织施加的更为强大的压力之下进行，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麻醉药”。

目前的整顿进程在三个方面特别起到作用，对欧洲的国家体系以及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调整：

1. 如果说 2008 年以前的经验能够有点什么用处的话，那么对于国家财政的整顿只能少部分地通过更高的收入，但

是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只能通过更少的支出来进行。^① 在公共话语中，整顿似乎总是并且理所当然的是和缩减开支并列起来的。全球自由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使得对于高收入人群以及国际化运动中的企业营业额征收高税收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以致人们干脆都不去讨论它了。^② 增税政策实施起来就是逆近 15 年来的潮流而动（见图 3.1）。如果一定要强力推行，则必须要明确，这绝大部分只能局限在无法移动的税源上实现，比如社保方面的收入，消费税等。这意味着，对于历史发展而言，当下现代化国家宪法规定的支出水平根本不够用。同时，这样做也会导致，国家的财税体系会比现在更加倒退。

166

2. 国家社会支出的缩减首先波及的是那些低收入因而

① 在这里，经济学理论也给出相同的建议：“对支出做出适当调整时不会产生经济衰退的后果；相反，增税的政策总是能深刻和长期地产生经济增长的损失。经济能力对于基于支出和收入的适应政策的反应的差别最明显地反映在了需求之上，而需求的组成部分则是私人投资。投资者的信任……在支出减少的政策之后恢复的速度大大快于实施增加税收的政策之后。”（Alesina et al. 2012, 26）此外，上文的作者们还认为，“财税的稳定措施只有在伴随着结构性的标志着决定性的政策转向的改革的时候，才对经济能力的伤害最小”。在两种整顿的策略之间，“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不存在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关涉供给方面的改革的相伴随的措施以及自由化的目的”。

②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例外（Bach 2012）。据媒体消息，由新选举出的法国总统宣布针对富人的加税措施后不久就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准备工作以期逃避赋税。“咨询师、律师、会计师和地产经济表示，很多公司已经开始研究应对紧急事件的预案，并让高薪资的员工转移出法国，然而这些人却又严格保护其客户，闭口不谈他们的姓名。他们说，已经有很多高级行政人员和高薪员工选择了新的目的地国家，如英国、美国、比利时和瑞士，把税收收入带到这些国家去。”参见 2012 年 4 月 7 日《纽约时报》文章《计划对“富人”征收更多税收引发的严重消化不良反应》。

更依赖国家公共服务的人。此外，它还会让在公共领域就业的人员数大大缩减，从而加强了在那里支出的工资的压力。同时，就会有更新的私有化浪潮和工资剪刀差持续增长。这样一来，以前由国家统一提供的如健康和教育类的服务就越来越因被服务对象的购买力不同而差异化了。总的来说，国家支出的总量被削减，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取代国家作为分配生活机遇的机制的地位，并进一步加深和完善了自由化方案的实施，以及战后以来的福利国家的转型和解体。

167 3. 国家财政预算缩减还带来如下的后果：国家总支出中越来越大的份额被用于支付那些现有的责任性支出，其带来的弊端则是，国家不得不因此损伤其他新的用以应付变化了的社会问题而采取的方案和必要的开支（Streeck 2010）。^① 财政紧缩政策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伴随着对于服务的缩减而来的。但是，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人口的老龄化，往往会导致需要并有权享受国家公共社会服务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说，缩减服务有时候也表现为对于每个享受服务的个体来说服务令人不快的减少，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在总的开支上能够有所减少。

受到国家财政预算缩水影响极大的在有形基础设施以及国家在家庭、教育、科研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各种支出，所有这些都是无条件的（Streeck 和 Mertens, 2011）。

① 国家支出如果是出于政治或法律的原因而不能任意裁减的话，就应该被看作是必须支付的款项。这其中包括了国家人力资源成本，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国家债务偿本付息的支出。从根本上以及长期来看，国家开支，也包括法律规定的理所当然是立法者的意图（Streeck 和 Mertens, 2010）。

于是像在美国、瑞典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同步地观察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财政整顿的第一阶段公共投资，不仅是其占国家支出的比例，而且其占社会生产的比例也下降了（见图 3.2）。而那些公共投资增长的国家，比如在工党领导下的英国，那里的国家负债并没有减少，而是在逐年增多。国家赤字或曰国家负债同公共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存在于，当人们不考虑有形基础设施的支出，而只关注“社会”方面的投资，即国家在促进全社会的人力资源、社会和知识资本方面的支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德国这样一个 1981 年以来相应支出从约 8% 下降至 6.5% 的国家（见图 3.3），同时也发生在瑞典这样的传统上的社会投资大国，其衰退程度也从 13% 下降至 10%（见图 3.4，Streeck 和 Mertens，2011）。

168

这里表现出来的相关性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国家可以在马上就要到来的财政预算整顿的第二阶段中试图去回避整顿国家中公共支出系统硬化的机制，^① 并无论是否需要减少赤字，仍然坚持捍卫甚至是提高为了明天的社会投资。2008 年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项目的要求非常高。经验

① 这一机制可以这样描述：“公共预算中的赤字可以导致国家债务上升，而这又能给财税整顿增加压力。如果又要避免加税的话，那么就只能从缩减开支入手。这样一来，国家开支中任意部分的开支必然受到比法定开支更大的牵连。而公共投资是任意性开始，那么理所当然地在缩减国家开支的时候会缩小公共投资。显然，这不仅波及了传统上我们认为的那种投入实物基础设施中的投资，还包括那些被我们称为‘软’投资的东西，尽管从绝对的量上来看，这种投资并不非常大。如果说政府要，或者说必须得追求财税整顿的话，那么它只有在准备并且能够实现加税的情况下才能捍卫‘软性’投资，或者说在有非常好的理由的前提下甚至增加上述投资的规模（Streeck 和 Mertens，2011，第 2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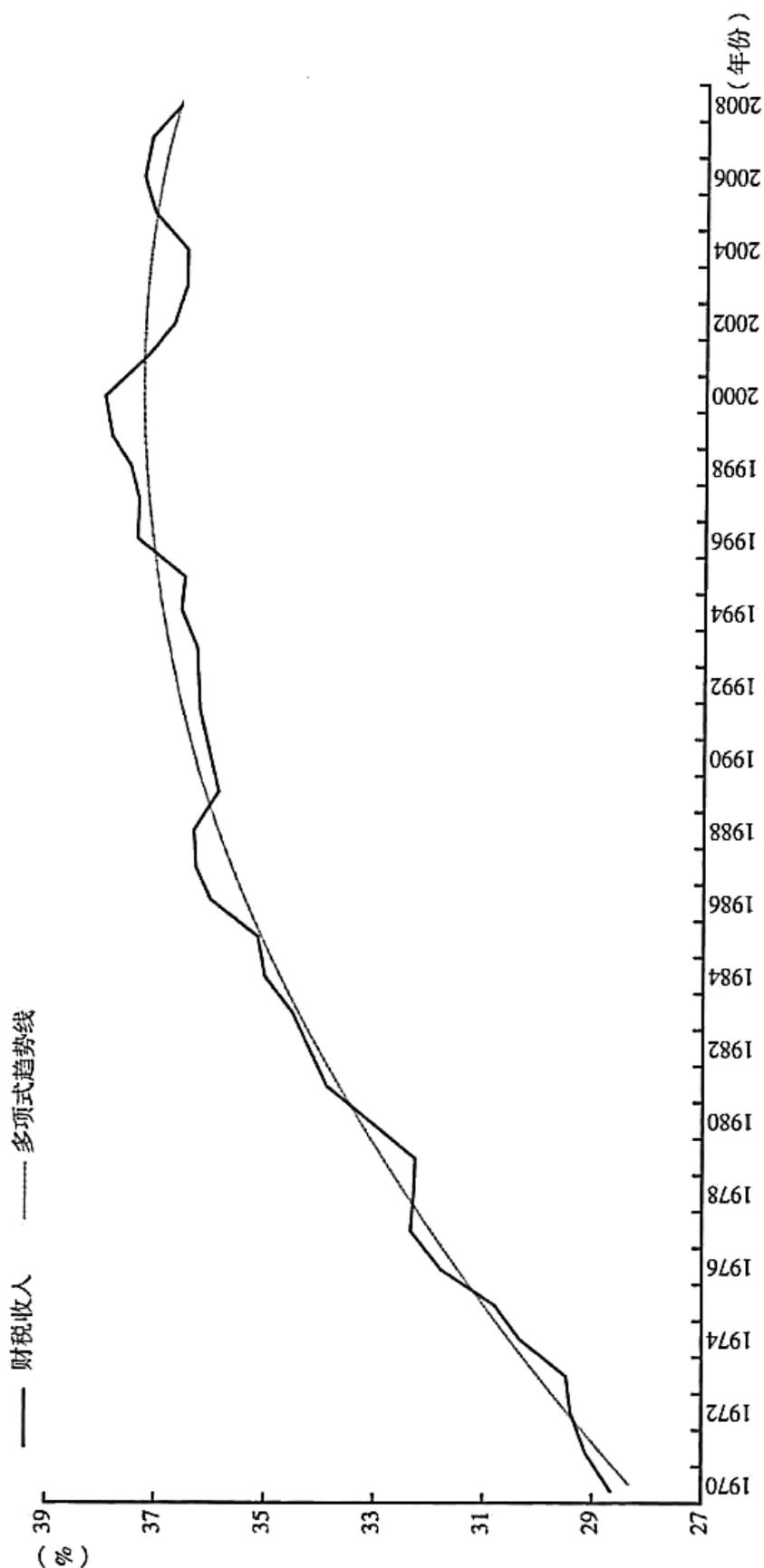


图 3.1 OECD 部分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70 ~ 2008 年

包括以下国家未加权平均值：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资料来源：收入统计：比较表格，OECD 税收统计资料数据库。

还告诉我们，财政的整顿有着很大的可能性会使社会对未来的保障更多地走向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转型和平行发生的越来越多的缩减公共开支的趋势中，整顿还将继续照顾不断老去的一代民众和选民团体传统上的利益诉求，直到传统上的福利国家渐渐地以自由的途径失去它的选民团体。^① 政治决策逐渐减少的自由空间和国家政治不断缩小的应对社会出现的新局面，为了社会和民众的未来做出预防性决策的可能性导致了政治期望的不断降低，这也伤及了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意愿。

170

整顿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从金融市场的压力中完全解放出来。在整顿国家中，尽管国家的财政预算每年都会有所结余，也仍然必须要贷款，因为国家的负债要慢慢还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仍然要通过新的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尽管人们一直在宣传整顿的时候一并许诺，国家可以通过整顿的方式慢慢从“市场”手中赢回自己的主权^②；但是，这一天即使真的有可能实现的话，也远在一个不可预期的未来。完全清

① 某种加速削减国家法定开支的方法可以这样得以实现：福利国家的人的生存条件是建立在“祖父辈制定的条款”之上，对于后出生的几代人已经无法再度实现或者说必须在那基础上大大缩减。这当然也提供了便利，好让人们转变观念，将高福利政策只视为一种老人们的优先地位。

② 这是20世纪90年代瑞典第二次金融危机严格整顿背后一个很强的动因。当时的瑞典财长约兰·佩尔松（Göran Persson）事后这样描述这件事情：“这关乎民主制度本身！为什么要选举出议会，但最终的决定却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做出？如果你自己没有全部能力去做出决定，为什么要去参加竞选？这根本就是侮辱……当我第一次去华尔街，试图贷款来为债务融资，那里我遇见的是一个由二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们组成的团队，他们都带着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这个外国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根本没有去过瑞典。他们根本完全不了解这个国家（Mehrtens 2013）！”



图 3.2 三国公共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81~2007 年

资料来源：OECD 教育一览；OECD 研发数据库；OECD 社会支出数据库；OECD 劳动力市场计划数据库；OECD 公共教育支出，成本和融资：1970~1988 年趋势分析；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分析。

偿债务需要国家财政预算连续几十年出现盈余为前提，并且还需要经济高速增长，并配以一定比例的通货膨胀。直到那一天实现之前，国家的政策始终要小心翼翼地保障其市场人民的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实现，国家政策稍有偏离原来的轨道就有可能面临债主们提高贷款利息的惩罚手段。^① 172

公共财政预算长期保持平衡的前提还当然是，税收的比例不能再降低。但这一点在整顿国家恰恰难以实现。美国从克林顿政府向布什政府的过渡时期的例子就显示，财政预算的盈余被当成了实施减税政策的理由，而当减税导致了新的赤字后，人们又开始通过新的缩减开支方案来对抗赤字，以期重新实现财政预算的盈余（Pierson 2001）。^② 缩减开支和

① 在实践中，如果一个国家开始力求并保持“国债刹车”的话，就必然已经因为国家预算中无法列支，而不得不去为公共投资寻求新的融资可能。这样一来，在整顿国家中就会有着广阔的适应所谓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市场。公共建设项目的贷款不再来源于国家，而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然后再由国家或者公民在长年的使用中不断向企业清偿这一贷款。这一组织模式的初期经验让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疑惑：政府和议会，特别是地方低层级的政府和议会，是否拥有足够的理解这种涉及成百上千个方方面面的，由国际律师事务所起草的合作合同文书，以及是否能够很好地去评估这其中的成本和风险。此外，也可以预期的是，咨询业和律师事务所由此可以寻找到有利可图的，对于公立机构来说花费巨大的业务机会。在这里建议去读一读德语版维基百科全书上关于公私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词条：http://de.wikipedia.org/wiki/Public_Private_Partnership，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26日。

② 今天，这甚至不需要去论证其合理性。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美国赤字达到峰值的2012年时仍然在竞选中向选民们许诺在绝不触动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的基础上于2015年开始推行幅度达456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见2012年8月11日《纽约时报》文章《一个违背数学定律的减税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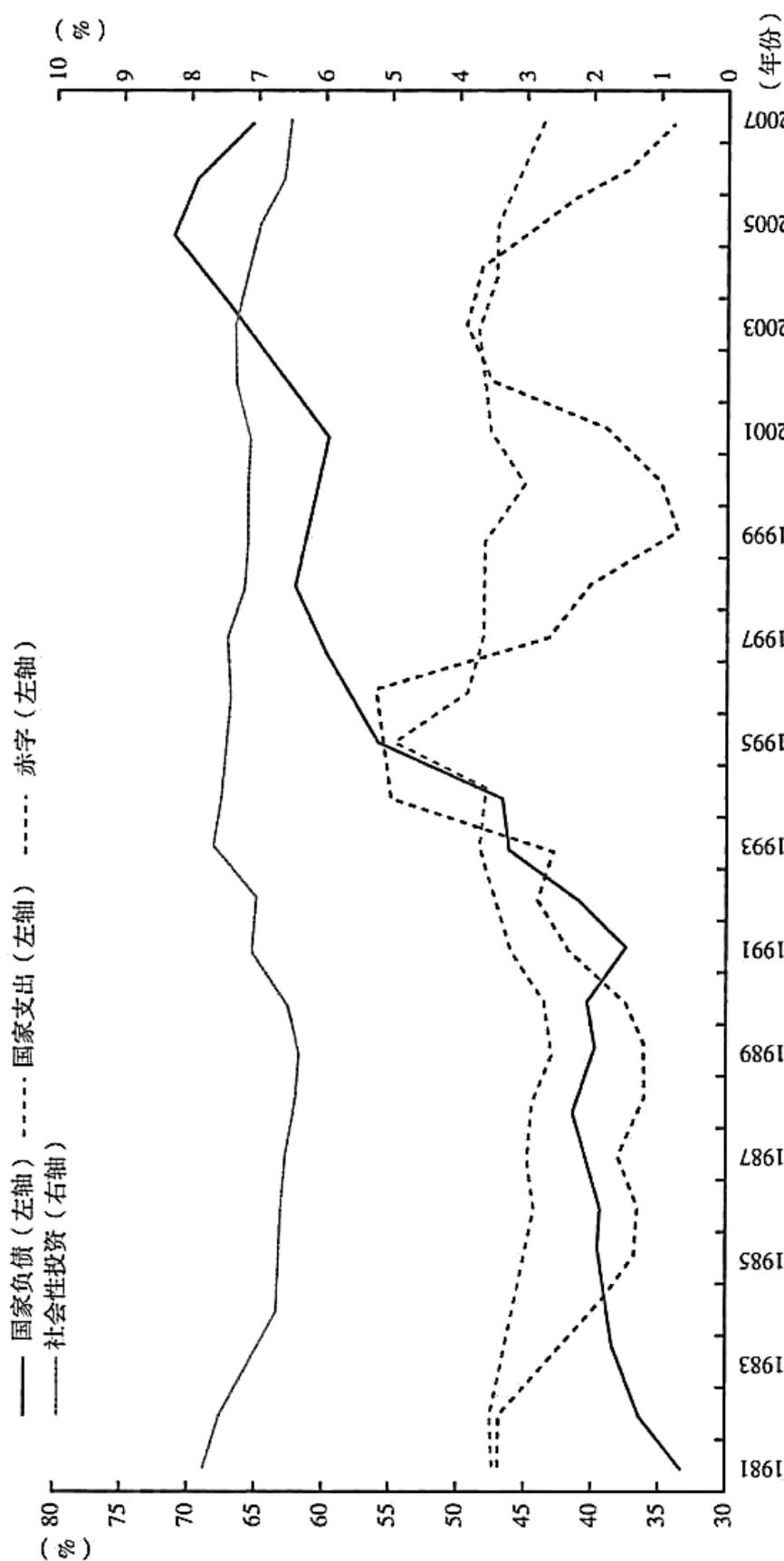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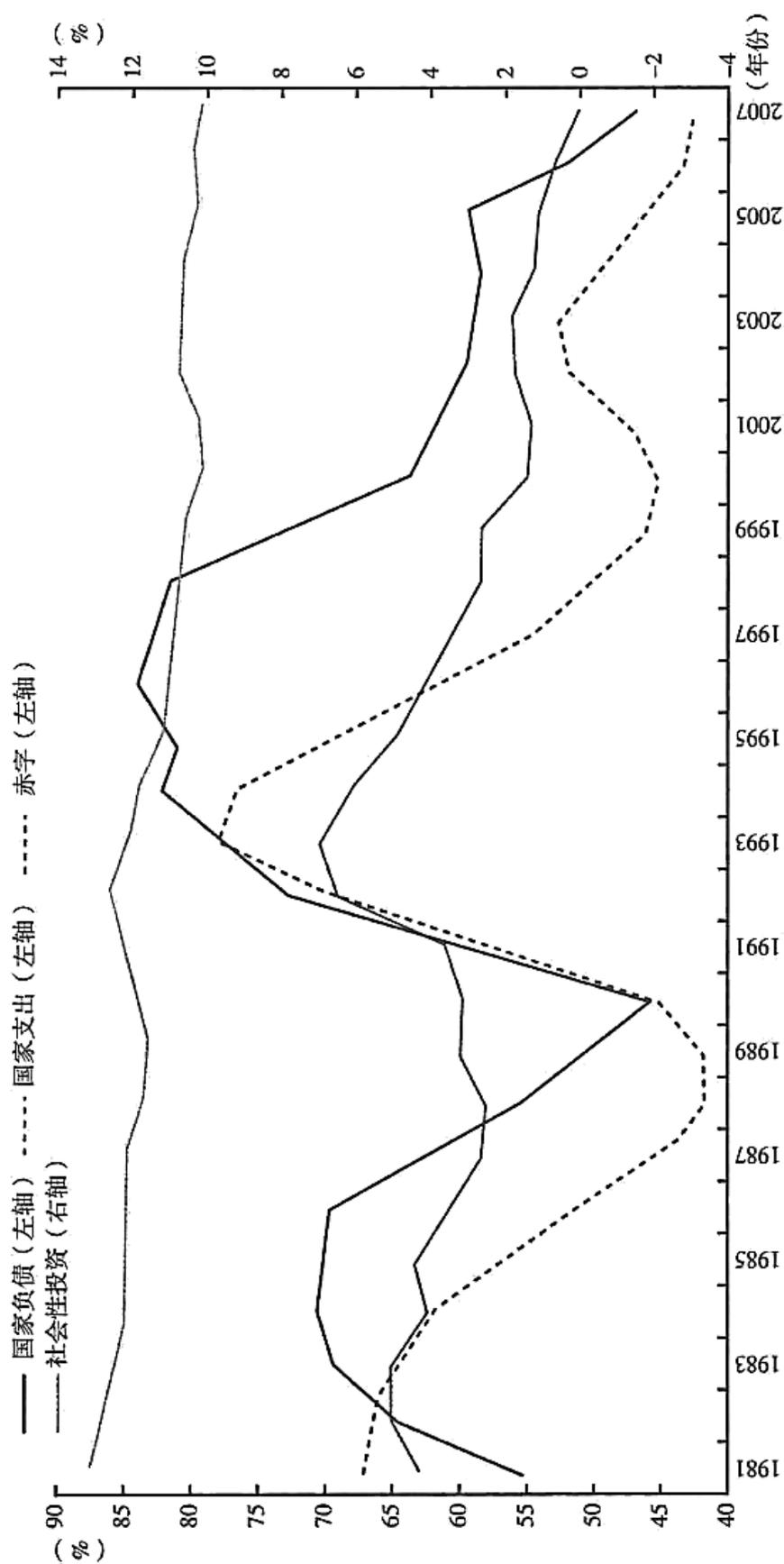


图 3.3 德国公共社会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国家赤字，1981~2007年

资料来源：OECD 教育一览；OECD 研发数据库；OECD 社会支出数据库；OECD 劳动市场计划数据库；OECD 公共教育支出，成本和融资：1970~1988 年趋势分析；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减税的这种游戏中，人们看到，整顿国家中对于国家财政 174
预算的整顿并不仅仅是为了整顿财政而进行的，其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全方位地缩小国家及其干预市场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去国家化和私有化方案中的一部分而已。在紧缩统治的先兆下，财政盈余给了人们契机，“把那些属于民众的东西归还给他们”（George W. Bush）。这样一来，整顿政策就变得越来越自我承担责任——特别是公民越来越少地能够期待国家为他们做些什么，而不得想办法来自己安排组织生活的时候，他们相应的就越来越没有缴纳税款的意愿。按此逻辑，缩减的开支会导致缩减的收入，而国家要想从负债局面中抽身逃离，就不得不要求继续缩减开支。由此导致的国家在国民经济中参与度的持续缩水是符合剩余国债的投资者的利益的：国民经济中税赋比例越低，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在紧急情况下短期内突然提高税率以满足债权人的利益诉求就越容易实现。^①

① 一个相类似的机制在原本有着极高社会民主化程度的国家瑞典正在运行着。如 Philip Mehrrens 在其科隆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指出的那样，瑞典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成功地克服了最后一次金融危机后就不断取得国家预算的盈余。2011 年当选的保守党政府利用这一情况，希望即使在良好的经济条件下仍然进一步缩减其国家债务。因为政府还要继续降低控制的水平，就必须同时也可以继续把危机后那几年推行的紧缩政策继续推行下去（Mehrens 2013）。因此政府宣布的，被广大选民广泛接受的缩减国债的目标被用来悄悄地推动瑞典这个原本高福利的国家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尽管国家预算已经长期处于结构性的盈余状态。



资料来源：OECD 教育一览；OECD 研发数据库；OECD 社会支出数据库；OECD 劳动市场计划数据库；OECD 公共教育支出，成本和融资：1970 ~ 1988 年趋势分析；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增长：回到未来

2008年危机开始以来，欧洲的政坛事件交替出现，很多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像民主选举的政府首脑如帕潘德里欧（Papandreou）和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被欧洲“国家共同体”派驻的金融经济代表换班就是以往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公众，如果说现在还存在的话，已经越来越跟不上事情的发展进程，并且也特别健忘。这对于政治来说再好不过，也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在2012年希腊和法国大选之后突然再次提出所谓的欧洲“经济增长方案”，且为了实现整顿而实行的紧缩政策则必须通过一个由公共或者私人贷款筹资的“增长”加以补充。

尽管只是极短时间，但欧洲危机政策的增长政策转向的原因，不仅因为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下台，同时也因为在希腊的选举中，激进左翼势力的不断做大，以及意大利国内不断增强的对蒙蒂政府政策的反抗。就连在德国，人们也开始对轮廓日渐明晰的整顿国家表现出了不满的情绪。在这个时候，把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增长许诺重新翻出来至少可以在短期内起到作用。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2012年6月，第一次在作为欧洲边缘的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希腊出现了一个不愿再对西欧中心负责的政府上台的可能性，并且它可能下定决心单方面宣布一切对外负债无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法国，当然德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把更多的财税收入投入暴露于希腊危机

177 的私立银行体系。宣布一个所谓的“增长一揽子方案”也可以说是让希腊人看到放弃赖账策略的好处，因为赖账策略在西欧国家的眼里就如同一次金融上的自杀式恐怖袭击。^①

由于政治上的左翼力量的压力在希腊第一次开辟了一个从货币联盟中抽身退出的现实可能性，它成功地抬高了西欧人一直以来致力于让希腊待在货币联盟中而愿意出的价码。现在，是否有任何东西作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通过的支出方案的结果增长了，是很令人怀疑的。事实上，人们许诺的新的增长政策和此前的老的方案比较起来一样的让人觉得很现实，并且到目前为止，关于为什么这个方案就一定会比前面的更有效果的严肃讨论从来也没有进行过。欧洲不仅为希腊，还为西班牙和葡萄牙设计的涉及很大范围的增长方案几十年前就早已有之——这从三个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赶走了他们各种的法西斯统治，并转而实行西式议会民主制度以来就有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欧盟以其各种结构和凝聚力基金（Struktur- und Kohäsionsfonds）为这三个地中海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大部分提供了资金，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利益交换的需要，防止三国走上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时，这在三国国内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同

① 这样一来，新的增长理论不仅对于紧缩政策——它让人们相信，如果按照其要求厉行节约，经济增长就是相应的奖励——的合法性需求，同时也对负债国家的政府希望取得来自布鲁塞尔的经济援助做出了反应。经济增长是解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分配冲突的保留药物。而法国新总统奥朗德特别培养了对于经济增长的期待，不这样，他也无法解释他所宣布的内部政策是如何同欧洲层面决策的整顿措施保持一致的。

时，西欧国家共同希望他们能够在经济和社会上与德国、法国和北意大利实现进一步的趋同。然而这一愿望离实现还有很漫长的等待，特别是当 20 世纪 90 年代时西欧援助的资金越来越少地流向这三个国家（见图 3.5）^①——不仅因为当时东欧出现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地中海三国不得不接受与他们分一杯羹的局面（见图 3.6）；另外，当时的德国也忙于“东部建设”；而且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富裕国家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进入了他们第一阶段的财政整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以极好地用在 20 世纪 90 年代民族国家内部政治中的“私有化的凯恩斯主义”（Crouch 2009）在外部政治的等效物上来描写：通过改善贷款的机会来取代款项划拨，只是这一次运用在了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而非用在国家内部领域。在引入欧元货币时，作为对于 1990 年两德统一时法国投了赞成票的一种回报，德国很早就已经决定，三个相对较弱的地中海国家可以成为货币联盟的成员国，作为一种增长和与西欧趋同的方案。同时，有保障地允许它们进入西欧市场，同时为外国投资者排除了货币风险可以给三国的国民经济带来迅速的繁荣。首先，在货币联盟之前，三国用于应对其财政赤字和偿还国家债务应付的贷款利息就迅速下降，直到正式的货币联盟开始时就实际已经降到了德国的水平（见图 3.7）。这只能这样解释，即

① 意大利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成员国之一，早期得到了布鲁塞尔地区基金中绝大部分的经费来发展其南部经济。当国内经济情况好转后，意大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之于欧盟的收支情况就已经基本持平了。

“市场”对此抱有希望并信任的理由在于，当支付不能的情况出现时，整个货币联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介入进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贷款利息上给予了一致性原则，虽然这种利息的一致大大超越了人们期望的经济能力所能达到的一致。^①

欧盟国家间的福利国家体系是如何一步步私有化的，可以从希腊这个案例上极好地体现出来（见图 3.8）。希腊 1981 年加入欧共体，2001 年以来成为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西欧国家要吸收希腊进入货币联盟的目的日益明朗，该国用于清偿债务的利率五年内从 17% 下降到不到 6%。同时，西欧国家向希腊的净支付从占社会生产总值的 4% 下降到只有 2%，很明显就是希望希腊能够利用资本市场来自行填补资金的空缺。在进入货币联盟之前，希腊成功地在极短时间内将财政预算赤字从社会生产总值的 9% 降低到 3%，这样一来至少达到了加入联盟的两项标准中的一项。当希腊进入货币联盟，可以以更优惠的条件取得贷款填补公共开支的漏洞时，财政预算的赤字又重新快速增长，并且在 2008 年时高于 1995 年的水平。由于极低的利率（Zinssatz），利息分配额（Zinsquote）——债务还本付

180

① 低利息水平上的利息一致使得诸如希腊和葡萄牙等国家也有可能高额负债。而利息一致的原则曾经也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大力支持。20 世纪 90 年代末，欧盟委员会允许欧洲的银行将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的债券在所谓的销售和回购协议业务中作为抵押来使用，并且所有国家同等对待，还可以跨越国境使用（Gabor 2012）。这让经济上较弱的国家也可以以它们来说极为优惠的条件获取贷款。当时那个负责新规则的欧盟委员分管欧洲内部市场和“金融服务”，他的名字叫马里奥·蒙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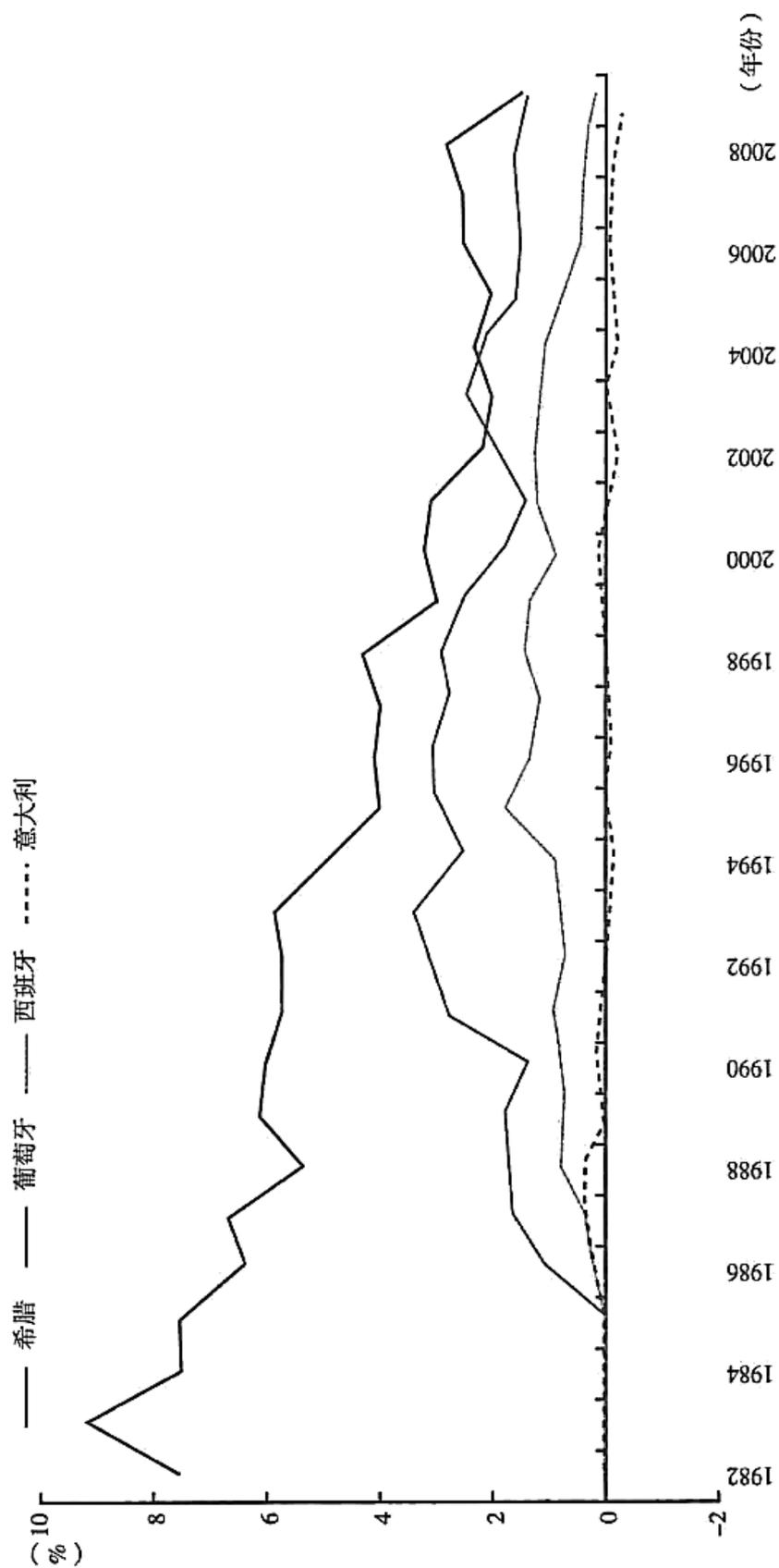


图 3.5 欧盟净支付占四个接受援助国国民收入的百分比，1982 ~ 2009 年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欧盟预算财政报告；OECD 国民经济核算统计，自主做出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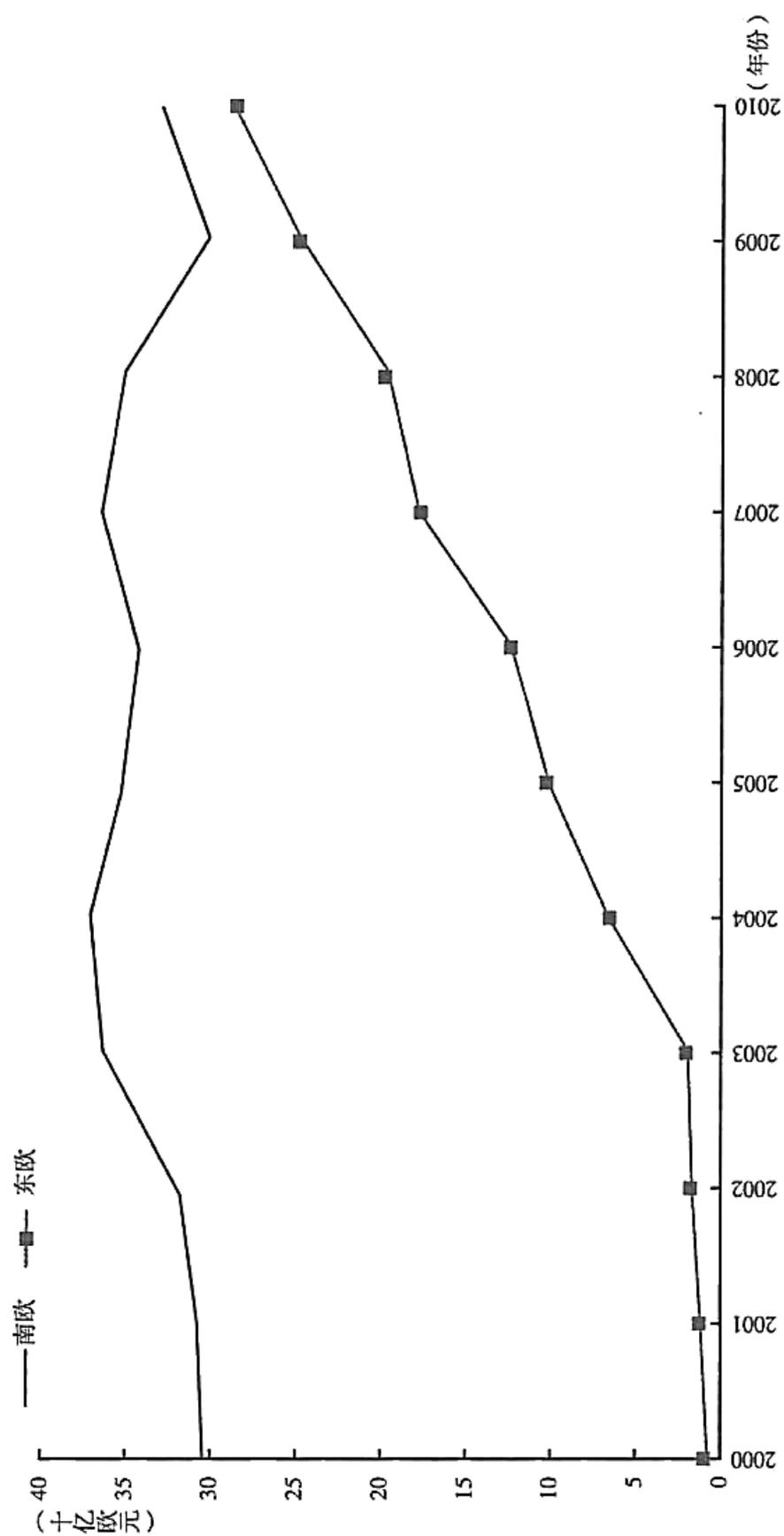


图 3.6 欧盟向南欧及东欧国家的毛支出，2000 ~ 2010 年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2010 年欧盟预算 - 财政报告。

息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仍然继续降低，在进入货币联盟时，国家负债大约在 100%，起先也只是逐渐地缓慢增长。2008 年后，赤字和利率快速增长，同时加快涨幅的还有利息分配额和国家债务。到目前为止，希腊作为货币联盟的成员国，最后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比 1995 年时的水平还多的，占年经济总量 60% 的公共负债。

在欧元短暂的繁荣期中，希腊和葡萄牙起初几乎可以任意地通过低息贷款来弥补来自布鲁塞尔的援助款项的缩减。^① 2008 年后，人们才以很痛苦的方式发现，这些年来巨大的资金流绝大部分吹起了一个泡沫，它看起来虽然像是增长，但实际上并不是——所以当世界金融体系发生危机时，情况就非常明显了：低息贷款的资金流中断，这些国家的财政以及一些大企业就因此无法清偿债务了。

公众关于金融和财政危机的讨论中，关于在各个民族国家、欧盟、欧洲央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察机构中是否真的根本没有人事先觉察到这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事情的问题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被边缘化。当希腊不得不想方设法掩饰其债台高筑的事实，从而加入货币联盟中时，以及后来又开始用新的低息贷款来大幅举债时，众所周知，美国的高盛（Goldman Sachs）投资银行——就像它惯常的那样，以收取极高的费用为回报——帮

① 在西班牙，负债的不是国家，而是私有领域。由于政府推行了一个强有力的信贷业自由化改革，西班牙的银行像希腊这个国家一样以便宜的贷款来供养自己。

182 助了希腊美化其账面。^① 情况看起来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网络化的”国际金融社区内居然会对此完全没有预料。希腊央行主席在当时还是经济学家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kas Papademos）。任期满后，他被擢升为欧洲央行的副行长（并且于2011年，如众人所知，成了希腊的总理，作为一个来自外部，远离政坛的“专家型领导”，他的任务就是实施“改革”，保证国家对于债权人拥有支付能力）。人们是不是应该相信，当他来到法兰克福以后就与自己的国家完全失去了任何联系，以致他根本就不知道希腊实际所面临的债务状况？大概就在帕帕季莫斯来到欧洲央行的时候，高盛公司负责欧洲业务的副主席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升任总部设于欧洲央行机关内的意大利央行行长。与其说换个工作地点就让他们患上间歇性失忆症的话，还不如说政治和高端金融业之间都对这种统一货币联盟内用一国举债来代替国家间款项划拨的方式过于满意而对此默许放任：一方面政治在财政预算方面的自由空间已经被压榨殆尽，另一方面金融业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并且他们也有理由相信，最终，当这个编织起来的网要撕裂时，富裕的成员国会为穷国欠下的债务买单，以保证欧洲和美国的银

① 见2012年3月6日彭博社（Bloomberg）题为《高盛秘密希腊贷款客户浮出水面，显示为两个罪人》的文章。文章开头这样写道：“希腊从高盛的秘密贷款从开始就是个错误。在2001年签订合同的当天，政府欠银行的钱只比借到手的28亿欧元多6亿欧元（约合7.93亿美元），2005年接管希腊国家债务局的斯皮罗斯·帕帕尼科拉欧（Spyros Papanikolaou）如是说。而到了交易时的价格，一个衍生的变相贷款——高盛也成功说服希腊不去测试其他竞争对手——几乎增长了一倍，达到51亿欧元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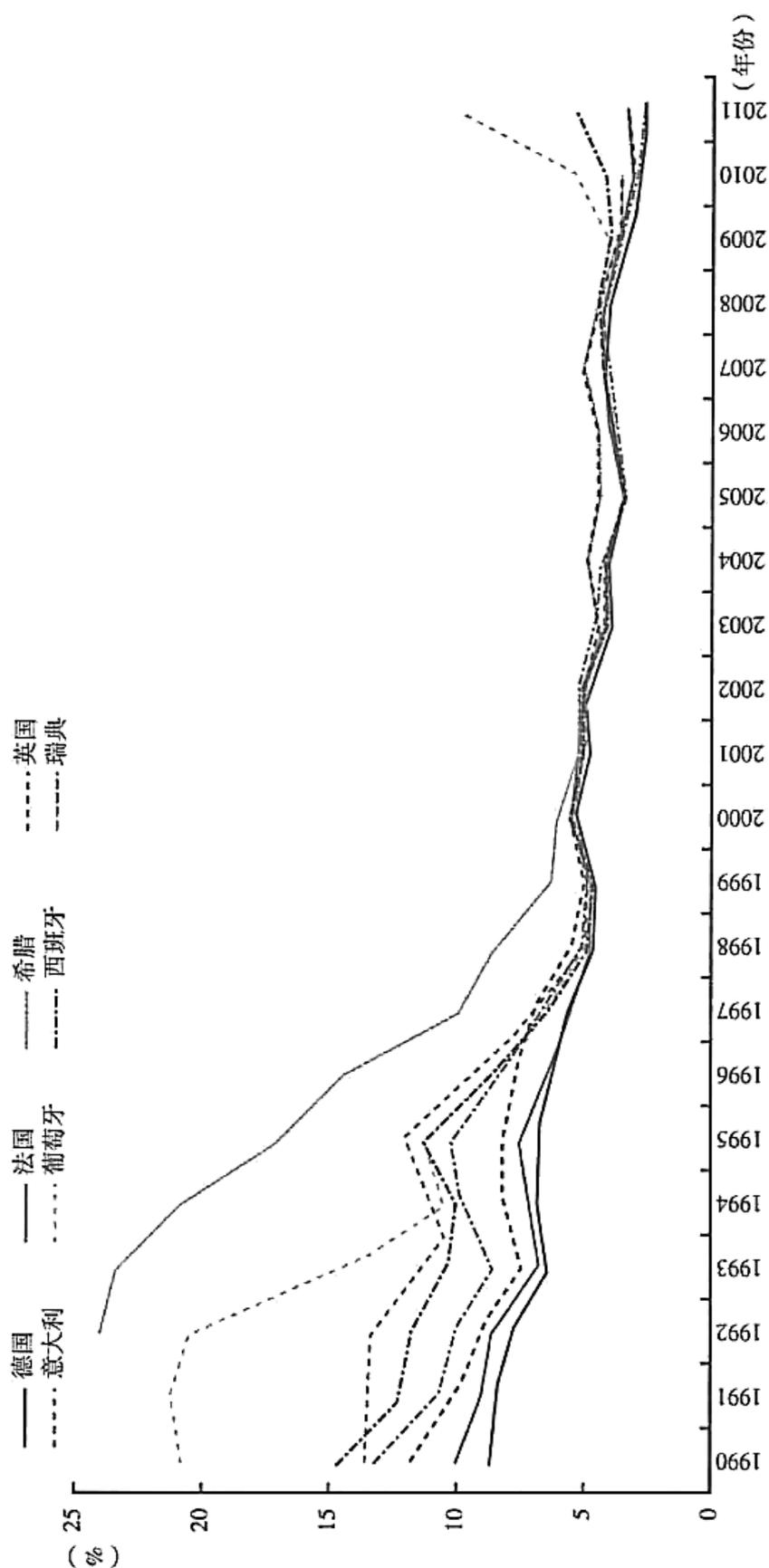


图 3.7 部分欧洲国家的国家贷款利率，1990 ~ 2011 年

资料来源：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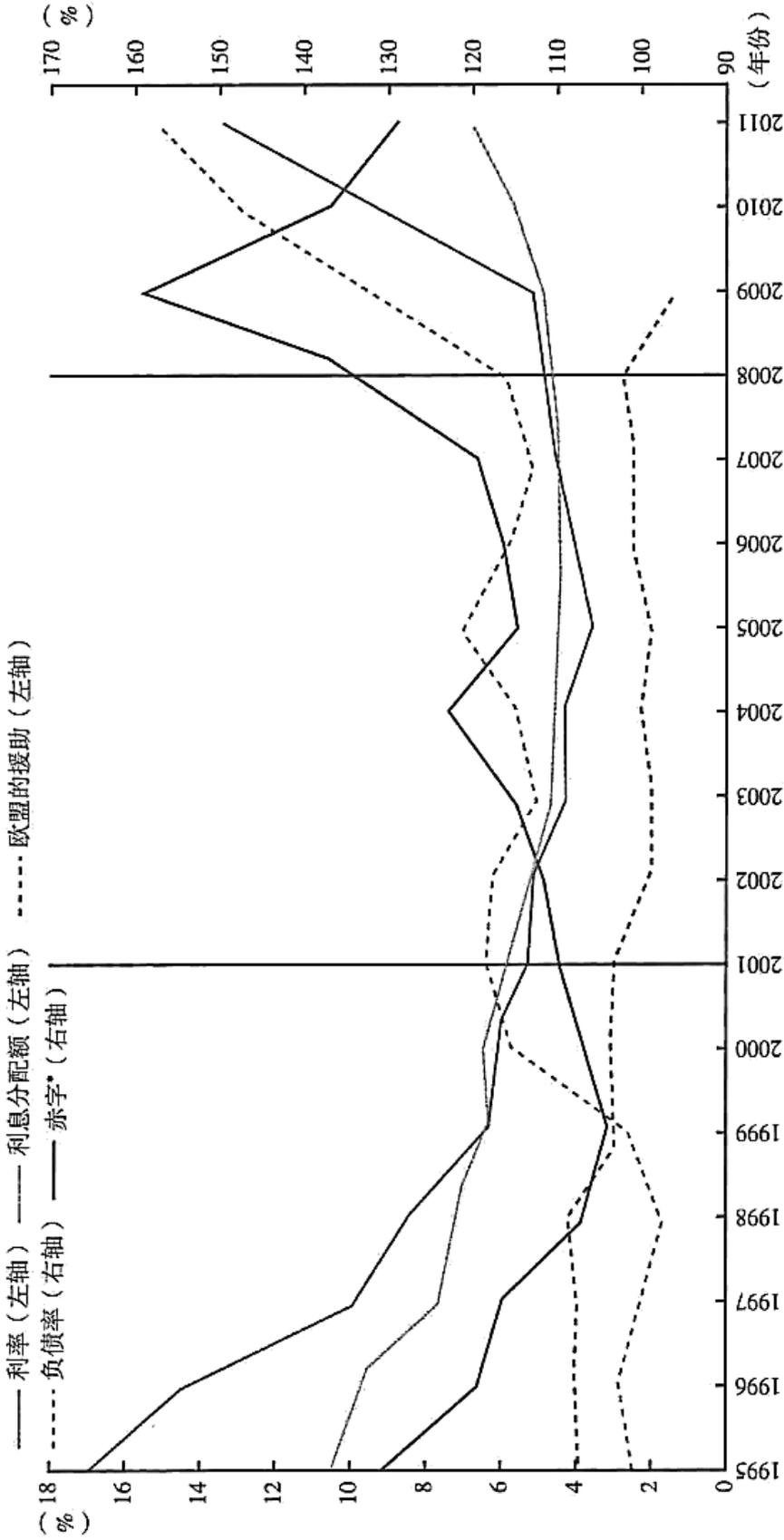


图 3.8 希腊：货币联盟和国家财政

* 原书“赤字”未标注对应右纵轴，但编者及译者认为应对应右纵轴，故放到第二排。
资料来源：欧盟预算财政报告；OECD 国民经济预算统计；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行毫发无损。

184

回顾一下危机爆发前的经验，我们不难看出 2012 年希腊和法国大选后被临时提到欧洲的议事日程上来的所谓“增长方案”不过是个象征性的政治手段罢了。^① 所有参与做出这些决策的人士都知道或者都应当知道，欧洲中心国家今天能够用于支持“经济增长”的财政自由空间已经不同程度地比 20 世纪 90 年代更加吃紧，而能够从资本市场中获得的贷款也不像 21 世纪初那几年那样容易。如果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欧洲边缘国家都只不过是刺激起了假性经济增长的话，那么今天又能有什么新的作为呢？2012 年夏天提到人们面前的所有用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中唯一一个能够起到一定效果的是帮助法国政府挽回一丝颜面，并给那些边缘国家们尚存一些能够得到新的资助的希望。尽管这些钱杯水车薪，但至少能够养活国家机器，并且给他们的当事人一份这样或者那样的委托合同。^②

185

① 在这里，我故意不去关注基本问题，即增长是否还能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关于这一点，参见 Miegel (2010)。

② 关于 2012 年夏季的决议，参见 6 月 27 日《明镜》网络版，标题为“EU - Wachstumsrhetorik: Der Mogelpakt”的文章。文章指出“增长方案”与财税方案不同，并不是法定具有约束力的合同，而只是由欧盟 27 国首脑峰会声明的一份附件。“然而官方却一直仍然提及所谓的‘关于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方案’。这样一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它似乎和财税方案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该方案表明，各国政府需要拿出 1300 亿欧元用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个数字已经包括了为 2013 年计划的 550 亿结构基金（它将会流向所有的相对贫困的欧盟国家）以及来自同样的一批基金的 2012 年度仍然未支付的剩余额度。未经进一步的阐述，决议认为，这些经费需要用于能够更有效地支持（转下页注）

此外，在统一的欧洲起作用的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说：唯一的名副其实的“增长政策”就是要消除一切各种形式的限制市场和竞争的机制和机构设置，无论它是卡特尔、商会、工会、出租车协会（Taxiinnung）^①，最低工资标准或是保护劳动者条例。唯有这一点无论以往还是现在都意味着——并且当今天的债权国要求债务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时，越发觉得这一论断实际上是切中要害的——所谓的促进增长的措施从一开始就是整顿政策的一部分。放松管制作为一种增长方案有着无比巨大的政策优势，因为没有人会真正相信这样的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引发奇迹的出现——并且当长时间都没有任何奇迹出现的时候，人们依然可以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用剂量不够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现象。与此同时，为了让患者在被喂服苦药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平静，就要尽可能地把民主制度从国家中抽离出去，用“专家政府”来取代它。必要的时候，人们还可以给按照增长方案通过象征性的货币奖励来赋予放松管制一个人的面孔。正因为放松管制政策——当然人们需要忽略因此而可能变得更必要的

（接上页注②）经济增长的地方。另外的600亿欧元则要分四年作为额外的贷款由欧洲投资银行向负债国家的公私合作模式发放。但是，也许也是因为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过高的亏损风险，一直没有很好的项目。最终，可以从欧盟的预算来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贷款提供上限为180亿欧元的担保；但这样的项目到目前为止也不存在。没有任何新的资金用到了任何一个地方。

① 出租车协会至少在理论上是一种布鲁塞尔作为破产管理人安排的如帕帕季莫斯和蒙蒂这样的“专家”尤为推崇的放松管制的产物。在罗马或者是雅典，比较低廉的出租车价格是否能够地中海区域的国家带来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警察行动的成本——不花一分钱，因此它非常好地能够适应当前的金融和财政危机的形势。在今天这种状况下，特别是它即使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增长效应，而只是在债务国家的表观意义上得以实现，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能够对增强“市场”的信心起到积极作用。金融市场看到了它们想看到的国家在针对其国家人民时的行动能力。

186

外篇：地区增长方案

欧盟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向地中海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输送了那么多的财政援助，这些资金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少了，但为什么却仍然没能在这些地区形成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呢？技术管理的行话上讲的“促进”（Ankurbeln）那些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但就是相对发展滞后的经济的行为总是会忽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经济的增长不仅有机制上的条件，同时也是有着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的要求，因此，它往往根本不是说促进就能促进，而且根本不是通过政府的决定就一定能够实现的。当国家或者政府对于某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实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案时，总是会使用诸如工资成本补贴、兴办企业补贴、投资帮助、特别折扣、赋税减免、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一些手段。上述所有的这些方式都作为一种代价非常大的国家干预手段出现，然后从它们所宣称需要达到的目标来看，即使能够实现，也是在长期上才有可能。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意大利南部地区（Mezzogiorno），另外一个则是 1990 年后德国的新联邦州。^①

^① 东德解体后，除了东柏林以外的地区分为 5 个州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被称为新联邦州。——译者注

南意大利的情况是，无论是意大利还是欧共体，在战后就为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却并未实现意大利南北地区在发展差距上可持续性的减小。20世纪50年代初，南意大利的人均收入^①是整个意大利平均水平的一半还不到，20世纪70年代，战后经济增长末期时，南北收入水平的差距已经缩小到大约只占平均收入水平的33%（见图3.9）。接下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上升到了约45%。直到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末期时，又缓慢地减少到了大约只占平均收入41%的水平。^②

在社会学的文献中，意大利南部看起来不可抑制的经济落后是由于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其中包括当地权力精英的传统势力。他们也担心，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会慢慢失去他们在当地的统治地位。按照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要有一个在其日常行动中以四个基本原则为导向的社会秩序。这四个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个以字母C开头的英语单词，即竞争（competition）、创造性（creativity）、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信用（credit）（Beckert 2012）。标准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区别就

① 整个意大利南部地区包括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以及阿布鲁佐、莫利塞、坎帕尼亚、巴西利卡塔、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地区。

② 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地下经济非常广泛地存在着。广泛存在的地下经济意味着很低的可统治性。这种低可统治性不仅体现在税收上，也体现在很难对于国家援助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

在于，前者把这样一种出于人的信仰的行为导向看成是对于所有人普遍适用的，并以此为分析的出发点。^① 这让经济学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像南意大利那样的社会会在如此之多的通往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促进”措施下仍然能够无动于衷，以及为什么引入了诸如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这样的现代化机制后仍然不足以推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188

意大利作为国家以及欧洲作为国家共同体为了南意大利的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家消除内部差距究竟投入了多少，恐怕连专家们也无法给出答案，因为计算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且有关部门在此期间也在不断改革。^② 最容易得到的估算方法是看对于南部地区的净划拨款项占意大利的社会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目前占4%左右，20世纪80年代末最高峰时占到约5%，而在20世纪末的第一次公共财政整顿风潮中，援助金额一度下降到3.4%的水平（见图3.9）。^③ 尽管提供了如此可观的资金，南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地区发展方案如何因

① 对于标准经济学理论来说，经济人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以及所有的个体之中，它只是等待时机表现出来而已。然而由于社会可能会处在一种低生产力的平衡状态中，因此标准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必要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公权的强力来强行打破这种平衡或者强行推动社会的变革。

② 于是1992年时意大利政府南方基金会（Cassa per il mezzogiorno），一个用于南部地区发展的特别基金，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税收的减免政策。国家基础建设投资，对于特定行业的补贴，对于私人企业的投资补贴和免税政策交替出现。此外还不断有新的欧洲发展促进计划。

③ 在计算意大利净划拨款项上，作者得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教授卡洛·特里吉里亚（Carlo Trigilia）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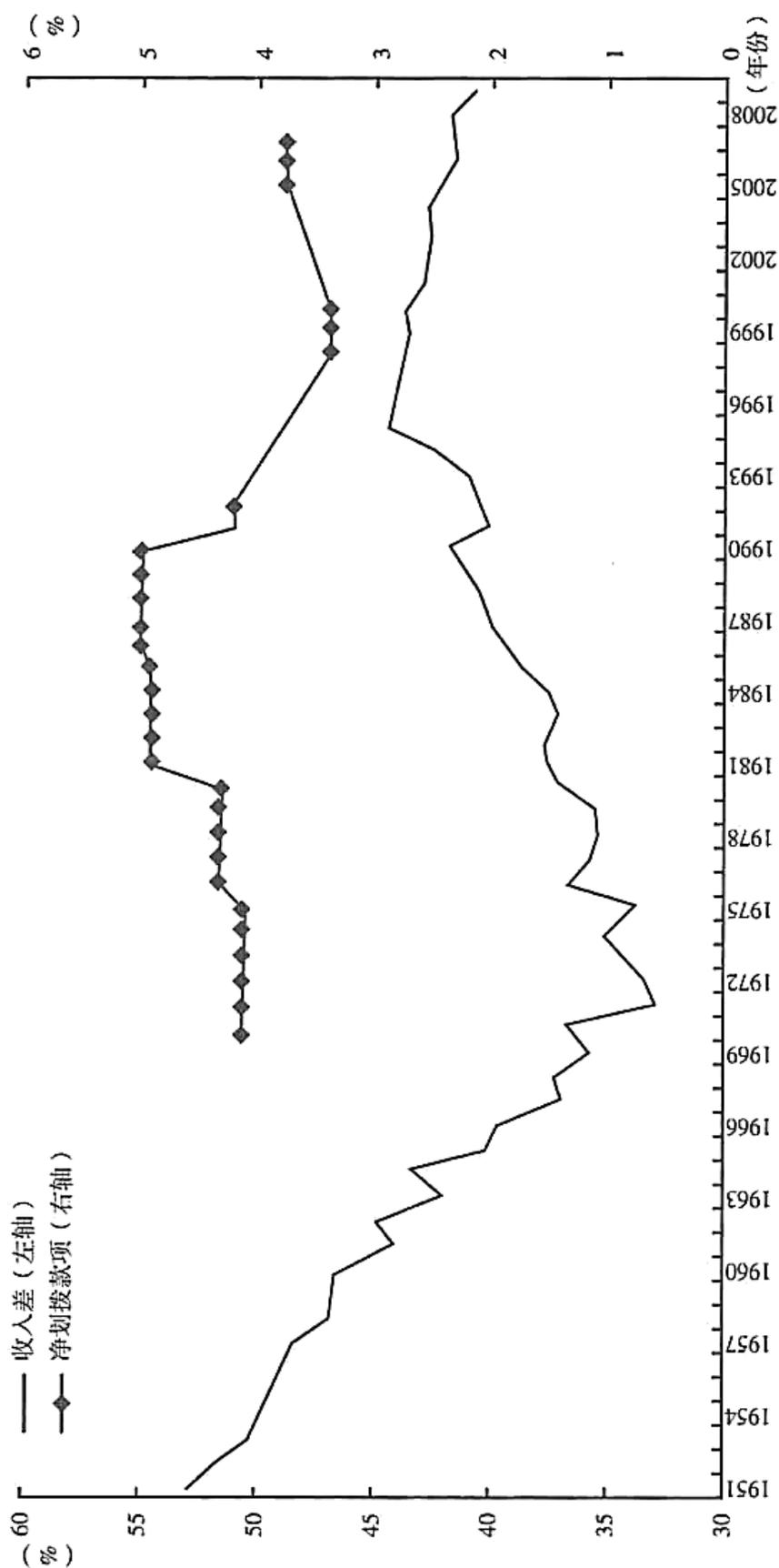


图 3.9 意大利对南部地区的净划拨款项和收入差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51~2008 年

资料来源：Vittorio Daniele, Paolo Malanima (2007)：II prodotto delle regioni e il divario Nord - Sud in Italia (1861 - 2004)，*Rivista di Politica Economica*, S. 267 - 316；Istat。

为政治和社会的原因难以实施的典型反面教材。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有排斥了中央政府的地区的权力结构的发展帮助，并竭尽全力地巩固本地区传统的权力统治结构的共识。同时，意大利中央政府中起支柱作用的党派，如天主教民主党，也慢慢了解到，他们可以把本来应该用于帮助地区发展的国家支出用来进行政治交易，比如用于购买选票。无 190 偿的长期划拨给南方的款项一直以来为北方人民所容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逐步在意大利实现相同的生活水平是左派的要求，同时也被看成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事务，更是国家团结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意大利的这项地区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欧盟的鼎力支持。^① 当欧盟的支持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不再继续后，公共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他们注意到，为了南部地方“发展”所花费的大量金钱最终也没有能够阻止意大利南北差距在最近十年内继续拉大的事实。在此之后，对于进一步的援助措施的反对声音就越来越大。在意大利国内，最明显的表达就是脱离主义倾向的地区性政党意大利北部同盟（Lega Nord）的崛起。

意大利的例子告诉我们的，被货币联盟作为手段应用的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政策必须要解决的两个相互间密切联系

^① 在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协商中，意大利坚持要求欧共同体能够部分承担其供养南部地区的费用。如果没有当时意大利政府做出的对南部地区大力的财政支持，那么在意大利政府的眼中，是无法保障国家维系在一起的，并且无法形成在罗马的基督教民主政府在议会中的多数。这一案例说明了，欧洲一体化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消除每个参与到其中的民族国家，相反，它让这些国家变得更加稳定（Milward 1992）。

191 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出于促进经济发展而投入的资金要能够保证带动起一项增长，同时这项增长还要能够产生盈余。换言之，就是这些钱要用在投资而不是消费上，尽管在单个的案例中也很难具体分清。那些筹集资金施以援手的地区是否愿意这样做，以及是否表现出团结的姿态取决于，那些被帮助地方是否存在有朝一日终能解决地区政策的效益问题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则是必须厘清谁来监督增长帮助方案经费的使用，以及这种监督职能在实施援助方和受助方之间——说得更宽泛一些，就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分配。过多地把监督权交给地方，可能会导致援助款项只用于消费而非投资；但如果过多地由中央来实施监管，则有可能会导致扶助项目忽略地方的区域特色。所以这里要解决的是个可管理性的问题。重要的因素包括：地方国家机关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构成，它们在机制上与中央连接的方式，地方社会结构以及中央对地方支持的政治依赖性。

谈到德国的情况，首先要提的是，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初，常常有人会担心从前东德过来的那些“新联邦州”会成为德国的“南意大利”。在此后的20年中，德国政府花了大量的金钱，以谋求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生活水平和竞争力方面趋于平衡。也是出于这种原因，人们怀疑援助的款项会更多地用于消费而非投资。1994年年初，东部和西部的地方的收入差从开始的大约占全国平均收入的60%降至33%左右（见图3.10）。接着德国又用了15年时间，使得这一数字又下降了6个百分点。伴

随的却是每年数额巨大的款项划拨，1995年到2003年拨款从社会生产总值的2.8%上升到了约4%，接着又下降到不到3%。2012年，这一比例大约为3.3%，也就是说，这比意大利的水平低约半个百分点。德国新联邦州中的人口只占全德国人口的20%稍强，而南意大利地区的人口比例则一直以来在35%。所以说，在德国，不仅人们更容易筹措到这样一笔款项，同时，享受这一优惠政策的人也更少。换算一下的话，意大利南部要得到占社会生产总值6%~7%的援助，才能达到和德国水平相同的效果。

192

尽管德国与意大利的情况不太一样，富裕和贫穷地区的差距确实明显的缩小了（在意大利，危机爆发时收入差距相当于1990年的水平，约为41%，是德国的1.5倍），但是仍然不能认为差距被填补上了。因此，联邦德国政府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仍然要坚持征收自统一以来的“团结特别税”，更不用说，德国在国内贫富地区分化中有着比意大利更有利的人口比例分配。^① 尽管施以数量巨大的援助，前东德地区的经济落后仍然挥之不去的局面相比南意大利的情况

① 当然这也由于新联邦州在选举政策上对于联邦下议院（Bundesrat）和联邦政府的组成施加的影响决定。关于将于2019年截止的“团结方案”是否应该继续的争论早在2012年时就已经在进行之中。关于东部德国地区的某经济部长在要求继续提供援助时，《南德意志报》2012年9月5日的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即使为东部建设提供了数以万亿的援助，但迄今东部地区仍然没有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有着‘自我承担能力’的经济和财政结构……在新联邦州，德国收入的企业税还低于10%；对于企业，征收的税收还在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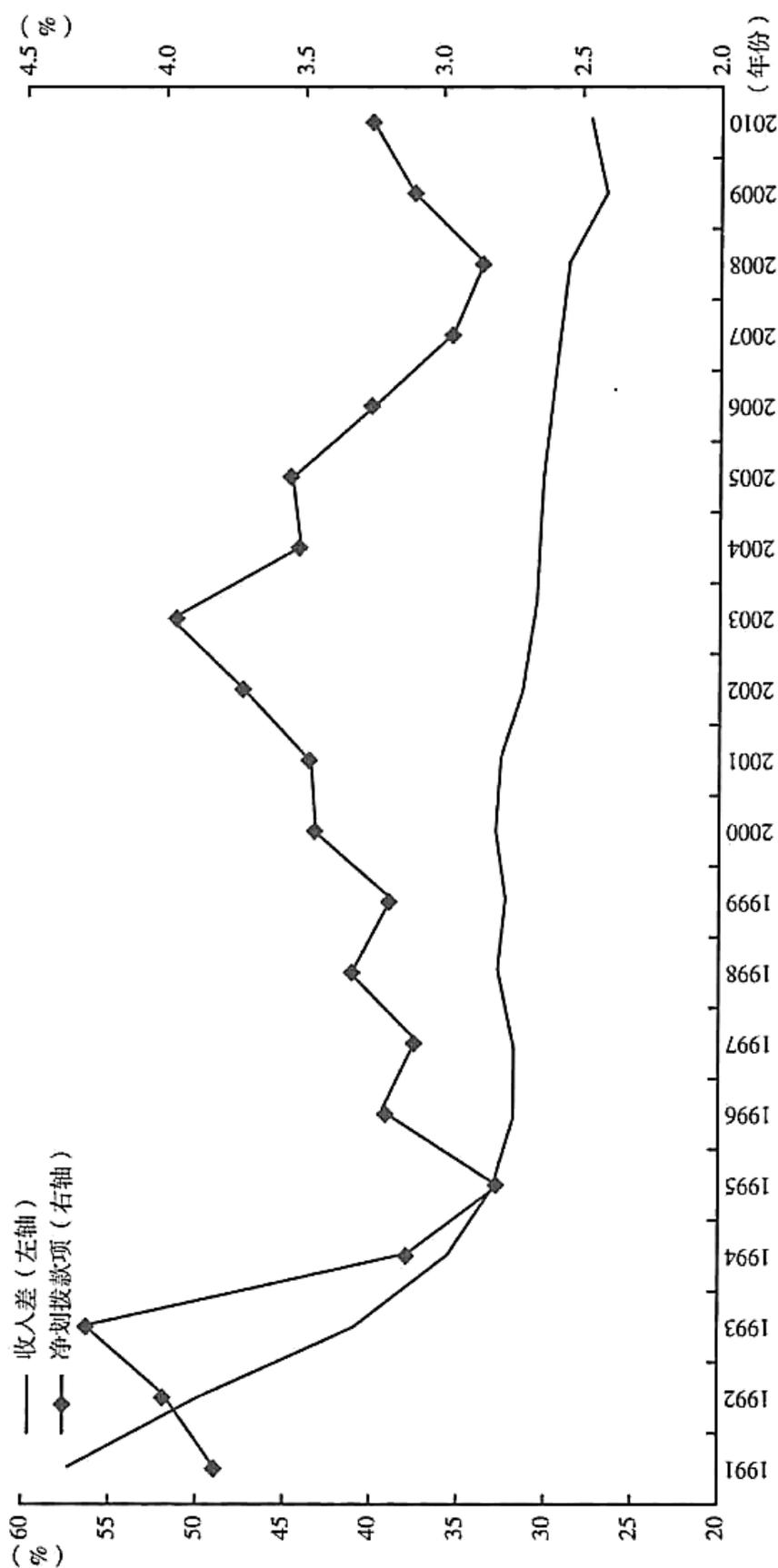


图 3.10 德国对“新联邦州”净划拨款项和收入差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91~2010年

资料来源：州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组；国内生产总值、各州及德国东西部大区域1991年到2010年的增殖；德累斯顿经济研究所向笔者提供的信息。

格外引人注目^①，特别还因为当两德统一时，那里并没有像后者那样成熟的、国家也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的权力结构，这阻碍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建立。在前东德地区，统一后不仅原有的共产党领导阶层被彻底地肃清了，同时，更多地回溯历史的话，德国东部地区的大地主阶级——其社会关系的结构和西西里还有卡拉布里亚在诸多方面有着相似性——首先是1944年7月20日之后的纳粹政权，接着是战后的苏联占领，然后又经历了德国统一社会党时期，已经被消磨殆尽，所以在那里根本不存在人们经常说的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封建残余（Hirschman 1982）。

迄今仍然存在争议的是，1995年以后德国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向西部靠近的速度缓慢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结到货币联盟以1:1的比例交换东德货币，以及将西部德国的社会国家扩展到东部地区来的原因上。所有这些措施在很多人看来都是科尔政府在东部地区购买选票的手段，因此也就和意大利南部的政策有可比性。种种情况表明，此后变得越来越必需的数量惊人的划拨款项固然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货币和社会联盟给新联邦州带来的动荡。但必须承认，令选民感到惊讶的是，^② 对于新联邦州的巨额财政援助尽管出于宪法的所谓实现国家各地区“平等的生活条件”

① 根据联邦政府2012年关于“德国统一现状”的年报（德国联邦内政部，2012），前东德地区的经济在2011年增长了2.5%，相比之下全德国增长为3%。其人均社会总产值从占西部德国地区水平的73%（2010年数据）下降到了71%；而生产力水平为79%，而失业率达11.3%（西部地区为6%）。

② 人们在这里会想起科尔许诺过的：没有加税的“繁荣的景象”。

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却是在一个无法估量的强大民族归属和责任义务感的支撑背景下才能得以维系。

195 上述两个案子中总结出的结论对于 2012 年夏欧盟为南方的负债国家决定的“增长方案”来说并不那么令人振奋。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独立的民族国家，而非一个国家内部的联邦州或省份。相对于一国政府之于地方豪强势力的关系来说，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更不容易绕开单个国家的政府和政党。^① 欧盟委员会一直试图绕开民族国家的政府实施其地区性的政策措施，然而实际上这种尝试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过。所以说在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内发生的事情，当然也可以向上一个层次，在更大的范围内类比整个欧盟。同时还要考虑的是，与在意大利和德国国内的情况不同，在欧盟内的欧洲，出钱支援者和接受资助者之间并不存在着自古以来的一种共同体情感。相反，民族的认同感却可以在任何时刻被调动起来，国家间提供团结资助的要求很快就会被认为是无理要求，方案定额也会被认为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干涉，从而最终被质疑其合法性。

① 在前东德地区，两德统一后，很多地区的核心位置都由西部德国的政治家以及官员担任，因此，西德的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在新联邦州得以确立和内化。而类似的过程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欧盟任命的意大利总理蒙蒂在 2012 年夏发现，西西里地区地方长官，拉斐尔·隆巴多（Raffaele Lombardo）领取的个人薪酬比德国总理默克尔还要高，西西里地区有 24000 名守林人和 20000 名行政人员，在行政支出方面，该地区平均每个公民每年支出达 349 欧元（与之相对，伦巴第地区为 21 欧元）。当然，令蒙蒂非常意外的还有，现任总统作为锐意改革的候选人在大选中打败了前任总统，而后者现在正在监狱服刑，然而这位现总统也曾经与黑帮集团有过勾结。因此蒙蒂也在酝酿弹劾现任总统。而关于西西里地区的预算赤字问题，蒙蒂却也因为该地区的自治地位而被束缚了手脚。

为了估计一下帮助地中海区域的危机国家渡过难关，免得它们在货币联盟中进一步掉队是怎样的一个艰巨任务，我们看起来很有必要做一些计算，以量化的形式把国家间的规模对比关系以及欧洲货币联盟内经济发展差异究竟有多大呈现在人们眼前（见表 3.1）。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三个地中海危机地区最穷的国家——共有 6810 万人口。而三个最大的，同时也是欧洲货币联盟中仅有的还有一定支付能力的成员——德国、法国和荷兰——共有 1 亿 6350 万人口，这是一个 41:100 的比例关系。而德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比例则是 21:100。经过平均计算后，地中海三国 2011 年时人均年收入约为 21000 欧元，而此时，拥有援助他人潜力的三个国家的平均人均年收入为 31700 欧元。也就是说，收入差达到了不低于 34% 的程度。这又比德国内部的收入差多了 7 个百分点。而在德国，继续花费社会生产总值的 4%，来防止东部地区再次失去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局面做法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如果人们把意大利也算进地中海待援助国家之中的话，那么统计上收入差距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美化，但这样一来，也造成了人口比例关系的恶化，达到了 80:100。即使是同法国一道共同承担，即使德国能维持 2011 年和 2012 年出现的相对较好的经济形势，援助一个地中海地区的相对比较有前途的国家的任务对于德国来说显然还是难以完成。^①

^① 在关于成立欧元公债的要求的语境中，请参见 2012 年 6 月 15 日《纽约时报》的文章《默克尔强调德国的强度极限》（“Merkel Stresses Limits to Germany's Strength”）。

表 3.1 欧洲货币联盟中部分国家大小比例及收入差，2011 年

	人口数 (百万人)	占德法荷三国 的百分比(%)	收入 (欧元)	收入差
意大利	60.1	36.8	26000	18.0
西班牙	46.2	28.3	23300	26.5
希腊	11.3	6.9	19000	40.1
葡萄牙	10.6	6.5	16000	49.5
意西希葡四国	128.2	78.4	23594	25.6
德法荷三国	163.5	100	31711	—

地区性干预政策的成本有多大，那么这种政策从外部或者从其上部可以控制的可能性就有多小。如果说意大利中央政府都没有能力监督援助资金在西西里的使用情况或者说管理好其地区行政机关的财政行为，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或者说德国政府又如何能够监督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政府呢？而且即使德国统一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对于东部新联邦州的地区性经济援助政策仍然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终点，那么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地区政策性补贴什么时候才算是没有必要的呢？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资本主义竞争中优势累积的效应时。支援国的选民们也被要求拥有超强的耐心，还特别在这样一个不断缩减公共财政预算，不断降低社会服务的时代。为什么芬兰人和荷兰人要对希腊和西班牙人拥有更多耐心，甚至比一个皮埃蒙特 (Piemont)、伦巴第 (Lombardei)、威尼托 (Veneto) 人对于巴勒莫 (Palermo) 或那不勒斯 (Neapel) 的人还要多？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西欧国家在财政危机的条件下还能够筹措到的用于划拨给南部国家的有限款项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用于交换那里的国家机器和中间倾向的政党对于欧洲中心的忠心——这是和意大利战后的民主制度形成的一种国家内多层次庇护制度（Mehrebenen - Klientelismus）看起来有着惊人相似的组织安排。所以这对于欧盟来说也是完全不新鲜的。当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在 20 世纪 70 年代摆脱了法西斯的军事专政后，三个国家当然也在意大利达成了日渐清晰的“历史妥协”（compromesso storico）的背景下，曾经面临着一个欧式共产主义的选项。这就差一点让他们可以对传统的，同时也受到专政统治打压的社会上层加以清算，同时至少可以开启一个社会结构的革命现代化的可能性。然而这一切却并不符合西欧人以及美国人的利益所在，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他们需要在地中海边缘地带的和平以及可信赖的同盟军。

吸纳三个国家进入欧盟——然后几乎同步进入北约组织——说明这一切并不是出于经济，而是政治上的考虑：198
欧盟需要用让它们来分享西欧繁荣的方式奖励这些国家做出的亲西方的，走上“欧洲”路线的决策。不是进行社会的革命，而是用来自欧盟结构基金（Strukturfond）补贴的方式使得这些国家中出现增长和富裕，当然也包括在布鲁塞尔的支持下在这些国家中按照西欧的榜样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机器。目标是在这些国家中建立社会民主的欧式资本主义制度，它能够用经济增长来帮助这些新晋民主国家实现民族和解：实现不流血的现代化。以西欧为取向的新中

产阶级的希望是，在一个渐进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和平地、长久地使自己成为国家内部政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角色——当然首先总是要不可避免地 and 旧的政治寡头达成某种妥协，在西班牙就表现为君主制度的保留，而在希腊则是在宪法中固定了东正教教会的特权，包括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在其扩张的领地内和一些商业活动中免税的特权。^①

最迟到财政和金融危机爆发，当然也有可能早在东方阵营 1989 年崩溃时开始，在欧洲新建立一个，位于东部的边缘地带（Peripherie）的必要性给输血式的拉平经济及社会差异的项目画上了句号。在三个地中海国家中——如情况所显示，并且当然也包括意大利——截至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社会经济的追赶势头达到了能够应对经济危机的发展水平。今天，人们很清楚地看到，欧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试图通过欧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地中海地区实现和平的计划实际上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并且当时许下的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趋同化的诺言，包括同时扩大和深化欧盟的方案难以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新加入欧盟，西欧的中心国家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同时资本市场的风险意识也越来

① 针对这一规定，目前为止，希腊的所有“救世主”们都没有任何一家提出撤销的要求。在希腊，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军队镇压了德国占领军撤出后爆发的共产主义人民起义运动后，又重新建立起了君主制度，还让那些和君主制度相关的力量坐稳政权。直到军事政权统治时期的岁月，政治一直是动荡的，皇帝和选举的政府之间的冲突也从未间断（Markantonatu 2012）。

越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已经永远不再有可能出现外部提供的可观的补贴了，或者说至少不可能出现像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规模的结构基金。一个由德国发起的致力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①，即使它可能只是出于一种象征意义而存在，也因为前面提到的国家间规模大小的比例原因而完全没有可能性，更不要说谈它是否真的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题。此外，如果给予希腊优惠政策，那么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意大利也有可能马上提出相应要求。同时也不要忘了匈牙利，尽管它现在还并不属于货币联盟，然后就是塞尔维亚、科索沃、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最终就是整个巴尔干半岛，1989 年以来，它一直都是西欧富裕地区眼中的不稳定的，亟待建设复兴的战略缓冲地带。 201

① 如同美国历史学家查理·S·迈尔（Charles S. Maier）在《纽约时报》上提出的要求（Maier 2012）。而迈尔在提出这样的要求时除了很多其他因素外至少忘记了当时参与马歇尔计划中的各方在政治上极度的不平衡性，这绝对不会导致今天这种类似的金融和政府问题。在美国国内，人们是以冷战开始时的一种遏制手段来捍卫马歇尔计划。而在欧洲，任何一次选举如果产生了错误的政府，那么美国的援助将会随时有可能终止。“在南部……德·加斯佩里需要来自盟国的援助……冷战程度的日益加深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美国站在基督教民主党的一边。华盛顿开始用西方的帮助和支持来淹没这座半岛。每艘运有援助物资的船只驶入意大利的海港时，都会有盛大的特别宣传庆祝活动。马歇尔警告，共产党人一旦赢得大选，美国的援助将立刻冻结。首先在南部，基督教民主党人利用了西方的援助，来赢得选民的支持。援助物资的分发在此后的多年中是由此产生的意大利南部的侍从主义的党派机器的原型（Hien 2012, 279）。”在希腊，马歇尔计划使由英国人发动的内战的胜利者能够压制住共产党，来服务其选民，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就业机会。包括希腊二战以后的侍从主义也可以追溯到西方盟国提供的援助物资（Markantonatu 2012）。

国际政治的语言中，欧洲国家体系出现的财政危机也被看作是此前化身为扩张中的市场经济帝国的欧盟“和平霸权”（Friedensmacht）过度膨胀的结果。由于财政上的资金越来越短缺，布鲁塞尔国家板块要想维系其整体就要把希望寄托在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改革”之上，同时，它要用超国家的机制来限制民族国家的民主权利。它的希望还在于有目的地通过把西欧的经济和生产方式当成他们未来出路的“现代的”中产阶级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培养地区性发展的助力。在这些之外，再由中心发起的结构、经济景气以及经济增长的计划都首先拥有一种象征价值——它们可以作为公众谈论的话题以及作为高峰决策的一种演练，当然也是作为对于政治以及政治辩论中对社会民主的残余成分的一种清除手段。^① 尽管从财政的角度上看它的数量微不足道，但是却可以被当作一种分配忠诚奖励（Treueprämie）机制或是为地区的发展助力给付一定费用的手段来使用：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和国家体系哈耶克化进程中通过利益保障实现的精英补选（Elitenkooptation）的手段。

关于欧洲整顿国家的策略能力

整顿国家中，只有最核心层次的那些才会知道，在那些

^① 见德国联邦政府和作为反对党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在2012年6月21日决议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就业一揽子方案”（Pakt für nachhaltiges Wachstum und Beschäftigung），它赶在了相应的内阁决议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个欧洲一揽子方案之前提出（见本书第181页注释^②），并且给予了社会民主党以及绿党接着可以在欧洲共同承担联邦政府政策的机会。联邦政府新闻和信息局2012年6月21日的新闻公报212/12。

不断上演各种高峰会见和政府决策磋商的舞台后面是否包藏着一个战略性的中心。在这个战略中心中，有人在充分考虑了现实状况的情况下，长期地、审慎地制定和操控着一些共同的目标，无论这些目标具体是什么。谁如果真想试着弄明白这些年来在背景幕布前上演的这一幕幕闹剧究竟意味着什么，肯定会有所怀疑。一直以来紧跟新闻报道的观众们所见到的不过是有决策力和决策权的人们一轮又一轮新的表演，他们是那些在塑造信任的施政措施领域中的明星艺术家群体，同时还伴随着各式各样“专家”的聒噪，以不同的音响强度向公众兜售着保持期越来越短的所谓专利方案。这就是一切了吗？或者在这一切的纷繁芜杂背后还有着某种连续性的东西，或者甚至就是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政府机关或者是坐落在纽约以及法兰克福的金融“市场”的战略能力？

如果人们要在危机和危机政治之间的角力中找到某种恒定性的东西，那么就会发现，所有居于责任岗位上的参与者们都从一开始就把统一的货币当作前提无条件地加以接受。欧元一经引入，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至于它有没有起作用，根本并不重要。捍卫欧元地位的联盟势力中理所当然地包括金融市场，因为它们就是以欧元的形式进行投资，并且希望借出去的钱能够有保障地得到完全的回报。然而市场甚至也可以在共同货币崩盘中大量获益，只要它能够及时地对此做出一些准备——或者说通过一些方法来加速其进程。因此，同属欧洲货币联盟的众多国家政府，包括那些赤字国家也都致力于劝说金融市场不要这么做。它们背后的支

持力量还有欧盟，因为欧洲货币联盟才是一个 1992 年后充分发展的真正意义上完备的内部市场。建立完备的内部市场的目的在于使得市场力量能够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自由参与博弈，不受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的制约，不用担心单个国家干预政策的干扰，也从限制市场的保护性法规中解放出来。欧洲国家为了保卫其国民经济的竞争能力，就应该允许其货币贬值，这是不符合新自由主义内部市场的精神和意图的。如果市场要想主张其自身的权利的话，那么通过货币贬值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过无条件政治干预实现的对按市场进行分配的结果的修正的可能性就要被彻底排除。取消了各国的货币并且用一个最好是能够在整个内部市场中统一的货币代替之是符合致力于要求把经济和市场从政治干预中解放出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政治逻辑的；因此，统一的货币是内部市场规划真正意义上的加冕礼。^①

204

共同构成欧元体系的联盟的政治经济，尽管它到现在还在书写着欧洲危机政治的剧本，首先始于出超国，特别是德国的出口业。在这个问题上，它们和那些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却是完全一致的。有了欧元这样的统一货币，产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国家就不会因为外国政府任意而为的保护措施被人为哄抬了价格。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捍卫欧元还能带来一

① 引入欧元作为 20 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市场扩张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时刻来看待，并不必然意味着忽视其他和货币联盟相关联的政治动机。重要的历史决策总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并且往往都是因为能够适应不止一种战略意义上的关联才能得以实现。在货币联盟的问题上，首先要想到法国的诉求，即通过一个欧洲共同的，法国可以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其中的货币和金钱政治来瓦解德国联邦银行的霸权地位。

个额外的好处。负债国的经济问题会压制欧元同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这样一来，欧洲欧元地区国家生产的产品在销往其他非欧元地区时，无形之中也就增加了竞争力。所以说在德国，维护和保持作为统一货币的欧元是一个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基础。它既受到了亲工业界的基民盟（CDU）的支持，也受到了代表工会利益的社会民主党（SPD）的青睐。

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德国的欧元支持派们多么巧妙地在政治话语体系中成功地把货币联盟和“欧洲思想”或者说甚至是“欧洲”的概念等量齐观，而完全混淆了统一货币不过是为了扩张市场而采取的一种合理化措施的性质，无视了在27个属于欧盟以及内部市场的成员国中尚有10个并未接受欧元货币的事实。这其中包括了欧盟成员国如英国、丹麦和瑞典，它们保留了某种特权，让它们在即使满足了条件后，也可以不像条约中已经规定的那样加入货币联盟。直到危机爆发之前，至少在德国，这还只是被看成是在短期内就可以得到修正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微瑕。今天人们却已经很清楚，欧洲货币联盟的扩大，即使在条约中表明了其意愿，仍然是在极远的未来才有可能被重新考虑的事情，并且要在解决当下的危机的情况下，货币联盟既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欧盟整个大集体造成任何的伤害。无视这一切事实的情况下，默克尔甚至可以被认为是诡异的提法——“欧元的失败就是整个欧洲的失败”——无论当初还是现在，都被除了左翼党以外的各派政治力量当成是应当强烈支持的国家共识。德国的政策必须是带有“欧洲”意味的，这在

德国已经不会引发争论；于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捍卫欧元就成了一个既出于经济用益性考量，又出于政治伦理原因的一项戒律。在这个问题上谁不愿意跟着加入进来，或者甚至胆敢声称“欧洲”没有欧元也是有可能的，就必须知道，他在所有的有责任的行动者眼中已经被排除出了那个被意大利人称为“宪法拱梁”（arco costituzionale，“Verfassungsbogen”）的权力秩序之外。^①

206 一眼看过去，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那些到目前为止除了一身债务以外，完全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好处的国家的政府也会坚持留在欧元体系中呢？^② 简单地就说就是：这些国家的统治是由国家机器和亲西欧的城市中产阶级结成的同盟决定的。后者则非常寄希望于通过加入欧盟从而打开的流动机遇，一方面为他们存下的钱寻找出路，同时也可以向往未来富裕的生活，进口商品也不会再因为本国货币的一再贬值而变得高不可攀。另外，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域还有着不同类型的改革派，他们在民族情感的动员下致力于革除本国的

① “欧洲”对于货币联盟具有大众舆论政治意义，这也构成了内部市场的“社会维度”，其差别则是有着多方面意义的。当作为欧洲的左派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建议了内部市场的项目时，他指出了人们不能去“爱”市场的状况。人们只能去爱一个社会公正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不可避免的统一内部市场总有一天要由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来加以补充的原因。然而在货币联盟中，这个问题就不再被提及。它的功能在今天更多的落到了“欧洲”这个字眼上，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想象它，从不需要护照和换汇的一次假日旅行到基督教意义上的西方世界。

② 除了新的希腊左翼党派统一社会阵线（Syriza）以外，地中海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政治势力提出要让自己国家退出欧洲货币联盟的要求。即使是统一社会阵线也并没有明确表态他们究竟多大程度上会坚持这一主张。

积弊，改变落后的面貌。在他们眼里，货币联盟带来的内部贬值（innere Abwertung）的强制性——也即是实现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工会的力量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革除——是避免国家贫困化的唯一出路。

在目前处于困境中的四个地中海国家中，单靠向往现代化的精英派和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联盟尚不能够清除前现代的封建残余力量，它们仍然在阻碍着国家发展欧式资本主义。他们的希望一直是，在布鲁塞尔找到他们自身无法实现的“结构改革”的同盟者或助力。由外部分派的政治义务对于他们来说和财政上的补贴同样有着帮助作用。他们希望由国家间协商争得在货币联盟内部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由于这与欧洲中心国家需要边缘国家有着稳定的需求的利益需要相一致，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这就并非完全不现实。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输送的援助一方面可以用于让这些受惠国增加其国民经济实力，即在合理化和现代化的意义上改善和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促进消费，包括购买主张南意大利模式的国家的政治阶级的支持。^① 对于受助国来说，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在后发过程中的长期性，使得在实践中严格区分这两种用途也并非易事。

207

然而，在南北组成的维护欧元区的联盟之间也存在着不容小视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存在于国家间，也存在于各个

^① 对它的稳定，如果足够以“欧洲”为导向的话，那么从外部视角来看就是能为政治的稳定做出贡献并从政治上看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国家的内部。对于北方来说，问题在于得给南方付多少钱，以及他们愿意付多少，作为补偿也好，作为发展援助也罢，用于让南方国家继续能够或者说愿意留在货币联盟之中。而在内部政治方面的争论则是，必须要厘清，谁来承担维系货币联盟的开支。在德国，从中得益良多的出口业设法让其他的工业部门也加入进来共同承担成本，尽管其他行业完全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受益。对于政府来说，这就产生了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即把原则上应该是用于提升本国出口业竞争力的一项税款，尽量用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分担到大众和所有的纳税人、消费者和社会救济扶助者身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着很多的辅助手段，甚至包括动用欧洲央行的力量。

另一方面，对于南部国家来说，一方面它们致力于尽一切可能地提高继续留在货币联盟内的代价；另一方面，它们也竭尽全力地压缩应该作为对于北方国家提供的财政援助的回报的主权让渡，如北方国家可以直接干预的可能性。内政
208 方面，一方面是抵抗“欧元帝国主义”的威胁的派别，另一方面则是愿意与外贸出超国之间合作，并期望以此换得更多的“平衡支付”或者渐渐地能够靠近和达到西欧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欧洲化）的派别，两者的力量相互交锋。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国家间的冲突很容易形成双边积累民族主义的情绪，而国家内部的冲突和抵抗则必须通过淡化民主机制的方式来使之达到和局：在北方国家，人们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用一些技术手段或者是某种责任意识上的沉默来掩盖实质上的对外资金援助；而在南方国家，人们可以指

出国际责任义务的约束性，或是直接通过购买选票的方式实施政治笼络。

在我这里刻画的欧洲统一体的基础政治经济利益构架之上上演着风云变幻的各种进程，并且还存在着极多样的不确定性。按条约规定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欧盟成员国如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将会怎样？在未来欧盟和欧洲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按国际法制定的财政协定如何纳入欧洲法中来？巴尔干国家进入欧盟的进程将如何继续？^① 它们也将获得“发展援助”吗？如果有的话，谁来支付这笔钱？所有的人都在猜测，在几年后，欧盟——如果说还存在着欧盟的话——及其欧洲国家体系将会变得和人们在此前设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责任人”寻找机会出来就此表态。从长期的角度看，人们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重现经济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情况能够重新进入可控的状态中。

在具体措施的层面上，尽管表面看起来如此纷繁芜杂，在欧盟及其核心成员国在危机爆发以来的行动中仍然能看出 209 四条有着连续性的主线：

1. “市场”，无论它究竟是谁，必须要尽可能地逃避参与拯救支付不能的国家的义务。付钱的人只能是其他的国家，也就是其他国家的民众来买单。今天，人们一致认为，在为希腊第一次减债行动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对私人债

^① 这里指的是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科索沃、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

权人提出尽管只是适度的“修剪”（haircut）的要求是一个错误，并且这个错误今后绝对不可能再重复：这一举措在默克尔的国家人民那里可能赢得的支持远远无法弥补和平衡在金融市场人民那里失去的信任。然而各级央行以及一些国有银行在事件之前似乎都有着足够的时间从私立银行以及其他的信贷商手中把绝大多数希腊国债以让它们的持有人可接受的条件收购过来，这样损失的绝大部分就还是落到了公共财政头上，那么在有可能马上就要到来的无可避免的第二次债务减免中仍然会由公共财政买单。

2. 陷入困境的银行不可以国有化，而是要用国家的钱去营救，并且要用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免得引发国家人民的不满。整顿国家金融机器空间中的工程师们的任务是，让那些必须进行的转账尽可能不出现在国家的账面上。一个很容易被看穿的例子就是德拉吉出任欧洲央行的主席后立刻做出的一系列举措：他给多家银行提供了总额高达1万亿欧元的利率仅为1%的贷款。作为回报，这些银行不受约束地表示要在由他们各自确定的限额内购买陷入困境的国家的债券，以帮助降低其风险酬金。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欧洲央行知道，如何通过这种对各家银行利好的业务——同时也可以帮助欧洲央行绕开本来不可以对国家提供资金的禁令——来保护它们免受可能的损失。^①

^① 众所周知，这一行动的作用在几星期后就烟消云散了。2012年9月，欧洲中央银行就做出了接下来的一步并决定，以确定的价格不设上限的购买危机国家的债务，开始只是在二级市场，即由银行而非由国家出面。

3. 无支付能力的国家想通过国家破产或者单方面的减免债务来寻求出路的可能性必须堵死。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也不得不通过财政的输血的方式来让它们可以向债权人履行义务。这样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让债权人愿意继续以能够承担得起的贷款来供养整顿了和整顿中的债务国家。当然，这些资金转账也都必须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很好地隐蔽起来，不让国家民众发现。一个很好的掩藏大范围国家间或者潜在的转账的例子就是实施单个国家央行和欧洲央行间的所谓 Target 2 的结算体系 (Sinn 2011)。

4. 如果说解决金融和财政危机的方式只能通过国家债务贬值这一条路可走的话——特别是，但不仅限于，长期经济发展振兴无望时——这一过程也必须尽可能的柔和而平缓，时间上要尽量拖延得长一些，好让有着报复能力的大投资者尽可能的有机会重组整个投资组合，以减少损失。在这一领域央行以及国际组织中专家的技术也很重要。他们的任务是为政府出谋划策，尽可能把无法用经济增长消化掉的国家债务通过“金融压制”的方法转嫁到存款者身上，即金融领域之外的小的财产所有者。也就是说，提高通货膨胀率和压低利率，从而迫使银行和保险投资国家债券的办法双管齐下 (Reinhart 和 Sbrancia, 2011)。已经有一些迹象显示，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要当下的危机一解除，并且金融业能够保全好自己的利益，国家会立刻启动上述政策。

上面提到的四点所谓的连续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在背后

有着某种具有长线策略的决策中心的存在。事实情况却是，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应对危机和国家转型的时间分段上却有着巨大的混乱。比如人们决定建立一个“银行联盟”（Bankenunion）来整顿陷入困境的南部国家的银行作为短效应对解决危机的方案，如果说它要能够产生超过粉饰作用的效果的话，却还需要很多年时间。同时，为短效防止希腊或者意大利国家财政破产，央行补贴了这些国家为清偿债务二次筹集资金的成本，尽管这种措施从长期来看会导致像美国模式那样产生泡沫经济或者有可能会阻碍人们本来希望在危机国家中实现的彻底的新自由主义合理化进程。^① 尽管台面上看有着种种混乱，但总的来说，那些看起来可以称之为持久的新自由主义行动主线的东西，在事实上可能不过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中起作用的，以私人投资者的潜在威胁表现出来的“限制性条件”（Bergmann et al. 1969；Offe 1972a）短效的基于常识的一连串反应罢了。其前提当然是，机构中形成的所谓的常识——也就是在类似高盛及其周围一系列的机构中的认知决策共同体中产生并实践着的常识——是正确的常识。因为为了满足市场人民的要求时往往根本没有替代选项可供选择，所以这种常识也就干脆从来不会遇上战略上的，而只有战术上的问题——特别是在与那些被过度的民主许诺惯坏了的国家人民打交道的时候。

^① 不应该忘记的还有，某些时候，再融资的高额成本只会在长期提升利息占国家支出的比例，因为人们并不需要同时为所有债务进行再融资。

政治经济阶级对世界的理解中固定不变的组成部分以及支持他们的行动的阿里阿德涅之线（Ariadnefaden）是他们毫无动摇地相信欧洲是可以完全统治的（Durchregierbarkeit）——或者说，至少他们以毫不动摇的决心来不断地通过宣布信奉这种信仰来鼓舞自己和他人。这包括了所有人：在德国，他们不仅是联邦政府以及反对党，还包括那些有着一体化思想的左派知识精英（Bofinger et al. 2012）；而在欧洲，包括了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在全世界则是占大多数的经济学“专家”。民主派不惮于为了实现“完全统治”（Durchregieren），而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希望就是能够有朝一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而对于自由派来说，只要哈耶克式的把市场从一切政治干预中释放出来的目标能够实现，他们就对一切抱无所谓的态度——也就是说，要利用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强力来让它自我清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

人们必须要相信，并且也相信，完全统治是有可能的。也只有这样德国专家委员会（Sachverständigenrat）在2011/2012年的年度报告中才可能建议成立一个还债基金（Schuldentilgungsfond），它可以要求诸如意大利这样的一个国家，从公共财政中每年恒定地节约出4.2%的盈余，并且要持续25年之久（专家委员会关于整体经济情况的鉴定书2011，115）。并且也只有这样，勃芬格等人（Bofinger et al.）才能要求未来的“严格的财政预算纪律”作为对于当下欧债集体化（Vergemeinschaftung）的回报。欧央行也才能把购买陷入困境国家的国债同许诺将来

213 的表现为缩减养老金或者变卖国家企业的形式的“改革”联系起来。技术统治上认为可以对政治或者整个社会实现的所谓可掌控性不过是一种令人看起来不会失望的假设性命题，或者某种意义上讲根本不过是个出于某种需要的幻象。德国在单个联邦州如不来梅问题上总结的经验是，当20世纪90年代初签署了消除债务协定后，其负债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Konrad 和 Zschäpitz, 2010）。即使反复不断地指出这些事实，也于事无补，就如同欧洲央行2011年在第一次救市方案中购买了意大利的国债一样。^①

假定可以拯救货币联盟的救世主们的可操控性的假想是不是现实的呢？也许这种假想只不过表达了一种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来实现它的决心以及表达了一种信心，只要人们足够长时间地坚持用掩盖、恫吓以及道义上边缘化的方法来对待反对派，坚持用强劲的各种措施削弱国家乃至欧洲层面的议会民主和权力寡头或专家治理的权力，其最终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① 根据《法兰克福汇报》2012年9月6日的一篇报道，欧洲央行曾经于2011年“向意大利政府就购买国债提出过许多要求。其中迄今七项要求中只有一项完成了……2011年8月5日，特里谢和已经被任命为其继任者的德拉吉在一封写给时任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信中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此后购买其国债的方案就开始了。特里谢和德拉吉的这些要求最终成为让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无能大白于天下的契机，并最终导致其垮台……新总理蒙蒂在一年之后只大部分地完成了七项要求中的一项，而其他的六项要求却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效果”。德拉吉在贝卢斯科尼政府时是意大利银行的行长——这如同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逸闻趣事。

国际整顿国家中的抵抗

国际整顿国家正处在一个不断令民主的民族国家中公民的政治资源贬值的过程中。在新的，控制国家政治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分配冲突的舞台上——在全球金融市场和在国家间金融外交的会议室中——它们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当国际调解了的国家民主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时，反对党如果要反对国家间制定的紧缩政策就显得很困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希腊的例子说明了，一国内的选举，尽管面临着外部的一切威胁姿态和国家共同体在宣扬上施加的影响，但如果他们的要求太过分的话，还总是会导致那样的引发足够愤怒的结果，最终使得债权国家需要付出的让负债国家打消退出游戏的打算的代价变得很大。 214

2012年夏一方面是希腊和意大利，另一方面是德国发生的事情，这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在德国，反对党支持政府无条件地坚持使用欧元，并连同执政党一起要求债务国家恪守由布鲁塞尔负责监督执行的财政纪律。^①唯一的区别在

① 甚至博芬格（Bofinger）等人也是如此，他们与德国专家委员会一道为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提出了所谓的欧洲国家债务或至少其中一部分的“共同责任”，这样一来，它就必然会要求“对各个国家的预算严格地集体监督”。在另外的地方，就成了这样的要求：“将主权转移到欧洲层面的机构则……变得不可避免，以有效地实现财税的纪律以及特别是（！）保障稳定的金融体系”（Bofinger et al. 2012）。“纪律”和“监督”一旦和“严格的”以及“完全统治”放在一起后就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成为德国关于欧洲的话语体系中意见一致的概念，从右到（中）左，党派颜色上则是从黑到绿。

215 于，反对党表示出一种为了欧洲的和平，可以付出更大代价的意愿。这种代价可以是以集体化旧的或者新的债务，或者可以是额外的“经济增长方案”——大约是出于这种措施反正也无法避免，倒不如寄希望于可以从一部分德国民众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越来越敌视德国的情绪的不满中捞取一定的政治选举资本。在反对派无声的支持下，政府试图在已经没有替代可能的国际日常事务中预判欧洲一体化以及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未来的根本问题，但这在议会中遭遇到了议员们，甚至包括执政党的议员们的反抗。因为他们看到议会由于党派的领袖而渐渐被夺去了权力，所以开始从联邦宪法法院以及它迄今的司法判例中寻求民主和主权的关联。

谈到希腊和意大利的情况，在那里，政党、选举和议会也是在向着国际整顿国家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因素。在希腊当帕帕季莫斯的“技术统治”宣告失败之后，其政党重新在政府中掌权，这让布鲁塞尔不得不减轻了敦促希腊政府实行紧缩政策的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对于希腊政府实施欧盟要求的整顿措施后的奖励。在意大利，当蒙蒂政府刚刚上台后就发现，受情势所迫，不得不更多地向左翼政党和工会达成比布鲁塞尔方面认为必要的更大幅度的妥协。蒙蒂在很早就开始培养民族主义的氛围，好让他在同特别是德国的谈判中可以赢得一个更好的地位，好减弱让其做出整顿措施的要求。那么包括在这个方面，当政治回归到像往常一

216 样的时候，也常常是伴随着整顿政策的实现出现延后的情形。

另外，我们根据美国的例子来回忆一下对于哈耶克式的“民主的转型”（Agnoli 1967）的有效抵抗并无保障的事实也是多有裨益的。在美国，如果不去计较 2008 年大选获胜的那个出身民主党的，在公众面前做出平民主义姿态的总统的话，华尔街的金融巨头接管国家机器的进度已臻完善。尽管 20 多年来已经激化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程度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公（Hacker 和 Pierson, 2011）以及多年来的高失业率，还是有大约一半的民众参加了选举。2012 年秋，美国人可以在一个富可敌国的前对冲基金经理和一个总统之间做出选择。后者除了一下子拿出巨额资金以拯救经济和金融市场以外，已经不能做出任何事情来管制其行为并且限制其经济和政治上的种种权力。^① 这时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在国家的打压下削弱了的，被文化产业的产品麻醉了的，极度分裂且组织涣散的社会——其糟糕程度即使是在阿多诺最悲观情绪的时候也仍然无法想象——是如何在跨国大公司组织起来的财阀统治中维持下来的。在大财团眼中，不仅是政客、党派和议会，甚至连公众的意见都可以用金钱来贿赂。

那么在哈耶克主义下不断统一的欧洲，当传统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民主渠道被国家间或者债务国家的责任义务堵死时该做点什么呢？众所周知，负起责任的反对派的社会民主模式的根本在于，敦促资本不断进行改革措施。这不但能给工人阶层及其组织带来好处，同样也能够帮助资本

^① 关于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市场管制，见 Mayntz (2012)。

主义不断解决其生产和再生产中固有的，它本身的机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不断被反复引用的经典是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界限的斗争的章节 [Marx 1966 (1867), 第 8 章]。历史上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则是，在福特制 (Fordismus) 中，工会通过斗争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217 从而保障了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的情况下，大众具有了购买力。相反，今天的情况看起来却是，大众既无法再为市场提供什么，也无法出于自己的利益再获取什么。而资本想从民众那里得到的不过是需要他们把在历史上争得的社会公民权利交还给市场——这一过程也许不能一蹴而就，但一定需要逐步进行，且不能太过缓慢。21 世纪初，作为被放松管制的金融业的资本已经放心大胆地按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自我组织 (McMurtry 1999)。它需要从政治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东就是通过关闭作为经济强权的社会民主来向市场投诚。

如果说做一个建设型的反对党无望的话，对于那些不想一辈子都需要为别人欠的债还款的人来说，只有做一个破坏型的反对派。他们的必要性在于能够提高各个民族国家中尚存的民主制度的延缓作用。如果民主方式集结起来的民众负责任的行为方式就是他们无法使用自己的国家主权，并且永远只是为了保障债主们的支付能力的话，那么他们更负责任的行为恐怕就是尝试做出不负责任的举动。如果说理性的前提是，“市场”对于社会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到满足，
218 并且还要牺牲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几十年的新自由主市场扩张最终落下的只有损失的话，那么最终恐怕只有非理性

才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了。当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人们才会真正实施这样的认识。频繁地宣告所谓的“平民主义”早就成了一种屡试不爽的统治技术，而在德国，它又被加入了一个在概念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新内容，即把“欧洲”反对者们对于货币联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总体上的批评和对于德国历史上的小国状态（Kleinstaaterei）或者甚至是两次大战期间的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向往情怀等量齐观。

尽管政府不断地做出各种宣传，但是在欧洲民众心中不满的感觉仍然在增加，他们觉得越来越不受到政府的重视——大概是因为他们总被教育着，越来越深入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自由化——其中包括政府财政预算的缩减、社会国家的缩减，失业率上升以及不确定性就业——总的来说符合经济增长的利益；同时，在领导位置上的“专家”们拿着越来越高的薪酬，而社会底层的民众的工资和社会保障都不同程度地在下降。批评性的知识分子则把尽可能加强民众这种感觉看成自己的任务，并且应该立刻停止在那些依靠游说别人相信他们没有任何“替代选择”来巩固其霸权统治的权贵那里获取名利。如果说由一部分人去强迫游说另外一部分人必须要去相信一些极度荒诞的东西，这就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一种侮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些反对向他们提出紧缩政策要求的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人们把自己称为“indignados”，这个词翻译成德语的时候译成了“生气的人”（die Empörten），但是其字面的意思是：那些被蔑视

219 地对待，并且感到尊严受到伤害的人。^①

在社会学理论的语言中，发泄愤怒有着表达性的自然属性，而不像经济事物中那样具有工具属性。按照国际金融外交理性的、“建设性”的建议下的尽义务的逻辑，国家人民需要把属于市场人民的东西归还给他们，为了不冒陷入这种逻辑不能自拔的风险，反抗国际整顿国家的社会运动必然需要一些时候来把它们对于后民主资本主义提出的过分要求的愤怒公开的宣泄出来。政治和文化上感受到的“单向度性”（Eindimensionalität）是怎样引发看起来“非理性”、“不现实的”而且“仅仅是情绪化的”抗议，这种抗议却又因为它们就如同它们本身的那样，所以并非完全没有作用。这让我们觉得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当时在德国直接的诱因就是紧急情况立法和大联盟以及它们所担心的政治和社会为了技术治理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替代选择结合起来（Habermas 1969；Marcuse 1967）。也许当初的判断过于夸张，但也有可能只是结论下得过早；无论如何，当年的情况和今天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四十多年以后，在欧洲的层面上展开了一场向着经济褫夺权力的后民主制度过渡的运动。

在抵抗金融市场对于民主制度的调解运动中，首先提出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货币工厂为了实现其

^① 参见已经渐渐成为经典的斯特法纳·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的呼吁，标题为“Indignez - vous!”（2010），德语是：“愤怒吧！”（“Empört Euch!”），更好的翻译应该是：你们觉得受辱了，做点什么来抵抗吧！

诉求而鼓吹他们发行的可以侵吞平凡人一生积累的全部家当的债券的合法性。在这个问题上戴维德·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他2011年出版的《债务：前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①一书中做出了难以估量其价值的有益的先期工作。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这一神话导致了全球的金融市场都被采用这种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性道德化了，同时反对派在反对这种要求时就显得不道德。但是，国家与私人不同，它在面对自己的债权人时可以设法转移债务或者中止履行还款义务来源于它的主权。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明文规定，国家主权意味着它只能用在通过提高税收或者降低对民众的社会服务来履行它对于金融市场应尽的义务。民主制度意味着，它首先要对自己的国家人民负责，它们可以制定法律，使合同归于无效。所有那些把钱借给它们的人必须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反正就算按照国家的民法规定，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偿还他的一切债务。债务人可以申请破产，从而保障自己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特别是在美国，企业家一次又一次宣布破产以求东山再起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并且常常被在资本圈子里的朋友们略带羡慕地视作榜样，引为谈资。

220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希腊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代议民主制的国家，就会发现，民众是否真的能像

^① 德语译本以标题 *Schulden: Die ersten 5000 Jahre* 于201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主人”一样被要求承担债务是很值得怀疑的。这些债务由作为民众的代理人的政府以民众的名义欠下——又更因为这些钱首先用来填补公共支出中的窟窿，并且更多的是因为富裕阶层拒绝承担更多赋税义务，而导致国家收入减少。同时值得怀疑的是，当希腊的政治阶层以人民的名义大幅举债时是否很好地向自己的民众陈明了利害，就像现在的财产咨询师依法要向他们的客户做出充分的说明一样。如果我们参照民法规定的标准来看的话，这里很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同时还有大的国际金融业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存在着我们一般可以称为说明书诈骗（Prospektbetrug）的情形。今天，希腊的穷人和处在平均生活水平的民众要用自己的医疗和养老保险来为那些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全球金融机构组成的团体硬塞给他们，而又没有，或者说没有很好地将其说明清楚的业务提供担保。也许对于希腊的国家人民来说，如果存在着一个国际民事法庭的话，他们可以到那里去打官司，然后通过法院判决来免除他们对于“金融市场”负有的支付义务。而那些被数十年的缩减社会保障支出惩罚其支付不能威胁的人则必须要清楚，自己有可能因为胁迫而被追诉刑事责任。

专业的政治学研究倾向于低估道德愤怒在政治上的生产力。这些研究往往会满足于一种精心演练的无所谓态度，还美其名曰价值自由；此外，他们也只会致力于搞那些毫无新意，对于被他们自己称之为“平民主义”的东西只剩下精英式的蔑视的理论研究，并想通过与权力精英们分享这些研究，从而获得他们的青睐。因此，即使当他们观察到整顿国

家旧的和新的领导者们最害怕和担心的其实就是那些感觉到自己被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专家们当傻子一样欺骗了的人们的愤怒的事实时，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其实与很多时候人们认为的不同，恐惧能给我们提供相当好的建议。危机可以导致“社会动荡”是那些坐在发号施令的位置上的男男女女们的噩梦。当然这一噩梦和实际上在街头上演的东西还相去甚远。不过看起来，1968年巴黎和都灵街头出现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被指挥阶级所遗忘。这样看来，在希腊时而发生的街头骚乱以及“我们是那99%” 222发起的各地的“占领运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银行和政府的过度估计以及他们散布的恐慌中，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

今天，认为市场应该要适应人，而不是反过来人去适应市场的观点被认为是疯狂的，如果我们去面对现实中的真实情况的话，似乎也确实如此。但如果他们能够绕过已经阻塞了的民主机制的渠道，以一种看似不明智的坚韧不拔不断地来表达自己的，这样看起来似乎还更加现实一些——以致那些做计算的人还不得不把他们考虑在列，还要兼顾那些小人物们固执的，不可被劝导地坚持着，在他们的余生中并不只是为了那些发行债券的商人们以及他们召集的专家们获得利润的欲望而活。今天整顿国家政坛上的反对党已经越来越不作为资本主义紧缩政策路线和话语体系中掺入的沙子而存在了。但是国家人民越来越敏感，对待事情做出的反应越来越难以预料——这是广泛传播的一种对于市场和货币文化深刻的荒诞性以及其生活世界提出的过分的

怪异的要求的感觉——却是一个社会事实：它可以说是一种公民“心理学”，并且作为一种和市场的心理学并列的东西，也需要很好地加以关注。最终公民也会陷入“恐慌”，并且和金融投资商一样做出非理性的反应，前提是，他们不再像后者那样有义务保持“理性”，尽管他们手上到时候没有钞票，而只有话语，但是谁知道呢，也许还有铺路的石头。

尾 声

下一个是什么？

当代的金融、财政和经济危机，就像我已经论述过的那样，是战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长期过程的暂时性终点。通货膨胀、国家负债以及负债私有化是一些临时性的应急举措，借助这些方法，民主政治维系了一个对于所有人来说有着相同的物质生活水平进步，并且自上而下地逐渐重新分配市场和生活机遇的有着不断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现象。在资本的受益者和管理者们每种手段分别大范围地使用了十年左右时间，就开始觉得入不敷出。当上述三种应急举措都被用尽之后，就必须再出台新的措施来代替它们。

现在怎么样？

借用现代化货币的魔法实施的购买时间的策略——以社会性来保持和平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原先向人们做出的许诺呈现出周期性的与事实情况相悖的延伸，因而早就已经失去了其真实的基础——在 21 世纪初的大危机中以及后危机时代还能够继续奏效吗？今天，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过去了 4 年之后，人们用一项田野调查来测试这一问题。对此唯一还能够使用的货币已经完全只剩下了央行的虚拟货币。曾经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一去不复返地踏上了哈耶克化的进程，对于它的“治理”（governance）来说仅存的最重要的权威就只有那些央行的主席们了。私立银行则噤若寒蝉，当潜在的客户都已经过度负债后，它们已经搞不清楚，
225 还有哪些应收款项是能够收得回来的。政府则被议会和仅存的那么一点民主宪政缚住了手脚：在美国，一个两极分化的议会利用了国家负债作为借口来取消国家；而在欧洲，选民们日益强烈地抵制要他们来承担实现新自由主义增长国家的成本的无理要求，因为这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得不到一丝好处。

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权力就会移交给德拉吉、伯南克之流。他们的手中控制着用越来越精心设计的方案，以自己制造出来的货币去滋养的银行以及它们的食利者并且帮助国家继续获取金钱，拆东墙补西墙地填补债务窟窿的权力。人们发明出了越来越多的新点子，试图给 2008 年以来已经难以为继的“赊欠资本主义”带来第二次春天，即使

它只能维持极短的时间。在欧洲，刚刚擢升为央行主席的高盛前管理者，从履新之初就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同时让国债的买家和卖家继续相互促进，快速增长其交易的出路。迄今为止，专家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宣布的最极致的方案要算2012年秋季的一项计划，旨在用央行新发货币以固定价格无限量收购负债国家的国债，并且只从银行手中收购它们此前从国家购得的债券，即使哪怕是在此前半个小时才刚刚获得的。这样一来，一方面既没有违反原本也并未严格遵守的不得直接向国家提供资助的禁令，另一方面又满足了金融市场的需求，无限量地以面值96%的价格购入某个成员国家的国债，然后立即转手，保证能以96.5%的价格再卖给欧洲央行。

这样做能否再次让当下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继续苟延残喘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还很值得怀疑。很多迹象表明，用这样的方法来购买时间，只能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时间罢了。在面对堆积成山的债务面前，通过无止境的用央行发行的货币来作为建立信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做法让国家面临着这样的风险：这样的手段也总会失去效果，并且人们迅速看穿国家这种通过“自我经营”来给自己筹集资金的把戏——就像笑话故事中的人物吹牛大王明希豪森向别人吹嘘自己掉进沼泽后，自己用手拉扯自己的头发，就能把自己从泥沼中拔出来——而中央银行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有着电子印钞机的“坏银行”。欧央行被赋予作为最后手段的统治的角色，对于像默克尔领导的一类政府来说并非是坏事。对于政府来说，需要做出的对于金融市场“负责”的行为常常

会受到国内民主制度的矛盾性和对抗性的阻碍。所以说，把政府的事务推给央行完全省去了政府很多政治合法性方面的脏活累活。但是，如果央行的政策降格成为无原则的，应对危机的短期行为，不守规矩地打法律擦边球^①或是用保障赢利来奖励银行购买国家债券等举措的话，那么央行本应该享有的信任和专业声誉以及它本身的政策上的可用性都必然会受到损伤。

相应的，央行方面也存在着这样的担忧，如果它过于明目张胆地改革其货币政策并为国家提供资金，就会失去其非政治性的地位。如果央行被普遍地当成政府，它就有可能陷入不再用纯技术的，而是用政治的理由来论证其决策，同时负有义务为此寻求一致认识的境地。^② 一个民主制度中，央行作为一个位于民主进程之外的机构，也许是被提出了太过的要求，也正是因为就连它的财政手段也还不够为新自由

227

① 参见欧洲央行强词夺理的迂回解释为什么在次级市场上无上限购买国债不是——银行禁止的——国家融资，而是货币政策。通过歪曲法律来建立信任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有效的可持续策略。

② 在此，它的行长们可能也会阻碍它的职业转型过程。2012年2月17日“thecurrentmoment”博客写道：“‘在民主国家里，如果你要推动人们去做一件事情，就必须要通过吓唬他们的办法。’在过去的星期二，在哈佛大学一次讨论‘欧元的未来’的圆桌会议上，我们听到了斯马吉（Lorenzo Bini - Smaghi）非常明确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斯马吉直到去年11月还一直是欧洲央行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并为其听众提供了比其个人意见更多的咨询意见。他让我们深入地看到了在这一刻在欧洲占主导，并使用某种特殊的技术来管理情势的技术统治的愿景。在这位银行家的评论中脱颖而出的两点是，第一，对欧元做出的非同寻常的意识形态的承诺；第二，一个关于控制社会的有些张狂的愿景。”见：<http://thecurrentmoment.wordpress.com/2012/02/17/in-a-demo-cracy-you-have-to-push-people-to-do-things-by-scaring-them/>，最后获取时间：2012年11月26日。

主义的经济秩序购买所谓的社会公正的表面现象。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央行在某些政治危机的时候事实上成为政府的先例。20世纪90年代的意大利就属于这种情况。意大利银行行长奎多·卡利（Guido Carli）和卡洛·阿泽里奥·钱皮（Carlo Azeglio Ciampi）在1993年，国家政党体系受到泥垢时代的贪腐事件的影响崩溃后分别担任过总理、财政部长和总统。由一个强大的央行来统治是一个意大利的传统——德拉吉在2006年结束了他的高盛职业生涯之后，被任命为欧洲央行主席之前，也曾经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一职，现在人们在欧洲层面上延续了这一传统。^①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政党政治瓦解后，政府的权力大面积地移转到独立的中央银行手上，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进行整顿政策，并达到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条件是一个跨越各党派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所在。

228

就像在美国一样，借助于综合性货币的危机的诊疗一样也可以在欧洲短期内取得效果：银行家的红利以及他们股东们的分红就又可以分发起来，金融市场为了购买国家债券而索要的风险酬金由于央行接手了风险的关系，也再次变得可以接受。但是这样的举措能否长远有效，并且能否带来经济增长，那就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在欧洲，人们需要的还是这样一种能够承担起再次延长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稳定局面的增长，并且通过这种增长，人们还

^① 包括前欧盟委员蒙蒂作为意大利总理也应该属于要取代政党统治的“专家政府”中的一员。不管怎么样，由于议会长期以来的无能，很多法律在意大利首先就是由政府或者总统政令的形式颁布的。

需要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在欧洲还需要缩小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兼顾到社会公正与市场公正。很引人注意的是，欧洲中央银行主席反复坚持，即使欧央行愿意在危机时刻做出超越其法定委托任务的一切帮助手段，但这仍然不能取代政府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新自由主义政策实际上想要实现的不过就是寻求一个新的有着经济增长的政府，它能够防止此次由央行直接一手导演的货币和债务的膨胀，从而导致财富市场过热发展，继而崩盘，或者是出现一个世界范围的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版本的大型通货膨胀。

如果要想让危机管理不成为下一次危机的前奏，不会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爆发的话，危机管理需要有增长的推动，这种增长，就像其他的政治事物一样，只能作为最近几十年来国家改革转型的结果处于新自由主义的先兆之中。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起统治作用的央行在做出提供所有好处时都要附加很多苛刻的政治条件。至于它能否实现这些东西，则又是另一回事——包括国家，有时特别就是国家本身也会试图投机，因为它们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可能失败。^①并且也没有人能够保障，提供的政策是否就一定能够成功——只要看看 2008 年以来的四年中美国持续的经济滞胀

① 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贝卢斯科尼被欧洲的影子政府用蒙蒂替换掉了，因为他的政府没有能完成特里谢和德拉吉在一封未公开的信件里 (!) 提出的作为贷款回报的一系列要求。然而蒙蒂在他担任总理的第一年任期内看起来不是因为能力不足，就是因为不愿意去履行人们期望他做的事情。

状况。在美国，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灵活政策和宽松的央行货币的组合——目前欧洲也开始实施类似的政策——只不过带来了一个假象中的经济增长，其结果不过是早就注定了周期性危机的出现。即使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新的增长：也与以往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大不相同了，水涨未必能带来所有的船一起增高。^① 根据由金融市场发起的自动的重新分配政策，无论其方法最终多么具有欺骗性，它总是会强制限制国家来保护市场自由和私有财产，特别是国家债券的财产。那么最终经济增长并不能够调和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固有的分配冲突；更加危险的可能情况反而是长期失败者们终于意识到贫富分化累积的马太效应，并且认清了游戏的本质。

必须要有新的增长，如果它的到来能够解决问题，履行调和矛盾的任务，那么它必然在质和量两个方面上都和过去几十年中的大大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国家每五年平均的增长率一直在降低。70年代初，还保持了大约4.5%的经济增长率，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时，最高峰的增长率也只有3.5%。到了危机前，平均增长率只有不到2.7%，在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只降到了不到1%的水平（见图4.1）。能够保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新经济增长需要这一趋势有着根本性的转变，然而目前为止，人们还

^① “涨潮后所有的船都被抬高了”是一句来自美洲大陆西北的海岸国家的民谚，自约翰·肯尼迪以来成为美国一句常用的政治隐喻，它的意义在于，当通过经济增长而使得一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后，对于所有人，无论贫富都带来利好的一种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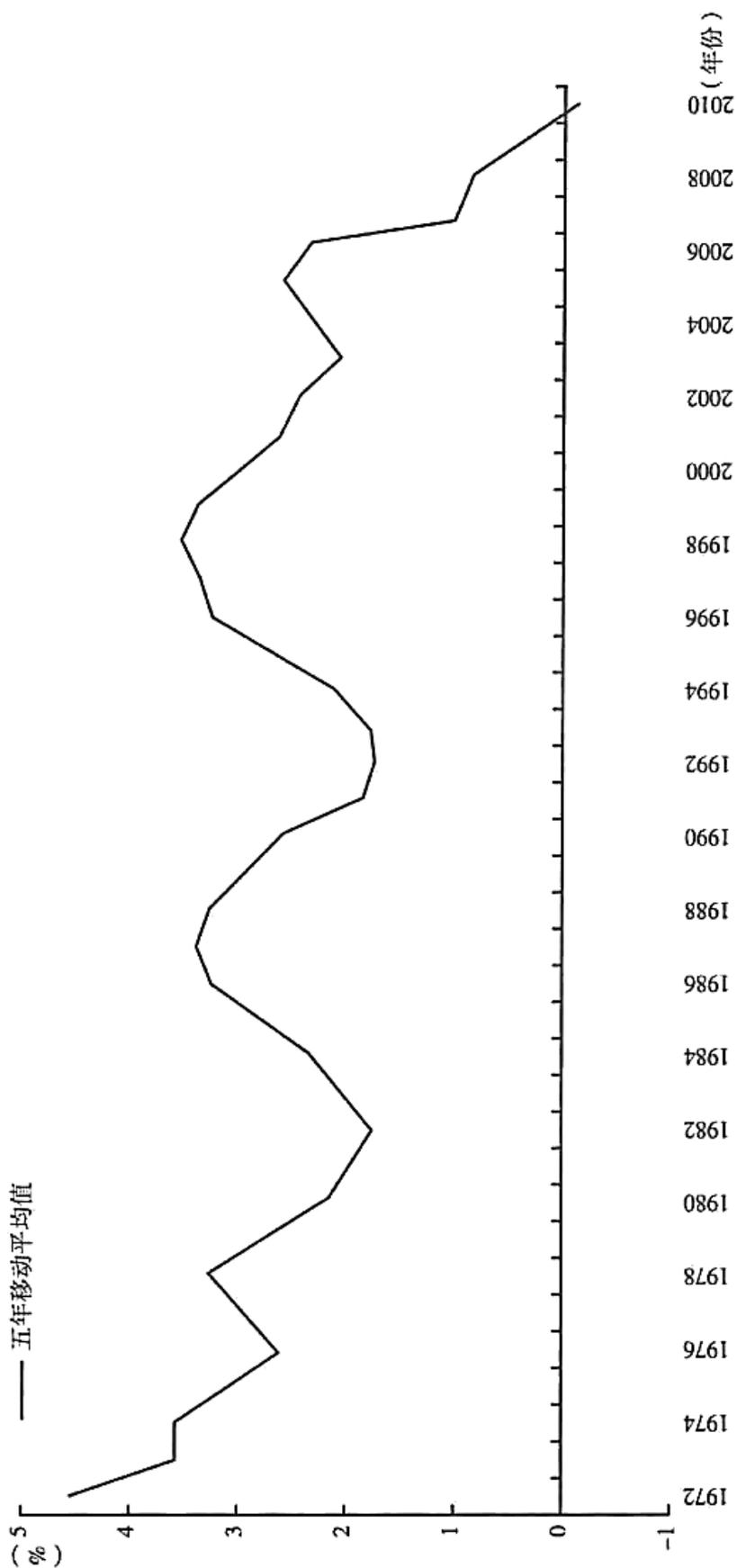


图 4.1 发达国家年平均增长率，1972 ~ 2010 年

包括以下国家未加权平均值：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资料来源：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看不到如何能够产生这样的转变。^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前危机时代，为了产生即使是增长率不断下滑的经济增长，国家越来越多地负债。在美国，整体债务水平——个人家庭、私有和公有企业、金融业和国家——在 1980 年时还在社会总产值的 5 倍以下；在这之后，债务不断上升，到 2008 年时，翻了一番，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9.5 倍之多。德国的情况和美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局部的变化趋势当然受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影响（见图 4.2）。人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猜测：包括这一次，如果要出现人们期盼已久的效果，那就必须要比以往更大幅度的举债才行。看起来很值得怀疑的是，美国和欧洲货币联盟的央行，在没有早已经债台高筑的国家和私人财政的推波助澜下，如何能够新堆积起天文数字的债务。极有可能就像人们要求的那样，还需要——尽管如同任何时候一样，只是有时间限制的——保障 20 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生活水平。即使这种手段成功了，其结果也可以不过是刚从经济滞胀的大雨中出来，就又进入了周期日益缩短的增长萧条周期交替的瓦槽中，最终人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政治信任损失的风险，以及相应的经济崩溃

232

① 2012 年 5 月 7 日左派博客“thecurrentmoment”在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后写道：“萨科齐担任总统期间的在任纪录的焦点就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他本身的经济纲领则远远要弱很多。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在国内的层面停止改革，让一切回到原状，而在欧洲层面通过使用德国信用基金带起新一轮的政府供贷，从而拉动增长……欧洲的新政府，其中包括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府现在依靠的是更多借贷来促进增长。这与其说是欧洲紧缩政策的结束，还不如说是一个可以带来危机的潜在趋势的延续。”见：<http://thecurrentmoment.wordpress.com/2012/05/07/end-of-austerity-europe/>，最后获取时间：2012 年 11 月 2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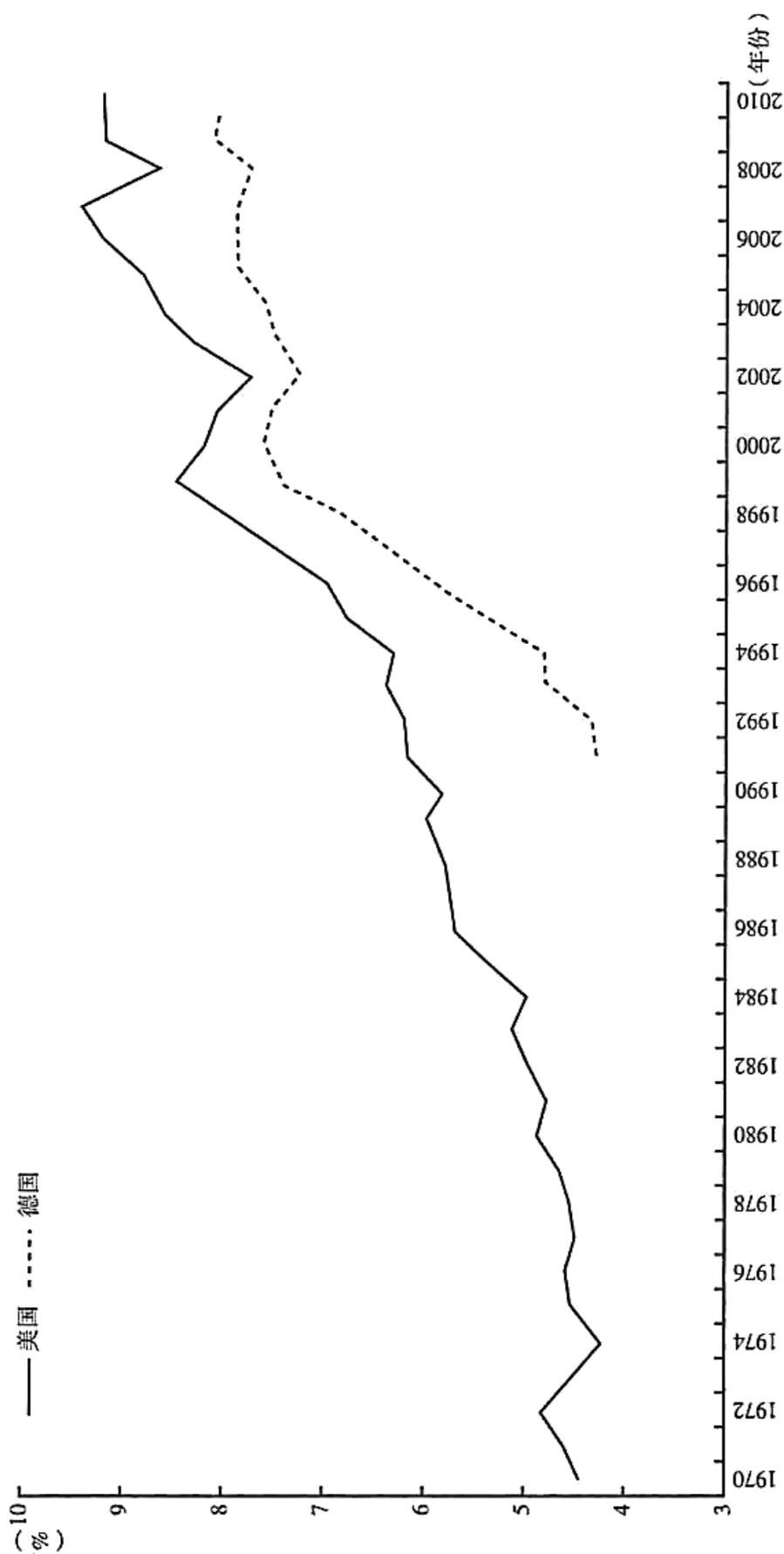


图 4.2 总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1970 ~ 2010 年

资料来源：OECD 国民经济核算统计；OECD 经济展望：统计和预测，当前数据。

的困局。

另外一个可能性则是通货膨胀的回归——作为事故，或者作为减债的策略，一开始可能只是慢慢地、逐步地实施，然后可能会是迈开步伐向前小跑，最后也许是策马扬鞭，失去控制，就像魔法师学徒手中失控了的扫把一样。第一眼望过去，通货膨胀也许是一个战后以来能够重新再用来克服危机周期的一个手段。但是在社会领域，人们是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的。与 20 世纪 70 年代不同的是，今天通货膨胀不是由劳动力市场发动的，而是由央行发起，并且努力通过拯救债务人来达到最终拯救债权人的目的。因此，它不可能像当年那么容易就被遏止。同时，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首先波及有产阶级——因为他们的财产在一个没有资本流动监控的环境中，可以很容易地在各种货币间来回跳跃——而是会更广泛地影响到退休工人和领取社会保障的人士。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工人，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处在一个和 70 年代时完全不同的境地。他们现在没有那么强大的工会力量来保障他们的收入能够基本和通货膨胀保持一致。作为一个能维护群体民主和和平的道具，通货膨胀在今时今日因此会以极快的速度失去效果。然而，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和风险，比如民众的不满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却非常巨大，难以预计。

234

资本主义或民主制度

如果整顿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就连能够带来社会公正的经济增长的幻象都难以营造的话，就真的到了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分道扬镳的时刻了。今天，看起来最有可能的出路是建立一

个完全哈耶克式的社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专制下充分保障市场不受民主制度的修正。如果这种情况实现的话，那么它的合法性依赖于，那些曾经构成了国家人民的人开始学会了把市场公正和社会公正混为一体，并且自我定位为联合起来的市场人民的一部分。此外，它的稳定则需要更为有效的方法和措施，让那些不愿意接受这一制度的人们从意识形态上更加边缘化，政治上更加分散化，在实体上要被控制住。那些不愿意屈从于市场公正的人在政治意志形成过程经济中立化的机制当中已经只能是像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所说的议会外反对抗议活动那样：情绪化，非理性，碎片化，缺乏责任意识——而这正中某些人下怀。当利益诉求发出声音，声明某种优先权的民主途径受到了阻碍，因为它们当中传出来的总是同一种声音，或者说传出来的那些东西对于市场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个替代选项是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国家，或者说至少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资本主义制度。它可能是另外一种，与哈耶克式相竞争的乌托邦。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并不符合历史的潮流，相反却是逆潮流而动的。因此，也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由于已经在组织和实现上有了很多的优势，并且人们往往总是惧怕随着变革而不可避免地到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所以迄今为止，这个替代选择在人们眼里是完全不现实的。^① 同样，它也会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信守其诺言的经验

① 然而这长期以来对于哈耶克式的乌托邦是有效力的，在整个漫长的哈耶克时代都是如此。

出发——只是它并不会归咎于民主制度，而是把责任算到资本主义的头上。^① 在这一方案看来，既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社会的和平，也不是在社会不公加剧的情况下保持社会和平，而是改善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增长排除在外的那些人的境况，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以社会和平以及经济增长为代价。

如果说民主制度意味着，社会公正不能为市场公正做出贡献，并最终自己得到体现，那么民主政治上就必须要把最近四十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进步中做出的体制改革统统取消掉，并且捍卫政治体制中仅存的那些民主成分的东西，并且尽量让它们能发挥作用，在它们的帮助下去按照社会公正配置市场公正，或者甚至是替代市场公正。只有在这样的内容关联中，我们今天来讨论民主制度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被那什么决定权都没有的所谓“民主化”机制给糊弄过去。今天的民主化必须意味着，能够

236

① 这是一个当下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广泛传播的视角，甚至在可能对其接受程度最低的圈子里面也广泛传播。《世界报》2012年1月26日的一篇文章关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报道中提到：“通信巨头阿尔卡特朗讯集团董事会主席本·韦华恩提到了资本主义‘没有完成的承诺’……‘任务在于，从过剩中学习’，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伊尼汉（Brian Moynihan）这样说。但银行家看起来也并非完全有信心：‘我们下一次会做对吗？’当他这样提问的时候，立刻又自己给出了回答：‘这恐怕只有亲爱的上帝知道……’确实，资本主义没有提供像在达沃斯广泛传播的推测……对于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总裁的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来说，问题可能出在更深的层次。他说过，人们认为，经济景气的循环已经得到了控制。实际情况却显示，资本主义‘并不具备管理经济景气水平上升和下降的能力’。更多的还有，‘资本主义也没有解决不公平的问题。’同时‘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人能对此给出答案’。”

建立起再次把市场纳入社会性的控制的机制：劳动力市场要能够给予有保障的生活以空间；商品市场不能破坏自然环境；信贷市场不能导致出现群体性的不可兑现的金融产品。在这些东西没有以很严肃认真的方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它还需要至少很多年的政治动员，以及对当下正在形成的社会秩序持续的干扰。

作为轻率试验的欧元

引入欧元，作为欧洲内部市场的完善，和欧元国家一道建立起了一个政治上的法权，它已经充分接近了人们关于用政治来实现免于受到政治制约的市场经济的理想：这是一种没有议会和政府的政治经济，虽然仍然像以往一样，由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但是它们却永远因为使用共同的货币而放弃了用贬值作为改善其国民经济状况手段的可能性。借此，欧元作为统一的货币就完完全全地在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意义上出于共同市场的基本法则消除了政治权力任意性的一个重要的变体，并要求各个成员国家的政府对国民承担的就业，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安全保障等义务移转到“内部贬值”的新自由主义措施上来：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工资降低，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好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以及一个按照再商品化改进了的福利国家。

237

今天，引入欧元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在这个具体案例中是欧元国家作为高度异质性的，跨民族国家的社会——如何在一个波兰尼所说的已经成了一种宗教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下的“轻率的试验”中，对其多样性的结构，机制以

及丝毫不加区分的，按照标准经济学的蓝图被改建成一个市场社会的典型例子。取消作为一种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贬值无异于把一个统一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强行嫁接在所有使用统一货币的国家之上；它以社会秩序高度和快速趋于一致为前提，并加大促进其发展的力度。同时，它也是市场和关系扩张的附加的动力。这种扩张又被看成是资本主义不断地向外攻城略地，其实现方式则是在被卡尔·波兰尼称为“有计划的放任自流”（geplantes Laissez-faire）中 [Polanyi 1957 (1944), 第 12 章]，试图用市场和它自我调控的自动机制或多或少的运用暴力来替换掉国家及其政治的力量。这样一来，关闭贬值的可能性就与 19 世纪时的金本位制非常相似，它对当时产生的民族国家的能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保护民众不受自由市场的不可控性的侵害。波兰尼印象深刻地结合了这种对于国际关系的稳定施加的影响对此做出了分析。

回顾过去中不难发现，在欧洲当下的经济、金融和财政危机的表现形式中能够看出对于共同货币的市场狂热派持相反态度的政治抵抗运动 [Polanyi 1957 (1944), 第 11 章] 的表达。然而直到不久之前——2011 年秋任命帕帕季莫斯和蒙蒂等委员之前——欧洲货币联盟还仅仅由民主国家构成，它们的政府彼时还不能或者说不愿意向真实存在的与市场资本主义纯理论中的想象出来的模范民众完全不同的国家人民宣战，或者借助于布鲁塞尔的技术统治以及并无多少地域背景的万能经济学家们（Universalökonomen）所规定的“改革”来扭转他们。就如同早期的反抗运动一样，由统一

的欧元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也并不一直都恪守政治修正或是经济合理化的准则；波兰尼本人也清楚，与经济上的放任自流状态的产生不同，社会对于市场的抵抗则是自发和无序的。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跟上为它们设计好的按资本主义制度合理化其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进程的速度，于是在这些国家中就出现了财政预算赤字，国家负债和信贷以及价格的泡沫。虽经历缩减，但仍仅存的用于自我保护的政治工具箱能够帮助它们实现的除了渐渐积累各种多年来一直威胁着欧洲国家体系的安全，并且甚至要葬送欧洲国家战后多年和平局面的系统的功能障碍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现在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就如同是从一本波兰尼的画册中出来的那样。被各自的民族国家代表的人民对于必须把他们的生活屈服于国际市场法则之下的抵抗在拜市场教的武装教会（*ecclesia militans*）看来不过是统治不力的问题。而这种统治不力则又必须并且能够通过更多的同类型的改革来加以解决：通过新的机制，来把民族国家的发声能力和政治任意性的可能性的最后一丝残余力量从体制中彻底清除出去，并且用包括以负面形式存在的如罚款等合理化的刺激手段来代替它们，成为被市场强加的命运潜移默化的进程。以同样的方式，长达几十年的把紧缩政策强加给那些被市场认为不够有竞争力的国家里的小人物们也能够成为现实的话，那么为一个高度异质的多国家社会轻率的试验实施统一货币也就有可能成功。最终改革之后，国家也只能事后慢慢接受在政治上被剥夺权力的现实。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权力，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市场推动的新自由主义趋同运动中，国家已经感受得足够多，并且开始倾听，直到某一个时刻达到了市场理性。

显然，人们对此只能选择相信，但目前还不可能亲眼看见。目前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欧洲各国人民之间以及本国民众内部的冲突不断上升，大家关心的只是谁还欠谁多少钱——一方面是“改革”，另一方面是补偿付款——以及谁是小人物，谁是大人物，谁该承担多少成本，谁又可以享受多少成果。如果谁有着坚定的信仰，可以期待着，现实存在的欧洲各国人民有朝一日——在标准经济学理论的模型中没有预设具体的时间，那么“有朝一日”就有可能意味着立刻、马上——能够共同成长为适应自由市场的，统一到市场公正理念中的模范人民。然而谁不属于这一教派的信徒，则会惊讶于幻象带给人们的力量，对于一个本不属于这个现实世界的理论可能引发的后果而产生恐惧，便也看不到任何的出路。

欧元国家中的民主？

当前正在撕裂欧元区国家的冲突是否可以通过其本身的民主化进程来保持其和平稳定呢？民主能够提供更多的维系力量以对抗由于完全不同的社会被强制进入共同市场和统一货币体系中，并且被夺去各自的一部分政治行动能力而带来的离心力吗？在欧元国家当中，同时存在着国家之间的冲突线和在其近旁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线，民主化能否通过后者来

削弱前者的力量？那些希望通过民主化来解决欧洲经济和国家体系当下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人中的很多人看起来是把民主化想象成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它能够一下子就把各种特殊的障碍长久地扫清，使得长期以来无法推行的跨国家的工资政策、欧洲社会政策、统一的劳动法和参与决策的政府或者是共同地区发展政策顺利得以实施（Bofinger et al. 2012）。

对各种可能性的投机可能很容易就会结束在无底深渊中，特别是当它把自己和希望以及自己强加的义务联系在一起创造出乐观的情绪来。当然也许人们可以就此达成一致，即人们为了欧洲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项目的话，就必须断然与那种新自由主义策略的强势人物如沃尔夫冈·朔依布勒（Wolfgang Schäuble）的“政治联盟”的项目区别开来，后者不过是为了给哈耶克化的中央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完全统治”大开方便之门罢了。只要各种委员会或者理事会的主席相对于欧洲央行行长或是欧洲法庭院长——更不要谈和高盛的总裁相比了——毫无话语权，那么，他们是否“由人民”选举出来，其实都已经和民主制度毫无关系了。所以说“表面民主”（Fassadendemokratie, Bofinger et al. 2012）这个概念放在一个法理或者事实上的宪法有义务不干预市场的自我运行的政治体系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一个要能够满足一位“欧洲财政部部长”保障为市场服务，同时能够重新赢得其信任的需要的民主项目，是不需要民主派的汗水的——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回避将民主问题和新自由主义问题甚至是资本主义问题联系起来的民主制度。它就

那样，如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求那样，顺其自然地运行了。

第二，为欧洲设计的民主制度还不能太过乌托邦，至少不能像 2008 年以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市场那样。这意味着，它必须避免再次把经济和社会，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截然分开处理的错误。实际上，两者之间是非常深入地交织在一起的。就像不同的生活方式下，如果不使用暴力是很难将统一的经济方式贯彻实施下去的，完全同样的道理，很难想象不同的经济和生活方式能够毫无阻力地塞进一个共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中。^① 欧洲的民主不能成为在机构上搞霸权；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民主制度可以也能够胜任把历史上形成的欧洲各国家之间，有时候甚至是一国之内的民族差异整合到统一的秩序之中的艰巨任务。^② 即使是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只由两个社会组成，并且已经长期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国度，却由于金融和财政危机在欧元国家中的新情况，因为民族认同性和分配冲突的不和谐因素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最近也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又重新建立起国家政府。所以现在为欧洲制定宪法的人就必须能应对这一类的问题，242 只是这种问题在欧洲的层面上将会多样化和复杂无数倍，并且所有的东西要能够一次性的，不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民主

① 可参见一直以来屡次失败的要把德国工业民主政治中的工会在企业决策层面的参与决定权形式作为一种增强劳方代表性的欧洲模式出售给其他欧洲国家工会的尝试。

② 关于由于参与的各国社会的高度异质性而给统一欧洲一体化和民主化带来的各种问题，Höpner 和 Schäfer 提供了很好的概述（2012）。另参见 Höpner、Schäfer 和 Zimmermann（2012）。

宪法的框架内，而是作为一个新的宪法产生的全部预备工作。

在真实存在的欧洲当中，一个中央集权主义的雅各宾专政式的宪法对于民主的欧洲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联邦制的分权以及在较大范围内兼顾特殊性的自治和保留权力，没有保护为数众多的、不同的、因为地域邻近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和身份认同群体不被多数派同化——欧洲正是由这些群体组成，并面临这种复杂的状况，这不仅表现在比利时，而且也在西班牙、意大利国内，还表现在芬兰和希腊或者丹麦和德国的关系上——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欧洲民主制度。^① 现在为全欧洲书写一部宪法的人就必须找到出路，来调和诸如保加利亚和荷兰这样的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者是找到办法来面对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内还存在着的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同时，它们内部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多样性也要求，必须要同时在一个可以想象的欧洲宪法中得到代表。^② 把所有这些都统统纳入一个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接受的宪法之中，在政治上是一个赫拉克勒斯的243 任务，敢于去做需要无比巨大创造性的乐观精神，这与新自

① 比如说一部后国家时代的欧洲宪法必须保留一些限制德国绝对领导地位的保障性条款以便一些小的或者经济上弱的国家能够接受，这样一来，它对于德国来说也正因为如此变得很难接受。

② 欧洲国民大会恐怕还没有召开，就必须要先讨论清楚比如加泰罗尼亚的议会代表是否必须或者可以坐在西班牙还是加泰罗尼亚的旗帜后面。接下来可能要讨论的还有巴斯肯、科西嘉、弗莱明、南蒂罗尔、西西里，甚至可能还有巴伐利亚。

由主义的市场技术统治者们比起来也丝毫不遑多让。^①

第三，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进程花了几十年时间，意欲慢慢地实现其构想，然而直到今天，却陷入了迄今最大的危机，希望通过向前发展再度从危机中逃离出来，欧洲的再度民主化也需要时间。跨国家的欧洲民主制度的机构作为从大脑中诞生的唯意志论并不能产生，人们没有历史上的榜样以供参考，而又不得不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作为建设的材料。共同起草欧洲宪法的委员会只可能是从现在活着的那些政治家中的熟面孔组成。它应该包括欧盟中的全部代表，而不仅是货币联盟成员国的代表。在这些代表周围围绕着的有关财政整顿、减少负债、监管和“改革”的冲突使得整体气氛升温，增大了相互间的不信任，并对咨询的结果预先做出判断时，委员会就必须开始工作了。直到出现一部能够让欧洲统一，并且有可能让欧元国家通过市场资本主义新的羁 244
绊民主化的宪法，则要过去很多年的时间了。

① 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乐观主义精神。博芬格、哈贝马斯和尼达-鲁莫林（Nida-Rümelin）都认为有可能在解决当下危机的进程中，即在不久的将来，走上一条条约改变的道路，这意味着，所有的27个欧盟成员国都同意“建立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核心欧洲的货币区”。对此，他们详细阐述道：“这要求有着清楚的宪法政治上关于超国家民主制度的设想，它既要能够允许共同的统治，又不能采用一个联邦国家的形式。欧洲联邦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模式，并且会过度损耗历史形成的独立的欧洲各族人民对于团结的意愿。今天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进行了的机构的深化则可以认为是由那样一种民主的核心欧洲应该代表欧洲货币联盟国家的全体民众的理念而来，但是其代表每个个体则是双重的特性，一方面直接地参与到了改革了的联盟中的公民，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其中的某个欧洲民族中间接的参与成员（Bofinger et al. 2012）。”不清楚的却是，为什么这个“宪法政治的设想”应该是清楚的。哪些问题应该在上述两个自我认同性的框架内讨论和决定？

欧洲社会的异质性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成为不同地方、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生活以及经济方式的异质性。统一的欧洲的民主宪法也只能在尊重和认可这些异质性的差异之上才有可能，从而它必然要认可自治权。如果拒绝这些，就必然会导致分裂主义。分裂主义要么用金钱来收买，要么就通过暴力方式来镇压；一国的民众异质性越大，那么其历史上试图把国家统一起来的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尝试都会越发的血腥：在这里只需要想想法国、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甚至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例子。对于异质的国家社会来说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它的财政立宪，它规定着社会上的哪一个部分作为一个社群，在哪种情况下有权要求全社会其他部分提供集体团结的帮助。在各民族国家当中的情况也是：越多自治权，相应的社会间团结的权利和义务都越小。关于这些具体意味着什么样的冲突从来都一直存在，即使是在德国这样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民族国家的社会中，各州之间的财政平衡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在欧元国家中，极大的异质性带来的此类冲突就会更加剧烈，不用几年时间就会形成很深刻的问题，无法用统一的少数服从多数形成的决议来规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乌托邦式的一刀切机制在局部地区保有分离自治主义选项的时候，挑衅了它们出于社会公正对市场公正进行修正、对不同社会部分之间补偿平衡支付的要求。没有任何理由去奢望地区性的或者国家内的特殊利益诉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和身份认同上的冲突会突然消失，只要共同货币区内过于异质的社会有了一部统一的民主的宪法就能解决

问题。^①

哈耶克设计的必然走向自由主义的国际化联邦的想法的错误在于他相信，所有参与进来的民族社会都可以也甘愿去适应由中央政府为了“美好的和平”愿望而建立的自由和一般的市场，并能够在联邦中找到它们集体的特殊利益诉求和集体身份认同。但是，他们会努力在其文化特殊性之上通过利用仅存的最后的政治机制来捍卫自己的生活和经济方式，这是哈氏没有想到的——也许，正是因为哈氏眼中，这些不过是文在一个所谓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外部皮肤上任意的文身而已；或者因为集体行动对抗市场公正在民主制度方面的可能性在哈耶克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吧。

赞誉贬值

除了眼睁睁看着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如何通过“改革”使货币联盟更加完善，使得市场能够有效地防止政治手段的修正以及作为国际整顿国家的欧洲国家体系更加巩固，人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提醒自己和别人，国家的货币还存在着贬值的机制。贬值的权利完全是一种对于作为各自的民族表示尊重的机制，它们是独特的经济生活和命运的共

246

① 人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欧洲央行耍的某种手段，而是因为欧洲议会中形成了多数票的决议，德国的纳税人就会为意大利的国家债务或者西班牙的银行债务心甘情愿地买单。相反，正是用议会决定的道路才更难掩饰某些做法的真正目的。

和在大内部市场的自由贸易世界中要被驱逐的利益和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按照市场要求的顺从地进行自我调节之外的现实的替代选择。那些能够贬值的国家，他们就可以自己来决定，是否，或者以多快速度摆脱其前资本主义的或者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遗产，并且让它们朝着哪个方面来进行变革。因此，与其他一切因素相比，贬值的可能性对于统一市场的集权统治来说犹如眼中钉肉中刺。

一国货币的贬值——从粗线条层面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修正了在国际经济交换中不对称体系的分配关系，它同任何资本主义的系统一样按照累积利益的原则起作用。贬值是个很粗糙的技术手段——就像司法上的简易判决程序——但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它总是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无论是实际上跟不上节奏，还是尚不想跟上发展的步伐，这个时候只要它实施货币贬值，那么国外产品的出口机会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国内产品的出口机会就会改善。于是本国的就业机会就会以牺牲别国更好的就业机会为代价得到改善。当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时，进口就会更加昂贵，这时生活水平更高的国民在购买外国商品时就会更加困难；与此同时，该国产品在国外不会卖得更贵，从而依靠工薪生活的人能获得更高的工资，也就不会陷入失业的窘境。换言之，一国货币可以贬值的可能性有效地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高竞争力”国家迫使“低竞争力”国家缩减其低收入人群的养老金，来让本国的那些高收入人群可以继续高枕无忧地用固定的价格买到“高竞争力”国家生产商提供的豪华轿车。

货币贬值作为一种手段，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相当于体育比赛中通行于高尔夫球或者赛马中参与选手差别过大时的让分制度（Handicap）。这时，如果没有一个平衡手段的话，游戏会很快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赢的人总赢，输的人总输。为了让较弱的选手也愿意参加比赛，就会在竞争中让强者先处于一定的劣势：在高尔夫球比赛中，可以给弱一些的选手配发一定量的不算杆数的挥杆，而在赛马中，对于有希望夺冠的种子选手，则是强行要求他们承担一些额外的重量负荷。在一国政治经济中的累进税制（progressive Besteuerung）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制度设计，或者说至少是想达到这样的效果。^① 因此，取消在欧洲货币联盟中的贬值权就相当于是在一个国家的收入税制度中取消梯级税收，或是在体育比赛中取消让分制度一样。

一个允许货币贬值的国家经济体系在没有某一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地区或成员国家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实施干预权的情况下也仍然能够运行得很好。它宽容了多样性，并且允许国与国之间既维护各自自治权又可以合作的和平共处。这样的经济体系既不需要“主导地位”国家能够让“后进”国家按先进的榜样来改革自身；也不需要后者发给前者一个牌照，以换取更多的财政支持。也就是说，今天，

248

①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地区政策”（Regionalpolitik）上，这种政策就是从强势的一方索取一些，然后给予弱势的一方，目的在于有朝一日弱的一方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强的一方。然后与贬值不同的在于，该项政策需要强势的一方不断的同意，作为对强势方的回报，给予者要能够对他们给付的补贴有监督权。这样一来又往往会出现很典型的激怒接受者的状况。同时如前所述，地区政策也不断地提出让自己越发变得多余的要求。

人们取消当下正在使用的欧元就和 20 世纪 20 年代人们放弃金本位制度存在着类似的地方。这在波兰尼看来，就又成为可能：

心甘情愿地接受其他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制定自己的政策机制，从而把那些有害的 19 世纪的关于所有纳入世界经济的国内政权必须要有统一性的教条理念抛到脑后 [Polanyi 1957 (1944), 253]。^①

无疑是结合 1944 年当时的战后秩序，波兰尼又接着写道：

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从旧世界的废墟中树立起了一个新的世界的基石：政府间的经济合作可以同按各自的意愿来组织其民族国家的生活的自由结合在一起 [Polanyi 1957 (1944), 254]。

灵活的货币管理——如果欧元结束后也应该形成那样的体系——会认可，政治不只是合理化措施的专业执行者，并且也会出于由政治代表的集体身份认同和传统的尊重而承认其在自身秩序中的中心地位。承认并允许货币贬值的国际经济体系，恰恰正是如哈耶克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智能的分配

① 所有出自《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的引言都是由我自己翻译的。

体系，而不需要“自负的知识”（Anmaßung von Wissen, Hayek 1975）就能够运转自如。哈耶克当然有理由坚持他的观点，认为这样的一个体系优于中央计划的系统；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的视角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局限的，这一点上，波兰尼则在他与哈耶克的论辩中深刻地洞见到，在哈耶克看来属于自然状态的，并且在他构想的可以促进世界和平的自由联邦中必然能够实现的符合市场公正和市场要求的跨国资本主义世界恰恰只能够通过计划才能创造出来。因为实现这一状态的前提就是打破既往的一切社会共同生活和社会团结中的结构。

249

贬值的统治政权可以使得所有参与到其中的国家免于必须就关于结构改革和补偿支付进行协商。“高竞争力”国家干涉入“低竞争力”国家内部和诸如“增长一揽子方案”（Wachstumspakete）一样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类似的增长方案总是会处于一种误读的危险之中。接受的国家会把它误解成一种进入市场的费用或是国家间“竞争力”的赋税，同时，有义务支付这些款项的国家也会因此而拒绝提供。国际冲突只会在某个国家过于频繁，或者在过于短的时间间隔内贬值其货币的时候发生。然而一个国家如果通过消费其信用成本，阶段性地重塑其出口能力归根结底是得不偿失的。仅因为这一点，就不必担心一些国家过度的使用贬值的可能性来改善其市场位置。^①

① 在这个以及其他的某些观点看来，贬值与“主权行为”的减债是有着可以相比较之处的。两者都是社会能够在资本主义食物链的尽头通过使用国家主权来自我保护不受过快和影响过大的资本主义扩张侵害的手段。

欧洲布雷顿森林

250 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尽管在欧元区内，国家间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它在没有同时取消掉了国家层面上的民族国家以及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就已经消除了贬值的可能性。^① 如果不向前一步，使这个错误继续扩大，或者不通过再用一个“政治联盟”来使货币联盟更加臻于完美，以至于一个整顿国家最终加冕，但只要危机最终的出路还并没有最终尘埃落定，人们或许可以试试，重新回到一个有着灵活兑换汇率的欧洲，就好像从来没有过统一货币一样。^②

这样一个尊重和认可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差异的体系，应该会比试图用一刀切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比货币联盟更加简便易行。没有统一设计者的“一个适应所有人的尺寸”（one - size - fits - all）的混合体，该体系也能运行，它需要的不是把各个参与国家交融在一起，而是让它们形成一个松散的平衡结合。这样一来，欧洲各族人民之间的嫉妒和仇恨的基础就彻底抽离了。政治上，欧洲的货币统治一旦实现灵活自由化就意味着北方出口国家，特别是德国，和南部的国家机器及其中产阶级之间组成的联盟的终结。迄今，这一联盟还在共同努力缩减地中海国家中

① 那些很早就异常清晰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并且预见到了欧元项目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的人中还包括美国保守主义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关于他的论点的综述参见 Feldstein（2011）。

② 弗里茨·沙普夫（Fritz Scharpf）在最近几年多次以非常清晰的方式罗列了关于欧洲政治这样的转型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的原因（Scharpf 2010；2011a；b）。

下层劳动者的工资和养老金，好让这些国家中的城市中产阶级能够以固定的价格消费得起由德国生产的奢侈轿车，同时德国的生产商也能以一个长期稳定的汇率来进行计算。在这个联盟中，南部负债国家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家们利用从市场和 国家组织借来的权力让国民屈从于国家市场公正法则，并以此作为对于北方国家提供的财政和道义支持的回报。

受到凯恩斯影响而建立的有着固定的，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修正的汇率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可能是新的欧洲货币体系的榜样。该体系当年的作用在于，能够把法国和意大利这样有着强大的工会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国家长久地吸纳到西方的自由贸易体系中来，而不是去强迫它们做出“改革”，以动摇其维系社会的根本，并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这一体系内在的智慧体现在，它放弃了强制要求各种国家内部秩序上的逐步趋同以及强势国家慢慢对于弱势国家展开“完全统治”。^① 这样，该体系至少在形式上尊重了各个成员国家的主权和其内政。^② 有些国家，因为工资让步以及更为慷慨的社会保障福利而导致其竞争力下降，则可以时不时地通

① 美国人可以在货币体系之外做他们能做的事情，好让意大利的共产党始终无法入主政府或者分裂意大利和法国共产主义领导的统一工会，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怎么样，美国在战后的二三十年内还是出于其罗斯福新政的传统宽容了在其西欧势力范围中的一些社会民主政府。

② 不是所有的社会秩序都值得人们这么做。另一方面，也不是每个不值得人们这样做的社会秩序都值得人们从外部去彻底改造它们。只有在极少数的极端个案中，一个社会才会糟糕到需要别的社会有义务去帮助改造它——特别是当美国大量的国家构建的实例显示，这样做一般来说不仅花费巨大，同时也是收效甚微。

252 过货币贬值的方法来平衡它们与高竞争力国家之间的差异。^① 然而贬值的手段也如前所述，不能任意多次的使用，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到出口的国家，工业部分以及企业的利益以及信誉方面的需要。因此，它只能作为一个最终有效手段（*ultima ratio*）在得到联盟中其他成员许可后方能实施。

为欧洲设计出一个能够取代当前的欧洲货币联盟地位的，同时有着固定和灵活兑换汇率的，适应时代的新体系究竟是什么样，值得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们花上很多汗水。^② 这可以有一系列具有可比性的模式，几乎每种模式，人们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时曾经实施过的欧洲“蛇形浮动货币汇率制”^③。无论如何这都应该是各国货币之间有着灵活性的连接，通过尊重各国家的主权以保障民族国家的民主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不是强行使用统一的货币。与此同时，也不一定要取消欧元，它可以在各国的本国货币之外，继续以一种储备货币或者是参照货币的形式存在下去。它的作用大约有些像凯恩斯建议并命名为“班科”（*Bancor*）的人造货币。美国最终拒绝了这一货币，因为它想要取代美元既定的功能。业内人士也将会寻找新的途径，如何保护届时重新建立起来的各国货币免受

① 在有着左派政治传统的国家中的选民和工会成员有机会通过增加进口商品的购买者以及外国商品生产商的花费来提高自己的实际收入，并以此来使收入分配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发生变化。

② 作为导论，参见 Scharpf (2012)

③ *Europäische Währungsschlange*，官方称为“欧洲汇率联盟”。——译者注

投机炒作的攻击，这样一来就可能有必要要求重新回到资本流动监管的老政策上去。^① 同样也必须解释清楚的是，如果从统一货币欧元回到各自货币的代价有多大；很多观点认为短期的费用以及长期的后续资金投入恐怕要更大于目前在希腊或者西班牙已经被宣判为失败的救市方案的花费。^②

从欧洲统一货币体系中脱离出来，这看起来和当下在应对所谓的“全球化”时的所谓的划界政策非常相似。全球化要求这个世界屈从于一个统一的、趋同的市场法则，而拒绝全球化的人，就一定会固守住欧元货币，因为它带给欧洲的效果就如同全球化对于这个世界一样。欧元曾经，并且现在也仍然是 20 世纪 90 年代时人们陷入全球化的狂喜时的产物，以那个角度来看，国家的行动能力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可以缺失的。建立一个欧洲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在今天这个新自由主义转向即将大功告成时刻的语境中简直如同 20 世纪 70 年代被视为体制爆炸性的改革方案：对于一个系统性的危机做出了战略性的回答，它告诉世人，没有国家的主权，社会民主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空谈罢了。通过这一事实，它指出了解决体系危机的方法存在于体系之外。^③

① 然而在最后的多年里丹麦克朗、瑞典克朗、英镑或者其他欧洲国家货币并未遭遇攻击。这反驳了只有一个像欧元这样的“大”货币才会安全，不会被像索罗斯那样的投机商炒翻的论点。

② 此外，国际各家银行和企业早就做好准备以防欧元停用，并且这在 2012 年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见 2012 年 9 月 3 日《纽约时报》文章《美国企业在希腊退出欧元时的支撑》。

③ 如果说告别欧元就意味着回到所谓的小国状态，这不过是耸人听闻的说法。只要看看英国和瑞典这样的国家，它们的社会在没有欧元的情况下依然是当今最为开放的社会。（如果说因为英国没有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伦敦的“欧洲”程度就低于索菲亚，这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十分可笑。）关于“开明保护主义的主张”，参见 Hüpner (2012)。另见 Hüpner 和 Schäfer (2012)。

赢得时间

254 欧洲货币联盟作为一个无所顾忌的技术性现代化项目，在政治上剥夺了实际存在着的构成欧洲人民的各个主权国家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在经济上分裂了他们。当下人们提出的取消货币联盟的要求看起来则是民主制度对于自认为是唯一选择的新自由主义整顿及合理化政策引发的合法性危机的理所当然的回答。它与要求把负债国家从欧元国家中排除出去的民族主义的要求从根本上是有区别的；它的目标不在于惩罚，而是解放那些今天处在可能永远被市场体系俘获，世世代代扮演着失败者和乞求者角色的危险境地的国家，给他们重新恢复声誉。并且这不是事关捍卫不公平，而恰恰相反，它正是关涉了作为欧洲人民走向统一的唯一道路的政治平衡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现在却正面临着以欧元为手段的统一市场的威胁。

建立欧洲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是对可以预见的针对欧元狂热派妄图通过市场技术统治而实现彻底统治以及最终整顿国家的完全机制化的“街头”抗争在公共政治话语的层面上补充。它最终的作用在于能够为建立新的政治行动能力以对抗新自由主义去民主化运动的进程争取时间。捍卫民主发展的前景的前提必然在于，无论现代社会的国家组织有多么值得怀疑，都不应该通过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来克制民族国家。更好的方法则应该是暂时利用好民族国家中仅存的民主机制，来减缓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拓展进程。在今天的情况下，当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进步的功能性随从中的

后国家民主之上时，^① 这种策略就完全落入了自我调控的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工程师手中；这一制度最终能够带来什么，2008年的经济危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足够说明问题的初步印象。

在今天的西欧，最大的危险已经不是民族主义问题，更不要说德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相反却是哈耶克式的市场自由主义。货币联盟的最终完善将给欧洲的国家民主制度以及唯一的还能够用以对抗整顿国家的机制的终结盖上印章。如果说历史上形成的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过大，以至于无法在可预见的将来纳入一个共同的民主制度之下，那么能够代表这些差异的机制就有可能作为次优方案被使用，来防止欧洲滑向一个没有民主的统一市场国家的状态。只要当人们没有找到最优方案的时候，这个次优方案就是最优的选择。

① 哈贝马斯以令人惊讶的确信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动力学机制……它可以被描述为功能强制性的开放和社会一体化的锁闭在各自较高水平层次上的交互游戏（Assheuer 2008）”。如果我们能够充分信任这样一种动力学机制，那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参考文献

- Adorno, Theodor W. (1979 [1968]), »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Einleitungsvortrag zum 16. Deutschen Soziologentag«, in: ders.,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 Frankfurt/M.: Suhrkamp, S. 354-370.
- Agnoli, Johannes (1967), *Die Transformation der Demokratie*, Berlin: Voltaire.
- Alesina, Alberto, u. a. (2012), *The Output Effect of Fiscal Consolidations*, Cambridge.
- Alesina, Alberto, Roberto Perotti (1999), »Budget Deficits and Budget Institutions«, in: James M. Poterba, Jürgen von Hagen (Hg.), *Fiscal Institution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 13-36.
- Assheuer, Thomas (2008), »Nach dem Bankrott. Thomas Assheuer im Interview mit Jürgen Habermas«, in: *Die Zeit*, 6. November 2008.
- Bach, Stefan (2012), »Vermögensabgaben – ein Beitrag zur Sanierung der Staatsfinanzen in Europa«, in: *DIW Wochenbericht 2012*, S. 3-11.
- Beckert, Jens (2004), »Der Streit um die Erbschaftssteuer«, in: *Leviathan* 32 (2004), S. 543-557.
- (2009), *Die Anspruchsinfation des Wirtschaftssystems*, Köln.
- (2012), *Capitalism as a System of Contingent Expectations.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Economic Dynamics*, Köln.
- Bell, Daniel (1976a),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6b), »The Public Household. On »Fiscal Sociology« and the Liberal Society«, in: der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S. 220-282 (Kap. 6).
- Bergmann, Joachim, u. a. (1969), »Herrschaft, Klassenverhältnisse und Schichtung. Referat auf dem Soziologentag 1968«, in: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Soziologentags*, Stuttgart, S. 67-87.
- Block, Fred (2009), »Read Their Lips. Taxation and the Right-Wing Agenda«, in: Martin, Isaac William, u. a. (Hg.), *The New Fiscal Sociology. Taxation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 68-85.

- Bofinger, Peter, u. a. (2012), »Einspruch gegen die Fassadendemokrati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August 2012, S. 33.
- Böhm-Bawerk, Eugen von (1968 [1914]), »Macht oder ökonomisches Gesetz?«, in: Franz X. Weiss (Hg.),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Eugen von Böhm-Bawerk*, Frankfurt/M.: TOPOS, S. 230-300.
- Boltanski, Luc, Ève Chiapello (2005),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dt.: *Der neue Geist des Kapitalismus*, Konstanz: UvK Universitätsverlag 2006).
- Brenner, Robert (2006),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 London, New York: Verso.
- Buchanan, James M. (2003), *Public Choic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Research Program*, Fairfax.
- , Tullock, Gordon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Liberty Fund.
-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2012), *Jahres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m Stand der Deutschen Einheit 2012*, Berlin.
- Canedo, Eduardo (2008), *The Rise of the Deregulation Movement in Modern America, 1957-1980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 Castles, Francis G., u. a. (2010), »Introduction«, in: Castles, Francis G., u. a. (Hg.),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 1-15.
- Citigroup Research (2005), *Plutonomy. Buying Luxury, Explaining Global Imbalances*. 16. Oktober 2005.
- (2006), *Revisiting Plutonomy. The Rich Getting Richer*. 5. März 2006.
- Citrin, Jack (1979), »Do People Want Something for Nothing. Public Opinion on Taxe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in: *National Tax Journal* 32 (1979), S. 113-129.
- (2009), »Proposition 13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lifornia Government«, in: *The Californi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Policy* 1 (2009), S. 1-9.
-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u. a. (1988), *Social Europe.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the Internal Market. Interim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Luxemburg: European Commission.
- Crouch, Colin (2004), *Post-Democracy*, Cambridge: John Wiley & Sons (dt.: *Postdemokratie*, Frankfurt/M.: Suhrkamp 2008).
- (2009), »Privatised Keynesianism. An Unacknowledged Policy

- Regime«, 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 (2009), S. 382-399.
- , Pizzorno, Alessandro (Hg.) (1978),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Two Volum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Crozier, Michel J., u. a. (1975),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 Dahrendorf, Ralf (2009), »Vom Sparkapitalismus zum Pumpkapitalismus«, in: *Cicero Online*, 23. Juli 2009.
- Doering-Manteuffel, Anselm, Raphael, Lutz (2008), *Nach dem Boom. Perspektiven auf die Zeitgeschichte seit 197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Durkheim, Émile (1977 [1893]), *Über soziale Arbeitsteilung*, Frankfurt/M.: Suhrkamp.
- Emmenegger, Patrick, u. a. (Hg.) (2012), *The Age of Dualization. The Changing Face of Inequality in De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osta (1985),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The Social-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tzioni, Amitai (1968), *The Active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dt.: *Die aktive Gesellschaft*, Wiesbad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2009).
- (1988),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dt.: *Jenseits des Egoismus-Prinzips*, Frankfurt/M.: Fischer 1996).
- Feldstein, Martin S. (2011), *The Euro and European Economic Conditions. Working Paper 17617*, Cambridge.
- Finansdepartementet (2001), *An Account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1990s*, Stockholm.
- Flanagan, Robert J., Ulman, Lloyd (1971), *Wage Restraint. A Study of Incomes Policy in Western Eur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itz, Wolfgang, Mikl-Horke, Gertraude (2007), *Rudolf Goldscheid. Finanzsoziologie und eth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Wien: Lit.
- Gabor, Daniela (2012), *Fiscal Policy in (European) Hard Times. Financialization a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Rethinking Financial Mar-*

- kets, World Economics Association (WEA), 1. bis 30. November 2012.
- Gamble, Andrew (1988), *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 Basingstoke: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anghof, Steffen (2004), *Wer regiert in der Steuerpolitik? Einkommenssteuerreform zwischen internationalem Wettbewerb und nationalen Verteilungskonflikten*, Frankfurt/M.: Campus.
- , Philip Genschel (2008), »Taxation and Democracy in the EU«, i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5 (2008), S. 58-77.
- Genschel, Philip, Schwarz, Peter (2013), »Tax Competition and Fiscal Democracy«, in: Schäfer, Armin, u. a. (Hg.),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Cambridge: John Wiley & Sons.
- Gerber, David J. (1988), »Constitutionalizing the Economy. German Neo-Liberalism, Competition Law and the ›New Europ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2 (1988), S. 25-84.
-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in: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5 (1994), S. 97-147.
- Glyn, Andrew (2006), *Capitalism Unleashed. Finance Globalization and Welf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scheid, Rudolf (1926), »Staat, öffentlicher Haushalt und Gesellschaft«, in: Gerloff, Wilhelm, Meisel, Franz (Hg.), *Handbuch der Finanzwissenschaft*, Bd. 1, Tübingen: Mohr Siebeck, S. 146-184.
- (1976 [1917]), »Finanzwissenschaft und Soziologie«, in: Hickel, Rudolf (Hg.) *Die Finanzkrise des Steuerstaats. Beiträge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r Staatsfinanzen*, Frankfurt/M.: Suhrkamp, S. 317-328.
- Goldthorpe, John (1978), »The Current Inflation. Towards a Sociological Account«, in: Hirsch, Fred, u. a. (H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l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 186-216.
- (Hg.) (1984),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rz, André (1967), *Zur Strategie der Arbeiterbewegung im Neokapitalismus*, Frankfurt/M.: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 (1974), *Kritik der Arbeitsteilung*, Frankfurt/M.: Fischer.
- Graeber, David (2011),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Brooklyn,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dt.: *Schulden*, Stuttgart: Klett-Cotta 2012).
- Greif, Avner (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Laitin, David A. (2004), »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 (2004), S. 633-652.
- Grözinger, Herbert (2012), »Griechenland. Von den Amerikas lernen, heißt siegen lernen«,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2012), S. 35-39.
- Guichard, Stephanie, u. a. (2007), *What Affects Fiscal Consolidation? – Some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9th Banca d'Italia Workshop on Public Finances, Rome, S. 223-245.
- Habermas, Jürgen (1969),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M.: Suhrkamp.
- (1973),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M.: Suhrkamp.
- (1975),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Suhrkamp.
- Hacker, Jacob, Pierson, Paul (2010), »Winner-Take-All Politics.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Precipitous Rise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38 (2010), S. 152-204.
- , (2011),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Hall, Peter A., Soskice, David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Hall, Peter A., u. a. (Hg.),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 1-68.
- Hardin, Garrett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Science* 162 (1968), S. 1243-1248.
- Hassel, Anke (1999), »The Erosion of the German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37 (1999), S. 483-505.
- Hayek, Friedrich A. (1967 [1950]), »Full Employment, Planning and Inflation«, 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67 [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 270-279.
- (1971), *Die Verfassung der Freihei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 (1975), »Die Anmaßung von Wissen«, in: *Ordo* 26 (1975), S. 12-21.
- (1980), *Recht, Gesetzgebung und Freiheit*, Bd. 1, Landsberg am Lech: verlag moderne industrie.
- (1980 [1939]),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Interstate Federa-

- lism«, in: Hayek, Friedrich A. (Hg.)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 255-272.
- (1981), *Recht, Gesetzgebung und Freiheit*, Bd. 2, Landsberg am Lech: verlag moderne industrie.
- Henriksson, Jens (2007), *Ten Lessons about Budget Consolidation. Bruegel Essay and Lecture Series*, Brüssel.
- Hessel, Stéphane (2010), *Indignez-vous!*, Paris: Indigène.
- Hien, Josef (2012), *The Black International Catholics or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Italy and Germany and Their Religious Foundations*, Florenz.
- Hirsch, Fred, Goldthorpe, John (Hg.) (197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l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82), »Riv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ket Society.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 (1982), S. 1463-1484.
- Höpner, Martin (2003), *Wer beherrscht die Unternehmen? Shareholder Value, Managerherrschaft und Mitbestimmung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M., New York: Campus.
- (2012), »Nationale Spielräume sollten verteidigt werden«, in: *Die Mitbestimmung* 58 (2012), S. 46-49.
- , Rödl, Florian (2012), »Illegitim und rechtswidrig. Das neue makroökonomische Regime im Euroraum«, in: *Wirtschaftsdienst –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politik* 92 (2012), S. 219-222.
- , Schäfer, Armin (2010), »A New Phas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Organized Capitalism in Post-Ricardian Europe«,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3 (2010), S. 344-368.
- Schäfer, Armin (2012), *Integration among Unequals. How the Heterogeneity of Europea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Shapes the Social and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the EU*, Köln.
- , Schäfer, Armin, Zimmermann, Hubert (2012), »Erweiterung, Vertiefung und Demokratie. Trilemma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7. April 2012, S. 12.
- Illmer, Martin (2009), »Equity«, in: Basedow, Jürgen, u. a. (Hg.), *Handbuch des Europäischen Privatrechts*, Bd. I, Tübingen: Beck, S. 400-404.
- Ingham, Geoffrey (2004), *The Nature of Money*, Cambridge: Polity.
- Judt, Tony (2005),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Penguin (dt.: *Die Geschichte Europas von 1945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Wien: Hanser 2006).

- Kalecki, Michal (1943), »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in: *Political Quarterly* 14 (1943), S. 322-331.
- Katz, Harry C., Darbishire, Owen (2000), *Converging Divergences. Worldwide Changes in Employment System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utto, Mikko (2010),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Castles, Francis G., u. a. (Hg.),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 586-600.
- Kerr, Clark, u. a. (1960),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ynes, John Maynard (1967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dt.: *Allgemeine Theorie der Beschäftigung, des Zinses und des Geldes*, München,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36).
- Kochan, Thomas A. (2012a), »A Jobs Compact for America's Future«, i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ärz (2012), S. 64-73.
- (2012b), *Resolving the Human Capital Paradox. A Proposal for a Jobs Compact. Policy Paper*, Kalamazoo.
- Konrad, Kai A., Zschäpitz, Holger (2010), *Schulden ohne Sühne? Warum der Absturz der Staatsfinanzen uns alle trifft*, München: C. H. Beck.
- Korpi, Walter (1983),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 Krippner, Greta R. (2011),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ristal, Tali (2010), »Good Times, Bad Times. Postwar Labor's Share«,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 (2010), S. 729-763.
- Kuttner, Robert (1980), *Revolt of the Haves. Tax Rebellions and Hard Tim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63 [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ockwood, David (1964),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in: Zollschan, George K., u. a. (Hg.),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London: Houghton Mifflin, S. 244-257.
- Lutz, Burkart (1984), *Der kurze Traum immerwährender Prosperität. Eine Neuinterpretation der industriell-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 im Europa des 20. Jahrhunderts*, Frankfurt/M.: Campus.
- Luxemburg, Rosa (1913),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Ein Beitrag*

- zur ökonomischen Erklärung des Imperialismus, Berlin: Buchhandlung Vorwärts Paul Singer.
- Maier, Charles S. (2012), *Europe Needs a German Marshall Plan*. *New York Times*, 9. Juni 2012.
- Marcuse, Herbert (1967),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Studien zur Ideologie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Neuwied: Luchterhand.
- Markantonatu, Maria (2012), *The Uneasy Course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in Greece. Regulation Modes and Crises from the Post-War Period to the Memoranda*. MPIfG Discussion Paper, Köln.
- Martin, Isaac William (2008), *The Permanent Tax Revolt. How the Property Tax Transformed American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1966 [1867]),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 1, Berlin: Dietz.
- (1966 [1894]),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 3, Berlin: Dietz.
- Maslow, Abraham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i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 S. 370-396.
- Matthes, Jürgen, Busch, Berthold (2012), *Governance-Reformen im Euroraum. Eine Regelunion gegen Politikversagen. IW-Positionen. Beiträge zur Ordnungspolitik aus dem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öln.
- Mayntz, Renate (Hg.) (2012), *Crisis and Contro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 Frankfurt/M.: Campus.
- McMurtry, John (1999), *The Cancer Stage of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 Mehrtens, Philip (2013), *Staatsentschuldung und Staatstätigkeit. Zur Transformation der schwedischen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iversität Köln und Max-Planck-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 Köln.
- Mertens, Daniel (2013), *Privatverschuldung in Deutschland. Zur institutionellen Entwicklung der Kreditmärkte in einem exportgetriebenen Wachstumsregime*.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 Köln.
- Miegel, Meinhard (2010), *Exit. Wohlstand ohne Wachstum*, Berlin: Propyläen.
- Mills, C.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Oxford u. 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t.: *Die amerikanische Elite*, Hamburg: Holsten 1962).
- Milward, Alan (1992), *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 State*, London: Routledge.

- Molander, Per (2000), »Reforming Budgetary Institutions. Swedish Experiences«, in: Strauch, Rolf R., u. a. (Hg.),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Fiscal Policy*, Boston u. a.: Springer, S. 191-212.
- (2001), »Budgeting Procedures and Democratic Ideals. An Evaluation of Swedish Reforms«, in: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1 (2001), S. 23-52.
- Moravcsik, Andrew (1997), »Warum die Europäische Union die Exekutive stärkt. Innenpolitik und internationale Kooperation«, in: Klaus Dieter Wolf (Hg.), *Projekt Europa im Übergang?*, Baden-Baden: Nomos, S. 211-270.
- Musgrave, Richard (1958),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McGraw-Hill.
- North, Douglass C., Thomas, Robert Paul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Connor, James (1972), »Inflation, Fiscal Crisis,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Socialist Revolution* 2 (1972), S. 9-46.
-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 Offe, Claus (1970), *Leistungsprinzip und industrielle Arbeit. Mechanismen der Statusverteilung in Arbeitsorganisationen der industriellen »Leistungsgesellschaft«*, Frankfurt/M.: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 (1972a), »Politische Herrschaft und Klassenstrukturen«, in: Kress, Gisela, u. a. (Hg.), *Politikwissenschaft*, Frankfurt/M.: Fischer, S. 135-164.
 - (1972b), *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 Aufsätze zur politischen Soziologie*, Frankfurt/M.: Campus.
 - (1975), *Berufsbildungsreform. Eine Fallstudie über Reformpolitik*, Frankfurt/M.: Suhrkamp.
 - (2006a), »Erneute Lektüre. Die »Strukturprobleme« nach 33 Jahren«, in: Borchert, Jens, u. a. (Hg.), *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 Veränderte Neuauflage*, Frankfurt/M.: Campus, S. 181-196.
 - (2006b), *Reflections on America. Tocqueville, Weber & Adorno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Polity.
 - (2008), »Governance. »Empty Signifier« ode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Forschungsprogramm?«, in: Schuppert, Gunnar Folke, u. a. (Hg.), *Governance in einer sich wandelnden Welt*, Wiesbaden 2008, S. 61-76.

参考文献

- Palier, Bruno (2010), »Continental Western Europe«, in: Castles, Francis G., u. a. (Hg.),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 601-615.
- , Thelen, Kathleen (2010), »Institutionalizing Dualism. Complementarities and Change in France and Germany«,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38 (2010), S. 119-148.
- Pierson, Paul (1994),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World Politics* 48 (1996), S. 143-179.
- (1998), »Irresistible Forces, Immovable Objects.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 Confront Permanent Austerity«, i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5 (1998), S. 539-560.
-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2000), S. 251-268.
- (2001), »From Expansion to Austerity. The New Politics of Taxing and Spending«, in: Levin, Martin A., u. a. (Hg.), *Seeking the Center. 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at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S. 54-80.
- (2004),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Karl (1957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d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Ursprünge von Gesellschaften und Wirtschaftssystemen*, Frankfurt/M.: Suhrkamp 1978).
- Pollock, Friedrich, *Stadien des Kapitalismus*, München: C. H. Beck.
- (1981 [1941]), »Staatskapitalismus«, in: Dubiel, Helmut, u. a. (Hg.), *Wirtschaft, Recht und Staa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M.: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S. 81-109.
- Poterba, James M., Hagen, Jürgen von (Hg.) (1999),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Fiscal Policy*, Chicago: Springer.
- Putnam, Robert D. (1993),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Evans, Peter B. (Hg.), *Double-Edge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 431-486.
- Rademacher, Inga (2012), *National Tax Policy in the EMU.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Common Monetary Policy on the*

- Distribution of Tax Burdens*. (Diss.), Fachbereich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Frankfurt/M.
- Raithel, Thomas, u. a. (Hg.) (2009), *Auf dem Weg in eine neue Moderne?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n siebziger und achtziger Jahren*,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 Rappaport, Alfred (1986), *Creating Shareholder Value*, New York: Free Press.
- Reinhart, Carmen M., Rogoff, Kenneth S. (2010),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639.
- , Sbrancia, M. Belén (2011), *The Liquidation of Government Debt*.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Cambridge.
- Rose, Richard (1990), »Inheritance Before Choice in Public Policy«, i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 (1990), S. 263-291.
- , Davies, Phillip L. (1994), *Inheritance in Public Policy. Change Without Choice in Brita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stow, Walt W. (1990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ggie, John Gerard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1982), S. 379-399.
- Sachverständigenrat zur Begutachtung der gesamt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2011), *Jahresgutachten 2011/12. Verantwortung für Europa wahrnehmen*, Wiesbaden.
- Sarrazin, Thilo (2012), *Europa braucht den Euro nicht. Wie uns politisches Wunschenken in die Krise geführt hat*, München: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 Schäfer, Armin (2009), »Krisentheorien der Demokratie. Unregierbarkeit, Spätkapitalismus und Postdemokratie«, in: *Der moderne Staat* 2 (2009), S. 159-183.
- (2010), »Die Folgen sozialer Ungleichheit für die Demokratie in Westeuropa«, i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Politikwissenschaft* 4 (2010), S. 131-156.
- (2011), *Republican Liberty and Compulsory Voting*. MPIfG Discussion Paper 11/17, Köln.
- , Streeck, Wolfgang (2013), »Introduction«, in: Schäfer, Armin, u. a. (Hg.),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Cambridge: Anchor.
- Scharpf, Fritz W. (1991), *Crisis and Choice i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6), »Negative and Positive Integr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

- omy of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in: Marks, Gary, u. a. (Hg.),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Sage, S. 15-39.
- (2010), »Solidarität statt Nibelungentreue«, in: *Berliner Republik* 12 (2010), S. 90-92.
 - (2011a), »Mit dem Euro geht die Rechnung nicht auf«, in: *Max-PlanckForschung* 11 (2011), S. 12-17.
 - (2011b), »Monetary Union, Fiscal Crisis and the Pre-Emption of Democracy«, in: *Zeitschrift für Staats- und Europawissenschaften* 9 (2011), S. 163-198.
 - (2012), »Rettet Europa vor dem Euro«, in: *Berliner Republik* 14 (2012), S. 52-61.
 - , Schmidt, Vivien A. (Hg.) (2000a), *Welfare and Work in the Open Economy. Volume I. From Vulnerability to Competitive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b), *Welfare and Work in the Open Economy. Bd. II: Diverse Responses to Common Challe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lieben, Michael (2012), »Die wählen sowieso nicht«, ZEIT ONLINE, 13. Mai 2012.
- Schmitter, Philippe C., Lehmbruch, Gerhard (Hg.) (1979), *Trends Towards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London: Sage.
- , Streeck, Wolfgang (1999), *The Organiza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s. Studying the Associative Action of Busines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MPIfG Discussion Paper 99/1, Köln.
- Schor, Juliet (1992),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ularick, Moritz (2012), *Public Debt and Financial Cri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scussion Paper*, Berlin.
- Schumpeter, Joseph A. (1953 [1918]), »Die Krise des Steuerstaates«, in: Schumpeter, Joseph A. (Hg.),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S. 1-71.
- (2006 [1912]),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Seikel, Daniel (2012), *Der Kampf um öffentlich-rechtliche Banken. Wie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Liberalisierung durchsetzt*. (Diss.)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 Shefrin, Hersh (2002), *Beyond Greed and Fear. Understanding Behavioral Finance and the Psychology of Inves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onfield, Andrew (1965), *Modern Capitalism. The Changing Balance*

-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Shonfield, Suzanna (1984), *In Defense of the Mixed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nn, Hans-Werner (2011), »Das unsichtbare Bail-Out der EZB«, in: *Ökonomenstimme*, 11. Juni 2011.
 - Spiro, David E. (1999), *The Hidden Hand of American Hegemony. Petrodollar Recycling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einbrück, Peer (2006), »Lobbyisten in die Produktio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2. Januar 2006.
 - Steuerle, C. Eugene (1992), *The Tax Decade. How Taxes Came to Dominate the Public Agenda*, Washington: Urban Institute Press.
 - Stiglitz, Joseph E. (2003), *The Roaring Ninetie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dt.: *Die roaring nineties. Der entzauberte Boom*, Berlin: Siedler 2004).
 - Strauch, Rolf R., Hagen, Jürgen von (Hg.) (2000),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Fiscal Policy*, Boston u. a.: Springer.
 - Streeck, Wolfgang (1994), »Pay Restraint Without Incomes Policy. Constitutionalized Monetarism and Industrial Unionism in Germany«, in: Boyer, Robert, u. a. (Hg.), *The Return to Incomes Policy*, London 1994, S. 114-140.
 - (1995), »From Market-Making to State-Building?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in: Leibfried, Stephan, u. a. (Hg.), *European Social Policy. 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S. 389-431.
 - (1997), »German Capitalism. Does it Exist? Can it Survive?«,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2 (1997), S. 237-256.
 - (2006), »The Study of Interest Groups. Before ›The Century‹ and After«, in: Crouch, Colin, u. a. (Hg.), *The Diversity of Democracy. Corporatism, Social Order and Political Conflict*, London: Edward Elgar, S. 3-45.
 - (2009a), *Flexible Employment, Flexible Familie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Reproduction, Working Paper*.
 - (2009b), *Re-Forming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0), »Institutions in History. Bringing Capitalism Back In«, in: Campbell, John, u. a. (Hg.),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 659-686.

参考文献

- (2011a), »A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in: *New Left Review* 71 (2011), S. 1-25.
 - (2011b), »E Pluribus Unum? Varieties and Commonalities of Capitalism«, in: Granovetter, Mark, u.a. (Hg.),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3. Aufl.),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S. 419-455.
 - (2011), »Taking Capitalism Seriously. 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in: *Socio-Economic Review* 9 (2011), S. 137-167.
 - (2012a), »The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in: *New Left Review* 76 (2012), S. 27-47.
 - (2012b), »Wissen als Macht, Macht als Wissen. Kapitalversteher im Krisenkapitalismus«, in: *Merkur* 66 (2012), S. 776-787.
 - Mertens, Daniel (2010), *An Index of Fiscal Democracy*. MPIfG Working Paper 10/3, Köln.
 - Mertens, Daniel (2011), *Fiscal Austerity and Public Investment. Is the Possible the Enemy of the Necessary?*, MPIfG Discussion Paper 11/12, Köln.
 - Thelen, Kathleen (2005), »Introduc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in: dies., u. a. (Hg.),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 1-39.
- Taibbi, Matt (2009), »The Great American Bubble Machine«, in: *Rolling Stone*, 9. Juli 2009.
- Tarschys, Daniel (1983), »The Scissors Crisis in Public Finance«, in: *Policy Sciences* 15 (1983), S. 205-224.
- Thielemann, Ulrich (2011), »Das Ende der Demokratie«, in: *Wirtschaftsdienst –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politik* 91 (2011), S. 820-823.
- Tomaskovic-Devey, Donald, Lin, Ken-Hou (2011), »Income Dynamics, Economic Rents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Economy«,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 (2011), S. 538-559.
- Wagner, Adolph (1892), *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dritte Auflage, Leipzig: Wint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 (1911), »Staat in nationalökonomischer Hinsicht«, in: Elster, Ludwig, u. a. (Hg.),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Jena: G. Fischer, S. 727-739.
- Wagschal, Uwe (1996), *Staatsverschuldung. Ursachen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Oplad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2007), »Staatsverschuldung«, in: Nohlen, Dieter, u. a. (Hg.), *Kleines Lexikon der Politik*, München: C. H. Beck, S. 547-552.
- Weber, Max (1956),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Erster Halbband*, 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 Weizsäcker, Carl Christian von (2010), »Das Janusgesicht der Staatsschuld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5. Juni 2010.
- Werner, Benjamin (2012), *Die Stärke der judikativen Integration. Wie Kommission und Europäischer Gerichtshof die Unternehmenskontrolle liberalisieren*. (Diss.)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 Western, Bruce, Rosenfeld, Jake (2011), »Unions, Norms, and the Rise in U. S. Wage Inequality«,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 (2011), S. 513-537.
- Williamson, O. E., u. a. (1975), »Understanding the Employment Relation. The Analysis of Idiosyncratic Exchange«, i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6 (1975), S. 250-278.
- Wright, Erik Olin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 (Wolfgang Streeck)

德国科隆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研究院院长，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在此之前他曾先后于法兰克福、纽约、明斯特和柏林任教，然后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担任社会学和工业关系学教授。他还是社会经济学促进学会 (SASE) 的荣誉会员，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以及欧洲科学院院士。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对2008年金融危机最好的分析——内容丰富、可信，言辞激烈且尖锐。”

——乌尔里希·托伊舍 (Ulrich Teusch)，西南广播公司 (SWR 2)

“施特雷克找到了一种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启蒙的危机讲述方式，这种方式让人看得更清楚，而不会因为世界的复杂性而悲观失望。”

——《南德意志报》 (Süddeutsche Zeitung)

“我们不一定要赞同施特雷克的怀疑态度，但这种怀疑经过了充分的论证。希望这本书能赢得很多读者。”

——史蒂芬·福格尔 (Steffen Vogel)，《日报》 (Die Tageszeitung)



甲骨文微信公众号

www.ssap.com.cn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ISBN 978-7-5097-7603-2



9 787509 776032 >

ISBN 978-7-5097-7603-2

定价：45.00元